

概要

新罗千年的  
历史与文化

文化篇

提供资料(按韩文字母顺序)

江原文化财研究所	三星美术馆Leeum
庆南文化财研究院	尚州博物馆
庆北大学博物馆	圣林文化财研究院
庆尚北道文化财研究院	新罗文化遗产研究院
启明大学行素博物馆	岭南文化财研究院
国罡考古学研究所	我们文化财研究院
国立伽倻文化财研究所	蔚山大学博物馆
国立庆州文化财研究所	蔚山文化财研究院
国立庆州博物馆	蔚山博物馆
国立公州博物馆	蔚山发展研究院
国立金海博物馆	中央文化财研究院
国立文化财研究所	中原文化财研究院
国立中央博物馆	昌原大学博物馆
国立中原文化财研究所	韩国文化财财团
国立清州博物馆	韩光文化财研究院
国立春川博物馆	韩神大学博物馆
大邱天主教大学博物馆	朴光烈
东国大学庆州校区博物馆	安秉灿
福泉博物馆	崔应天
釜山大学博物馆	咸舜燮
釜山博物馆	
佛教文化财研究所	
佛教中央博物馆	
三江文化财研究院	

凡例

1. 本概要以新罗的萌生至附属于高丽时期为对象。
2. 以专刊内容为基础，分历史篇与文化篇进行了叙述。
3. 按具专业性教育书籍的标准进行了整理。
4. 执笔者从《新罗千年的历史与文化》执笔者中选定。
5. 韩文原稿通过了工作组的校阅和审校。
6. 外文版以韩文原稿为基础进行翻译，并通过了外国专业人士的审校。
7. 图片资料是根据专刊和资料集收录的。
8. 外文标注整理为学界通用的用语，固有名词的英文标记采用了罗马字母标记法。



## 发刊词

千年王国新罗最早完成了韩民族统一大业，绽放了灿烂的文明之花。它是凭借特有的开放性和进取性在丝绸之路上进行多方文化交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家。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综合、系统汇编新罗历史的史书，不禁令人遗憾。这是我们庆尚北道的作为古代新罗根基而编撰本书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以此来完成我们所肩负着的历史使命，即用我们的双手开展寻找民族的根基，弘扬根基文化。

《新罗千年历史与文化》一部书可以说是一项规模宏大的丛书编撰工程。本丛书以“新罗国前身斯卢国的出现”、“古代国家体制的形成和发展”、“统一三国的完成”以及“新罗延续至高丽”等历史发展时期为主线，整体叙述了新罗历史进程。并以简洁明快地描述并解释新罗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求浅显易懂、容易理解。

编撰并出版长达千年的新罗历史丛书，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新罗所创造的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的财富也是韩国文化的源泉，因此值得我们迎接挑战、付出极大的努力来完成此项工作。《新罗千年历史与文化》编撰工作自从2011年以“如何编写新罗史”为主题举办学术会议以来，历经五年的艰辛工作终于完成。这部丛书是韩国136名新罗史专家学者们共同协力而完成的一部力作，共有30册，12000页之多。这无疑是集编纂委员、编辑委员、编写组全体成员智慧和热情的结晶。

《新罗千年历史与文化》的编撰工作的意义非常之重大，并非整理过去的历史那么简单。这是一件通过本民族历史的重新整理的编写，找回民族自尊心、准确树立民族认同感的事情。编撰成果将会成为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的宝贵资料，也会成为向海外传播曾经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交流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国家新罗的历史文化的珍贵载体。对我们来说，铭刻千年历史进程中的大量故事、神话、传说以及文化遗产等等文化因素都会成为我们发展旅游事业取之不尽的源泉。

世界正以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如果说文艺复兴结束了黑暗的中世纪；工业革命推动历史步入近代社会，那么进入21世纪的现在，可以说世界正处在文化革命时期。同时也可谓处在物质文明的发展因‘智能’的出现而登峰造极的时代。在这样的尖端技术革命的时代，相信只有称之为‘我们’的‘认同感’才可以成为我们设计未来的唯一的精神价值。

随着时代的变迁，衡量历史的尺度或许会发生变化，但历史价值始终不会改变，它会成为链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规定我们未来的生活。这便是通过了解历史所学到的智慧。新罗时期虽离我们现在很遥远，但我们的的确确是通过吸取新罗国的历史与文化精华，生活在现代并且走向未来。了解历史与文化就是寻找我们祖先的精神和灵魂的事情。

庆尚北道的道厅所在地即将迁移至安东、礼泉地区，并向世界宣告蓬勃发展的新庆北时代的开启。在这重新起飞的历史时期，编撰《新罗千年历史与文化》工程的完成，其意义重大。它将会成为庆北地区新千年之旅的精神、文化基础。期待《新罗千年历史与文化》的编撰工程将成为开启新庆北时期的序幕，成为一部培养韩民族历史意识上不朽的大众历史书籍。

最后，谨向肩负着“编写不朽的民族史书”之使命，倾注满腔热情的执笔组以及相关人士致以深深的谢意！

2016年12月

庆尚北道知事

## 前言

在新罗千年历史进程中，最初700余年是三韩列国之一的斯卢国时期。自斯卢国兴起的新罗一跃成为王国之后，与先进的高句丽、百济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从严格意义上讲，三国统一之前那段漫长的韩国古代史不应以某个国家为中心重新构筑，只有在三韩或者三国整体的有机框架内理解每个国家的历史，才能保证其客观准确性。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韩国古代史研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藉此，研究者们一直不断地尝试着对所取得的丰富成果按国家进行总的整理、汇编工作。

在韩国历史研究中，北朝鲜当局以政治目的为先，有意把高句丽看作三国的正统，而百济和新罗贬为其附属国。北朝鲜从这种立场出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集中研究了高句丽史的现象已不再是鲜为人知的事实。期间，我们也曾持续不断地开展了整理、汇编相关加耶国、百济国历史研究成果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教育人力资源部设立加耶史政策研究委员会，旨在探求开发与整备加耶文化圈的理论依据。截止21世纪初，有釜山大学韩民族文化研究所为基地，历经数年进行了对金海地区加耶史迹的整理工作，同时进行了对加耶史和加耶考古学研究成果的综合、整理工作。而10余年前，忠南历史文化研究院在忠清南道预算支持下，历经三年，陆续出版了15册相关研究丛书以及收录各种文献、考古资料的《百济文化史大系》25册，另学界大受裨益。

从这种趋势和动向来看，庆尚北道于2011年12月以庆北文化财研究所为责任机构，着手开展此项《新罗千年历史与文华》编撰工作的意义匪浅。因为新罗的历史与文化，从狭义上讲是庆北地区传统文化的根基，但从广义上看也是韩民族历史的基干。综合整理截止目前所取得的有关新罗历史与文化研究丰硕成果的工作，是一项具有重新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意义的意义的工作。事实上，迄今为止的相关新罗史研究在韩国史研究过程中一直做到了牵头作用。那是因为作为古代史研究资料中有‘双碧’之誉的《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的大部分内容是以新罗为中心记述的。而作为辅助资料的碑文和出土文物等金石文资料中，属于新罗的内容最为丰富，较他国明显占优势。就拿被发现的

木简情况来讲，活生生地反映新罗社会生活的木简发现量也不亚于百济地区所发现的木简量。总而言之，我们对三国的了解以新罗最为丰富。然而，新罗国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受高句丽、百济等国的影响。反过来想，我们籍以新罗的文化及社会制度，可以以此类推因缺乏史料而难以理解并构筑的高句丽、百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等等，这一点也很有意义。目前韩国古代史学界以新罗史相关的知识积累为基础，奠定了理解高句丽、百济历史的基石和框架，这已然成为了一股趋势。

《新罗千年历史与文化》编纂委员会在出版发行相关研究丛书22册、资料集8册、概要2册及其韩国语版本和3种外国语版本的过程中，并没有满足于重新构筑乡土历史与文化史来触发普遍关注并鼓吹热爱乡土的意识，而是拟定复原韩国古代史作为最终目标，始终以此为我们信念和使命来履行此项工作。但这是一项有40多名专家参与，汇集270余篇文章的大部头编撰工作的宏大计划，期间也曾出现过预想不到的难关。因此作为属于庆尚北道所在地迁移工程内容之一的本丛书出版计划不得已推迟2年，为此表示歉意。并向庆尚北道行政府历届知事兼编纂委员会共同委员长李周锡、朱洛荣、金玄基、金章周表示谢意。此外，我们仅代表本编纂委员会向接受我们全面委托，在5年期间出色地执行各种编撰工作的编委卢重国、朱甫墩、李熙濬教授和庆尚北道文化财研究院李东喆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忘我的付出。

2016年12月

《新罗千年的历史与文化》编纂委员会委员长 李基东

引言	010
----	-----

## 第 I 篇

## 新罗

<b>第一章 新罗文化的萌动 斯卢国时期</b>	018
第1节 村落和居住	021
第2节 墓葬和葬礼	028
第3节 服饰	038
第4节 器具	043
第5节 透过出土文物看对外交流	058
<b>第二章 黄金文化的繁荣 麻立干时期</b>	064
第1节 城市与城郭	067
第2节 墓葬和葬礼	073
第3节 服饰	089
第4节 物品	102
第5节 透过出土文物看对外交流	120
<b>第三章 外来文物的接纳与发展 中古期</b>	132
第1节 金石文	135
第2节 墓葬和葬礼	152
第3节 佛教美术	158
第4节 服饰	171
第5节 农耕与生产	176
第6节 透过出土文物看对外交流	186

## 第 II 篇

## 统一新罗

<b>第一章 三国文化的融合与新罗文化的繁荣 统一新罗时期</b>	192
第1节 王京与地方城市	195
第2节 王陵	212
第3节 宗教与祭祀	220
第4节 佛教美术	233
第5节 儒学与文学	286
第6节 音乐	298
第7节 科学与技术	308
第8节 生活文化	334
第9节 农耕与生产	351
第10节 对外文物交流	362

# 引言

本书主要介绍新罗历经千年的文化瑰宝。文化这一概念随着如何去界定，如何去分类，其所包括的范畴也将有所不同。因此很难给文化下一个能让许多人都能达成共识的定义。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涵盖各种类型广泛且复杂多样的现象，以至所述之人所指的概念都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生活在地球不同地方的人们，其生存条件或生活方式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而这一事实又通过各类媒体被人们所了解。总之，很难用一句话简单概括文化究竟是什么，也许这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

即便如此，将人类群体的各种现象进行分类时，通常会沿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分类法，从这一点来看，可以将文化理解成除了前三项之外的其他现象。当然，这四个领域涵盖的现象相互关系紧密，并不像它们的名称一样划分得如此明确。说得再具体些，可以将文化理解为在人类群体生活中出现的现象中，除了与力量或权力行使有关的部分和成为其基础的经济部分以及与群体结构有关的社会部分之外的其他现象。但这种解释并不能告诉我们文化具体是指什么。为了解其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在与人类有关的各种现象中特别关注一下以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的探讨。

在人类学方面，作为其先驱者之一的爱德华·泰勒早在1871年就对文化下过定义，并广为引用。他指出：“文化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及除此之外的所有能力和习性。”这样说，似乎对文化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人类学的这种定义主要是着眼于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现象所涉及的文化范畴。因此，除了文献等记载的内容之外，对于无法直接观察其现象的新罗文化就无法适用这种解释。而绝大部分文献记录都是以政治事件为中心，直接记述文化现象的情况极其罕见。这种情况追溯至新罗初期更为明显。鉴于此，在解说新罗文化时只能由考古学者所指的文化——物质文化占据重要部分。

考古学常用的文化概念来自1929年戈登·柴尔德的定义。他说：“我们发现各种残存文物——土器，工具，装饰品，坟墓遗址，住宅形态——的特定类型同时出现的现象在不断重复。我们可以将这种规律性的具有关联特点的综合体称为‘文化集团’或‘文化’。”本书中介绍的土器等物品以及墓葬，居住遗址将

成为阐述新罗文化的重要项目。

序言未免有些冗长，但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我们在本书中就新罗文化选取具体阐述项目时，不得已只能采用大量来自考古学考证的领域或物质遗址及其研究成果。作为与此相关的文化项目，可能会包括村落和居住，墓葬和送葬仪典，服饰，物品以及对外文物交流等。此外，能以文献记载为中心重组的项目有宗教和祭祀，学问和文学，生活文化，艺术，科学和技术等。

在确定了叙述项目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叙述方式。最理想的叙述方式当然是按时间顺序对各个项目进行叙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方便地了解文化领域的发展趋势。但由于各时代保留完好的相关项目物质资料同历史记载偏差甚大，尤其是物质资料的保存并不均衡。例如，物质文化可追溯的朝代越久远其类型越少，我们可窥测的领域也会更小。此外，各时代的相关文献记载差距也甚大，难以照搬其在各项目领域中的记载。因此，能先将整个新罗史分成几个时期，从历时的角度进行记述，以更好地了解各时期内各项目的发展趋势。这种方式在了解各时代文化的整体脉络方面有着自己的优势。

纵观新罗千年的历史，经历了无数变迁与曲折。因此，为了系统了解新罗史本身，要将其分成几个小的段落去分析。我们从《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的记载中发现新罗时期的人们已经将自己的历史分成了三个阶段。由于两本史书的阶段划分标准或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所设定的时间点也自然有所不同。抛却两本书中重复的部分，将其融汇为一本后发现新罗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上古，中古，中代，下代等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上古时期尤为悠长，而且可分为前后出现明显差异的斯卢国时期和麻立干时期。换言之，可将新罗的千年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即斯卢国时期(BC57-AD356)，麻立干时期(356-514)，中古时期(514-654)，中代时期(654-780)，下代时期(780-935)。

这五个时期均有自己的特点，必须从历史学上明确地加以划分。但是，从文化方面来说，中代和下代虽然各有不同，但划分已不太明显，将其视为统一新罗的一个时期更为恰当一些。此外，在表现文化资料的质与量方面，统一新罗时期较之前的时代丰富和详细得多。尤其是文化方面的文献记录，说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一时期也不为过。因此，先将本书分为统一新罗前篇和统一新罗



图1 庆州舍罗里130号墓



图2 瑞凤冢金冠

篇，再将前篇细分为斯卢国时期，麻立干时期，中古期。

所谓古新罗时期和统一新罗时期的大分类在实际论述各文化的具体项目时，只能存在差异。斯卢国时期和麻立干时期的文化并不能以文献记录为基础进行论述。因此，自然以通过考古学资料获悉的物质文化为重点。这两个时期将会以村落和居住，墓葬和送葬仪典，服饰，物品以及对外文物交流为主进行描述，又因村落相关资料不足，就以在墓中出土的资料为重点。尤其与麻立干时期的村落有关的调查资料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将重点论述王京的都城和关防遗址，各地方的城廓。

从考古学调查方面来看中古期几近死角，尤其是与村落有关的资料几乎全无，只能暂不予论述。即便如此，从支持古新罗时期的一贯性角度出发，本



图3 壬申誓记石

文献记载为中心，以物质文化为辅助资料进行阐述，首先将介绍王京和地方城市。之前中古期因相关内容不多而跳过的王京的城市规划部分，也将在这里一同予以介绍。此外，因为这一时期的墓葬文化已经在前面的中古期介绍过，这一部分就将以王陵为题，从斯卢国时期开始整体梳理。接着，将介绍以墓葬土著宗教和国家祭祀，佛教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文化，并另行稍加详述佛教美术。这是因为与佛教相关的雕刻，建筑，工艺正是新罗有形文化的重要特点与成就。之后，将介绍儒学和文学，音乐，科学和技术项目。科学和技术部分将介绍天文和历法，度量衡，医药，造物技术，木版印刷术。其他内容包括介绍统一新罗时期的服饰和整个新罗时期饮食及居住的生活文化部分，统一新罗时期的农耕和物品部分以及对外文物交流部分。对外文物交流将包括这一时期的文献中记载的人才交流内容。

书将照搬墓葬和送葬仪典，服饰，物品，对外文物交流项目。此外，本书将单独论述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佛教美术项目，并增设构成这一时期特点的金石文项目，并连同下一时期即统一新罗时期的金石文也在此一并论述。这也是为了尽可能掌握各文化项目的整体脉络。在墓葬和送葬仪典方面，统一新罗时期处于中古期的延长线上，因此将在这里包含进这一时期的内容。

统一新罗时期将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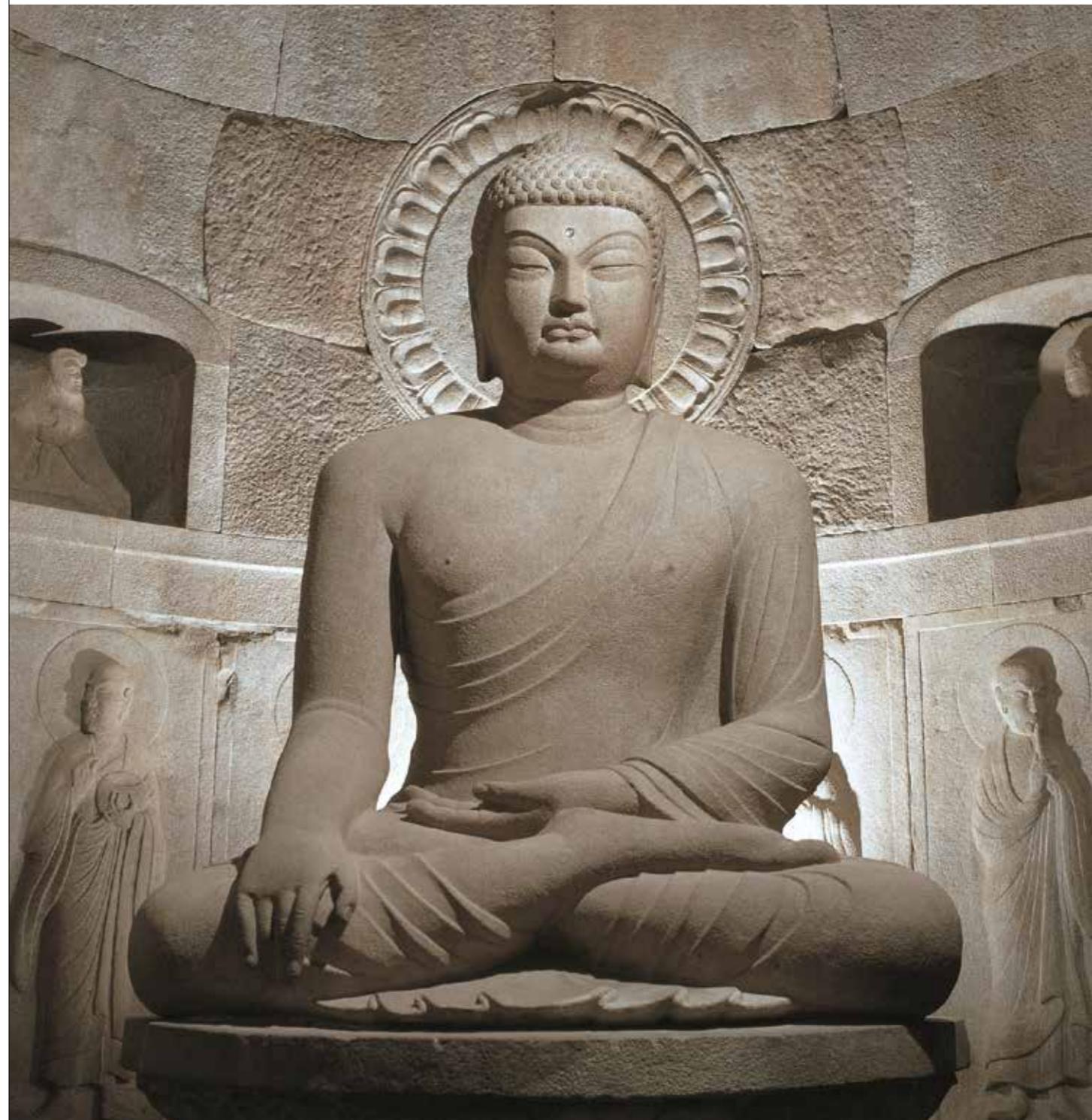


图4 石窟庵本尊佛



# 第 I 篇

## 新罗

新罗文化的萌动  
斯卢国时期

黄金文化的繁荣  
麻立干时期

外来文物的接纳与发展  
中古期

## 第一章

# 新罗文化的萌动

## 斯卢国时期

村落和居住  
 墓葬和葬礼  
 服饰  
 器具  
 透过出土文物看对外交流

在6世纪中期之前,岭南地区一直是新罗和伽倻活动的主要舞台,大致相当于洛东江主流及大小支流的流域。不属于这一水系的地区大体上只有东海岸和南海岸的部分地区,其中庆州地区作为新罗前身——斯卢国的活跃舞台及麻立干时代之后新罗的核心,具有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庆州地区属于盆地地形,不属于洛东江流域,但也不属于东海岸地区。该地区属于太白山脉的最下端,涵盖流入东海的小型河流兄山江的中,上游流域。

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庆州地区成为从洛东江主流流经的大邱出发回溯其支流琴湖江,向东经过永川前往东海岸,尤其是东南海岸到洛东江入海口的必经区域。反之,这里是从东南部海岸进入内陆的多条交通路线的交汇枢纽及关卡。可推测,这种地理位置在钢铁的出口等对外贸易极其活跃的辰韩·弁韩时期,在地缘政治上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以至成为斯卢国非常重要的成长和发展背景。

根据墓葬等考古学资料推测,斯卢国开始具备早期国家雏形始于公元前2世纪末至1世纪末左右,形成于该时期墓群的木椁墓是其重要证据。斯卢国的建国过程在文献记录中以神话或传说的形式出现。据文献记载,庆州一带从公元前1世纪便已形成6村的政治群体落户定居,随后朴,昔,金等三个族群又先后迁入,争夺政治性主导地位。他们所拥有的姓氏当然是后世之人附会的,但这也说明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个群体曾经在不同时期迁入,定居于庆州盆地。是他们形成了组成斯卢国的邑落。

之后,斯卢国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了由作为政治中心的国邑及多个邑落构成的基本结构。随着时间的流逝,邑落的数量可能有所增长。其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移民迁入后人口的增长。但是,它的具体进行过程和内部实际情况尚不明确。也有人认为6村就是真实的邑落数据,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其后人牵强附会的说法,因此并不能下定论。

斯卢国逐渐发展为辰韩的核心势力。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墓中随葬的文物中看出来,因为在当时的生活和文化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铁器,在庆州一带尤其显得样式多样与集中。到了2世纪中期,斯卢国开始迅速发展。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的韩条中记载,韩濊强大起来,成为威胁汉郡县的势力,这些足

以证明上述推论。而证明这一点的现象是2世纪中期代替过去的木棺墓出现的木椁墓这种新型墓祭形式。木椁墓无论是自身的规模还是随葬品的质量，都远超前一时期木棺墓的水平，而导致这种变化的背景正是炼铁技术的发展。这是铁制武器及农机具等的制造技术迅猛发展后，生产力得到提升，社会分化加速的结果。

到了3世纪末，斯卢国依然沿用辰韩之名，但已经和不少同盟国家一起多次进入朝鲜半岛内的乐浪，带方郡以及中国本土开展外交活动，并进口先进文物。在这种情况下，313年和314年高句丽发起了南下侵吞乐浪郡和带方郡的政治动乱，由此而引发的波动随即影响到了南方。流民大规模迁徙至南方，辰韩社会内部则为了应对来自外界的危机而开始了整合运动。其具体的进行方式是斯卢国依次吞并了自己的邻国。其结果就是继承并融合辰韩的大部分基业而建立新罗。



## 村落和居住

### 村落分布情形

纵览庆州地区自身的地形，会发现兄山江的支流形成了多处沟谷地带。向西，作为与相邻的永川琴湖江上游水系的分界线，大川向东流去形成一个沟谷地带；向南，作为与相邻的彦阳洛东江入海口水系的分界线，兄山江的上游麟川向北流去形成一个沟谷地带；向北，兄山江下游的支流形成了多处沟谷地带。其中，尤其向东西方向延伸的沟谷地区相当于从东北方向的东海岸地区绕过太白山脉的最南端，进入洛东江支流琴湖江流域——永川的交通要道。东南方向有南川流出与兄山江汇流，与南川分割水系的东川则沿着同一沟谷地带流向东南方向，汇入东海太和江的入海口。庆州地区彼此泾渭分明的几个主要沟谷地带自然而然成为部落(邑落)活跃的舞台。据推测，正是因为它们集中在一起才形成了斯卢国。

但是，尚无说明这些邑落自身拥有怎样的结构的文献资料，也没有正式调查过可以了解辰韩·弁韩时期各国村落结构的居住遗址。因此，只能通过建造在村落附近的，间接反映人类群体居住情况的这一时期古墓的分布来推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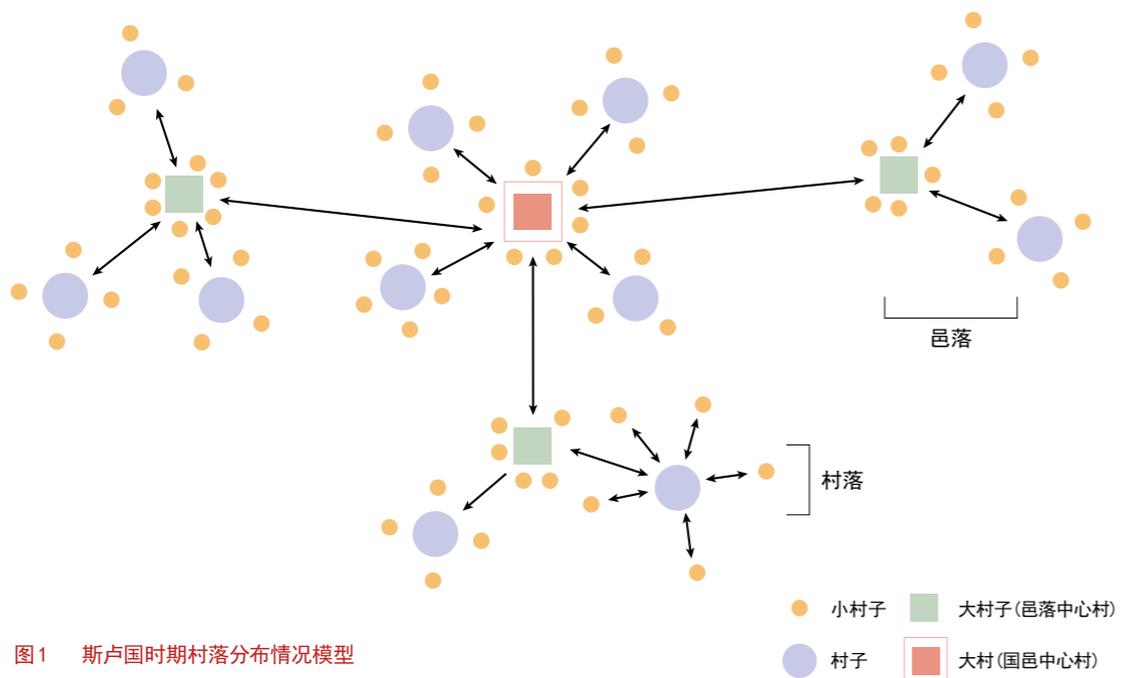


图1 斯卢国时期村落分布情况模型

村落的分布及其结构。假设目前发现的斯卢国时期的各个古墓群对应多个村落，斯卢国时期村落分布情形如(图1)所示。

从公元前2世纪末至1世纪初前后，庆州盆地的各沟谷地带开始流行木棺墓。(图2)此外，继这些木棺墓群之后，在同一地点形成了木椁墓群及后期的坟墓，长期以来作为一种公墓使用。木棺墓群广泛分布在庆州盆地各地的现象说明这些建造者们所在的村落，乃至之后的村落也没离开其大框架，而是大体上固定，维持在公墓附近。

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于岭南各地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而左庆州如安康仁洞里等壅塞的交通枢纽地区也发现了木棺墓，从而可以从木棺墓上推测到前代邑落群居社会集结在一起，形成了某种网络。这可以解释为起初作为邑落联合体的斯卢国此时已经成立，从上述庆州以沟谷地区为主的自然环境来看，当时的斯卢国大概有5-6个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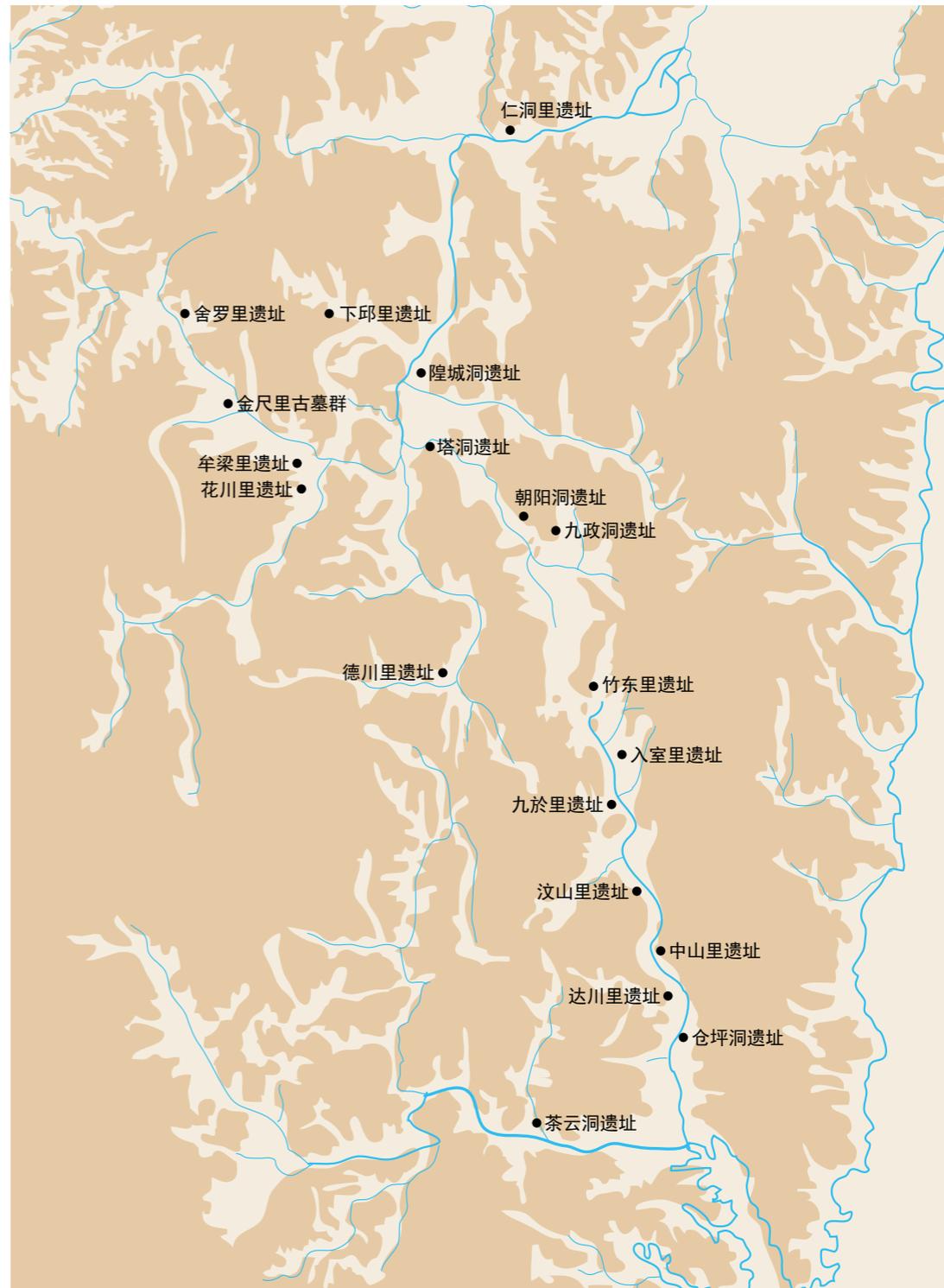


图2 庆州地区斯卢国时期遗址分布图

## 发掘的村落和生产遗址

截至目前在庆州地区发现的生活遗址有隍城洞村落遗址和月城附近的居住遗址,生产遗址以隍城洞的制铁相关遗址最具代表性。

隍城洞遗址集中了以居住地为代表的生活遗址,以木棺墓和木椁墓为中心的墓葬遗址,与制铁有关的生产遗址等,是各自占据不同区域构成的综合型遗址。该遗址位于庆州盆地西北方向兄山江河畔海拔30m左右的冲积带上,沿着河流方向呈南北分布状。北侧是坟墓遗址,南侧是生活及生产遗址。在隍城洞生活遗址中共发现了47处斯卢国时期的居住地,大致上可分为早期和晚期。

早期居住地共有17处,分布在整个遗址的西南方向,大体上平面呈圆形(图3)。以直径4-5m,宽度为20m<sup>2</sup>左右的小型为主,地基非常浅。居住地内部设施有靠在单薄的竖穴墙面上进行小型锻冶作业及炊事的火炉。该火炉未见其他特殊设施,只是略微凹进去的居住地面和灶台形态。部分居住地的火炉附近摆放着有砧石痕迹的大石头,因火灾被废弃的居住地则出土了制造铁器时用的铁块。对这些铁块进行科学性分析,其结果发现是将铁砂用作了原料。遗址年代推测在公元前1世纪后期至公元1世纪期间。该早期遗址的居住地应该是铁器锻造师的居住空间,同时有兼作制铁的锻冶工坊性质。

晚期居住地的平面形态以抹角长方形为主,与前期鲜明的对比。地基大体上较浅或索性建在地表上,墙体是粘土混合秸秆的泥墙。规模对比前期有所扩大,很多都超过30m<sup>2</sup>。内部设有1个火炉,在一侧墙面上设有类似火炕的保湿设施。(图4)出土的大部分文物都是土器。据考证,应该以公元3世纪前期为主。这一时期的居住地与前期兼作锻冶工坊的居住地不同,以具备制铁相关技能的工匠们的居住地居多。即,到了这一时期,与制铁相关的工作迁往野外独立的锻造炉,熔炼炉等工坊进行,居住地主要用作工匠们的居住空间。

月城附近的居住遗址是位于月城和鸡林之间的居住地和竖穴遗址,代表当时这一带已经形成了村落。这里出土了推测为斯卢国时期的两处居住地和竖穴遗址等。1号居住地的平面形态呈抹角长方形,规模估测为700cm×340~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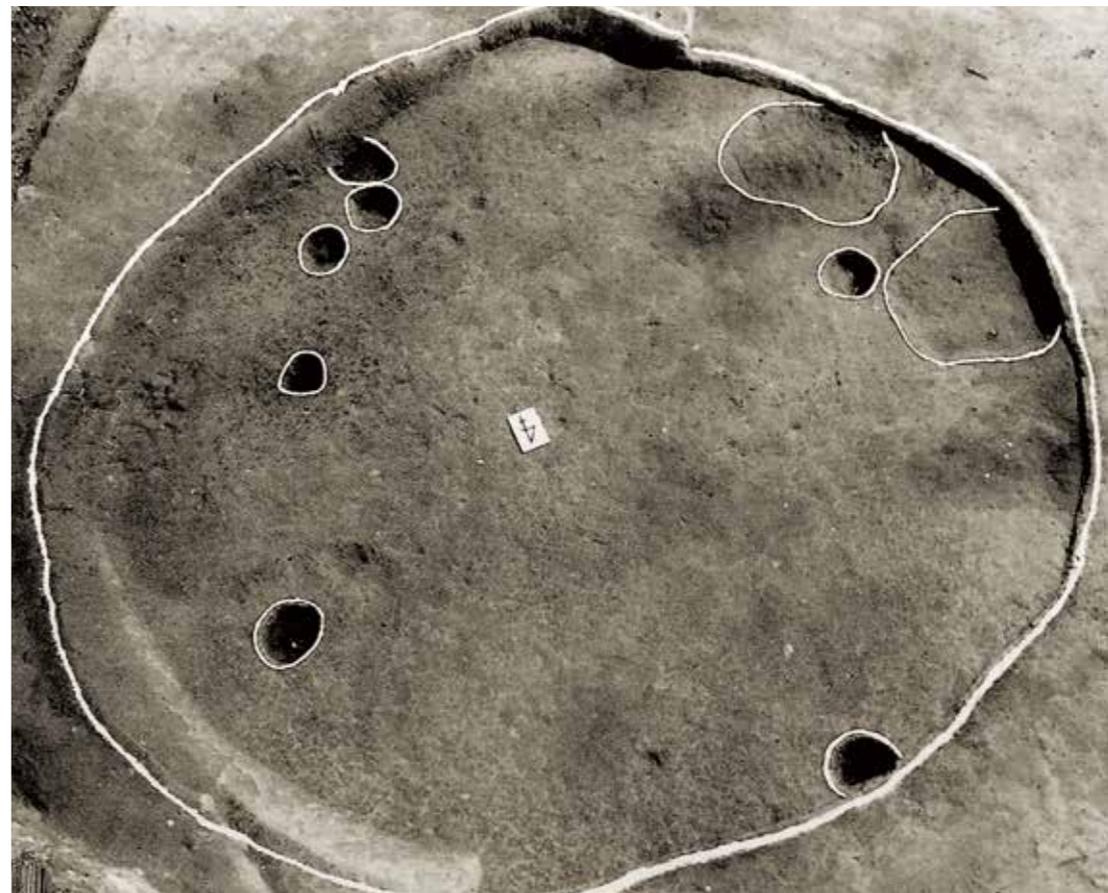


图3 庆州隍城洞遗址I-da-1号居住地

cm。从居住地和竖穴中出土的文物,据考证造于3世纪前期至后期之间。这些居住地随着月城垓子的建成而遭到了破坏。由此可见在月城及其垓子建成之前,这一带已形成了村落。据考证,不仅在月城北侧的平地,在月城内部也形成了村落。

最近在距此不远的Joksaem地区发现了同一时期的木椁墓群。墓葬规模不大,且只挖掘了一部分,但据测这一带应该有大量木椁墓存在。这些木椁墓群与月城附近的村落相隔一段距离,可见当时的生活空间和墓葬空间是分隔开的。这与同一时期隍城洞的墓群和居住群,制铁工坊等在空间上互相分隔,形成相邻分布的情形呈鲜明对比。据推测,隍城洞村落群体是受月城一带统治



图4 庆州隍城洞遗址I-Na-6号居住地

集团统治的底层生产村落群。

在隍城洞的制铁相关区域内并未发现生产过生铁的冶炼遗址，产品生产阶段的设施以铸造铁器用的熔炼炉和锻造铁器用的锻冶炉为主。早期的锻冶遗址是在上述斯卢国时期早期的隍城洞遗址第一期“Da”区居住地内部被发现的。从这一时期的生活遗址中发现的最大特点是作为生活空间的居住地与生产空间并没有分离。

在晚期遗址中发现了在野外作业的锻冶炉和小型的独立熔炼炉。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炼铁技术在自行发展的过程中，到了2世纪后期~3世纪，出现了熔炼铁块制作铁器的工艺，即熔炼，提炼，锻炼的分工趋势。

晚期的锻冶炉是挖一个椭圆形的浅显竖穴后，其内部中央呈50~100cm规格的椭圆形，地面铺有木炭，周边有当时应该用作砧石的大石头和锻造碎片。熔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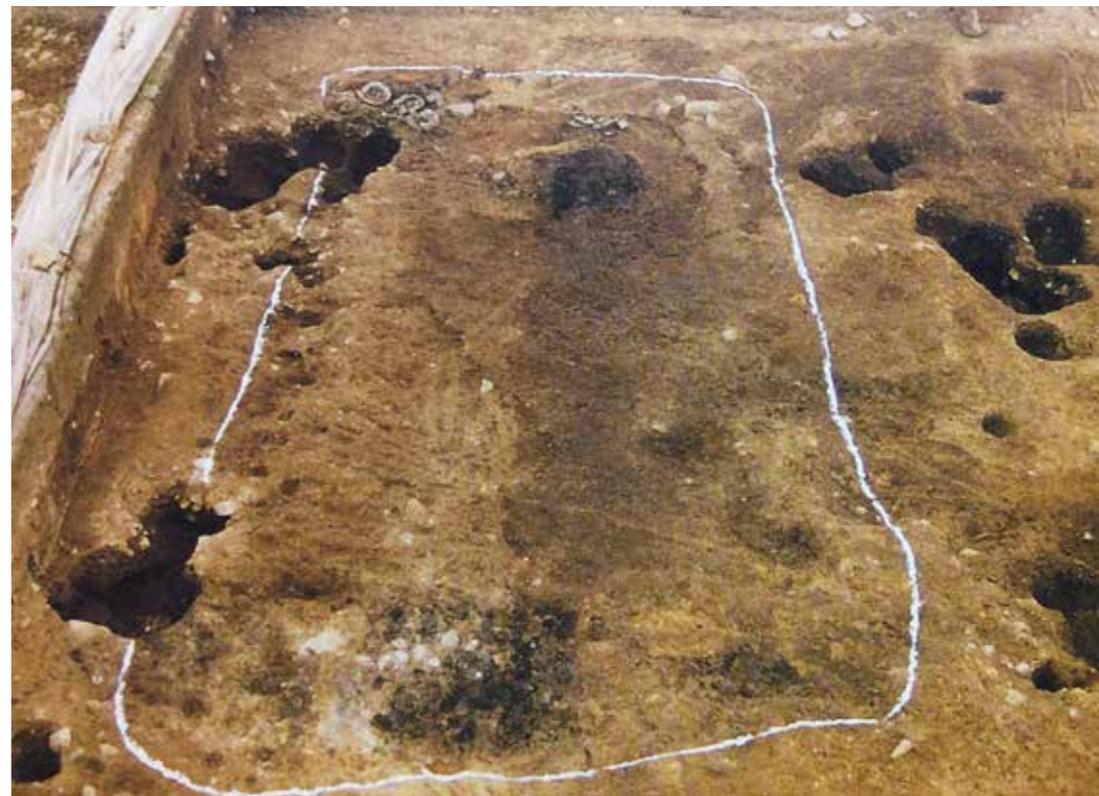


图5 庆州月城附近的居住遗址1号

炉是挖一个直径100cm左右的椭圆形竖穴，用混合了炉壁片等的黏土填充地面后再挖一个50cm左右的土坑，用混有秸秆的黏土建造墙体的结构。在这种熔炼炉的周围发现了大量砧石和锻造薄片，熔渣等。熔渣中发现有水滴状熔渣黏着在上面，证明此时已经在进行小型熔炼作业。此外还发现了精炼炉，炼钢炉。

隍城洞制铁遗址的发掘和分析结果说明，斯卢国最迟在3世纪时多样化且分工明确的大型制铁产业已颇具规模。在隍城洞遗址中发现的大口径通风管形态一直沿用至统一新罗时期。

## 墓葬和葬礼

### 斯卢国前期代表性墓制 木棺墓

在斯卢国时期的前期,即从公元前1世纪初~公元2世纪初,墓祭的整体主色调是木棺墓。这是一种像当代一样挖好墓坑后,将木棺放入后再铺上薄薄一层土的形式。虽然称这一时期的墓冢为木棺墓,但庆州地区却并未真正出土过木棺。但从1988年昌原茶户里1号墓中出土的木棺实物和其他考古学证据说明,大致上使用了两种木棺。一种是所谓的整木棺是取比人体身高稍长的实木剖成两半,将里面掏空后再相扣的。另一种是用木板打造的箱形棺材。

这两种木棺的形态差距反映了体系或传统的差距,也说明使用不同棺木的人出资不同。关于整木棺,在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和顺大谷里墓发现的木棺碎片很可能是整木棺的一部分。若这一现象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则整木棺就将与前代有关联,于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当地原住民的棺木形态。反之,板材棺木虽并无证据能确定其起源,但可以与朝鲜半岛西北地区的木棺墓形态联系起来,与来自那里的移民有关。

被认为是斯卢国前期代表性墓冢的朝阳洞38号墓的墓坑长258cm,宽



图6 庆州朝阳洞38号墓及其细部

128cm,深150cm左右,估测木棺的长度为190cm,宽度为65cm,高度为30~40cm(图6)。这么深的墓坑源自强烈的封尸意识,但这个深度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整体变浅的趋势。

墓坑的主轴方向大致上是东西方向,头朝东。这一习俗至少延续至麻立干时期。木棺墓的坟丘是何种形态和大小,并没有直接的证明材料。有一些间接证据就是在木棺墓的墓坑周围发现的沟渠[周沟]。在德川里遗址木棺墓16期中,大型墓4期的主体结构平面呈一字型,匚字形,口字型,后面两种均因围绕墓坑长边的主构部分太长,因此坟丘的平面形态可能是狭长的椭圆形或长的长方形。被认为是主体结构的坟丘最大规模为长800~900cm,宽600~700cm。这一数值是所能猜测到的最大规模,而实际规模有可能比这个小很多。虽然没有任何材料在说明坟丘的高度,但可能并不会像现在的坟丘一样耸起,墓顶可能是平坦的。

在斯卢国前期中代表较晚阶段的木棺墓可以舍罗里130号墓为例(图7)。该墓的墓坑平面形态为抹角长方形,规模上长度为332cm,宽度为230cm,深度



图7 庆州舍罗里130号墓

为100cm。而安置在其中的木棺据测长度应该为205cm，宽度应该为80cm。依据土层与墓圹底部的痕迹，木棺的平面形态是个“ㄩ”字形，用板材制作而成。相当于被葬者腰部的位置上设有长74cm，宽60cm，高15cm的腰坑。尤其是在木棺和墓圹之间随葬了大量文物这一点，被认为是充分体现了仪式的精致化。若沿着舍罗里130号墓的墓圹平面，用框架把这些文物都圈起来构成外框结构，便与下一阶段木槨墓相同。因此也将舍罗里130号墓称为木槨墓的先驱。

与木棺墓一同在斯卢国前期使用的墓式为瓮棺墓，坐落在木棺墓之间。瓮棺墓并非当时的主流墓式，因此这里将只阐述到木槨墓的阶段为止。瓮棺的结构在斯卢国时期前期有像江边路1号瓮棺墓一样的单翁式，但大部分都是两个相同器形土器组合的合口式(图8)。但到了后期，随着其他器类之间的组合增加，两耳附壶结合盘口碗或把手附碗的案例变多，还有在此基础上加上蒸屈等的三翁式。

斯卢国时期瓮棺的长度大致在1m左右，长轴方向与等高线方向平行，为东西方向。安置瓮棺的墓圹比瓮棺的大小略大一些。也许地面上会有坟墓标识，但已不可考。



图8 合口式瓮棺墓

### 斯卢国后期代表性墓制 木槨墓

木槨墓与木棺墓从根本上具有不同的结构及文物随葬文化。这是各地区为了增大首领的政治权力并强化相关墓葬仪式，扩大随葬空间而采用的方式。对比前面所述斯卢国前期的代表性墓冢一朝阳洞38号木棺墓和斯卢国后期的代表性墓冢—隍城洞江边路1号木槨墓(墓圹长414cm，宽338cm，深39cm，木槨可能长275cm，宽206cm)(图9)，二者的规模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2世纪中期出现的这种木槨墓只能说明当时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前面的木槨型木棺墓中表现出的一样，这是内部积累的一系列变化到了那时候一次性爆发的结果。

木槨墓的墓式特点首先是墓圹及木槨的长短较之以前小了很多。此外，在



图9 庆州隍城洞江边路1号墓

向木椁墓发展的过程中，最显著的变化中重要的一点是墓圻的深度变得极浅。因此，最初木椁本身处于地面之上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分明带有想要彰显覆盖其上的坟丘外观的意图。

木椁墓以平面为基准，分为近似方形，长方形，细长长方形等三种，近似方形是早期的形态，后两者是代替它出现的。总而言之，长方形和细长长方形到了后期就会形成主副椁式。

目前，可推测木椁墓的坟丘形态和规模的史料几近空白，在蔚山中山里遗址中发现了筑有护石的案例。蔚山中山里IA-26号墓是墓圻长度为840cm的细长长方形主副椁式卫石木椁墓，从中发现了长1480cm，宽760cm左右，平面呈长抹角长方形的护石(图10)。早期就开始有这种护石，说明当时的人们希望高筑坟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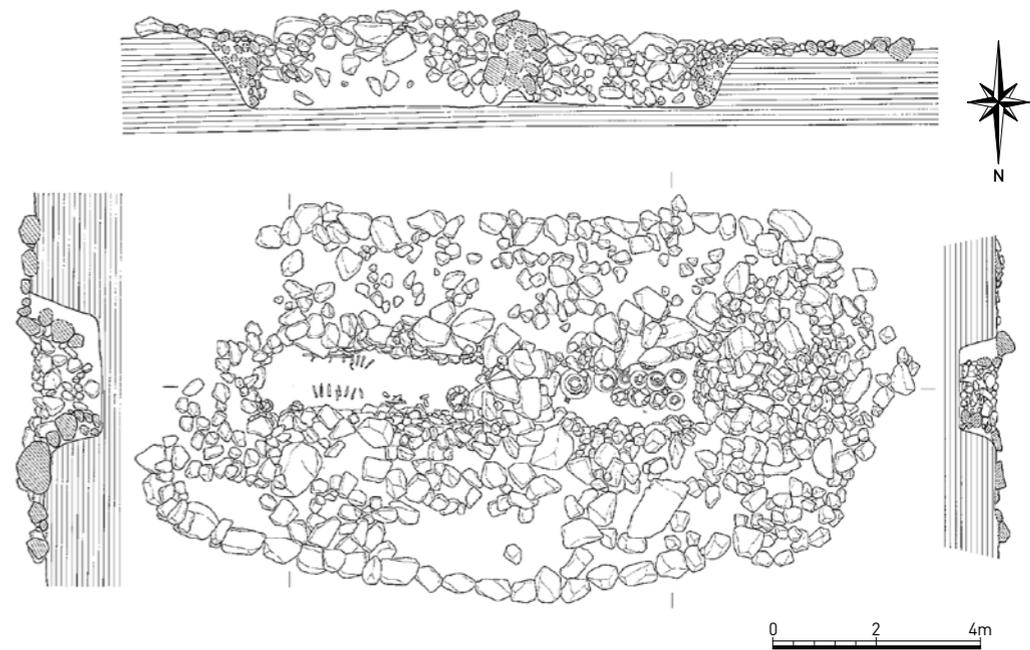


图10 蔚山中山里IA-26号主副椁式细长长方形木椁墓

### 从木椁墓到积石木椁墓

众所周知，积石木椁墓这一墓式是麻立干时期庆州统治阶层惯用的墓式。因其结构独特，所以它的起源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热议。过去认为是“外部传入说”占主流，例如从只用石头建造坟墓的高句丽传入等。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几乎已经可以肯定积石木椁墓是从庆州地区的木椁墓中慢慢进化演变而来的。

从“由木椁墓向积石木椁墓”慢慢进化的自我起源说考虑，这里通常被认为是积石木椁墓的最典型范例，其在木椁周围的墓圻之间和木椁之上堆石的形态并非一夜之间从木椁墓演变而来的。若只关注积石这一元素的变化，则是在墓圻和木椁之间的四周堆石的形态(四方积石式:最近通常称其为卫石式木椁墓)最早出现，然后是在木椁上也积石的形态，最后是木椁位于地面之

上, 筑造积石部覆盖其上的地上积石式。其中, 至少最早期的形态是斯卢国末期的墓葬形式, 因此有必要在此介绍一下。

从木椁墓首次登场的2世纪中期到细长方形主副棺式木椁墓出现的3世纪中期, 只有位于平原的古墓群中出现过部分卫石式木椁墓。但从3世纪后期开始, 在石材相对短缺的丘陵地区的古墓群中也出现了它们的身影, 逐渐具备了更加鲜明的积石木椁墓的形态。浦项兴海邑马山里积石木椁墓作为其代表性案例, 是说明在木椁底部铺一层小鹅卵石, 在木椁周围堆石的四方积石式积石木椁墓, 也难以归类为卫石式木椁墓的例子。该积石木椁墓是一座在小丘陵顶部以东西方向主轴先筑造的主副椁式木椁墓上, 向北距离3m左右, 仿佛瓢形墓一样并肩而建的方形积石式积石木椁墓。从各种迹象来看, 这似乎是一直坚持采用木椁墓到一定时期后, 突然之间就变成积石木椁墓的早期, 即最晚4世纪初的形态。



图11 浦项马山里遗址的大型四方积石式积石木椁墓

从墓冢的结构来看, 在墓圪中央安置了主椁, 在两侧的短壁侧安置了副椁或随葬柜子。墓圪的长度为800cm, 宽度为320cm, 深度为50cm。墓圪内除了西边的副椁位置和东边的随葬柜所在的东壁正下方之外, 整体铺设了长度为10~20cm左右的小鹅卵石形成地面后, 在上面安置了主椁, 其周边堆砌了宽度为60cm左右, 4~5层左右的河石。之后, 在墓圪和主·副椁之间, 用15~30cm左右的河石和割石填充了大约60cm左右的宽度。从主·副椁内部沉陷的土层形态来看, 木椁上部并没有积石。安置于中央的主椁规模长约290cm, 宽约110cm, 从金制耳饰的出土位置上判断, 应该是头向东侧(图11)。

在主椁及东侧和随葬柜之间有宽80cm, 高约20cm的间壁, 东侧短壁下方文物随葬空间的地面并未铺设小鹅卵石。在西侧的副椁和主椁之间并未发现间壁, 西侧副椁的底部保留了地基层原貌。西侧副椁的规模为长约190cm, 宽约195cm左右, 比主椁的内部宽度宽了大约85cm左右。这种随葬品分布说明头部摆放了随葬柜, 脚下摆放了副椁。

## 斯卢国时期的葬礼仪典

关于新罗丧葬仪典的记录近乎空白, 只有《隋书》中记载过新罗有一年丧之说可供参考。丧葬仪典的最后一环为送葬仪典, 其证据便是古墓。古墓是了解人生最大仪式之送葬仪典或祭祀方法, 即所谓葬法的直接资料。无法准确破解过去的葬礼过程中发生的每一个细枝末节, 但可以从作为送葬仪典其中一环的墓冢体现出的各种信息来进行某种程度的推算。

还原斯卢国时期早期的墓式—木棺墓的建造过程, 可以理解为墓地的选址和整理—挖掘墓圪—(挖掘腰坑)—安放木棺—用土加固木棺四周及上部—填土—建造坟丘。这一过程与中国古代的木棺墓或木椁墓的建造过程并没有太大的出入, 与朝鲜时代的儒教式墓葬中木棺墓的建造情形也并无不同。但从斯卢国时期庆州地区的木棺墓中可以窥视到各阶段仪典的良好墓冢并不多, 因此我们将以其附近的永川地区龙田里木棺墓的考古发现为例加以说明。



图12 永川龙田里木棺墓出土文物

在永川龙田里木棺墓中随葬有文物的位置包括(1)腰坑;(2)木棺的底部墓坑地面;(3)木棺的内部;(4)木棺的外部墓坑地面;(5)增强土内;(6)封印木棺的增强土上方;(7)埋土之中;(8)建造坟丘之前墓坑肩线外坟丘内。因此,(1)和(2)是与挖掘腰坑完成墓坑的最终准备后举行的祭祀有关的文物;(3)是尸体的成服文物;(4)和(5)是与安放木棺后举行的祭祀有关的献祭文物;(5)是与加固土建造过程中举行的祭祀有关的文物;(6)是与用加固土完全封印木棺后举行的祭祀有关的文物;(7)是与向墓坑内填土过程中举行的祭祀有关的文物;(8)与完成填土后建造坟丘前举行的祭祀有关。其中,(6)是与取土有关的祭祀;(8)是

坟丘完成后与平土祭有关的祭祀结果。

如上所述,除了与祭祀有关的文物之外,并没有太明显的要随葬死后世界生活用品的意识。尤其大量出土的组合式牛角形把手附壶和袋状壶等土器都是排列整齐埋入其中,让人怀疑是不是作为死后的生活用品。但鉴于作为祭祀用品的漆器腐蚀严重,保留不多,上述可能只是作为献祭文物使用。

如下还原斯卢国后期木椁墓的建造过程,可以分为墓地的选址和整理-挖掘墓坑-安放尸体-在木椁周围设置加固土-建造坟丘。这里和木棺墓不同的是省略了埋土的过程。前期的木椁墓只是在木椁的四周增添了加固土,围绕位于地面之上的木椁向上建造坟丘,或者另外用土封印木椁的同时建造了坟丘。反之,后期的木椁墓可能用与加固土一样的土密封了木椁之上,并建造了坟丘。而每个步骤都有着和木棺墓一样的祭祀是毋庸置疑的。至少在墓坑选址时。挖掘墓坑后。安置木椁时,安置尸体时,随葬文物时,木椁覆盖后,建造坟丘时,完成坟丘后等进行祭祀或仪式是理所当然的。

木椁墓到了后期阶段,除了被葬者的成服文物,与仪典有关的文物和被葬者的献祭文物之外,还出现了额外随葬死后生活用文物的倾向。后期木椁墓出现了在木椁内部设置间隔开的副椁或独立安放的副椁。副椁中随葬了死后的生活用品,没有副椁时则放在被葬者脚下的空间。此外,主椁内部的文物分布越到后期越趋于定型,高杯等献祭文物均摆放在被葬者的头侧。最终,形成了麻立干时期墓冢的新罗式文物分布定型。

## 服饰

服饰是人类维持基本生活的衣食住行之最基本的三要素之一。服饰不仅是这种生活必需品，更是为个人赋予个人色彩的重要元素。人类早期的衣服只是为了应对寒冷天气，维持人体体温所需。之后，随着认知的发达和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为衣服搭配了配饰等，在追求美观的同时也体现了自己的社会，个人的个性与身份地位。这种服装的搭配或服装与配饰被统称为服饰。

东亚古代社会的服饰如实反映了人物与时代的面貌。当时社会的统治阶层为了从视觉上彰显自己的政治，社会上的排他性地位，穿着用高级布料制作的华丽服饰。此外，国家也从律令制度的角度，根据社会身份的贵贱高低规定了服饰的材质或颜色等。新罗兴德王9年(834)颁布的禁令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 文献上的服饰

关于新罗服饰的文献信息少之又少。《三国史记·杂志》中关于色服的记载和中国正史上简单提及的只言片语便是全部记载。因此，我们不得不同时探讨

考古学资料。但是，即使保存再好的遗址也没有完整出土的服饰类，且几乎全部都局限在饰品上，因此这使我们在了解新罗的服饰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有关斯卢国服饰的直接文献记录是个空白。只有3世纪中期编撰的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记载了介绍记录斯卢国所属三韩服饰概况的只言片语。

- ① 其风好衣帻。下户前往(乐浪)郡面圣时都会借用衣帻。私下佩戴印绶和衣帻之人超过千人。〈韩朝〉
- ② 视珍珠为价值连城之物串起来配在衣服上，或当作项链或耳饰来用。金银和刺绣绸缎则并不被重视。〈韩朝〉
- ③ 那些人……并未戴冠，而是将发髻露在外面，仿佛一件耀眼的兵器。身着麻布织造的长衫，脚上是皮履和草鞋。〈韩朝〉
- ④ 用蚕桑编织成绸缎。〈弁辰朝〉
- ⑤ 制造宽幅漂亮的麻布。〈弁辰朝〉

①②展示了社会上流人士的服饰。隶属三韩的国家有78个左右，使用中国式印绶和衣帻之人有千人左右，平均每个国家有十余人。因此，他们应该是各国的统治阶层。而社会地位低于他们的下户只有在前往韩朝郡县面圣时，才会借用衣帻。③是通过考古挖掘出土的文物考证的事实。

④记录了社会成员的普遍情形。相对属于上流阶层的人穿着皮履，其他人则穿着草鞋。

④⑤透露了弁韩的织造技术。文献记载当时的人种桑养蚕织成绸缎布，布料用的丝线柔和且布幅较宽。种桑养蚕抽丝织布的技术源自中国，并于某个时期传入三韩地区的。

绸缎在三韩社会应该是交易商品或统治阶层的专属用品。但因为当时的织造技术已经发达至可以直接织造绸缎，因此大部分人购买布料应该不难。只是会根据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存在每个人可以穿戴的织物品质及种类高低，质量优劣之差。

## 与服饰相关的出土文物

从斯卢国时期的古墓中出土的服饰相关资料有琉璃珠或串玉项链，青铜手镯，动物形青铜带钩等配饰和服装装饰用青铜纽扣。这一时期与之后的麻立干时期不同，并没有完好的粘贴在金属器具上保留下来的织物。

首先是琉璃制项链，如文献资料上记载的，它是基本配饰，但其琉璃的原料，据推测应该是从中国或东南亚进口的。金箔也曾和琉璃玉一样进口成品。早期有与隍城洞2号木棺墓的出土品一样的多彩琉璃珠编织品(图13-①)，晚期有与蔚山下袋44号木椁墓出土品一样的水晶加工品(图13-②)，主要从大型古墓中出土。这一时期，并没有一提起新罗文化脑海中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用黄金物品装饰衣服或身体的服饰文化。

手镯与耳环，戒指一样，都是历史悠久的首饰。因为从视觉上比不上头上戴的头冠或耳环，项链，所以希望能从数量上弥补这种缺陷。青铜制手镯在庆州塔洞木棺墓中出土了4件，在隍城洞15号木棺墓(575号)中出土了2件，在舍罗里130号墓中出土了12件。均用青铜铸造而成，断面分为圆形和扁形的。在塔洞木棺墓出土品中，其中一件在表面设计有8个突起(图13-③)，舍罗里和庆山新袋里的出土品中则包括刻有多条线段纹的文物。但究竟是舶来品，还是当地制造的已经不可考证。

青铜制动物形带扣主要作为腰带配饰，可以像钩子一样钩挂在一起。中国自春秋时代以来盛行这种金属制腰带装饰，制作成各种动物形象。这种传统经战国时代一直延续至汉代，并在中原文化向周边扩散的过程中传入朝鲜半岛和满洲一带。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的辰韩和弁韩地区很早就出现了。

从庆州的塔洞木棺墓，舍罗里130号墓，德川里127号木棺墓中出土的老虎形状带扣装饰是最早期的形态，而从相邻的永川渔隐洞遗址，庆山的新袋里1号木棺墓及东94号木棺墓中出土的文物也与其相似。从中国河南省辉县琉璃阁152号墓，平壤中和郡马场里木椁墓中也有过相似的文物出土，因此这种早期资料被认为是舶来品的可能性很大。有时是虎形和马形相伴出土，有时是单独出土，3世纪时古墓的出土文物以马形为主。此外，从庆山新袋里55号木棺墓



图13 斯卢国饰品(①⑦庆州德川里127号木棺墓, ②德川里18号木椁墓, ③⑥庆州塔洞木棺墓, ④庆州德川里124号木棺墓, ⑤庆州朝阳洞60号墓)



图14 庆州塔洞木棺墓(①~④)、永川渔隐洞遗址(⑤~⑥)出土青铜制纽扣(铜泡)

中出土了中国战国~汉代盛行的弯曲的棍状带扣一件。这种带扣曾经在平壤南井里116号墓(彩篋冢)等多个乐浪古墓中出土过。

1918年永川渔隐洞发生山体滑坡,中国汉朝的青铜镜及仿制镜,青铜制带钩及各种青铜制纽扣(铜泡)(图14-⑤~⑥)得以重见天日。一直以来,韩国学术界将这一纽扣盲目理解为是北方西伯利亚及满洲地区青铜器文化的产物。但是,北方地区很难找到与之形态相似的案例。纽扣上的多条纹状与韩式铜剑文化期的青铜器或原三国时代的青铜制手镯上装饰的纹样相似,因此不排除这些文物是在其被出土的岭南地区制造的可能性。中国辽宁省曾经出土过与渔隐洞遗址和塔洞木棺墓出土的青蛙形纽扣(图14-④和⑥)相似的文物,只是在大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从塔洞木棺墓中出土的虎形,熊形花纹装饰品(图14-①~②)曾经在中国春秋~西汉遗址中出土过相似的案例。

## 4

## 器具

迄今为止,我们考古发现的斯卢国时期物品以土器和铁器为代表。这些物品几乎大部分都是从古墓中挖掘出来的。当然,除了土器和铁器之外,主要还有可以用作装饰品的青铜器和漆器。但目前尚无形态相对完整的漆器出土,无法单独开篇介绍。不过,庆州市内塔洞木棺墓中曾出土过不少有四个腿的圆形漆盘和配有盖子的圆柱状漆器,以及刷了漆的扇柄。大部分青铜器都与服饰有关,因而合在一起介绍。

## 土器

1977年从庆州朝阳洞的一处遗址中偶然发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型土器,而随着该古墓遗址在20世纪80年代初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后,一个全新样式的土器群浮出了地表。这些土器因为像瓦胚一样软,因此称其为“瓦质土器”,代表了斯卢国时期大约到3世纪中期的土器。

这些土器有着前一时期的早期铁器时代无纹土器制作工艺的烙印,也受到



图15 早期铁器时代土器类(庆州下邱里木棺墓)

并承袭了中国战国土器制作传统的汉代土器的影响。在制作土器的过程中使用了转盘，与过去赤褐色的氧化焰烧成的土器不同，这是在半封闭的还原焰窑炉中用1000℃以下的温度烧成的，因此土器颜色呈灰白色或灰黄色。这一类土器的使用时期与斯卢国时期墓式的发展趋势同步，分为木棺墓阶段和木椁墓阶段。到了木椁墓阶段中副椁登场的3世纪中期，已逐步发展为在1000℃以上的高温下烧成的非常坚硬的陶质土器，并一直延续至麻立干时期的新罗土器正式出现的4世纪中期。为了与麻立干时期的新罗土器区分开来，通常称其为古式陶质土器。

瓦质土器与后来的古式陶质土器或新罗土器相比，碗的种类单纯，土器质地非常柔软。而与前一阶段的土器中口缘部断面呈圆形或三角形的黏土土器(图15)相比，其特点是胚土已经过精心筛选。部分器种采用了打捺文工艺。大致上分为前期和后期，也分别称为古式和新式。古式瓦质土器出现于斯



图16 组合牛角形把手附长颈壶(庆州朝阳洞38号墓)



图17 袋状壶(庆州朝阳洞38号墓)

卢国成立的公元前100年之后不久，即公元前1世纪末左右。迄今为止，为人们所知的代表性器形有将两只牛角状末端连在一起形成把手的长颈壶(组合牛角形把手附长颈壶)(图16)和立面呈福袋形状的小坛子(因此被称为袋状壶)(图17)，此外还有打捺(绳文)短颈壶和外反口缘短颈壶以及辅食器(译者注：装配菜的小碗)等小碗。古式瓦质土器在木棺墓和瓮棺墓中出土，庆州地区则在包括朝阳洞遗址在内的所有木棺墓遗址中有出土。

在继承古式瓦质土器制作工艺的同时，引进了新型器种的新式瓦质土器，以高杯(图18)，台附广口壶(图19)，台附直口壶(图20)，打捺(格子纹)短颈壶，广口小翁，炉形土器为主。这一土器群的最大特点是几乎全都有台。器种比上一阶段增加许多，并最终影响到了后面古式陶质土器的样式。这一新式瓦质土器样式群的中心时期从木棺墓向木椁墓转换的2世纪中期开始，一直到3世纪中期古式陶质土器出现之前。



图18 高杯(上:庆州朝阳洞3号墓,下:庆州德川里14号墓)



图19 台附广口壶(庆州德川里19号木椁墓)



图20 台附直口壶(庆州德川里16号木椁墓)



图21 神仙炉形土器(庆州德川里120号木椁墓)

纵观新式瓦质土器的制作特点,与古式瓦质土器相比在相对更高温的条件下烧成,调整碗面时使用了平衡打捺工具,并加上了台脚和镂空工艺,或加上盖子等,体现出比前一阶段更先进的制作技术。但烧制温度依然在900℃以下,吸水性强,很难用作生活用品。尤其是台附广口壶和炉形土器及其演变而来的神仙炉形土器(图21)等应该都是一种代表身份地位的奢侈品,制作上耗费了大量心血,且实际上也只用于随葬入土。此外,尤其在以斯卢国地区为中心的辰韩区域内,集中出土的鸭形土器(图22-23)也值得关注。虽起名为鸭子,但实际保留的鸭子形态并不多,仅仅是形体像鸭子,但大部分头上都带着冠,因此也有人认为是否为现在已经灭绝的鸭子科的新物种。不同寻常的是,还有头部呈猫头鹰状的土器(图24)。

如上所述,新式瓦质土器在制作技术上有了丰富的变化和革新。即,在土器的成型阶段使用转盘,实现了几近完美的左右对称,并通过调整器壁的厚度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化。此外,在打磨表面时使用了刻有格子纹或绳文的打捺工具,防止土器龟裂和破碎,且达到了美观。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出现了烧成温度更高的土器。这种制作技术的变化也可能为下一阶段的古式陶质土器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陶质土器与前一阶段的瓦质土器不同,是在1000℃以上的高温中烧成的,从窑业技术的角度看可堪称为革命性的变化。窑炉应该是完全封闭的结构。但从这些土器群准确成型经过了较长的时间来看,这段期间一定是反复进行过新型土器的生产实验。早期的一段时间内在配有副椁的木椁墓中与瓦质土器一同出土,主要伴随陶质短颈壶,由此可见以此为对象进行过此类生产实验。这种短颈壶形状扭曲或表面形成有气泡,可见制作技术尚不成熟。其次,出现了向炉形土器等演变的迹象。这说明从外部传入了古式陶质土器的制作技术,并在已有的土器制作传统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生产体系。陶质土器的烧成时间比瓦质土器长很多,因此在生产陶质土器的同时,土器的生产体系也逐渐向专业体系转变。



图22 鸭形土器(庆州德川里80号木椁墓)



图23 鸭形土器(庆州德川里120号木椁墓)



图24 猫头鹰状土器(庆州隍城洞575号遗址, 20号木椁墓)



图25 早期陶质土器短颈壶(庆州九於里1号木椁墓)

## 铁器

斯卢国时期从考古学角度又称为原三国时代, 这一时代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铁器的全面使用。斯卢国活动的庆州地区古墓的铁器出土量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地区。舍罗里130号墓中随葬的70个板状铁斧(图26)就是这一事实的



图26 庆州舍罗里130号墓及其细部



图27 板状铁斧和铸造铁斧(①④庆州朝阳洞38号墓, ②庆州朝阳洞60号墓, ③庆州德川里19号木椁墓, ⑤蔚山中山洞568-7号遗址, 21号木椁墓, ⑥庆山新垅里18号墓, ⑦庆山新垅里62号墓, ⑧庆山新垅里111号墓)

象征性事件。铁是斯卢国的成立和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和动力。

在前一个时期的早期铁器时代进入尾声之际,即公元前2世纪,有迹象表明,铁器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青铜器。这说明铁器文化进入岭南地区并发展的时间比我们过去猜测的要早些。在这一时期,除了釜部剖面长方形铸造铁斧之



图28 铁镰(上:蔚山仓坪洞810号遗址, 2号墓, 下:庆州隍城洞575号遗址, 64号木椁墓)

外,铁制短剑等锻造铁器占主流。之后到了公元前1世纪初,如朝阳洞5号墓中出土的铁器所示,铸造及锻造系的各种铁器的地位已经牢不可破。铸造铁斧的釜部剖面变成了岭南地区特有的梯形(图27下)形态。虽名为铁斧,但应该是作为锄头来使用,这也是证明此时铁器已经正式普及的有力物证。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岭南地方铁器中,另一特征之一的板状铁斧(图27上)也开始正式随葬到墓葬中。这一板状铁斧与前一阶段相比更趋于标准化,也将其本身开刃用作斧子,但主要还是用作锻造其他铁器用的材料用铁器。此外,作为农具随葬的还有铁镰(图28)和大小不一的各种锻造铁斧,末端带有圆环的环头刀子是用于射杀的削刀。

武器类中,铁剑(图29-①~③)作为最基本的武器从早期铁器时代就开始使用,此外还有铁矛(图29-④~⑬)。这些都是取代过去的青铜器出现的,都是锻造品。进入斯卢国时期后,铁簇开始广泛陪葬。

铁剑一直做成短剑使用,到了2世纪中期长剑开始流行,一直到2世纪末左右出现大刀。最常见的大刀款式是配有环头的,但具有只陪葬于大型木椁墓的特点。铁矛以岭南地区特有的二段关式铁矛最为盛行。这是在插入木柄的釜部增加一个关部的形态。铁簇最早流行的是插入箭杆的无箭眼的无茎逆刺式(图30),到了木椁墓之后变成了有茎式。早期的无茎式铁簇具有长度短,幅宽的特点,后期则长度变长,簇身的宽度也变窄。先史时代已出现有茎式箭



图29 铁剑(①~③)与铁矛(④~⑬)①庆州隍城洞575号遗址, 6号木椁墓, ②④庆州隍城洞575号遗址, 13号木椁墓, ③庆州隍城洞 575号遗址, 59号木椁墓, ⑤⑥庆州隍城洞575号遗址, 20号木椁墓, ⑦⑩⑪庆州德川里80号木椁墓, ⑧⑨庆州隍城洞江边路1号木椁墓, ⑫⑬庆州德川里3号木椁墓)



图30 无茎式铁簇(蔚山仓坪洞810号遗址, 2号墓)

簇,但如此在原三国时期依然沿用无茎式铁簇,这可能是由于制作简便。

上述铁器从斯卢国早期开始便和前一时期的青铜器一样,集中在一小部分握有权势的个人手里。这一点在舍罗里130号墓体现得很充分。尤其在这一时期与无茎式铁簇一起大量陪葬关部突出型铁矛的现象,并非局限于庆州地区,也出现在其他地区。这暗示这一时期岭南地区的辰韩、弁韩统治阶层的武力基础已正式形成。

到了木椁墓开始出现的公元2世纪,铁器的样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私人武器的环头大刀(图31)与以往的犁铲(图34)及耙子(图36),锹刃(图35)等耕地用农具从大型木椁墓中成套出土。铁制锹刃与耙子的出现说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而这种农具仅局限于大型古墓中的现象则暗示着农具垄断的状态。而且,此类古墓中当然陪葬有大型水晶制玉,说明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权势的统治阶层的登场。

另一方面,正如在德川里木椁窑中的发现,从3世纪中期开始,在庆州地区出现了将铁棒卷起来粘贴而形成蕨手形装饰粘于长铁矛,像铁路枕木一样铺在木椁墓的地面上的埋葬习俗。这是斯卢国统治阶层墓葬仪典的特点之一,其装饰本身显示着该时期的铁器制作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出现的武具之铠甲和紧接着出现的头盔也充分体现了铁器制造技术的发展。铠甲是将长条状铁板竖向衔接起来的板甲形态。这种铠甲不仅能护住整个上身,也常



图31 环头大刀(庆州隍城洞江边路1号木椁墓)



图32 蕨手形装饰铁矛(庆州九於里1号木椁墓)



图33 有刺利器(庆州九於里1号木椁墓)



图34 犁铲(左:庆州德川里19号木椁墓, 右:庆州九於里1号木椁墓)



图35 锹刃(浦项玉城里na-101号木椁墓)



图36 铁耙(左:浦项玉城里na-101号木椁墓, 右:庆州隍城洞575号遗址, 64号木椁墓)



图37 庆州德川里120号木椁墓



图38 颈甲与纵长板甲



图39 庆州舍罗里130号墓出土镮轡



图40 庆州隍城洞江边路1号木椁墓出土镮轡

常搭配保护颈部的颈甲。3世纪前后生产活动活跃的隍城洞铁器制造遗址中发现的熔炼, 精炼, 锻冶等工序也充分证明了当时铁器制造技术的发展水平。

除了利器和武器之外的铁器还有马具。斯卢国时期的马具在其成初期, 即公元前1世纪的古墓中首次作为随葬品登场。主要出土的是驾驭马最有效的轡, 时而伴随将轡固定在马头上用的八字形或环形笼头等。轡由咬在马嘴中刺激舌头的嚼头(衔)和防止嚼头从马嘴中松脱的镜板构成, 公元前1世纪的马具只使用采用长棍状镜板的镮轡。即, 在卷起铁棒制作而成的2节嚼头上连接末端为圆形的螺旋桨形或末端呈四方形的“T”字形镜板。镜板的末端扁平, 而镜板的中间部分则相对较厚, 侧面钻有2个连接笼头用的孔。

1世纪~2世纪的所有马具在延续前一时期形状的前提下, 增加了“T”形镮轡的出土。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是出现了镜板呈“S”形末端卷起呈蕨菜纹样的镮轡。其中, 舍罗里130号的出土品(图39)最具代表性, 最近考古挖掘的塔洞木棺墓中也有所出土。装饰在镜板上的蕨菜纹样不仅出现在马具上, 也出现在铁矛等武器类等。这是只出现在辰韩·弁韩地区的特殊纹样。

2世纪中期~3世纪的马具随着木椁墓这一新型墓式的出现, 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形态。最具特点的是随葬的轡的形态与大小已丧失了原本的功能。与以往不同, 以蕨菜纹装饰多样化地运用的“S”形镮轡为主流, 镮扩大至30cm以上, 体现出反而降低了驾驭马功能的趋势。此外, 镜板正面只开有1个孔的现象也体现出同样的趋势。单凭这一个孔不仅无法连接笼头, 即使连接轡时也无法充分发挥镜板的功能。此外, 轡用于马嘴咬合不是太长, 就是太厚, 丧失了作为轡的原本功能, 而是多数做成了随葬用品。以隍城洞江边路1号木椁墓出土品(图40)等最具代表性。

## 5

透过出土文物看  
对外交流

反映斯卢国时期对外交流的物品可分为金属品和琉璃制品。金属品以中国产的青铜镜最具代表性,此外有青铜制装饰品中的一部分。在琉璃制品中,珠子是从中国或东南亚进口的,因此可以体现对外交流的一面。此外,金箔琉璃玉很可能是乐浪或中原地区的作品通过马韩地区传入的。

## 金属制品

在斯卢国时期的遗址中出土的舶来文物中,产地辨别最为明确的是铜镜。因为这些铜镜不仅数量多,且以汉镜为主。其中代表性案例是1982年发掘的庆州朝阳洞38号墓出土的西汉镜系列。同时出土了4件成品和1件半成品,均为异体字铭带镜。根据铭文内容,分为家常富贵镜,昭明镜,日光镜(图41)。多个西汉镜的组合受到广泛关注。古墓的建造年代以公元前1世纪后期的意见居多。

2010年在紧邻月城南侧的塔洞发掘了比朝阳洞38号墓晚1世纪左右,建于约1世纪后期的木棺墓。墓冢内部与瓦质土器一同出土了细形铜剑,虎形带钩,动



图41 庆州朝阳洞38号墓等出土汉镜(①②庆州朝阳洞38号墓,③庆山新垆里75号木棺墓,④浦项城谷里13号甕棺墓)

物形青铜纽扣,青铜制手镯,铁制簪,铁剑,铁刀,铁簇,铁矛,铁鍬等大量文物(图42)。在庆州盆地中心出现随葬有舶来品的木棺墓,意义非常重大。

铜镜则出土了2件。其中1件是典型的日光镜,但另一件是反复分配一个字来形成纹样的仿制镜。认为与塔洞木棺墓相似时期的舍罗里130号墓中出土了4件仿制镜。

汉镜的产地是中原地区。这些镜子是经西北汉地区的乐浪等汉四郡传入岭南地区的物品,证明辰韩·弁韩与乐浪之间有贸易往来。在斯卢国活跃的庆州



图42 庆州塔洞木棺墓出土的外来系文物和仿制品

地区只出土了乐浪设立一段时间后传入的物品，但其附近的浦项，永川，庆山等地出土了更早的星云文镜或其半成品，说明岭南地区和西北汉之间的贸易体系从很早就已经开始。有人认为仿制镜的产地是倭国，但也有可能是辰韩·弁韩地区的作品。

### 装饰品

作为这一时期斯卢国地区出土的金属制装饰品，有青铜手镯和青铜制动物形带钩。使用金属装饰的习俗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现象，因此在其萌芽期的史料中应该也包含一定程度的舶来品。但具体到哪些是舶来品则很难断定。

在塔洞木棺墓中出土的4件青铜手镯中，其中一件有8个螺发型突起，另外

3件有可能是随身佩戴的。此外，在舍罗里130号墓中在2个相当于被葬者手腕的位置上各发现6件，共计12件手镯，其中6件印有菱形纹和集线纹。乐浪遗址中出土了类似的铜制手镯，部分文物可能是舶来品。

动物形带扣也是前一时期没有过的新元素，庆州则是塔洞木棺墓，舍罗里130号墓，德川里127号木棺墓中出土的虎形带扣为最早阶段的资料。中国河南省辉县琉璃阁152号墓，平壤中和郡马场里木椁墓中均发现过相似案例，因此很可能是舶来品。

北方青铜器文化中常见的装饰品之一是青铜纽扣(铜泡)，其特点是铸造在上面的各种动物纹样。塔洞木棺墓中出土的铜泡均为青铜制，形态有虎形，熊形，蛙形，圆形，龟形装饰的方形等。其中，很多人认为蛙形纽扣可从北方的青铜器文化中找到其图谱。虎形，熊形纽扣在朝鲜半岛也很难找到根源，是与中国战国时期末~汉代的遗址出土品比肩的资料。用肉眼观察，铜质与常见青铜器不同，因此是舶来品的可能性很大。

从斯卢国~麻立干时期的遗址中出土的金属制碗具大部分都是从中国中原的礼器中起源的，但也有像铜鍍一样受游牧民族喜爱的生活用具。庆州地区则在塔洞木棺墓和舍罗里130号墓中出土了铁鍍。塔洞出土品破损严重，只剩部分铜体和底部，从器形来看与舍罗里的出土品相似度极高。目前很难判断这类铁鍍的产地，但其形态基本上是以铜鍍为原型，因此不无舶来品的可能性。

### 琉璃与玉石制品

到了斯卢国时期，琉璃的使用率扩大，产品种类也变得多样。对琉璃进行自然科学分析的结果，这一时期也和前一时期的早期铁器时代一样，依然使用铅钡系琉璃，但后来依次出现了钾玻璃(potashglass)和钠玻璃(sodaglass)。据推测，玻璃原料主要是从中国或东南亚进口的。舍罗里130号墓中出土了用水晶珠和蓝色琉璃珠串成的项链，德川里古墓群和浦项玉星里古墓群也出土了用各色琉璃珠串成的项链。



图43 庆州德川里19号木棺墓出土水晶制曲玉和多面玉

在这一时期的琉璃玉中，有一种被称为金箔琉璃玉的重层琉璃玉备受关注。德川里15号墓中出土1件，24号墓中出土4件(6颗)等，在3世纪木椁墓2期出土了这种特殊的珠子。辰韩·弁韩地区除上述出土品之外，仅在金海良洞里462号墓中有出土。但在马韩的辖区内，19期古墓中出土多达123件。因此，德川里出土品有可能是经过马韩传入的。

开始喜好玉石是从先史时代开始的。其中，青铜器时代是天河石；原三国时代是水晶和玛瑙；三国时代以硬玉最具代表性。玉石在当时社会被认为是最珍贵的物品，根据身份贵贱可佩戴的级别也有着森严的限制。

在德川里18号和19号木椁墓以及朝阳洞3号墓等中均出土了非常优质的水晶制曲玉和多面玉。这些水晶制品在整个岭南地区进入木椁墓时期后，成为占据主流的装饰品。但如舍罗里130号墓中所示，庆州地区早在木棺墓时期就已出现，体现了斯卢国的先进性。在其材料产地尚不明确的情况下，也有见解认为它们是从西北汉地区进口的。此外，玛瑙也非常受欢迎。从德川里36号木椁墓中出土的玛瑙有可能是成品进口，也有可能是进口原石后在当地加工完成的。

## 第二章

# 黄金文化的繁荣

## 麻立干时期

城市与城郭  
墓葬和葬礼  
服饰  
物品  
透过出土文物看对外交流

自公元元年前后起，一直保持独立且分散在洛东江东侧各地的小国从3世纪后期到4世纪前期之间，陆续附属于斯卢国，形成以此为广域政治体，这就是新罗麻立干时期的开始。此时，庆州地区已经成为王都，原本作为独立小国与之保持对等关系的各地区成为了新罗的管辖之地。

从《三国史记》早期记载的小国归顺事件和麻立干时期普遍随葬于各地区墓冢中的新罗样式物品的分布来看，新罗的版图应该辐射了洛东江东岸的釜山，梁山，密阳，昌宁，大邱，星州及其北的庆北内陆多个区域。不仅东海岸的盈德，蔚珍，连三陟和江陵，襄阳也归于新罗版图。此外，在忠北报恩三年山城附近的古墓中也出土了5世纪后相同样式的土器，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新罗的版图已经越过小白山脉，延伸到了忠北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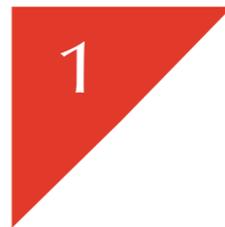
在从350年开始到公元6世纪初的麻立干时期，新罗的地方统治方式通常被称为间接统治。这种方式不是由中央官府直接向地方派遣地方官，而是保留各地区建立在土著基础上的统治势力，并通过他们代收贡品等，对相关地区实施统治的方式。虽然收服了各地的政治体，但当时的中央集权势力并不强势，远远达不到直接统治各个地方的程度，因此不得不合理利用现有势力，从而进行统治。当然，在相互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派遣军官监督各地不得互相联络或对外进行外交。

随着麻立干时期的开始，地方的各种物产以贡品的形式开始集中到王都，在中央也能向地方征调人员后，在庆州建造了王都月城，并在其周围的山地建造了防御和避难用的山城。此外，在市内各处建造麻立干及六部长沉眠的巨大古冢时，应该也动员了地方的物资与人力。月城自建造之日起到600年后新罗灭亡，一直是新罗宫城。由此可见麻立干时期新罗的政权非常稳固。

在地方各处，从中央获得一定政权委任的“干”等统治阶层向人民强征更多的物资与人力，以此巩固自己的政权基础。他们为自己建造的阴宅均为庞大的古冢，是证明这种间接统治之双面性的有力物证。这些古冢直接体现了各地区统治阶级的权利在相关地区内相比之前得到加强，而随葬物品中不乏宫中赐予的各种服饰和统一样式的新罗土器，又确切地证明了这些墓主当时确实隶属于新罗国。

可以窥探到新罗麻立干时期生活的物品大部分为亡者而随葬在古墓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包括土器,金属装饰品,武器,武具,马具,农器具,金属容器,玉石制品,漆器,织物,绘画,舶来品等所有生活用品。这些种类繁多的物品大量随葬于墓中,可见在当时的经济和物流中所占的比重很大。

土器整体上强调了直线美,尤其粘有土偶等或刻有“马”图案的土器是新罗土器独有的特色。古时提起新罗就会被称为“黄金之国”,金银细工的装饰品是统治阶级的象征,从他们的古墓中至少也会出土一对耳环,这也是新罗文化的特点之一。清一色带有“山”字型立式装饰的金·金铜制带冠,各种各样的金耳环,琉璃制的颈饰·胸饰,金·银制腰带和大刀等都是新罗古墓的标志性物品。此外,金银容器,与高句丽渊源颇深的青铜容器,东罗马或波斯产琉璃容器和带有硬玉制曲玉的装饰品也是非常独特的元素之一。此外,如天马冢的天马图所用的白桦树皮制品也是三国时代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尤其是应该远经丝绸之路,通过高句丽流入的中亚血统的独特宝剑等落户在朝鲜半岛的东南角,成为提醒对外交流并不通畅的新罗对外建交重要性的物品之一。



## 城市与城郭

### 王都的形成与防御体系

麻立干时期王都的城市规划和防御设施状态通过3世纪末以后的遗址和文物分布以及相关资料记载,可以窥探其大概的情况。从截至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最晚到4世纪的某一时期,现庆州市内空间将被划分为统治阶级的王宫和墓群以及专门的生产区。月城及其周边是统治阶级的居住区及行政中心;皇南洞和皇吾洞一带是统治阶级的墓区;隍城洞一带是专门的生产工坊和制铁群体的生活区及墓区。此外,在距离中心平地不远处的周边地区则发现了生产日常用品的土器窑址等。假设这些区域之间形成了有机的互动关系,那么可以想象到当时的中心生活区应该在直径3.5~4.0km之间。虽然将这一范围定义为城市尚需更多的证明资料,但可以从推测出最晚到4世纪后期,这里已经成为新罗这一广域政治体的中心。

月城作为王宫,坐落于庆州盆地中央。月城的建成时间最晚也应该在4世纪左右,直到新罗亡国之前,它一直是君王及王族居住,办公的场所。虽然对月城内部的考古学调查不足,尚留有很多不明之处,但从目前已经发现的文献记



图1 空中俯瞰的月城及其周边



图2 被发掘的明活山城

录或周边的墓群等遗址足以证明这一点。月城周围在3世纪时还是普通的生活区，但进入4世纪后，便成为与一般生活区相隔一段距离的特殊空间。之后，月城于5世纪后期改建。《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记载炤知麻立干9年(485)对月城进行了修葺，可证明这一点，而月城进行了修葺记载与明活山城的修葺记录有关。到了5世纪后期，随着高句丽的军事威胁进一步升级，新罗不仅整顿了六部，还以王都自我防御为目的修整了明活城。明活城之前便已存在，大肆修葺是在此时。也许是将土城修建成了石城。明活山城位于庆州东侧，规模极其庞大。从庆州经吐含山山脚的楸岭可通往东海岸，因此这一方向一直用作防止倭寇侵犯的要塞。而在此时大肆翻修明活城，不仅是为了防倭寇，还因高句丽的蠢蠢欲动而希望将其用作避难所。事实上，475年一接到百济汉城沦陷的消息后，新罗君王立即将住处迁至明活山城。此后，一直到488年维修月城并迁回为止，明活山城在10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充当着新罗王都的功能。

纵览新罗都城一带的关防遗址，以月城为基准：东有明活山城，南有南山新城，西有西兄山城，三城鼎立形成第一区域。紧接着是由北方的北兄山城，东南方向的关门城，西方的富山城防线形成的第二区域。从截至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真正形成上述防线是在中代以后。不过据史料记载建于中古期和中代的城址中也发现了麻立干时期的土器片，由此可以推论在上述建城时间之前，已经存在着土城或同等的防御设施，因为相关城池所在的位置是保卫新罗王都的重要防御据点。据猜测，分布在庆州一带的城池应该是按照月城→第一区域→第二区域的顺序扩张建成的，或者是多个土城先并列存在，然后到了某一时期以石城代替，编入都城的关防体系中。

### 构建全国范围的防御体系

新罗在整顿王都的同时，并行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力度。麻立干时期的地方统治通过造城项目获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以470年的三年山城为开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造城作业。所谓三年山城这一名称，源自造城投入了足足3



图3 报恩三年山城城墙

年的劳役，体现了造城时所倾注的心血。三年山城也很好地体现了新罗为防范高句丽来犯投入了多大的精力。据《三国史记》中记载，于471年建成笔老城，474年建成一牟，沙尸等多座城池。这些城池的具体位置已难以考证，但大致上应该都是全国交通要道上的军事要塞。

虽然没有解说各地方为造城动员劳役的具体方式或规模等的详细记录，但从468年泥河城的建造记录来看，15岁以上的人是主要的服役对象。随着动员劳役的必要性进一步显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各年龄段和性别的人口普查。当然，在当地对其进行管理的组织也较为完善。这时，作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人，村干应该是总管此类事务的，旗下应该有专管实务的组织。

在目前岭南地区仍有保留的这些城池中，可能建造于这一时期的资料分布在洛东江中下游地区，庆北北部地区，忠北地区及东海岸。洛东江中下游地区均位于通往庆州的交通要道中。可以推测，散布在洛东江与琴湖江汇流之地和由大邱与庆山，永川相连的这些城池互相联系，形成了一定的体系。此外，通往梁山，彦阳，蔚山一线上也分布了多座城池，亦是同样的道理。



图4 闻庆姑母山城挖掘情形

庆北北部地区中，尤其是金泉，尚州，闻庆，荣州的城池居多，但是否都是初建于麻立干时期，则需要通过之后的考古挖掘等进行验证。闻庆姑母山城在考古学挖掘中，发现可以将其初建年代追溯至麻立干时期。这座山城建在两川汇流之地，城围1,300m，用经过加工的石材修建了城墙。通过考古挖掘发现外墙的高度应该在7~13.8m之间，内部设施有城门，曲城，雉城，蓄水设施等，尤其地下室木制蓄水池为横向12.3m，竖向6.6~6.9m的大型蓄水池。姑母山城据推测应该是坚守从小白山脉以外进入闻庆的路口，是防御连接其与尚州





图6 庆州皇南洞古墓群全景(左端的墓冢为天马冢)



图7 庆州金尺里古墓群全景

区所谓中大型高冢群只集中在两处。

这两处集中的高冢通过期间进行的考古学挖掘结果可知，其内部结构为积石木椁墓。积石木椁墓的典型特点是，与传统的木椁墓用泥土填埋墓圻和木棺之间相比，采用人头大小的河石进行填充，木椁上也堆有石头。但每一时段堆石的形态各有不同。在积石木椁墓中，早期延续了前一时代建造木椁墓的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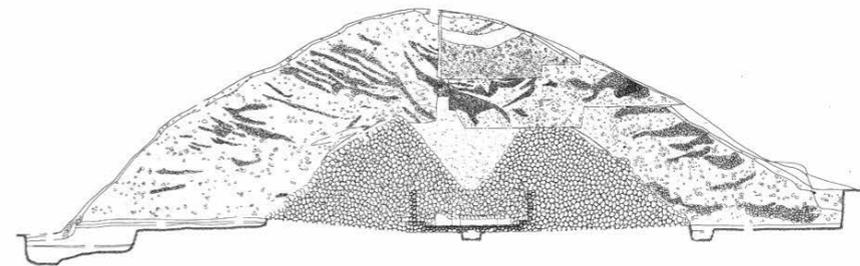


图8 地上式积石木椁墓剖面图(天马冢)



图9 庆州皇南大冢南墓去坟丘后积石部全景

式，只是用堆石代替了原本填充在墓圻和木椁之间的填充土。此外，最早是将土和石头混在一起填充，后来随着墓圻的加深和堆石量的增加，最终发展成为全部用石头填充木椁四周的围石墓形式。再然后，出现了木椁上面也堆石的形态。最后，出现了将木椁设在地面，在其周围架设木制架构后堆石的形态。

积石木椁墓之所以占据主流，大概是因为从斯卢国向新罗过渡的过程

中，原本居住在庆州盆地各个沟谷地带的邑落统治层的上层建筑在迁移到市内王都地区时，选择积石木椁墓作为彰显自身身份地位的墓式方式。换言之，就是随着新罗六部的形成，其所属统治阶级继续建造以积石木椁为内部主体的高冢的结果。

在庆州市内的高冢之间，除了积石木椁墓之外，还有些小型的竖穴式石椁墓。因其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出土文物上都远不如积石木椁墓，因此基本可以断定是社会地位低于积石木椁墓所葬者阶层的坟墓。另一方面，在比竖穴式石椁墓稍早的时期，还有一些延续前一个时代传统的木椁墓。这些木椁墓的主人也被认为是积石木椁墓的主人的下层人群，像舍罗里遗址一样，积石木椁墓和木椁墓及竖穴式石椁墓聚集在一起的情况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此外，因在市内王都地区规模较大的主副椁式中出土了一套马甲和铠甲而更加引人关注的Joksaem地区C10号墓也是木椁墓。瓮棺墓一直以来都作为幼儿或少儿的墓冢，大部分附属在其他墓冢中建造。

在庆州市内王都地区发现的规模非常庞大的古墓均为地面式木椁结构的积石木椁墓。包括这些大型古墓在内的高冢在日寇侵略时期还残留有155座，此外地下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古墓。这些古墓同样属于麻立干时期及中古早期早期的坟墓，大致上可以理解为是同属新罗六部统治阶级的坟冢。

目前，认为王都地区麻立干时期高冢整体上是从小城向西北方向建造的意



图10 庆州Joksaem地区C10号墓挖掘全景

见占主流，但这种趋势也不能一概而论。虽然目前很难明确划分群体，但鉴于麻立干时期的政治实施六部管理体系，很可能其墓区也是按六部划分，在该墓区大大小小的高冢按集群依据时间先后依次建造的。

木椁形态是随着时间而慢慢演变的，最先出现的是主椁和副椁延续上一代木椁墓的形态，呈“昌”字或“日”字结构分布的主副椁分处不同墓圪的木椁。



图11 庆州天马冢木椁内文物出土情形



图12 瓢形墓之皇南大家全景



图13 5座墓冢相连的Joksaem地区B区古墓群(B1~4,6号墓)

之后出现的是在单椁式木椁的头部及足部两侧进行附葬的形态，主椁和副椁呈“明”字型并排分布的主副椁使用同一木椁的形态，再之后是头部附葬的木椁形态，最后是足部附葬的木椁形态。

墓型分为单葬墓，双人墓，合葬墓。除了单葬墓，即单人墓之外，还有瓢形墓即双人墓以及3座以上木椁相连的墓型是庆州地区积石木椁墓的又一个重要的特点。连起坟丘建造时，最终坟丘的形态根据连接次数和方式而有所不同。在连接方式中最常见的基本款是拆除先建之墓的部分护石后，在该位置建造要连接的坟冢。待施工结束后，便形成了瓢形墓。所谓合葬墓是按照上述方式连接3座以上的墓型，与瓢型墓不同的是，有并不破坏护石，在旁边后建墓冢的情况，也有拆除两座先建单葬墓之间的部分护石后原位建造的情况。

在积石木椁墓作为高冢正式在庆州立足时，新罗的各个地方也开始建造高冢。从大体上看，辰韩时期各地形成小国的邑落所在地区的中心都建造有高冢群。其内部主体是竖穴式石椁墓或横口式石室墓。这种高冢的内部结构体石椁墓有像釜山或庆山一样继承，发展前期木椁墓形态的地方，但也有不少



图14 釜山福泉洞古墓群远景

地方与前一时期木椁墓的形态无关，而是直接引进的。因为，像大邱或昌宁一样，一个区域内的各个地区差异也很大。如此，麻立干时期新罗各区域及地区的地方墓式均带有竖穴式石椁或横口式石室的基本墓型特征，又保留了各自的独特结构。

竖穴式石椁墓的挖掘与木椁墓或积石木椁墓不同，并不是在大肆改变墓冢外型的状态下挖掘，因此对石椁结构本身并没有太多的不同意见。作为其结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盖石的出现。这是与前一时期的木椁墓截然不同，同时与庆州地区的积石木椁墓不同的地方。可以充分体现木椁墓向竖穴式石椁墓演变过程的即为福泉洞古墓群。最初是用石椁代替木椁的外椁，最终变成盖上盖石的方式，完成了向竖穴式石椁墓的转变。

在新罗的地方中，釜山地区分别在不同地点建造了被称为福泉洞古墓群的高冢之前阶段的墓冢以及被称为莲山洞古墓群的高冢群。莲山洞古墓群墓型基本上延续了福泉洞古墓群的墓型，具有地下式长方形竖穴式石椁的特点。与之不同的是，梁山地区的北亭里古墓群，截至目前只发现了半地上式的所谓



图15 釜山莲山洞M3号墓调查全景(具有副椁的竖穴式石槨墓)



图16 梁山北亭里古墓群远景



图17 昌宁校洞古墓群全景

竖穴系横口式石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日帝时期发现，被称为梁山夫妇冢的北亭里10号墓。相似结构的横口式石室墓也出现在庆州市内的皇南洞151号墓中。

昌宁地区的每个地方使用的墓型都不尽相同。桂城桂南里古墓群是在木椁墓周围砌石头的过渡形态墓式，也有人认为是木盖石椁墓。校洞古墓群从很早就开始采用了设有长墓道的横口式石椁墓，而在其附近单独形成高冢群的松岘洞古墓群是典型的地上横口式石室。

大邱地区的各个地方也采用了各自不同的墓式。花园星山洞古墓群采用半地上竖穴式石椁墓为内部主体，反之，位于达城周围的大邱地区最大古墓群一达城古墓群，则同时采用了割石造石椁墓和更具特色的板石造石椁墓。后者的结构，自日帝时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横口式石室墓，但对拥有类似形态的星州星山洞古墓群及龟尾黄桑洞古墓群等洛东江中游各处遗址进行考古挖掘的结果发现是竖穴式。另一方面，在同属大邱地区的漆谷鸿岩洞古墓群中发现



图18 庆山林堂古墓群挖掘全景

了具有加长型细长方形竖穴式木椁，且主要用石头建造坟丘的石椁坟丘墓。

林堂遗址高冢墓位于庆山地区，该高冢墓独具匠心地保留了将岩石挖成棺材形状的墓圪，并在里面设立了木椁结构，因此又被称为岩圪木椁墓。但鉴于其配有盖石，并在福泉洞古墓群中已确认在竖穴式石椁墓内安置了木椁，因此木椁墓这一叫法也有不当之处。反之，处于同一地区的北四里古墓群则采用了传统惯例的竖穴式石椁墓，但很奇特的是新上里古墓群以积石木椁墓为主，非常引人注目。

义城地区的塔里一带金城山古墓群采用了积石木椁墓及对其进行某种变形的变形积石木椁墓墓式，堪称史无前例。以庆州为中心来看，在新罗各地方中因义城地区处于对西北内陆地区起到杠杆作用的地理位置而选择那种墓式。星州地区则以星山洞古墓群的墓式与大邱达城古墓群最为相似，采用了割石造和板石造的竖穴式石椁墓。善山地区的洛山洞古墓群的石室剖面则是梯形，是加长型地上式的横口式石室的内部主体。此外，古墓群的形成相对较



图19 义城大里里2号墓A-1号主副椁挖掘全景



图20 星州星山洞38号墓挖掘全景

晚的尚州屏城洞古墓群的内部主体是极长的横口式石室。

此外，比如东海岸的江陵地区，在作为这一地区核心古墓群的草堂洞古墓群中，竖穴式石椁墓与木椁墓共存。其中，A区1号墓则是配有巨大盖石的细长方形竖穴式石椁墓，该墓用大大小小的割石堆造四壁，约2/3的地面用鹅卵石和石灰铺就而成，部分建造了分壁。而且石椁内部空间用割石砌了略低于石椁



图21 江陵草堂洞A-1号墓挖掘全景

地面的四壁，安置了用板石盖上盖子的石棺。

如上所述，新罗每个区域的高冢的内部结构都不同，构成每个区域的每个小地区都各有不同。而之所以每座高冢内部都有着各自独特的墓室结构，可能是因为各区域或地区的酋长们认为自己的墓冢是体现当时继世思想的来世空间，并努力在其中体现自己的政治地位。此外，若考虑到高冢是随着新罗中央对地方的间接统治进一步强化而伴生的现象，那么这种多样性最终可能是各地区的统治阶层将自身渴望独立的愿望投射于墓冢的结果。

## 葬礼仪典

古往今来，无论现世地位如何高，财产如何多，人都难逃一死，而为了逃避对死亡的恐惧，人们想象出了亡者的世界。被留下的人想要淡忘失去父母或家人的悲伤，恢复日常生活并不容易。也许每个人，每个社会克服这种极度悲伤的方式各有不同，古代社会的统治阶层则试图从盛大的墓葬仪典中找到慰藉。他们建造巨大的墓冢，将死者生前用过的物品，死后所需的物品，甚至连侍从也一同随葬其中。丧，既是死亡本身，也有“哀悼死者的行为”之意。相比之下，葬则表示“埋葬死者的行为”。虽然也有人死后马上处理尸体予以埋葬的情况，但大部分会留出哀悼时间，相隔一段时间后会正式入土为安。在这段时间内，人们会将尸体放入棺中保管，这就是所谓的殓。

与高句丽和百济一样，新罗对丧葬典礼的相关记录少之又少。只有《隋书》一书中有过守孝期为1年的记载，但时期较晚，要将这一记录追溯至麻立干时期套用，仍有些过于牵强。麻立干时期的新罗古墓不仅规模庞大，里面还有大量人们平时用过或死后要用的随葬物品，甚至还有死后要继续服侍的侍从被迫殉葬。因此，从考古调查的结果上，我们可以逆向推论出当时的新罗人所举行的送葬仪典或来世观念的冰山一角。

麻立干时期的新罗古墓流行厚葬，虽然大部分用木头，布，纸等有机物制作的文物已经腐烂并消失，但仍留有大量土制或金属制文物，足以想象得到当时随葬品之丰富。当然，我们并不能判定这些文物都是用于死后世界的。因为各种文物有条不紊地分布在分工明确的墓冢内各个空间中，每个空间的文物种类也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材质将古墓出土的文物分为金属(青铜器，铁器)，玉石器，陶器，骨角器，竹木漆器等，根据用途分为装饰品，马具，武器，农器具，仪器，土器，金属容器等。但这种分类只是为了我们便于将文物本身归类，因此需要根据随葬进墓冢的意义进行功能性分类。比如在中国，以汉代为中心将这些文物分为礼乐器，生活用品，地位象征品，镇墓辟邪品，贡品祭祀品，明器等六种。

新罗古墓中虽然也有礼乐器和镇墓辟邪品，明器等出土，但数量稀少，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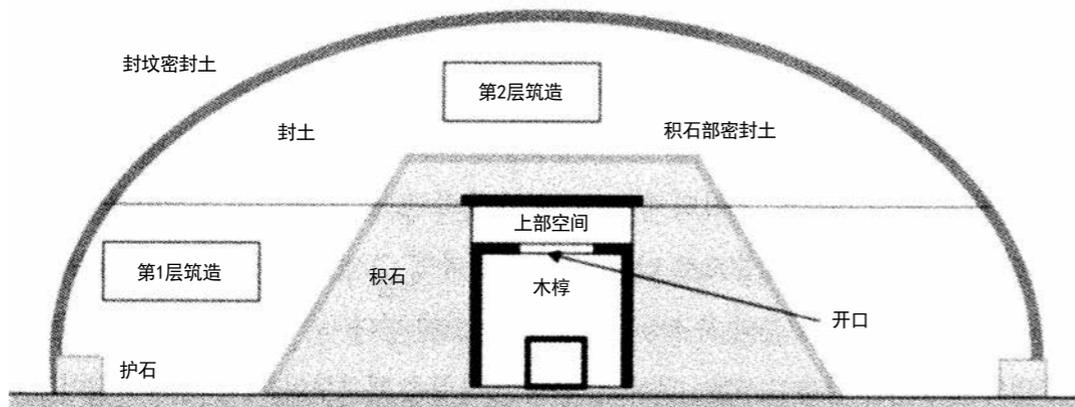


图22 积石坟丘墓地上式积石木椁墓的结构模拟图

远达不到普遍化。因此，借鉴中国的分类法，可以将麻立干时期古墓中的随葬文物分为生活用品，威势品(以服饰为主)，贡品(仪典用文物)。但目前很难对古墓中出土的文物赋予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功能，只能了解其大概。

我们发现文物的随葬并不是在古墓的建造过程中一次性投入，而是按照建造工序的不同阶段分批投放的。以皇南大冢南墓的文物出土状态为例，详情如下：

文物大致上可分为随葬在木椁外部和内部的以及随葬在副椁上的。其中，随葬在副椁的文物可以确定全部都是死后生活用的器具。反之，从木椁外部和内部出土的文物可以根据各自所在的具体位置进行细分。根据所在位置对木椁外部的随葬文物进行分类，可分为：(1)埋在坟丘顶上的文物；(2)随葬在坟丘内的文物；(3)随葬在积石部覆盖层内的文物；(4)随葬在木椁顶部的文物。随葬在木椁(主椁)内部的文物可分为：(5)随葬在内椁和中椁四周石阶上的文物；(6)随葬在内椁上的文物；(7)随葬在副葬间的文物；(8)随葬在木棺中的文物等。

联系这些文物的随葬位置和古墓的建造过程来分析随葬文物的意义，即可窥探到当时送葬仪典的冰山一角。皇南大冢南墓的建造过程大致上可推算出如下13个阶段，但在此基础上可能还可以进一步进行细分，具体的建造顺序也可能有所变动。

(一)墓地的选址:选择靠近先辈的墓地。(二)墓地的定址:选择要安放主椁和副椁的地面。(三)墓坑的挖掘:挖掘要建造主椁和副椁的空间。(四)外椁的安装:为主椁和副椁各自安装木椁(主椁外椁建造至棚顶，并设计开口部用作出入口)。在主椁外椁和副椁周围准备堆石至其上面，建造侧面坟丘(护石等外部设施也同步建造)。(五)中椁的安装:在主椁外椁的内部安装中椁，在中椁和外椁之间建造积石阶。(六)内椁的安装:在主椁的中椁内部安装用隔断分开尸体间和随葬间的内椁，在内椁和中椁之间建造积石阶。(七)尸体的安置:在内椁尸体间的内部放置装有尸体的木棺或尸体。(八)内椁的盖棺:盖上内椁中木棺的盖子。(九)中椁的盖棺:盖上中椁的盖子。(十)主椁和副椁的盖棺:关闭主椁的开口部，副椁覆上木盖。(十一)上部积石部的建造:将石头堆至主椁和副椁上的一定高度上完成积石部竣工，并用黏土封闭。(十二)上部坟丘的建造:在上述上部积石上用土向上堆砌坟丘。(护石也有可能此时堆砌的)(十三)坟丘的封闭:用泥土整体覆盖坟丘表面进行密封。

联系到上述各阶段和之前的文物出土位置，(8)是在木棺中安放尸体时安装的状态或随葬在其内部的文物，是在(七)的过程或之前将尸体入棺时与成服同时随葬的文物；(7)是在(七)的过程中同时随葬的文物；(6)是在(八)的过程之后随葬的文物；(5)是与(八)和(九)的阶段有关的文物；(4)是在(十)的过程之后随葬的文物；(3)是在(十一)的过程之后随葬的文物；(2)是与(十二)的过程有关的文物；(1)是在(十三)的过程或之后随葬的文物。此外，副椁的文物可以看作是在(十)的过程之前随葬的。

如此说来，可以猜到至少从安放尸体开始到完成坟丘的建造为止，每一阶段都举行了各种仪典，其结果随葬了各种文物。这整个过程都可以称为将尸体安置在古墓之后的葬送仪典。

新罗人如此随葬了那么多物品。在古墓中建造独立的副椁，再将大量实际生活中用过的器物随葬在其中，这与新罗人的死后观有关，该死后观即为继世思想。继世思想可以理解为在死后世界继续现实生活的观念体系。即，认为在死后世界继续保持在这一世的地位或权势，死后世界的生活与现实世界一般



图23 庆山造永EIII-2号墓副椁中出土的殉葬者人骨

无二。因此，为了在死后世界继续生活而将许多生活用品拿到阴间，这一切就体现为后葬。

殉葬也是如此。殉葬指的是在某人亡故后，将与其有关的人处死并一同埋入坟墓中的送葬仪式。这一残酷的风俗存在于全球所有古国的形成期及早期，韩国也不例外，在扶余，高句丽，新罗，伽倻等地均有发现。像扶余或高句丽在《三国志》，《三国史记》等文献记录中均有记载，据说扶余王死后会殉葬大约百人。至于新罗，有记载称智证王时已禁止殉葬，但皇南大冢，天马冢等超大型积石木椁墓中明确发现了殉葬的存在。

至于殉葬风俗是从新罗成立之前自身就已存在，还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尚不明确。从时间上来看，新罗的殉葬比扶余或高句丽晚一些，与伽倻相近，与高冢的建造及黄金文化的引进同步出现。新罗与伽倻的统治阶层，一方面用奢华的黄金装饰品和巨大的高冢彰显自己的地位，一方面以此体现了希望能将现世的生活延续至来世的继世观念。在坟墓中随葬大量物品的同时，杀死活人后埋葬的殉葬风俗的流行也是如出一辙。

### 史料记载的服饰

麻立干时期服饰的记录不仅在《三国史记》中无从查找，在中国史书中也不见踪迹。新罗曾于4世纪后期向前秦派遣使臣，但之后一直到整个麻立干时期都不再向中国派遣使臣。即，尚未建立与南朝的外交关系。《梁书·新罗传》中记载：“梁普通2年(521)新罗法兴王首次派遣使臣随百济使臣赴梁，并进献了地方特产。”就体现了当时的情况。

《周书》中形容高句丽：“有官身的人在头冠上插两根鸟翎，以示身份的显贵。”百济则是：“在早朝或祭祀时在头冠的两侧加上鸟翎。”《隋书》中记载：“新罗的服饰与高句丽或百济类似。”《周书》与《隋书》中记载的鸟羽冠是否能代表麻立干时期的实际情况尚无法断定，但从已出土的文物中确认了鸟羽冠的存在，因此可将其追溯至麻立干时期。可以猜测，这一时期新罗统治阶层中的男性应该在平时或重要场合配戴了鸟羽冠。

此外，忠州高句丽碑正面的“赐予寐锦服饰……并赐予诸位上下服饰”的字句引人瞩目。关于该碑的建立年代，尽管有着5世纪前期或后期的说法，但无



图24 皇南大冢北墓金冠



图25 金冠冢金冠

论是哪个说法成立，这一碑文都描述了高句丽太子向新罗王及其随从下赐服饰的情形。这就像中国，尤其是北魏向高句丽下赐服饰一样，高句丽也向新罗的统治阶层下赐了服饰。这里的服饰应该不是常服，而是高句丽的官服。随之，高句丽官服可能对新罗官服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 黄金装饰品

似乎是为了填补没有文献记录的遗憾，从新罗古墓中出土了无数的服饰构成品。即，墓主从头到脚佩戴的各种装饰品。遗憾的是，服饰几乎没有保存下来，只检出了少量的织物碎片。

典型的新罗金属装饰品文化在皇南大冢南墓阶段成型，但这一时期能够拥

有黄金装饰品的人数极其有限。在皇南大冢的北墓建造时期出现转折点，此时更多人可以佩戴黄金装饰品，并将这些装饰品变成新罗式。到了这时候，会打造新的金冠代替过去的金铜冠，用于装饰驾崩的君王或王族的头部，也会打造金手镯。不仅如此，装饰品种类也更加丰富，涉及腰带配饰，耳饰，颈饰，指环，饰履等，装饰也更趋于华丽。

在新罗的装饰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金冠。在新罗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新罗金冠仅在麻立干时期的王族墓中有所出土。金冠如此有限，说明金冠在当时新罗社会是象征着王族庄严地位的代表性威势品。新罗冠特点是带轮上添加了3个树枝型立式装饰和2个鹿角形立式装饰。因此，将其称之为带冠。该带冠比起日常使用，应该更倾向于仪典用。但所谓树枝型立式装饰的树枝呈“山”字或“出”字形状，有可能是样式化的，而鹿角形立式装饰反而有可能是自然的树枝形状。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树枝型立式装饰的形态和镶嵌在上面的曲玉及纓络的数量有所变化，带轮和立式装饰上所刻的花纹也更趋于复杂。

麻立干时期新罗的带冠根据材质的不同，分为金冠，金铜冠，银冠。目前为止发现的金冠均来自皇南大冢北墓，金冠冢，瑞凤冢，金铃冢，天马冢，共计5件，且只在庆州出土过。银冠极其罕见，只在皇南大冢南墓出土过1件。金铜制带冠加上从地方的高冢出土的，共计几十件。大部分学者认为金冠上点缀的立饰象征着连接地上与天界的媒介——树木和鹿。金铜冠不仅出现在庆州的王族，贵族墓中，在地方首长级人物的墓冢中也有大量出土。金铜冠的外型与金冠大同小异，但大部分只装饰了3个“出”字形立式装饰，只有极少一部分装饰了同金冠一样的两个鹿角形立式装饰。

在古墓中出土的冠中，还有一种与带冠不同，在圆锥形冠帽上装饰了鸟翼或鸟翎形的冠饰。这一圆锥形冠帽或连同冠饰被称为帽冠。有时，出土品没有冠帽，只有冠饰，这是因为用白桦树皮或绸缎等布料制作的帽冠已经腐烂，只剩下了装饰品。

这一帽冠是新罗统治阶层的日常用冠，应该是用来遮挡男子发髻的。截至目前帽冠出土较多，分为金，银，金铜，白桦树皮制。在构成帽冠的冠帽和冠饰中，帽的材质以白桦树皮等有机物质制品最多，其次是银制品，还有部分



图26 天马冢金冠



图27 金冠冢金制冠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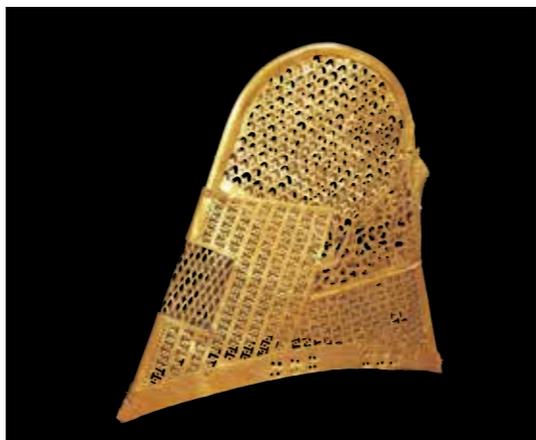


图28 天马冢金制冠帽



图29 皇吾里古墓金制耳饰



图30 普门里古墓金制耳饰

金，金铜制品。在插入冠帽的冠饰中，庆州地区主要出土的是金，金铜，银制品，而地方大部分是银制品，金铜制品极其少见。金制品组合在一起的案例仅限在金冠冢和天马冢出土，银制和金铜制品则在庆州以外的地区也有广泛分布。从形态上看，大致上呈鸟翼形的居多。

庆州地区只要有着一一定规模的墓冢，都会毫不例外地出土金制耳饰。新罗的耳饰体现着新罗人的美学和极致的金属技艺。在新罗统治阶层的男男女女为了向外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佩戴的装饰品中，耳饰是最为基本的饰品。耳饰是从视觉上区别于庶民身份或地位的必要元素。在挖掘过程中，虽然也出现过只有耳饰的墓冢，但没有一个墓冢是只有冠帽或腰带装饰而没有耳饰的。由此可知，统治阶层内部随着地位的升高，会在耳饰的基础上增加头冠或腰带等以区别着装。

新罗耳饰由直接接触耳朵的主环和吊在主环上的中间饰以及坠在下面的垂落饰等三部分构成，其图谱可以从高句丽的耳饰中溯其根源。但中间饰的样



图31 路西里215号古墓金制颈饰

式非常多样，是新罗耳饰的特点。耳饰根据主环的形态分为粗环空心的太环耳饰和细环的细环耳饰。与种类相对单调的太环耳饰相比，细环耳饰则有诸多种类。但仔细观察从墓冢中出土的装饰品组合，只有佩戴细环耳饰时才会在腰间配戴大刀。这表示细环耳饰的佩带者可能是男性，太环耳饰的佩带者并非是女性。

太环耳饰到了皇南大冢北墓阶段，随着其主环的变大，制作耗用的金属板也随之增多。中间饰则已定型化。细环耳饰早期也流行有中间饰和垂落饰的与太环耳饰相似的类型。到了5世纪后期之后，则形状各异，以奢华的装饰为主流。

在从新罗古墓出土的装饰品中，颈饰和胸饰的奢华程度也丝毫不亚于耳饰。庆州的大型古墓中经常出土编有蓝色琉璃珠的颈饰，偶尔也会有编有金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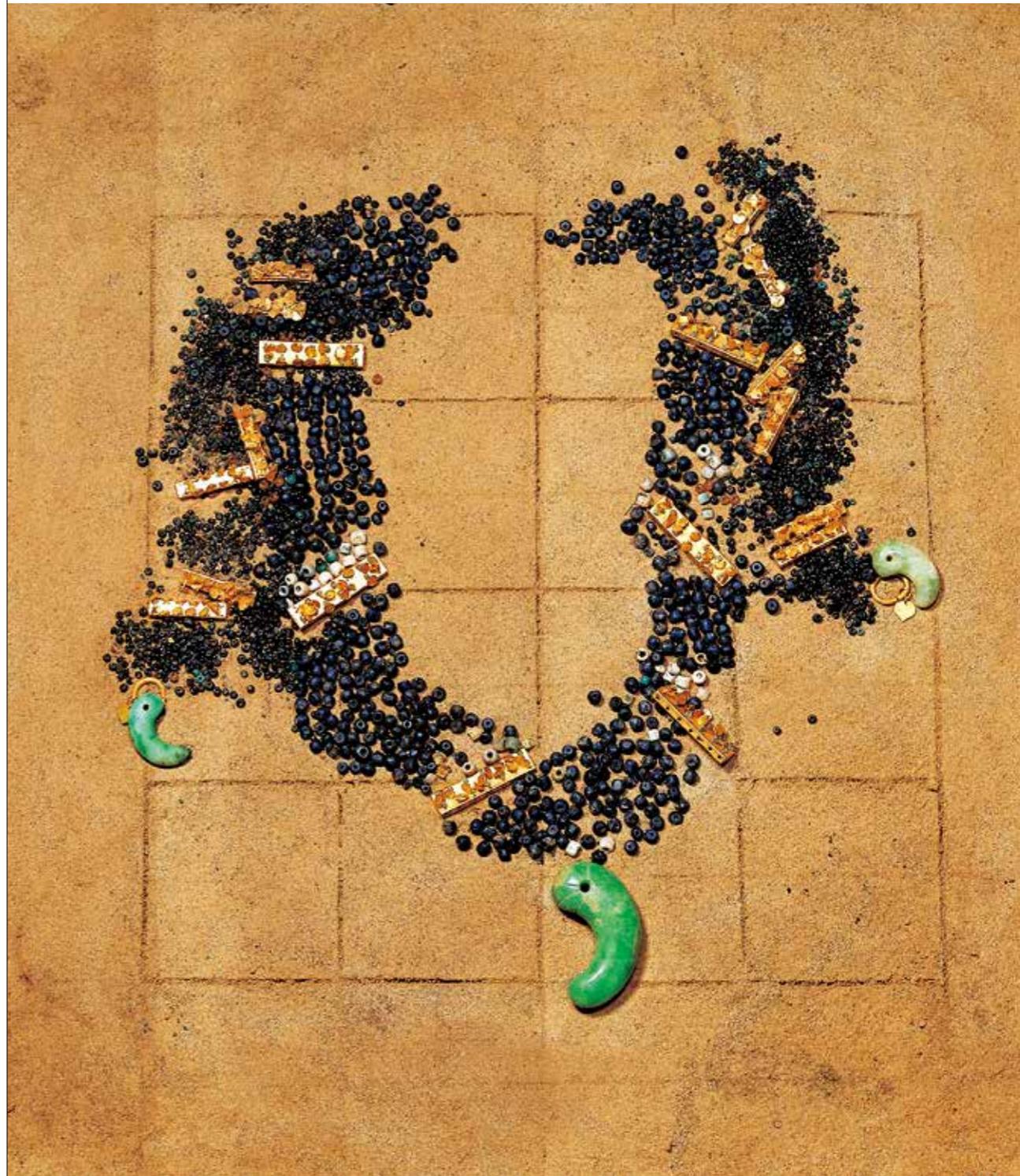


图32 皇南大冢南墓胸饰



图33 天马冢金制腰带配饰



图34 皇南大冢南墓的金戒指



图35 天马冢金手镯

和金珠的颈饰。在皇南大冢的南墓和北墓，天马冢的墓主胸口附近，发现了用数千颗琉璃珠和金板编制的奢华胸饰。

腰带配饰指的是装饰在腰带上的金属配件。在古代，腰带是官服的配件之一，人们对其非常重视。因此用金银珠宝装饰腰带表面。金制品出土于皇南大冢南墓和北墓，金冠冢，瑞凤冢，金铃冢，天马冢等位于庆州的6座积石木椁墓



图36 皇南大冢南墓的金铜饰履

中。其中除了皇南大冢南墓，其他墓冢均同时出土了金冠。就像金冠不是君王专属，而是当时王族特有的物品一样，金制的腰带配饰也是同样的情况。在新罗的腰带配饰中，所有金制品和部分银制品均伴有腰牌。腰牌由形象化的香囊，药盒，鱼，磨石，夹子，曲玉，陶瓷等装饰品构成。

在手镯中，时间最早的是皇南大冢北墓的手镯。该手镯的表面没有任何装饰，是将实心金棒弯曲而成的。与之不同的，还有部分像管子一样空心的部分。6世纪的手镯有的像金铃冢的出土品一样在表面的突起上镶嵌琉璃，有的像天马冢的出土品一样只表现突起。戒指是6世纪作品中最为奢华的装饰品，戒指上面制作成宽阔的棱形或花瓣形状，在其表面贴上金板形成突起，或镶嵌数十颗金颗粒进行装饰，又或者镶嵌蓝色或绿色琉璃珠。

饰履与百济饰履相比，纹样相对简单。既有像皇南大冢南墓，义城塔里古墓Ⅱ椁出土的饰履一样镂空“凸”字花纹的，也有像金铃冢，梁山夫妇冢的出土品一样没有花纹的。新罗饰履与百济饰履一样，是组装三张金属板而成，但从侧板的结合位置上发现其中存在着根本差异。即，百济的饰履是在底板上前后



图37 皇南大冢北墓金冠出土情形

连接左右侧板的两端，但新罗饰履则是将包住鞋头的板和包住鞋跟的板左右层叠后，用金铜钉竖向固定。新罗的饰履都是金铜制，从鞋底上可以充分体现出其非实用的一面。从皇南大冢的南墓出土的鞋底上装饰有几个羽翼，金冠冢出土的饰履则装点了几朵莲花。因此，这种饰履不是平时穿着的，而是为了亡者而特别制作的。

上述的各种装饰品在王族墓，贵族墓及地方首领墓中出土，但在物品的材质或水平，数量上有所差异。其中，最能体现地位差距的物品有头冠和金铜鞋履，戒指也是一个占很大比重的物品。金铜鞋履通常会与耳环，项链，腰带，手镯配成一套。在金属制装饰品中，耳环，项链，腰带的出土数量最多，在一定程度上普遍都有。王陵级大型古墓中头冠，耳环，项链，腰带，手镯，戒

指，金铜鞋履等一应俱全，其中，带冠，项链，腰带，手镯，戒指为随葬品的基本配置。值得关注的是被葬者的头饰，皇南大冢北墓，金冠冢，瑞凤冢，天马冢，金铃冢墓主均带着金制带冠入葬，在出土情况明朗的皇南大冢北墓与金铃冢，天马冢，金冠以覆盖整个面部的形态出土。

地方与庆州相比，定型化趋势稍弱。地方社会中最重要金属制装饰品依然是头冠。以头冠为中心，分为随葬带冠的情况和随葬帽冠的情况。随葬帽冠的情况主要集中在与皇南大冢北墓接近的时期，同时随葬有带冠和帽冠的情况只有梁山夫妇冢男性遗骸部和昌宁桂南里1号墓。除此之外，其他都是随葬带冠或帽冠的其中一样。金属装饰品正式出现在地方古墓大约是在5世纪前半期。但在5世纪后期到6世纪前期，随葬物品出现了头冠，耳环，腰带，金铜鞋履全套。

### 骑马人物型土器与彩画板服饰

金铃冢出土的骑马人物型土器因写实的新罗人面孔和着装而备受关注。也许是因为高挺的鼻子和尖尖的下巴所致，骑马人给人的印象显得有些锐利，但微眯的双眼和肉墩儿的胯下马又让人心生亲近之感，充分体现了似静而动的“静中动”的精髓。从侧面观察土器，前端的注口，骑马人的脸，后面的马尾形成了一条弧线。之所以将主人乘骑的马做得肥壮，似乎是为了整件作品的稳定感。

在这座人物像中，一直以来的热门话题是他头上所戴的冠。因为是土器，所以无从判断冠的材质，底部似乎粘附了贵金属。头冠基本是个圆锥形，圆锥正面似乎也贴了什么，但具体是什么已不可考。冠的底部贴了一层厚厚的装饰，冠后端向上呈尖状突出。人像并不是将冠压低戴在头上，而更像是放在头顶上的，用左右侧的两根绳子沿着耳朵垂下，在颌下固定。虽然相关资料并不多，但麻立干时期新罗统治阶层平时佩戴的冠及帽冠的形状应该与此相似。

另一方面，天马冢除了著名的天马图之外，还出土了一件绘有骑马人物像，瑞鸟，草花纹和菱形纹的彩画板。虽然这件文物的性质不明，但认为是马



图38 金铃冢骑马人物型土器

具的一种或是冠帽的帽檐。将两张圆形手镯状的白桦树皮层叠起来，用线进行衍缝后在正，背面画了图案。在所描绘的各种场景中，骑马之人的头发和服饰最为引人瞩目。头发并没有束髻，长发下垂。上衣为襦衣，下装为阔腿裤，具备史书中记载的三国时代服饰的基本形态。上，下装的颜色不同。



图39 骑马人物型土器，人物像近照



图40 天马冢彩画板人物像近照

## 4

## 物品

## 土器

进入4世纪后期以后,岭南地区的土器文化发生了变化。大致上以洛东江为界,洛东江以东流行新罗样式,以西则是伽倻样式的土器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这个时期两个地区的政治体系及土器生产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两个地区的核心集体成长起来后,在东岸新罗形成古代国家,在西岸伽倻社会成立,各区域的统治力度得到强化,对土器生产体系的控制力度进一步加大,使区域内土器样式具备了较强的统一性。

新罗土器和伽倻土器与高句丽土器或百济土器相比,在器种的构成或器形上有相似之处,但若仔细观察,依然会发现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台脚的透窗形态。新罗土器的透窗上下交错,而伽倻土器则是并排透窗。新罗的高杯杯形较深,伽倻的高杯则较为扁平。在盖子的柄方面,新罗的就像倒过来的台脚,而伽倻的盖柄大部分都是纽扣形。在土器表面的花纹方面,新罗是用大刀雕刻了三角形,网纹,圆形,各种动物形象,而伽倻则装饰以点列文。

最能表现新罗土器正式自成一派时期情况的古墓是庆州月城路Ga-13号墓。在这座古墓中首次出土了在台脚上开有交错型透窗的高杯,而对于王陵皇南大冢南墓的墓主是奈勿王(356~401)还是訖祗王(417~458)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根据不同意见,其年代可能在4世纪中期或5世纪初。

麻立干时期是大量生产土器,并将其大量随葬到积石木椁墓等墓冢中的时期。主要器种有高杯和台附长颈壶。此外还制作了圆柱形器台和钵型器台,台附直口壶,盖杯,杯形土器,赤褐色软质钵等。

在土器中,形态变化速度较快的是高杯。整体来看,皇南洞109号墓3,4椁



图41 庆州月城路Ga-13号墓有盖高杯



图42 皇南大冢南墓土器类1

出土品等早期型高杯的台脚颇长且有曲线，设计成4~3段。与此相比，皇南大冢南墓之后的高杯的台脚稍短一些，且线条笔直，设计为2段。台脚末端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早期的末端较为尖锐，到了皇南大冢南墓时期，尖锐型与浑圆型并存，再往后则以浑圆型为主流。器壁方面，也呈现越往后越薄的倾向。

色彩也因时期的不同而各不相同。早期高杯以高火烧成，剖面呈暗紫色的为主。皇南大冢南墓时期后色彩呈灰色系，而从大型高冢中出土的器物中，带有黑色光泽的也占一定比例。至于盖子，早期盖子的盖柄呈纽扣型或宝珠型，但皇南大冢南墓阶段之后普遍采用了台脚缩小型盖柄。这种盖柄不仅出现在高杯上，也广泛应用于盖杯，长颈壶等。

虽然特征不如高杯具有代表性，但长颈壶同样是能很好体现麻立干时期新罗土器特征的器种。长颈壶的变化集中在颈部的长度和口缘的形态上。较之高杯的台脚越来越短，长颈壶的颈部则变得越来越长。早期的瓶颈相对较短，并有很多没有盖子。皇南大冢南墓的出土品中也有配有盖子的器物，但并未发现典型的盖托。到了下一阶段，壶颈呈曲线外径，或形成完整形态的盖托，天马冢时期之后，出现了具有盘口形口缘的附加口缘长颈壶。

土器表面装饰了几何学纹样。最早流行的是在杯身和盖子上刻上各种纹



图43 皇南大冢南墓土器类2



图44 皇南大冢南墓高脚杯类



图45 天马冢土器一览

样，到了6世纪后变成了上下分布三角形和圆纹的简单样式。有时，也会捏造小型的人偶或动物土偶粘在上面。这是庆州独有的特点。

新罗土器早期仅出土于洛东江以东的岭南地区，后来逐渐扩大到忠州，清州等忠清地区，沿着东海岸的江陵以北也有所出土。从各地古墓同时出土新罗式装饰品即服饰。这一情况说明随着新罗版图的扩大，一部分新罗人直接带着土器迁移到了这一地区，或者是当地人接受了新罗土器的样式自己制造的。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每个地区的土器样式都存在一些微小的差异。例如昌宁，星州，义城虽然从广义上属于新罗样式，但具体样式上也存在着些许差异，因此也可以将每个地区归类为一个小地区样式。但庆山，大邱，蔚山，釜山的土器几乎与庆州的土器一模一样，反映了上述地区从各个方面与庆州地区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图46 皇南大冢南墓器台与长颈壶



图47 昌宁校洞古墓群出土的高脚杯

## 武器与马具

岭南地区4~5世纪是局势激荡的时代。随着辰韩·弁韩时期小国之间全面开启吞并之战，不仅仅是武器，各种甲冑等防具的制作也非常活跃。那时候，各国的命运取决于作战的能力。新罗从很早以前便致力于开发最先进的武器与马具。



图48 三累大刀(①皇南大冢南墓, ②金冠冢, ③大邱达城郡汶山里M1号墓)和三叶大刀(④釜山福泉洞 10·11号墓, ⑤皇南大冢北墓, ⑥义城鹤尾里1号墓)



图49 天马冢木心铁板被轮蹬



图50 皇南大冢南墓玉虫装饰鞍桥



图51 皇南大冢南墓金铜制步摇附云珠



图52 皇南大冢南墓扁圆鱼尾形杏叶



图53 天马冢心叶形杏叶



图54 天马冢天马图(左:红外线图片)



图55 天马冢竹制天马纹金铜装饰障泥

武器包括刀剑或枪等攻击用武器和甲冑类或盾牌等防护用武器。武器可分为用于近身战中的和用于远程攻击的。装饰大刀在武器中属于最高级别。观察皇南大冢南墓墓主的佩刀,发现其作为仪装刀(装饰刀)的功能大于武器。因此,装饰大刀是与头冠,腰带等一起构成服饰的元素。新罗的装饰大刀有三叶大刀,三累大刀,龙凤纹大刀等。

铁制铠甲分为板甲和札甲。前者是打造大大小小的多张铁板之后,用钉子或兽皮拼接完成的铠甲。后者是用兽皮将数百张小的小札拼接在一起的铠甲。高句丽的古墓壁画中经常出现的骑马武士的铠甲是札甲。

马具包括控制马匹用的嚼子,骑马时脚踩在上面用于控制身体平衡的马蹬,放在马背上供人跨坐的马鞍,装饰马身用的马铃,云珠,杏叶等。马蹬以脚踏部呈圆环状的轮蹬居多。随着时代的发展,脚踏部分的宽度逐渐加宽,有的舍弃木心而用纯铁,其脚踏部分成了2股。在马具中,最奢华的是马鞍。大部分出土品只剩下了前后鞍轮。从皇南大冢南墓出土的金铜制鞍轮正面绣有龙纹,镂空板内侧紧密粘附了玉虫的翅膀,显得极致奢华。

云珠指的是用于装饰马背上系带交叉部位的马具。早期的云珠为了充分起到防止系带打结的功能而制作得非常简单,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彰显奢华贵气,而用金银等贵金属装饰。其中,尤其以高句丽系的步摇附云珠最具代表性。因在圆形云珠的上面点缀了步摇,故而得名。

杏叶是坠在马背上的皮带下端的装饰品。新罗的杏叶有很多种,最具特点的是扁圆鱼尾形。杏叶的上端为扁圆形,下端呈鱼尾状,故而得名。此外,因心形外型而被称为心叶形的杏叶也非常独特。

另一方面,在天马冢中出土了多件障泥。障泥是用于遮挡马蹄喷溅泥土所用的马具。障泥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两张为一组的白桦树皮制品,因为其表面上绘有天马图。绘有图案的白桦树皮为多张层叠,衍缝了多行,边角用真皮包了起来。天马图是用白色涂料在红色的白桦树皮上绘制而成的,马鬃和马尾显得非常有力,口喷瑞气。边缘用红色,黑色,白色,绿色绘制了忍冬文。近年来在翻新保存天马冢出土文物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件在竹子上装饰了天马纹镂空金铜板的障泥。

## 金属容器

在庆州的中大型古墓中,还出土了各种金属容器,截至目前出土的金属容器达到100余件左右。其中,大部分都是熔解金属后倒入模具中铸造的,或者是用锤子锤打锻造出来的碗。此外还有盒,碗,熨斗,鏝斗,鼎,壶,洗,盘,勺,蒸屉。金属容器中有一部分是王族或贵族的生活用品,但大部分是用于各种仪典的礼器。其中有金,银等制作成的典型新罗样式的高杯,也有用青铜制作成的长颈壶,但大部分与中国中原王朝及高句丽的礼器有着相似的器形。

在金属容器中,数量最多的盒基本上受了高句丽的影响,不同的是大小要更小,也更具观赏性。盖柄的形态随着时间的不同发生了变化。早期以高句丽



图56 皇南大冢北墓金制高脚杯



图57 金冠冢铜制鏊斗

式的十字钮居多, 6世纪后流行的是宝珠形钮或鸟形钮。到了金冠冢和饰履冢出现的时候, 金属容器上加入了华丽的纹样。从金冠冢出土的鏊斗不仅制作工艺精巧, 表面刻画的各种纹样也非常漂亮, 将圆形容器上的注口雕琢成了龙头, 手把两端也各阳刻一个龙头, 凹凸有致。从饰履冢出土的勺子则用鍍金工艺在勺上表现了龙, 鸟, 忍冬唐草文。另一方面, 皇南大冢北墓中出土了盏底扁平的小银盏, 用凸纹(打出)工艺在整个表面表现出各种纹样。这一银盏的纹样出土自饰履冢, 与古墓名字由来的金铜饰履上的纹样相同, 体现出了外来元素。

### 农器具

三国时代的正式开启, 最大的契机在于铁器的普及。铁器虽然也用于制作



图58 皇南大冢南墓银盒



图59 皇南大冢北墓银盏



图60 天马冢出土的各种农器具



图61 皇南大冢南墓出土的铸造铁斧

战争武器上，但应用于制作各种农器具后，生产力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并成为导致社会分化和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新罗的炼铁技术从斯卢国时期开始便独占鳌头，在此基础上，新罗从很早开始便普及了各种铁制的农器具。进入麻立干时期后使用了耕地具，摩田具，除草具，收获具等，能从中推算出整个农耕过程的各种农器具。由此，形成了前近代社会农器具的基本框架。在这一过程中，4世纪以后用于打开农田灌溉水道的铲子和锄头开始出现，6世纪随着犁头的出现全国普及牛耕。

铁制工具以制造各种武器和农器具用的锻冶具，加工金银精工品用的精致工具类最具代表性。铁镰或铁刀子等农器具在小型古墓中也有出土。但耙子，犁，犁头等主要农器具和锻冶工具类，以庆州为例，只出现在王族，上层贵族的坟墓中，地方则只出现在首领级古墓中。这表示当时在农器具类的持有方面，总体上是受社会地位差距的影响的。麻立干时期新罗的统治阶层正是通过这种差距来稳定社会的。

## 漆器与织物

对庆州市内的王陵级古墓进行考古挖掘的过程中，出土了多件漆器。从金冠冢，金铃冢，天马冢出土的漆器上仍留有用红色，青色，黄色染料制成的瑞鸟，莲花纹，唐草纹，三角形火焰装饰。皇南大冢南墓出土的漆器上留有“马朗”两个字的朱书，从皇南大冢北墓中出土的漆器上则残留有包括凤凰在内的各种鸟，牛，狗等动物纹。这些图案成为研究新罗绘画史的珍贵资料。壶杆冢出土的箭筒的附属具使用了黑色底漆，庆州坊内里古墓出土的朱漆函则已证明在底漆中使用了骨粉。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漆工艺已经发展到了让人刮目相看的程度。

新罗的统治阶层为了从视觉上展示自己的排外性地位，做出了各种努力，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服饰。新罗被认为是韩国历代历朝中最封闭，也最严格遵守身份秩序的朝代，因此其从很早开始就根据社会地位的高低严格规定



图62 皇南大冢南墓漆器出土情形

了布料的类型和服饰的颜色，而这一情况在《三国史记·职官志》有记载。

但现存的新罗服饰或织物史料非常稀少，因此难以考证当时的详细情况。天马冢出土的马具使用了用彩丝编织纹样的锦。而从庆山林堂古墓群中出土的绣品(绣着织物)中，麻织品有用S股的线织造的麻布和苕麻布，绢织品则用没有捻股的线织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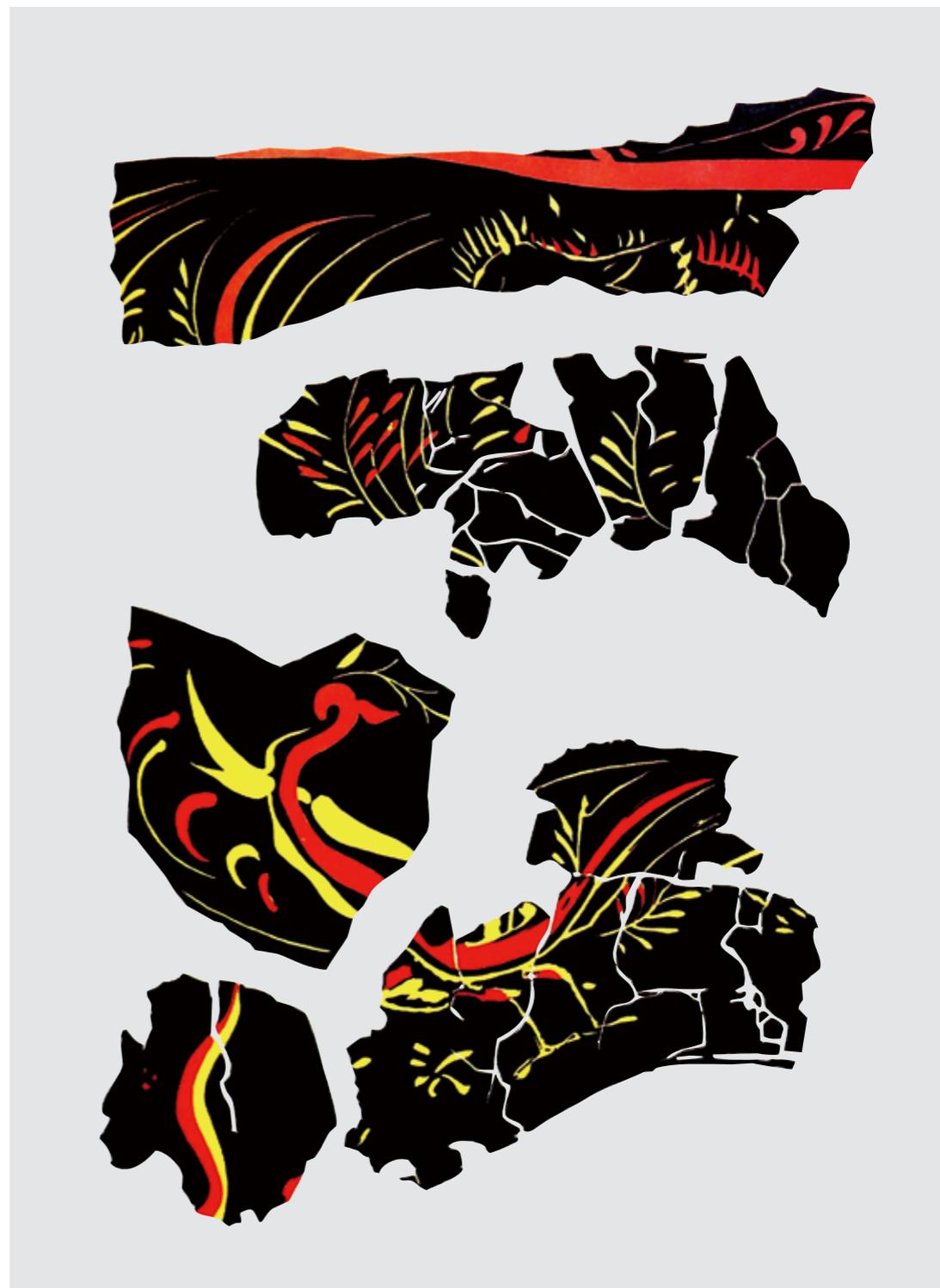


图63 饰履冢出土的漆器纹样

## 透过出土文物看 对外交流

### 与中国历朝的交流

在积石木椁墓建造期早期，新罗的外交倾向于亲高句丽，但到了5世纪中期以后，则与百济、伽倻变得亲密。新罗的考古资料充分论证了其外交关系正如文献记录上记载的一样，但以高句丽为桥梁而进行的与北朝的交流情况并不明确。在整个麻立干时期，南朝与新罗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外交往来。

尽管如此，皇南大冢南墓与北墓均出土了猜测在东晋~刘宋时期制造的铜镜，青铜熨斗，黑釉盘口小壶。这些文物考虑到同属一个时期的百济遗址中大量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物品以及433年以后新罗与百济缔结了所谓“罗济同盟”，应该是经由百济传入新罗的。



图64 皇南大冢北墓黑釉盘口小壶

### 与高句丽、百济、伽倻的交流

新罗从4世纪中，后期开始，在周边诸国中与高句丽来往尤为密切。似乎为证明这种外交关系情况一样，新罗古墓中出现了多件高句丽产或高句丽式的文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壶杆冢青铜盒，瑞凤冢银盒，金冠冢铜制四耳壶。这3件金属容器均为高句丽产的成品。与之相比，大型古墓中经常出土的鼎，盘，釜，斗，熨斗，盒，碗等金属容器组合可能是受高句丽影响制造的。

壶杆冢青铜盒由盒身和盖子构成。该盒的马蹄形底部表面铸有16字的铭文，铭文内容为：“乙卯年国冈上广开土地好太王壶杆十”。代表乙卯年，即415年纪念国冈上广开土地好太王而铸造的第十个碗之意。“国冈上广开土地好太王”是高句丽广开土大王的谥号，字体也与广开土大王碑相同。



图65 壶杆冢青铜盒

从瑞凤冢出土的银盒盖子内面以针刻手法刻有：“延寿元年太岁在卯三月中太王教造合杆用三斤六两”的22字文字，意为“延寿元年太王治世时，太王于卯年3月中旬下旨制造合杆，用银三斤六两。”底部的表面也刻有：“延寿元年太岁在辛三月口太王教造合杆三斤”(口：字迹辨认不清)的20字，意为“延寿元年太王治世辛三月中旬，太王下旨制造杆，用银三斤。”鉴于合杆盖柄呈十字型，新罗从没有过延寿这一年号，使用太王的称呼等现象，认为是高句丽产的见解占多数。“辛”字和“卯”字代表的辛卯年估计应该是451年，推测是银盒的制作时期。

装饰品中也包括高句丽产的作品。从皇南大冢北墓出土的太环耳饰在粗大的圆环下面坠了一个葫芦形垂落饰。这与新罗的其他耳饰从外观上明显不同，反而与集安麻线沟1号墓的出土品十分相似，这就是高句丽产成品传入的例子。北墓出土的Y字形发饰也与麻线沟1号墓出土品几乎一模一样。此外，从新罗古墓中大量出土了带有高句丽元素的文物。从月城路Ga-5号墓中出土的铅釉壶很有可能是高句丽产的成品，但因尚未在高句丽遗址中发现过同类文物，因此很难判定。此外，从古墓中出土的许多武器，马具上也能轻松看到高句丽的元素。



图66 瑞凤冢银盒



图67 瑞凤冢银盒铭文



图68 皇南大冢北墓金制耳饰



图69 庆州月城路Ga-5号墓铅釉壶

积石木椁建造期的新罗文化中会出现规模如此可观的高句丽元素，其理由是4世纪后期之后，新罗与高句丽一直维持友好的关系。经过公元400年高句丽军的南征之后，变得更加紧密的两国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5世纪中期。高句丽的工艺品可能就是在此期间大量流入庆州，将其新罗化的生产活动也活跃展开。

如此，新罗与高句丽的交涉与交流活跃展开，但尚未在高句丽的遗址中发现积石木椁建造时期新罗的物品。这与从中国南北朝时代的遗址中未发现百济与新罗文物的情况一脉相承。

新罗与百济虽然也曾为中南部地区的霸权而对峙过，但也曾守望相助共同抵御高句丽的南下。于是，两国曾经互相派遣技术员，也曾有过皇室的联姻。而在这些过程中，当然要伴随着文物的交流。新罗遗址中曾出土过百济产文物，同样，从百济遗址中也曾出土过新罗产文物。

饰履冢的金铜饰履是将3张厚镀层的薄铜板拼接在一起的，将2张金铜板呈左右对称拼接起来形成侧板，底部用了一张金铜板。这一鞋底描绘了龟甲纹以及11个8瓣莲花纹。龟甲纹交替搭配了龟面和双鸟纹，对称排列了有着人脸和鸟身的人面鸟身，鸟，麒麟，有翅膀的鱼。这个饰履的纹样与百济汉城期后期的高敞凤德里1号墓4号石室出土的饰履相似。此外，侧板在鞋履前后用钉子固定，鞋底的金属钉像锥子一样突出的特点基本上也与百济金铜饰履同属一宗。

另一方面，公州宋山里旧1号墓中出土的两件鍮板是典型新罗腰带配饰的组件。在方形的银板上以镂空方式表现了简化忍冬草。这与金冠冢的出土的腰带配饰最为相似。金冠冢各出土了一组拥有相同图案的金制品和银制品。由此可以推论到宋山里旧1号墓出土品是从新罗传入百济的。这一腰带配饰之所以流入百济，可以肯定是因为430年~553年期间罗济同盟。

新罗与伽倻因为仅隔着一条洛东江，因此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来往都更为密切。伽倻与新罗不同，是小国分立的联盟体制，因此很难就新罗与伽倻的关系一言以蔽之。但新罗与伽倻从辰韩·弁韩时代便开始共享着相似的文化，因此长期以来保持着文化同质性。4世纪以后，在国际关系的变化过程中，伽倻与百济-倭联盟保持同盟关系，新罗则选择与高句丽联盟与之对抗，这种关系的巅峰对决便是400年爆发的多国混战。在这场战争中，曾攻击新罗的伽倻，百



图70 饰履冢金铜饰履(底板)

济，倭国联军，因高句丽增援新罗而大败。之后，新罗开始受高句丽的干涉。但到了430年代，渴望摆脱高句丽干涉的新罗与百济联姻，新罗与伽倻的关系也由此基本进入和平期。彼此制造的成品经常出现在对方统治阶层的墓葬中，便是这种外交关系的有力论证。

饰履冢和壶杆冢中出土了采用与大伽倻的龙凤纹大刀相同工艺的大刀，尤其饰履冢大刀与陕川玉田M3号墓中出土的龙凤纹大刀非常相似。因此，可以推



图71 公州宋山里旧1号墓银制铸板(新罗产)

图72 高灵池山洞45号墓三叶大刀  
(新罗产)

论饰履冢及壶杆冢的大刀是从大伽倻引进的。饰履冢和金铃冢是凤凰台古墓的陪冢，而且出土文物不仅档次高，其中还包括许多与中国南朝或百济有关的史料。鉴于此，墓主生前可能是王室中人，且是与大伽倻-百济-南朝的交流事宜息息相关的人物。从当时大伽倻与新罗的格局来看，很难将这把大刀看作是大伽倻下赐给墓主的，可能是惠赠或墓主以个人名义购置的物品。

大伽倻古墓中也出土了新罗产器物。作为从新罗进口成品的代表，可以例举池山洞45号墓的三叶大刀。三叶是三国时代各国大刀常用的通用图形。话虽如此，但新罗制造的大刀环头的形态是所谓的上圆下方形，并在其中装饰了三叶纹。池山洞45号墓大刀从外观及制作工艺来看，说是庆州造也无可厚非。此外，从陕川玉田古墓群出土的耳饰中有些带有新罗的特点，但与庆州的出土品相比，又有一些微妙的差距，因此，也可看作大伽倻圈受新罗的影响制造的。其他池山洞古墓群或玉田古墓群出土土器中的新罗样式的土器，与其说是庆州造，更有可能是洛东江以东的玄风或昌宁地区制作的土器。

涉及新罗与倭国交流情形的资料较少。因为就像400年爆发的多国混战一样，两国对立的时间远远长于和平期。尽管如此，约建于4世纪前后的庆州月城路Ga-29号墓中出土了日本产石手镯[石钏]，从Ga-31号墓中出土了土师器系土



图73 庆州月城路Ga-29号墓石手镯



图74 庆州月城路Ga-31号墓土师器系土器

器。此外，从金铃冢出土的铜镜又名百乳镜，是当时倭国流行的镜子，因此很有可能是从那里进口的。日本则在各地零散出土了5世纪前期和6世纪以后的新罗文物。



图75 皇南大冢北墓嵌玉手镯

对于新罗与倭的交流，可能是新罗为摆脱高句丽的掌控而与百济伽倻和倭国采取和亲政策之后，430年以后新罗与倭国的文物交流进入了最活跃的阶段。从日本列岛5世纪中期的古墓中出土的三燕或新罗系马具类以及装饰品都确实体现了这一时期两国的交流情况。

新罗的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黄金装饰，是名副其实的“黄金之国”。其中有几件造型和制作工艺非常独特的文物，最具代表性的是皇南大冢北墓嵌玉手镯和鸡林路14号墓的装饰宝剑。

嵌玉手镯是从皇南大冢北墓中出土的多件手镯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出土当时佩戴在墓主的左手腕上。包括新罗在内，三国时期的手镯大部分较细，且呈圆形或方形，但这款手镯的金板宽且长，加入了细线与细粒细工元素，并镶嵌了绿松石等宝石。手镯手环部分也将一张金板衬在镶嵌了金珠和宝石的金板背面，对上下边缘进行了圆润的包边处理。这种工艺在东亚系手镯中史无前例，在波斯手镯上出现过环形不同而外观类似的镯子。因此，也有人认为这个手镯的产地来自东罗马。但西域工艺品中并不存在用相同的工艺手法制作



图76 庆州鸡林路14号墓装饰宝剑

的作品。与之相比，北魏工艺品中从内蒙古西河子乡出土的步摇冠在嵌玉的组件，镶嵌工艺，中控卷丝等方面与北墓出土的嵌玉手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不能排除住在北魏的西域工匠参与制作的可能性。

装饰宝剑是东亚唯一一件独特的出土宝剑。铁剑的刀鞘和刀柄都是用纯金打造的，刀鞘表面形成框架，将晶莹剔透的暗红色石榴石镶入其中进行装饰。装饰的中间和外围则贴上金颗粒以增加奢华感。刀柄末端是半圆形，刀柄的



图77 味邹王陵地区颈饰(包括镶嵌琉璃玉)和镶嵌琉璃玉(細部)

装饰细长。刀鞘入口处的装饰添加了向一侧延伸的长方形装饰及其下面的托一样的装饰，刀鞘末端采用梯形。侧面设计了两个勾部方便挂在腰带上，上面的装饰为“P”字形，下面的装饰为半圆形。外观与此非常相似的刀具有被俄罗斯埃尔米塔日博物馆收藏的哈萨克斯坦波罗瓦的出土品，被认为是5世纪的作品。鸡林路宝剑产地被推测为伊朗或中亚。

在新罗积石木椁墓中出土的琉璃制品中，琉璃容器和镶嵌琉璃玉都是舶来品。镶嵌琉璃玉出土自味邹王陵地区C区的4号墓中。用马赛克手法表现了4名脸白，嘴唇嫣红的人，背景为蓝色。在这些表现生动的人物之间，还穿插有鸟和云。在小小的琉璃珠上镶嵌了多个精巧的图案，展现了琉璃工艺的精髓。这块琉璃玉看似也是从西域流入的，其产地可能是印尼爪哇(Java)岛。

在庆州的古墓中共计出土了24件以上的琉璃容器。除了庆州外围的安溪里4号墓出土品之外，其他均与金冠等黄金文物只出现在王族的陵墓中。即，琉璃容器具有只出现在君王与王族的坟墓中的特点。这一点说明琉璃容器在当时的新罗社会是属于最高阶层的象征。

这些琉璃容器属于钠玻璃系统，采用人工吹制工艺成型。大部分都是在罗马玻璃的制作中心制作而成，具体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某地制作而成的。加上类似容器类的分布，应该是通过丝绸之路中亚的大草原，经由所谓的“草原之路”传入新罗的。

如上所述，从麻立干时期的新罗遗址中出土了许多来自西域，中国南朝，高句丽，百济，伽倻，倭国制作的文物。其中，来自西域或南朝的物品可能是经由高句丽或百济流入新罗的。另一方面，百济，伽倻，倭国遗址中出土了新罗产物品，但在高句丽，南朝未曾出土新罗产物品。新罗随着外交关系的发展，进口的舶来品被王室独占，也有下赐给王族，上层贵族的迹象，但并未发现下赐给地方首领的痕迹。如昌宁等新罗的边境地区有传入大伽倻产物品的痕迹。



图78 天马冢琉璃杯



图79 皇南大冢南墓凤首形琉璃瓶

## 第三章

# 外来文物的 接纳与发展

## 中古期

金石文  
墓葬和葬礼  
佛教美术  
服饰  
农耕与生产  
透过出土文物看对外交流

中古期是指从23代法兴王即位的514年开始，一直到28代真德女王死后武烈王即位的654年间。这一时期跨度140年，是新罗千年历史中成长与发展活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新罗摆脱过去的集体性质，同时形成了新罗独有的特点。中古期是三国中原始国度起步最晚的新罗克服政治社会性的落后，追赶上另外两个发达国家，最终为统一大业奠定基础的时期。这表示这一时期内不仅是社会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文化也渐趋成熟。这些面貌可从文献资料及几个新出土的6世纪金石文资料，遗址和文物等多个考古资料中得到证实。

6世纪初登上王位的智证王(500-514)从多个方面着手，采取了值得关注的改革措施。这也是为了将之前以6部为中心的体系转变成以国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支配体系而采取的预备措施。

继智证王之后，法兴王(514-540)继承其遗志，将父亲实施的政策付诸于具体的行动之中。517年，新罗设立了兵部，这是新罗最早的官府。这一举措也符合需要大幅加强军事力量的时代需求。520年颁布相关法令，体现了全新整顿的新罗其国家运营方向。其中应包括最终被分为17级的官阶在内，将各种与国家基本方针相关的事项设为篇目。最近发现的多个金石文中记载的《佃舍法》或《奴人法》等都是其有力证明。528年，国家公开承认佛教。佛教早在5世纪前期讷祇王时便已传入新罗，但在真正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从内部经历了诸多的矛盾和摩擦。法兴王时期修建了新罗最早的寺庙——兴轮寺，也因此推崇佛教的贵族和反对派之间造成了巨大的矛盾和摩擦。随着以法兴王为中心的尊佛势力胜出，佛教终于成为国家级宗教。

佛教令新罗社会从多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变化表现为：用理念支持的意识形态强化从制度上整顿的中央集权支配体制；对死后世界产生了理念上的变化，并衍生出庆州盆地等的墓葬结构(横穴式石室)及墓群的位置(周边山区)变化；迅速提升文字使用水平；其他与佛教有关的各种文化被正式接纳等。新罗的整个文化氛围都开始发生了变化。536年首次使用年号，对统治者的称号也从过去的寐锦王变成大王等，新罗此时已经具备

了名副其实的中央集权制贵族国家的基础。

以如此整顿的支配体制为基础，新罗正式开始对外扩张自己的领域。随着551年真兴王(540-576)成年后亲政，使用开国年号，正式开启了新的时代。就在同一年，新罗与百济共同出兵汉江流域，到了553年更是独霸一方。554年在百济圣王发起的复仇战中获得全面胜利。乘其胜势，新罗于562年终将伽倻实力尽数收入囊中，达成了长久以来的夙愿。由此，新罗不仅大大奠定了人力，物资基础，还架起了能与中国直接，独立交往的桥梁。随着版图的扩张，人口和土地的骤增，新罗政府不得不全新强化对地方的统治。真兴王为了招抚这些亡国之民成为新罗国人，对外标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的王道政治。

在真智王(576-579)短暂在位后即位的真平王(真平王，579-632)为了维持法兴王和真兴王历经两代架设的体制正常运行，加快了制度整顿的步伐。新罗在长期经营的固有体制基础上，接纳在与中国南北朝交往过程中接触到的各种先进制度，进一步完善并整顿体制，实施了以法令为本的统治。如上所述，新罗为统一大业一步步夯实了基础。中古期的最后是史无前例的女王登基，也是进入中代的过渡期。



## 金石文

### 碑文世纪—六世纪

到了6世纪后，正式开始转型为以国王为核心的统治体制，这一面貌在文献记录中有大致的记载，但并无详细记录。可以对其进行具体完善，再现当时情景的线索可以从当时所建的各种篇幅短小的碑文中窥知一二。

在新罗版图内发现了大量属于6世纪的碑文，因此6世纪又被称为碑文世纪。另外，虽然这一时期的木简也大量出土，但内容相对简少，相比之下，石碑却可以更为生动地描绘出整顿统治体制的情景，因此是无以伦比的历史资料。6世纪初的金石文包括浦项中城里新罗碑(501年)，浦项冷水里新罗碑(503年)，蔚珍凤坪里新罗碑(524年)。

其中建造时间最长的中城里碑(图1)高105.6cm，碑文全文12行，依据第一行开头的辛巳，该碑修建于501年，估测总字数应在203字。碑文字体大小不均，小的2cm，大的5cm，差距较大。字体采用楷书，但仍留有很多隶书的痕迹。碑文内容讲述的是以中央六部的统治势力为中心发生了某种纠纷，牵连至地方势力，因此由朝廷介入裁决和执行的事情。碑文最后表示如有违朝廷决策，将



图1 浦项中城里新罗碑



图2 浦项冷水里新罗碑

予以严惩，彰显出依据成文法颁布法令之前必须制定法律的高调姿态。

冷水里碑(图2)宽70cm，是个分别在正面，背面，顶部刻有碑文的形态独特的三面碑。碑文正面有12行125字，全文共计231字。依据三行开头的癸未，该碑修建于503年。碑文是判决文的一种，叙述了珍而麻村一名叫节居利的权贵拥有巨额财产，于是与其有着各种关系的人们之间便发生了财产纠纷，最终由朝廷出面解决后予以执行的事情。该碑文首次披露了智证王即位之前是葛文王在位的事实，并出现了可以全新理解当时政治社会的几个线索。

凤坪里碑(图3)高204cm，碑文所刻部分宽度为32-36cm，但下端部位是54.5cm，形状不规则。字体为从隶书向楷书过渡阶段的字体，碑文全文10行，字数预计为398字(或399字)。该石碑建造于524年，碑文内容为：建造前一年在此地发生了朝廷不得不大举兴兵的重大事件，朝廷解决事端后，国王以及14位当朝贵族聚集在一起召开会议，公布处理结果并予以执行。该碑文涉及一些被认为是法令的法律名称，透露了大量过去未曾有过记载的内容，因此而备受关注。

奇怪的是，以上石碑均从东海岸地区出土。这里是北方居民和文化南下的重要通道，新罗从很早开始便非常重视此地。高句丽也是从5世纪中期开始向这条通道扩张势力。因此，新罗逐渐加快北上的步伐，与高句丽的边界甫一接触便开始发生冲突。524年建造的蔚珍凤坪里新罗碑从侧面真实反映了这一情形。

6世纪中期与新罗扩张势力有关的石碑均带有一种纪念碑的性质。首先，丹阳新罗赤城碑(图4)位于南汉江上游，碑身高93cm，上端部分被破坏。这是一面仅打磨一面后刻字的单面碑，用楷书镌刻而成，每字大小2cm左右。碑文22行，全文据估计应在430字左右，但目前残留的只有288字。第一行的开头已经被破坏，建碑年份不明显，估测在545年~551年之间。该碑文记录了在文献记载的新罗进军汉江下游之前，名将异斯夫奉真兴王之命主持军事作战，成功攻占高句丽位于此地池城的事件。通过该碑文可窥探到官阶制度和律令制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昌宁真兴王碑(图5)建于561年，高度约为176cm，宽度为175cm，是打磨一块巨大天然石的一面，并在边缘用直线打上边框后在里面刻字的单面碑。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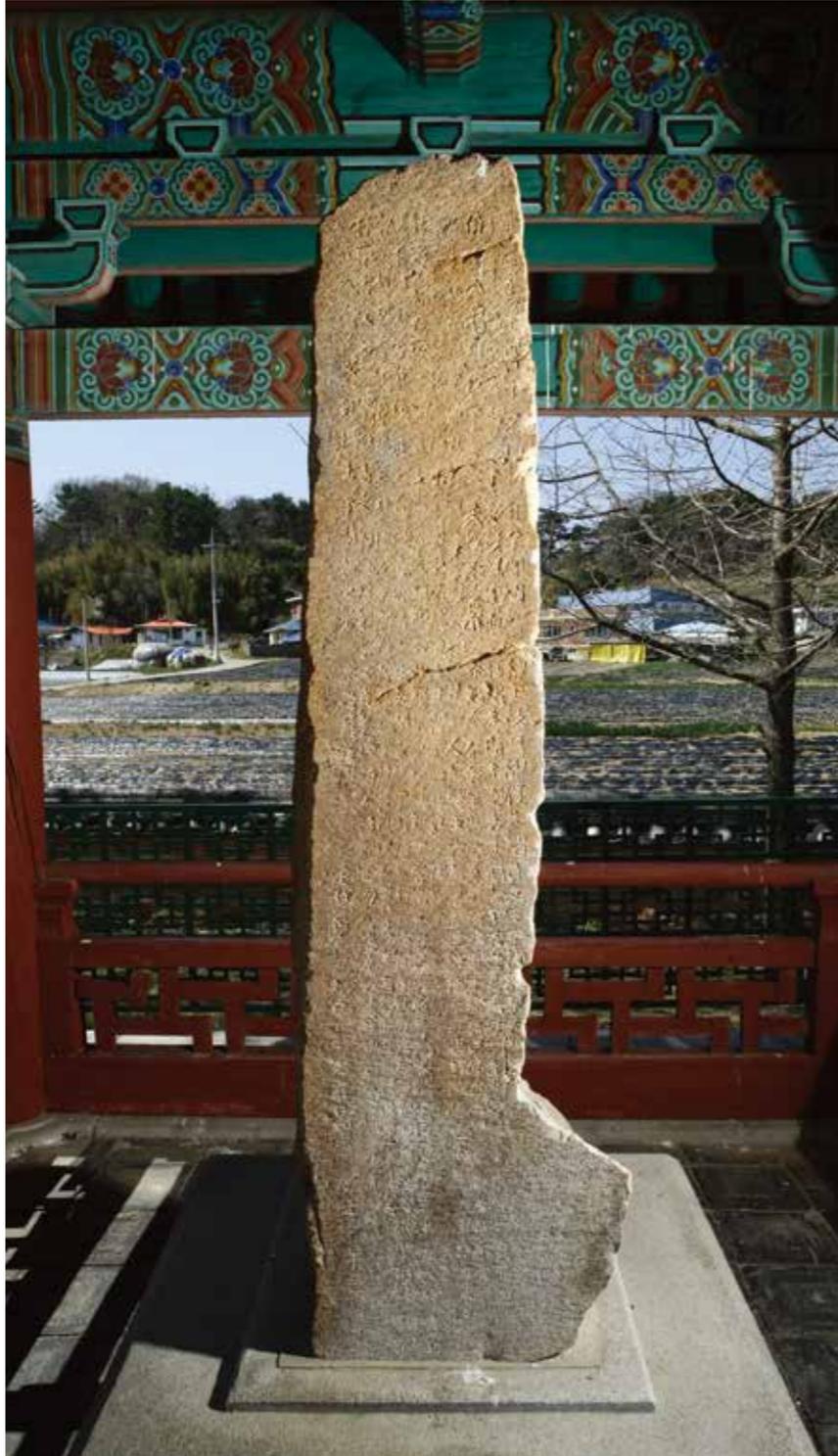


图3 蔚珍凤坪里新罗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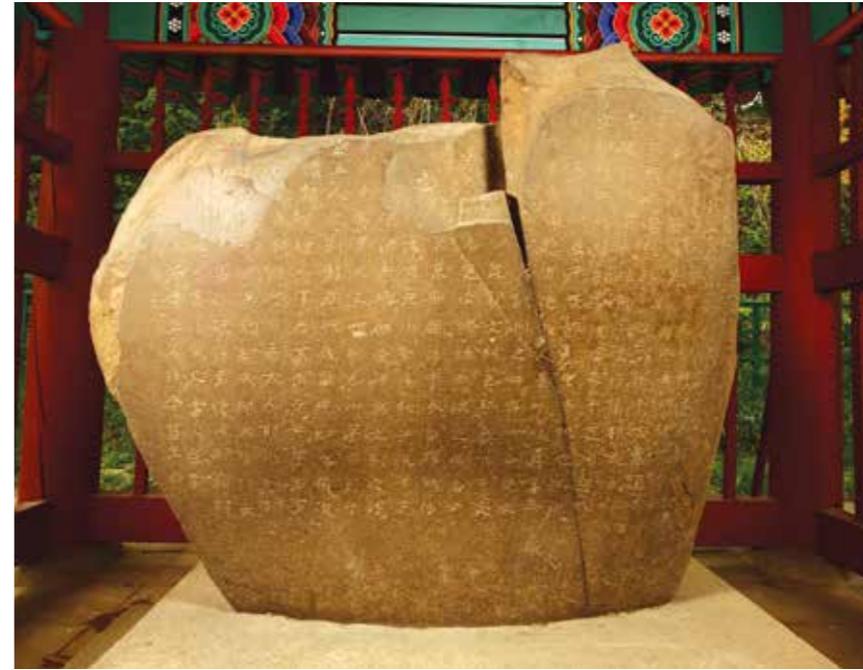


图4 丹阳新罗赤城碑



图5 昌宁真兴王碑

用自隶书演变而来的楷书刻写，全文27行，每行基本为26字。碑文前段记录着真兴王幼年即位后施政的基本方向以及向四周扩张领域、居民管理等内容。后段列出了从王都追随真兴王而来的中央高级贵族以及从其他地方就职之地前来参与的地方官员和军官，还有地方权贵，村长等人名。联系到次年包括大伽倻在内的其他伽倻势力被新罗吞并的事实，可以推测该碑与新罗进军洛东江以西地区密切相关。

昭示着进军汉江下游的石碑是北汉山的真兴王巡狩碑(图6)。该石碑原本位于北汉山的碑峰上，目前已转移至国立中央博物馆保存。该真兴王巡狩碑最先由秋史金正喜在1816年攀上碑峰后发现，此后他再次前往此地将自己调查得知的内容用自己的笔迹刻在了碑文侧面(图7)。

碑石材质是坚硬的花岗岩，据最近对石质的调查，有人大胆猜测是从庆州

搬移至此的。该石碑在碑峰山顶上建造碑座后插在上面，原来碑身上面还有盖石，现如今已遗失。该石碑是个单面碑，碑身高155cm，4面打磨光滑，但只在其中一面刻字。字体为楷书，全文12行，但磨损严重，无法得知全文字数有多少。建碑时间也有人认为在555年左右，但普遍认为是568年。该石碑是新罗涉汉江北上的有力物证。另外，之所以要建在人迹罕见的碑峰山顶，很可能是因为此处为新罗的领土边境，真兴王用于向上天诏告自身的领土所在。

而昭示新罗向东海岸北进的石碑是黄草岭及摩云岭的真兴王巡狩碑。黄草岭碑原本位于咸镜南道长津郡的黄草岭，目前被转移至咸兴市沙浦口的咸兴本宫进行保存。第一行的上端已被破坏丢失，碑身原本高度据测应为151cm，全文12行，每行字数应为35字。

摩云岭碑(图8)原本位于咸镜南道利原郡的云施山摩云岭，后移至咸兴市的咸兴本宫，与黄草岭碑一同展出。碑石材质和黄草岭碑一样，都是花岗岩。碑身高136cm，宽45cm，厚30cm，是配有碑座和碑盖的完美形态。与黄草岭碑不同的是，这是一座前后皆刻字的双面碑。碑文正面共10行，每行26字；背面共8行，每行各25字。碑文由真兴王巡狩的事实，目的及随行僧侣2人以及众臣的名字等三部分构成。通过这两座碑可知，真兴王于568年8月率领众臣巡视北方国境，确认边界，体察和安抚民情，并为积极说服其成为新罗国民而建造。

中古期除了这些石碑之外，还建造了带有各种性质铭文的碑石和刻石。首先是，为首都防御而建城时立起的明活山作城碑(551年)和南山新城碑(591年)(图9)。南山新城碑自1934年以来至2000年，共挖掘出10期。碑文不仅讲述了与南山城的筑城有关的相关事宜，还包含了与新罗的地方统治有关的重要内容。这些碑文在大致注明：“辛亥年依法建造南山新城，3年内如有坍塌必有严惩。”后，记录了与此相关之人的出身地，官阶，姓名等。所有碑文的开篇都一样，但相关人士的姓名各不相同，由此可推测是按照建城时分摊区域各自建造的。

其次，记载了与佛教相关内容的代表性石碑有大邱戊戌铭坞作碑(578年)(图10)，记录了在另冬里村修建坞，即水库的事实及相关负责人的职责，姓名



图6 北汉山真兴王巡狩碑(复原碑全景)



图7 北汉山真兴王巡狩碑金正喜书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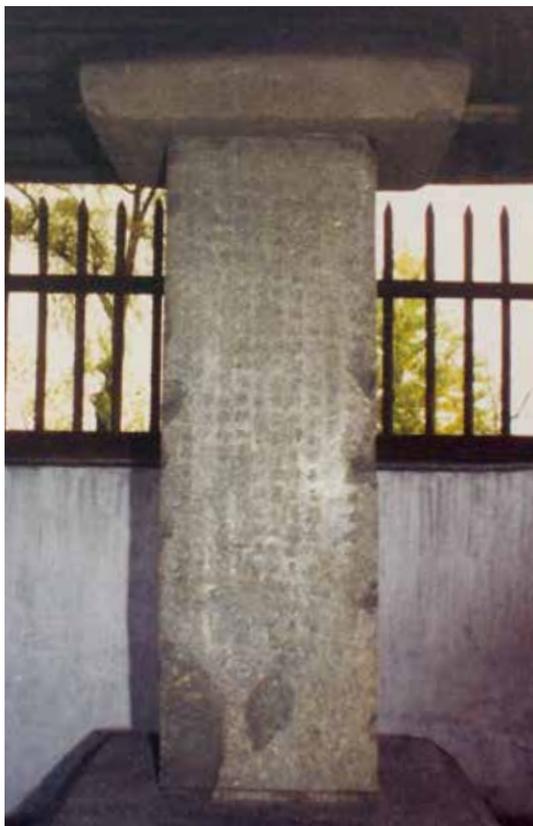


图8 摩云岭真兴王巡狩碑



图9 南山新城碑第1碑

以及水库规模, 动工人数, 作业时间等与工程有关的诸般事宜。至于工程负责人不是地方官员而是僧人, 可能是因为该水库与寺院相关, 而且他们具备专业知识。这也代表随着佛教受到朝廷认可, 僧人作为具备先进的专业技术和知识的阶层, 在国家统治的各个领域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僧人的名字在蔚州川前里刻石(535年)和黄草岭碑及摩云岭碑也有所记载。摩云岭碑所记载的御驾随行人员中, 两位僧人的名字出现在最前面。而修池后建造的石碑有永川菁堤碑(丙辰铭536年)。

蔚州川前里刻石(图12)在高度约2.7m, 宽为9.5m的大型岩石面上雕刻了几何图案, 动植物图案, 人物图案, 行列等各种图形的雕刻和各种铭文。铭文的刻石时间从三国时代至新罗末期非常宽泛。僧人的名字出现在据估测为535年



图10 大邱戊戌铭坞作碑



图11 壬申誓记石



图12 蔚州川前里刻石

的乙卯铭上,该刻石上也随处散乱记录着花郎们的名字,堤川点村洞窟刻石上也出现了花郎和郎徒的相关字眼。

另一方面,有儒学相关记载的代表性例子则当属壬申誓记石(图11)。该碑文开头写有“壬申”干支,内容中经常涉及宣誓效忠的字眼。其年份尚不明确,但认为大致是612年左右。尤其之前一年7月22日宣誓要依次熟读《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左传》等,限期三年,表示新罗中古期青少年们强烈的尊儒崇儒事实。

与儒教有关的记录从之前建造的风坪里碑和黄草岭碑及摩云岭碑中也已有体现。风坪里碑中提到“获罪于天”,意指对上苍犯了罪。该词出现在《论语·八佾篇》中,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对儒教经典的深入了解。此外,黄草岭碑与摩云岭碑中所用的巡狩,朕等表达方式以及引用了出自《论语·宪问篇》的“修己以安百姓”均体现了真兴王时期的儒教统治理念和水平。

### 统一新罗时期的金石文

随着三国的统一,汉字的使用水平也得到大幅提升。随着佛教和儒教经典的广泛普及,使用汉字的人数骤增,作文章的能力也得到迅速提升。尤其是为迎合国家所需而通过制度性教育有组织地培养汉字能力的结果,到了7世纪后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这一大背景下,涌现出元晓和强首等卓越的文豪,其水平显著提高。到了8世纪,唐朝认为新罗的文字水平已与唐朝接近,因此称新罗为君子国,由此可见一斑。

起初,书写汉字所用材料都局限于石头或木头等。即,不是碑文或刻石,就是木简或竹简。后来,造纸术传入新罗,其水平得到提升,行政文书或书籍逐渐以纸张代替。而在其他用途上,则利用了各种材料。例如,在土器上刻字或墨写;在瓦片上用模具印上去的;在各种印章和金属碗具等上刻字;在舍利棺和塔址等上镌刻铭文;在佛像和铜钟上铸造标记等。

如此,金石文在统一时期也被广泛应用。尤其在中古期罕见的新现象是“金



图13 庆州皇福寺遗址三层石塔舍利盒铭文

文”的盛行。即,在金铜板上刻字后封印在舍利棺内以及铜钟上的铭文等。前者可举例3层石塔舍利盒上所刻的铭文(706)(图13)和记载了建塔过程的昌林寺遗址塔址(855年)以及“咸通六年”铭金鼓等。

后者的代表性例子应属圣德大王神钟(771)。上院寺钟也同样建造于725年,在迄今为止被发现的铜钟中历史最为悠久。而被掠夺至日本后或被破坏或保存至今的铸文新罗钟有无尽寺钟(745)(图14),莲池寺钟(833)等。还有铸造有铭文的铁佛,在佛像左侧胳膊背面铸文的全南长兴郡宝林寺铁佛,于铭文开篇处记载了佛像的建造时间为释迦如来圆寂后的1808年,当时是国王(宪安王)在位3年(858)。此外还有在91cm高的佛像后背铸有楷书体铭文的江原铁原到彼岸寺铁佛(865)(图15)。此外,在月池(雁鸭池)中出土了刻有“东宫衙镗”的锁头,在国立庆州博物馆南部扩建占地中出土了刻有“辛审东宫洗宅”的1



图14 无尽寺钟拓本



图15 铁原到彼岸寺铁佛后背铭文



图16 武烈王陵碑螭首篆额部分



图17 武烈王陵碑螭首篆额拓本

件青铜碟。

石文形态更加丰富多样，首先新出现一种碑名——陵碑。武烈王陵碑的本身已消失，但螭首的中心部位刻有“太宗武烈大王之碑”的题额(图17)。此外还有文武王陵碑和金仁问碑，只剩残片的圣德王陵碑片，兴德王陵碑片等。其他石文大部分都刻在与佛教有关的器物上，以9世纪作品为主流，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其实，除了陵碑铭文之外的大部分石文都属于此类。首先，作为特殊形态有将石头打磨成石碑形状，在正面或四面雕刻佛像并刻入铭文的佛碑像，可分为石碑形态和光环形态。前者可举癸酉铭全氏阿弥陀佛碑像(673)(图18)，后者可举己丑铭阿弥陀佛碑像(689)。这些佛碑像证明了建造当时正在盛行阿弥陀净土信仰。然后是甘山寺阿弥陀如来立像(720)(图19)和弥勒菩萨像，背面刻有造像记，正如后世的汉文学项目中所述，体现了当时高水平的汉文驾驭能力。

和尚碑则另成一条传统，延续至新罗末高丽初期。其中建于哀庄王(800-808)时的高仙寺誓幢和尚碑是唯一记录了元晓于686年3月30日以70岁高龄圆寂的资料，并显示出了新罗地方军10停之一的音里火停的存在事实，因此具有



图18 癸酉铭全氏阿弥陀佛像



图19 甘山寺石造阿弥陀如来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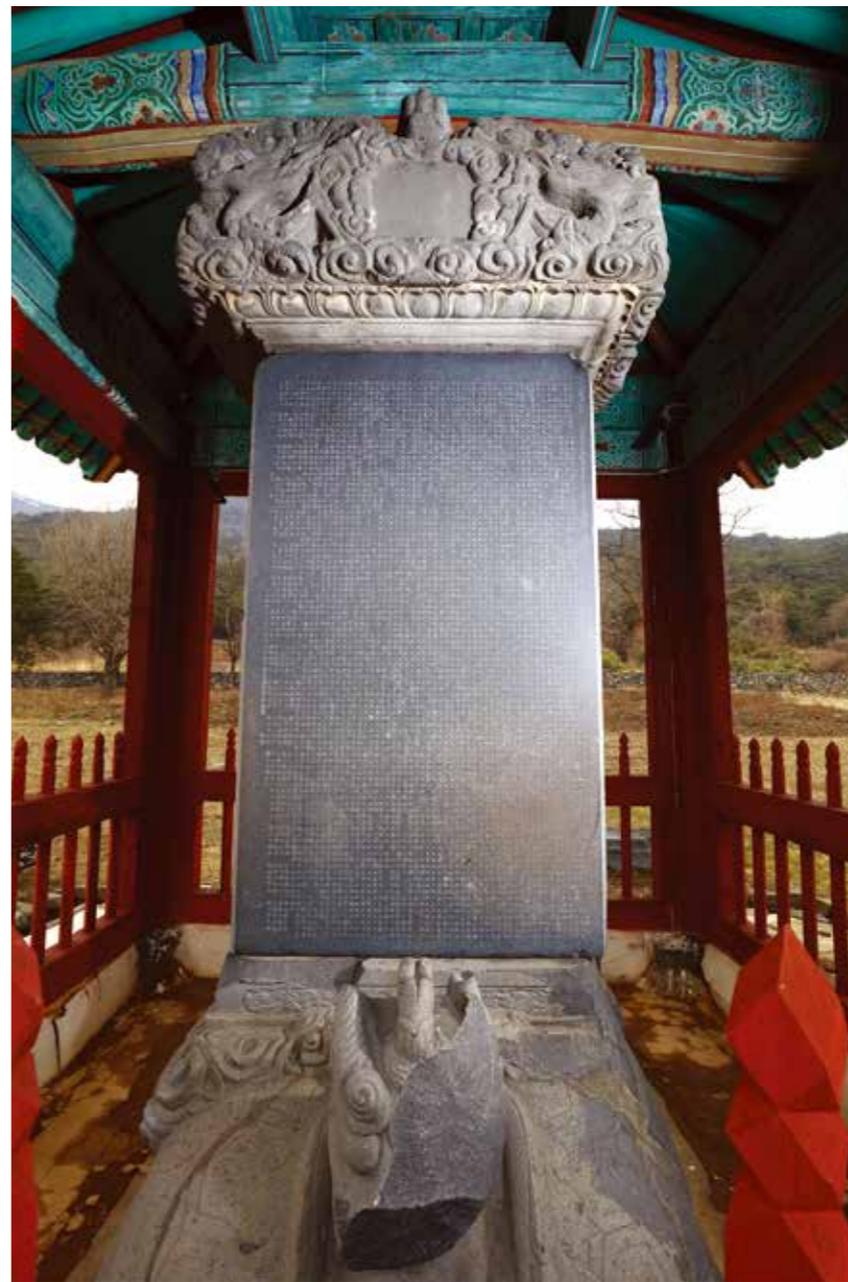


图20 保宁圣住寺遗址郎慧和尚碑

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他和尚碑中，与禅宗有关的9世纪代表性作品有忠南保宁圣住寺旧址的郎慧和尚碑(图20)。该碑文是崔致远所著四山碑铭之一。郎慧和尚是武烈王第八代孙，于哀庄王元年(800)出生，真圣王2年(888)以89岁高

龄圆寂，留下了关于他学习佛教的经历、与国王的对话内容、骨品制度等与新罗史研究有关的重要资料。该碑文写于890年左右，不久后建造了石碑。类似性质的石碑有长兴宝林寺普照禅师塔碑，昌原凤林寺真镜大师塔，闻庆凤岩寺智证大师塔碑等，这些石碑都是证明下一代禅宗盛行的如山铁证。



图21 陕川海印寺妙吉祥塔记



图22 大邱桐华寺敏哀大王舍利盒

在这些塔址中，将铭文刻在砖上的海印寺妙吉祥塔记(图21)最为突出。这是崔致远于895年撰写的文章，讲述了为超度众多死于战祸中的僧侣而建造石塔的始末。此外还有法广寺塔址(846)，宝林寺塔址(869)等。

刻在蜡石制舍利壶上的铭文也不少。偶有8世纪制作的，但大部分都是9世纪制作的。例如原本封印在大邱桐华寺毗卢庵三层石塔内部的敏哀大王舍利壶(图22)是涂有黑漆的蜡石制(高8.3cm)，是863年为死于非命的敏哀大王祈福而建造石塔并安置于其中的。铭文中记载了建塔的功德和敏哀大王的生平及建造石塔经过，以及与祈愿文有关之人的职务和姓名。这是证明桐华寺担任着新罗皇室法堂(愿堂)的珍贵史料。此外还有“永泰二年(766)”铭舍利壶，“咸通六年(865)”铭舍利壶等。

安养中初寺遗址幢竿支柱(827)和潭阳开仙寺石灯(868)上也刻有铭文，咸安郡北面防御山摩崖佛的下面也刻有铭文(801)。在8世纪初为防御日本进犯首都而兴建的新垓里城的城石上，每隔一段建造距离便记录了动员劳役的地区和距离等，其中“金京”尤其引人注目。金京，是指庆州。另一方面，土器铭文的代表应属从首尔舍堂洞窑址出土的刻有“△县器村何支为”铭文的土器碎片(图23)。器村是隶属前面△县的村名，应该是指窑址所在的那一带。这是证明7世纪已经有专门生产土器村落的珍贵资料。



图23 器村铭土器碎片

## 墓葬和葬礼

### 六世纪中叶至统一新罗时期的墓制

从6世纪中期以后到统一新罗时代的墓祭以横穴式石室墓和火葬墓为主，此外还有小型石槨墓等。横穴式石室墓的墓型内部结构基本上为地上式，像麻立干时期的古冢一样又高又大。即，先将作为内部主体的石室与内护石等结构一同建造后，再将整个坟丘与外护石一起盖上的形态。庆州市中心周围的山区大概是从6世纪中期才开始建造。

横穴式石室墓是以后续埋葬为前提的墓祭。因此，此类坟冢由安放尸体的石室，从外部进入石室用，类似有棚顶的走廊的连廊，从连廊外部连接坟冢外部的墓道(参考<图24-④>)以及坟丘等4个部分构成。当然，墓道将用坟土填埋。新罗横穴式石室墓的葬礼通常不使用棺材。因此，内部设有各种形态的尸台(图24)也应该是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

石室若为方方正正建造的六面体，则很难打造棚顶，因此建造四壁时通常会向上收紧，大部分会从连廊的玄门高度开始正式收紧。因此，连廊的棚顶自然低于石室的棚顶，存在一定的落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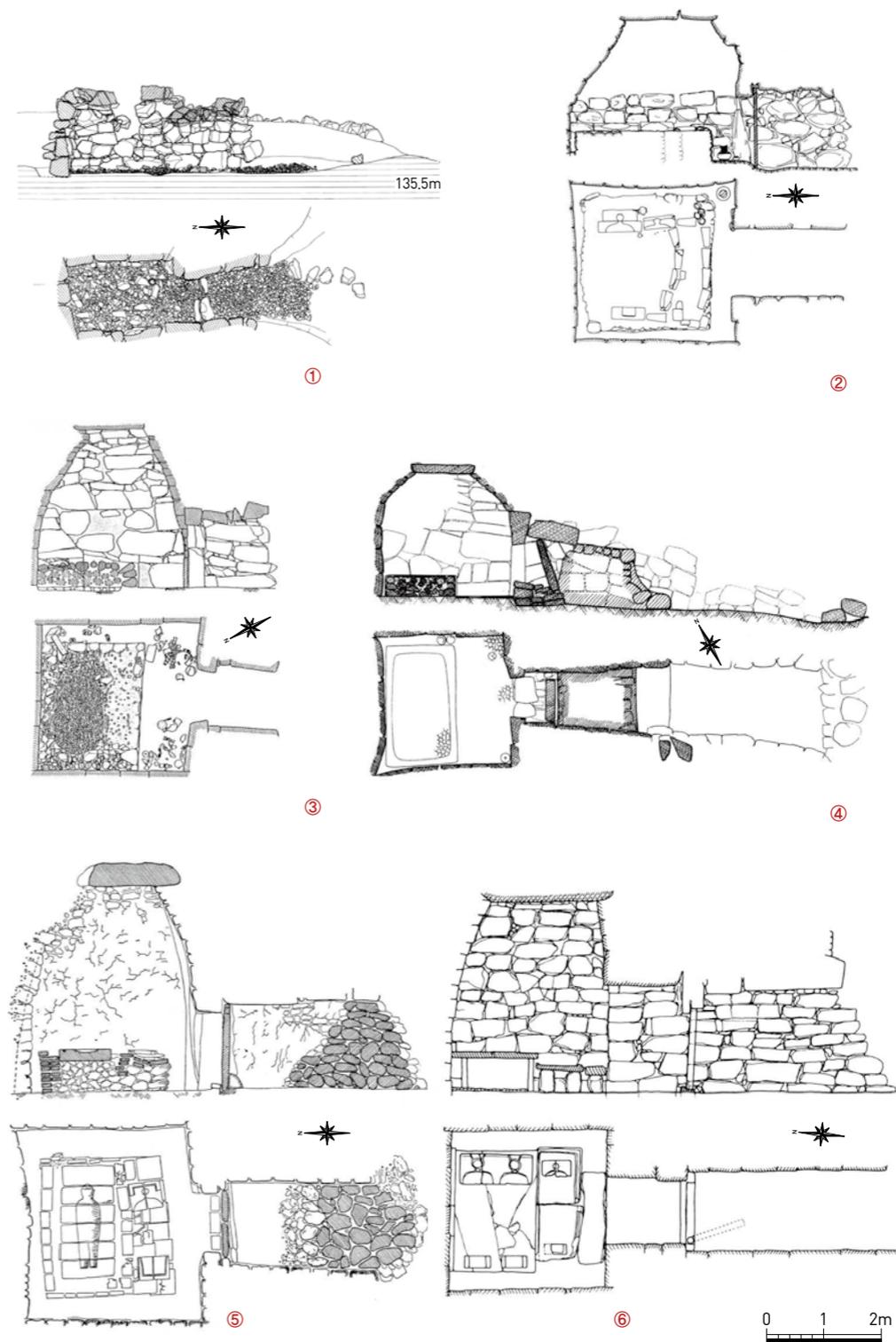


图24 庆州地区横穴式石室墓的平面图和侧视图



图25 庆州一带出土的新罗藏骨器

横穴式石室墓大致上根据石室的平面形态和连廊的位置等属性为依据进行分类。连廊的位置分为中央连廊型，左偏在连廊型，右偏在连廊型。石室的平面形态分为长方形石室和正方形石室，其中刚出现时的早期横穴式石室墓从平面上很可能是长方形。在此之后引进了方形平面，在方形石室中，年代久远的石室高度都较高。有的在玄门和连廊的门扉之间也有所谓的扉道。

新罗横穴式石室墓最大的特点是各种尸台，尸台说明当时在安置尸体时可能确实不用棺材，大体上逐渐从低矮向高台方向演变。那一时代大部分都是用割石建造边框后，再用小石头填充内部，但也有像獐山土偶冢一样用非常大的石板制作成床形的尸台。尸台分为有安置尸体头部·上身·脚的头枕·肩带，足座的和像双床冢一样有整体托起尸体的。此类尸体台都使用了凝灰岩。

火葬墓可分为将装有火化后骨灰，通常被称为骨壶(骨灰坛)的藏骨器直接埋在土坑里的墓和另用设施或容器保护藏骨器的墓。地方以前者为主。后者主要出现在王都地区，其设施或容器有石棺，石函，石穴，其他土器等。藏骨器常见的有:装饰有华丽漆纹的土器或中国瓷器等。尤其从8世纪开始偶尔也用带有盖子和坛身有捆绑用钩子的火葬专用藏骨器(图25)。

过去几乎没有可考证火葬墓外部形态的证据，直到庆州锡杖洞出土的61号火葬墓几乎足以确定坟丘存在。还原该墓(图26, 27)的铸造过程，应该是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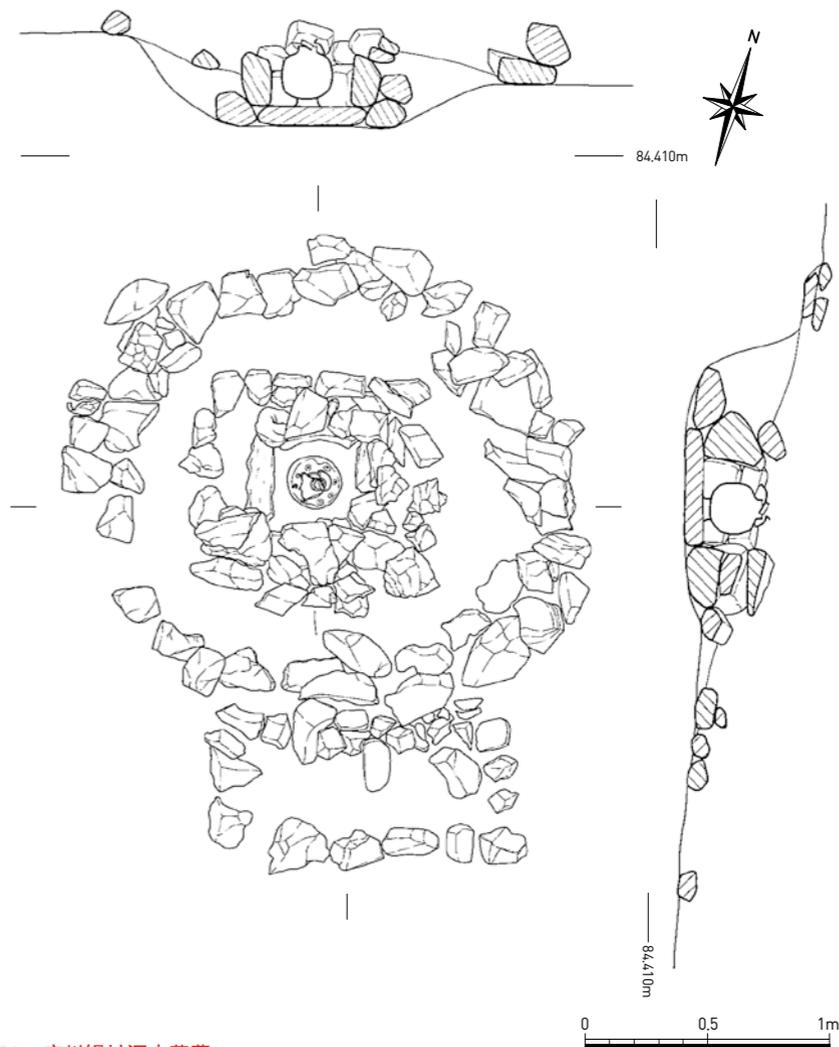


图26 庆州锡杖洞火葬墓



图27 庆州锡杖洞火葬墓发掘现场及藏骨器

挖出一个直径为200cm, 深度为50cm左右的平面为圆形的坑后, 将平滑的河石铺在中间, 再用4个割石与河石互相拼接, 形成方形石椁墓。用其他石头填充其周围, 并用泥土填平最早掘出的墓坑。在石椁内安置配有盖子的印花文骨壶后, 再用石头围住石椁周围, 然后再在上面盖上石盖。最终, 应该在首次掘开的墓坑周围用大小在20cm左右的割石砌一个直径为200cm左右的平面圆形护石, 并在里面建造小的坟丘。紧贴着该坟丘的东南侧, 用石头围出一个长方形区域, 里面用泥土填埋的台子上可能安置着床石。

东川洞火葬墓建造于小金刚山南端丘陵上某个横穴式石室墓的坟丘下面。鉴于与石室墓的年代相差无几, 因此可能当时有个小坟丘。小型石椁内有藏骨器和随葬品。其年代据考证在6世纪3/4期的后半段。

### 中古期以后的送葬仪式

石室墓是另设有通往墓室通道的横穴式或横口式结构, 与麻立干时期封闭式的竖穴式墓祭不同, 呈开放式结构。葬礼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骤然变化。开放式墓祭可以在坟墓建造完成后安放尸体, 也可以追加埋葬, 还能在安放尸体后于墓室内部进行祭奠。这种变化被认为是到高句丽, 百济, 中国南北朝的影响所致, 在葬礼制度上, 从中古期盛行石室来看, 来自中国南北朝的影响应该很大。

石室墓从麻立干时期的厚葬迅速向薄葬转变, 随葬品极少。随葬品中死后生活用品消失, 只剩下部分成服遗物和麻立干时期放在被葬者头顶上的部分贡品。此外, 部分古墓中全新出土了仿造实用品用于葬礼的模型和缩小人物造型的陶俑等明器或十二之俑等避邪物。葬法也发生了变化, 即以在石室一侧安装停尸台后, 在上面放置头枕, 肩带, 足座等, 将尸体直接放在其上的直葬方式为主。

纵观石室内部的文物出土状态, 尸体头顶安放简单的贡品后, 尸体上佩戴了腰带装饰等成服遗物。发现贡品都集中于玄室内部停尸台的前面或角落里。如此集中在一侧的贡品大部分为高杯, 长颈壶, 瓶子等土器, 用于对被葬者的祭祀中。



图28 庆州獐山土偶塚墓道及羨道(左)和玄室内部(右)

参考以上内容, 中古期以后石室墓的葬礼过程可整理如下。先完成坟墓的建造后, 通过墓道和连廊将搬运到墓地的尸体安放在石室内部的停尸台上, 并随葬成服遗物和贡品。之后, 建造祭台或将贡品摆放在祭桌上, 最后进行辞别祭祀后退出墓室, 封闭连廊和墓道。追加墓葬时会重新挖开首次墓葬时填埋的墓道, 进入墓室增建现有停尸台后, 通过相同过程安置尸体, 行同样的祭祀后, 退出墓室再次封闭墓道和连廊。

若回顾这种葬礼过程, 会发现石室墓的送葬仪式可以推测为按照选择墓地-准备随葬品-(后土祭)-墓地保留-穿圻-建造石室-(方相氏)-(永久放置)-搬入尸体-成服-(币帛)-随葬遗物-(平土祭)-封闭石室的顺序举行。此外, 从坟丘的周边和主构等出土的可能用于祭祀的文物以及从大型陵墓级古墓的墓典中发现的床石和拜礼空间来看, 墓祭在这一时期依然持续。

退出墓室时, 在祭台或祭桌上摆放贡品的祭祀与以往的传统平土祭一样。同时, 比起前一时期重视的尸体头侧的贡品, 该平土祭的贡品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此后, 随着死后生活用遗物的消失, 暗示了死亡之后观念的变化。认为坟墓是死后居住的阴宅, 在那里的生活是与生前生活不同的象征性的世界。而明器的出现, 将尸体视为鬼也与此一脉相承。这种变化同中国一样, 中国也是在葬礼历史发生堪称根本性变革的椁墓到室墓的转变时, 随着墓室内祭祀空间得到确保而发生的。

## 3

## 佛教美术

528年，佛教在新罗开始正式流传。此时，距佛教传入高句丽已经过了150多年。这一事件使新罗的文化和美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开端便是在王京修建了寺庙，随后在544年真兴王(540~576在位)5年修建新罗最早的寺庙——兴轮寺，之后又接连兴建了皇龙寺，芬皇寺等皇家寺庙，其中规模最大的便是皇龙寺。皇龙寺总面积约2万坪(约70000m<sup>2</sup>)，占地广阔。553年开始奠定地基，584年供奉着巨大金铜释迦三尊像的中金堂建成。观察当前皇龙寺中金堂旧址残留的座架，可以了解当时供奉了释迦佛立像等共计19尊各类佛像。推测位于中间的释迦佛立像高度应在5m左右，是著名的新罗三宝之一，长期以来受新罗人的尊崇。这里碑式作品于1238年受蒙古战祸的牵连，永远消失在了历史中。

从1976年开始，在历时8年的皇龙寺遗址挖掘过程中，曾希望能发现与释迦佛立像原形有关的资料，但出土的佛像相关文物只有47件。其中，被认为是供奉在中金堂内的巨大释迦佛立像一部分的螺发碎片也只有1件。即便如此，只剩4块的螺发碎片重达6.2kg，足以证明释迦佛立像的规模非常之大。

除了释迦佛立像之外，还出土了小型立佛像。该立佛像被发现于木塔旧址



图29 庆州皇龙寺遗址中金堂旧址

东侧，是高度仅有17.5cm的小佛像。佛像取轻微弯曲左腿，挺出右侧臀部的三曲姿势，身着袒露右肩的轻薄袈裟，垂下右手握住宝珠，形态饶有情趣。三曲姿势、袒露右肩以及手持宝珠的此类佛像已扔荣州宿水寺遗址出土的3件在内，仅新罗就发现了15件左右。此类佛像尚未在高句丽，百济发现，仅在新罗有所发现，是中古期新罗的特色佛像之一。

在讲堂旧址附近发现的鸱尾高达182cm，而鸱尾通常与建筑物的规模成正比，因此仅凭其大小便可知建筑物规模之庞大。鸱尾又称望瓦，位于建筑物屋脊的两端，有辟邪及装饰建筑物的功能。鸱尾背面刻有男女面相，虽雕工粗糙，但表情生动，堪与从灵庙妙寺遗址出土的人面纹瓦一起被誉为代表新罗的面相。

在过了60多年的645年，皇龙寺金堂前修建了高达80m的巨大九层木塔。关



图30 皇龙寺遗址出土的青铜螺发碎片



图31 皇龙寺遗址出土的立佛像



图32 皇龙寺遗址出土的鸭尾



图33 传灵庙遗址出土的人面纹

于皇龙寺九层木塔,《三国遗事》中详细记载了其缘由。据记载,善德女王(632-647在位)听从慈藏法师的建议,让百济阿非知带领200多名工匠一同修建。皇龙寺的九层木塔同样烧毁于1238年的蒙古入侵中,目前只剩下其遗址。

芬皇寺是在善德女王在位的第三年,即634年开始动工,将安山石打磨成石砖形状建造而成的模砖石塔,也非常独特。该塔是新罗保留至今的塔中历史最长的。该塔原本塔高9层,目前只剩下3层。因为经过了多次维修和复原,而无法得知现在的塔还保留了多少初建时的形态。只是与相近时期建造的百济弥勒寺石塔相比,完全不同的形态让人津津乐道。

芬皇寺模砖石塔一层的每一面都设有门,其入口左右伫立着金刚力士像。金刚力士像为4头身的身材比例,身披“X”字形天衣,充分体现了整个7世纪佛教雕塑的特点。经过3次挖掘分析,已考证创建当时芬皇寺在模砖石塔后面设立了3个呈“品”字形的金堂,为三金堂模式。由模砖石塔和普光殿构成的伽蓝配置无法考证其具体年代,如今是它第三次重建后的形态。



图34 庆州皇龙寺遗址九层木塔遗址



图35 芬皇寺模砖石塔



图36 芬皇寺模砖石塔金刚力士像



图37 芬皇寺石塔舍利具(银盒)



图38 芬皇寺石塔舍利具(针筒)

曾经在维修芬皇寺模砖石塔时在2层和3层之间发现了石盒和里面的舍利器及供养品。该舍利器和供养品是在新罗发现的历史最悠久的案例，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只可惜挖掘当时的具体情况不明，部分出土文物也已遗失。同时出土的还有银盒以及日本冲绳产贝壳，银制(针筒)，金银制针，银制圆盘形耳环，金铜制装饰板，各种琉璃及玉石制珠子等。出土文物主要是女性的生活用品，可见是与善德女王有关的供奉物品。

中古期佛教美术的压轴之作当属半跏思惟像。半跏思惟像是坐在椅子上，将右脚放在左腿上取半跏趺坐姿势，将右手手指贴近面颊陷入沉思的形象。这一时期新罗制作了数量颇为可观的半跏思惟像，其中首屈一指的是国

宝第83号。用金铜制作塑像并不容易，尤其像半跏思惟像一样将手指贴于面部，抬起一条腿的复杂姿态更是难上加难。即便如此，国宝第83号金铜半跏思惟像的姿态依然完美无瑕，与石窟庵雕塑一起充分展现了新罗美术的精髓。头戴三座山峦连成一片的头冠，后脑勺处留有用于插入光环的龕。以祥和的眉眼与温暖的微笑为特点，脖子上清晰刻有三道。上身并未披挂天衣，只以2串简单的项链加以表现。下身围着被称为裙的裙子，裙子垂落至放在左腿膝盖上的右腿下方，饱满顺滑。踩在左脚下的莲花状脚踏是模拟新罗时期而重新补做的。

除了材质和大小之外，国宝第83号半跏思惟像与日本京都广隆寺的木制半跏思惟像，两座佛像几乎如出一辙。头上同样顶着三山宝冠，墩子的形态和双腿上的衣褶也一模一样。不同之处便是材质。国宝第83号是金铜，而广隆寺佛像则采用的是赤松。这与日本通常将樟木作为木雕佛材料的习惯也有所不同。

能佐证这两座佛像渊源的作品则为庆北奉化郡物野面北枝里的半跏思惟像。流丽的3层衣褶垂落的样子和左手轻轻握住右脚踝的形态与国宝第83号的金铜半跏思惟像非常相似。上半身已被破坏，仅剩的下半身造型就高达175cm，是巨大的新罗作品。若上半身保存完好，将会成为高达3米的新罗半跏思惟像里程碑式的作品。它们只盛行于600年前后，不仅有可能高达3m的巨大石造半跏思惟像，也有用金铜制作而成的不朽之半跏思惟像。随之，可以说此类半跏思惟像在佛教美术史上的意义是非常特别的。

说到中古期佛教美术，就不能不提庆州南山的佛像。2000年被收录进世界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南山，在60多处溪谷发现了150多处寺庙遗址，目前保存有107尊石佛和磨崖佛，整个南山堪称是一座博物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中古期建造的，大部分建造于统一新罗时期。中古期制作的佛像有拜洞三尊石佛，长仓谷弥勒三尊佛，佛谷龕室佛像。

南山的大部分中古期佛像都集中于西侧，因此可以推测是从这里开始制造佛像的。其中最早的作品是看似孩童面相的拜洞三尊石佛像和长仓谷三尊石佛，它们也是新罗最早的圆刻佛像。拜洞三尊石佛像于1923年将原本散落在



图39 国宝第83号半跏思惟像



图40 日本广隆寺半跏思惟像



图41 奉化北枝里半跏思惟像



图42 庆州拜洞石造如来三尊立像



图43 庆州长仓谷石造三尊佛像

庆州南山山脚处的佛像集中到现在的位置上。在三尊石佛附近发现了记录有禅房寺名字的塔志石，因此又曾被称为禅房寺三尊佛。但发现塔志石的遗构属于高丽时代后期，因此也证明了与7世纪的这尊三尊佛并无关系。因三具石像并排而立又被称为“三体石佛”，但因佛像居中，而两边是菩萨像，因此三尊佛的说法还是更为恰当些。有人认为中间的本尊佛像是阿弥陀佛，因此也有阿弥陀三尊的说法，不过并不能肯定。

与拜洞三尊佛立像拥有类似特点的有长仓谷的三尊佛像。该佛像于19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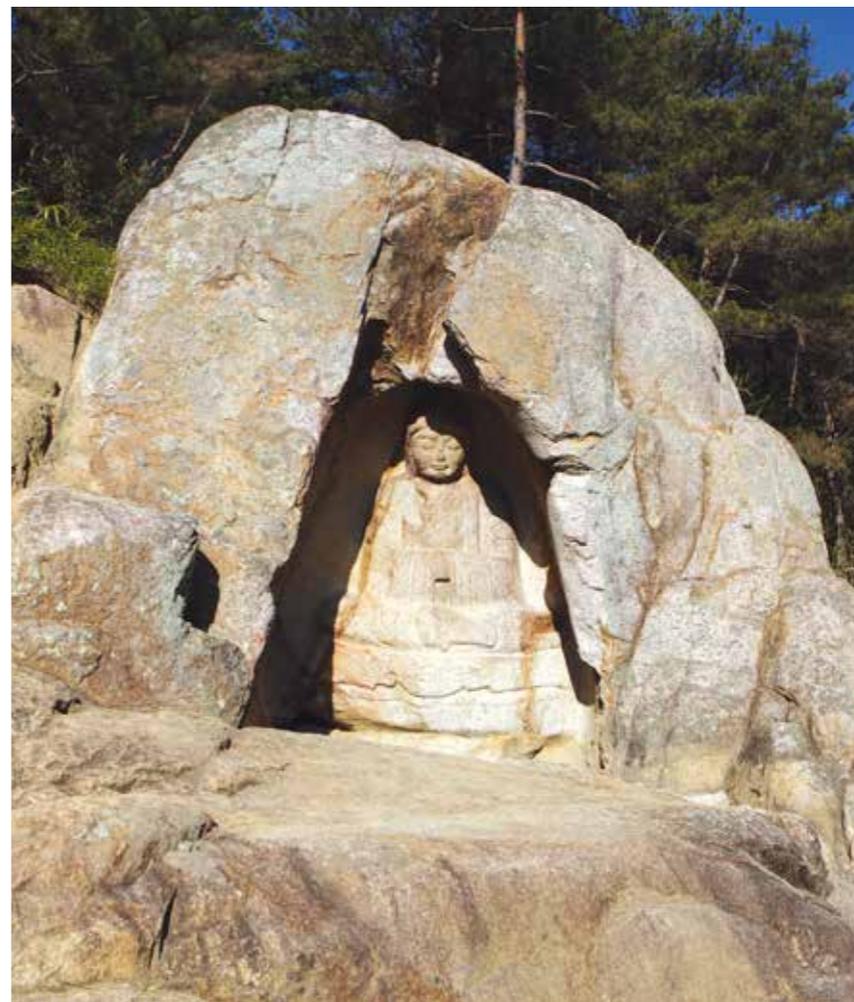


图44 佛谷釜室佛坐像

年在位于南山长仓谷路口的一个石室中被发现，目前已移至国立庆州博物馆展出。从中央的本尊佛坐在椅子上和《三国遗事》中生义寺石弥勒条的内容推测，也有说法认为该作品是《三国遗事》中记载的三花岭弥勒三尊佛。中央本尊佛坐在椅子上的形态在韩国雕塑中极其罕见。孩童般的面相，大大的头，无起伏的饱满身体曲线都是它的独特之处，而佛像身上的带状褶皱和膝盖上的旋窝状褶皱皆为中国6世纪后期雕塑中常见的特点之一。据此，推测该作品诞生于中古期末的7世纪前~中期。又被称为“孩童菩萨”的可爱的胁侍菩萨虽看似双胞胎，但宝冠和耳环，两手的位置，衣摆的方向各有不同，可见工匠在细节变化部分的独具匠心。因形似儿童的身材比例和天真烂漫的笑容，即使是冰冷的花岗岩也似乎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代表新罗花岗岩石佛的这两组三尊石佛中，认为拜洞三尊石佛的雕刻时间要早于长仓谷三尊石佛。因为比起略显粗糙的拜洞三尊石佛，长仓谷三尊石佛的雕刻手法相对来说更为精进一些。这两组三尊石佛通过没有起伏的身体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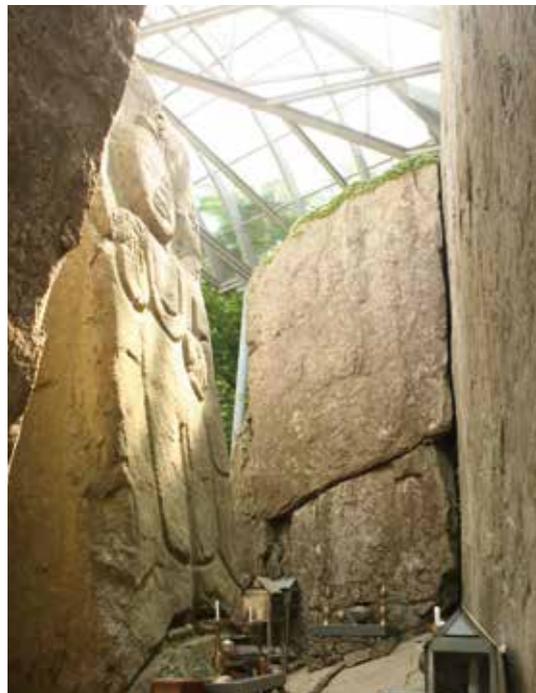


图45 庆州断石山神仙寺磨崖佛像群



图46 断石山神仙寺半跏思惟像

条和孩童般的身体比例，如实体现出了中古期特有的造型感。

位于南山东北侧山脚的佛谷龕室佛坐像充分体现了新罗人对石窟的狂热。这具坐佛像被供奉在1m深度的龕室中，其神态仿佛陷入冥想般沉静。面部采用接近圆刻的高浮雕，但身体和基座则用浅雕予以简化。虽然双手被衣袖遮住而看不见，但双手与一般禅定印不同，让人联想起在衣袖内相握的拱手姿势。略显浮肿的眼睛和厚实的嘴唇让整个佛像显得柔和且女性化，似乎马上就要走出石龕为众生解忧一样。圆润柔和的面相略显女性化，但从平面身体造型和仅以线条表现的衣褶来看，可以揣测是7世纪中期雕刻的。可能正是将这种对石窟的渴望凝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了石窟庵。

不仅是庆州的南山，断石山也修建了大型的磨崖佛。断石山神仙寺磨崖佛像群在断石山中腰的U型岩壁四面共雕刻了10具佛，菩萨以及人物像。岩壁上原本应盖有屋顶，用作礼拜场所。东北面是立佛像，东面是菩萨立像，南面则是菩萨像。北面共雕刻了7具佛像，菩萨像，人物像，均面朝东北面的立佛像，由此可见断石山磨崖佛像群的主尊正是东北面的立佛像。南面保存至今的200余字的铭文中记载了“在神仙寺建造了弥勒石一区 and 菩萨二区”的内容，由此可见刻了弥勒三尊像。虽然与铭文中的弥勒三尊像没有直接关系，但这里也有半跏思惟像。该佛像是新罗半跏思惟像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铭文刻在东北面立佛像的旁边，且位于弥勒道场内，因此可见半跏思惟像与弥勒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位于王京西侧的仙桃山，也在山顶附近的岩壁上雕刻了巨大的佛像。中央的本尊佛是直接刻印在岩壁上的磨崖佛，左右两侧的胁侍菩萨则是用独立的石材雕塑后构成了三尊。像这样将磨崖佛与独立的立像构成一套的情况极为罕见，这也许是因为仙桃山容易裂纹的石质所致。该仙桃山磨崖三尊像从位于王京西侧的地理位置和左侧菩萨像手持净瓶来看，推测为是从西方净土俯瞰众生的阿弥陀三尊像。从《三国遗事》的记载来看，阿弥陀信仰始于7世纪后期。这也许与为普及阿弥陀信仰做出巨大贡献的元晓和尚(617-686)以及从唐朝游学归来后在一片华严思想中主张弥陀净土思想的义湘的作用密不可分。



图47 庆州仙桃山磨崖如来三尊立像

## 4

## 服饰

### 法兴王时期的服制整顿和相关文物

中古期以后，和麻立干时期不同，对新罗服饰的记录开始增多。最引人瞩目的是随着法兴王时期颁布的律令开展的服制整顿。《三国史记》和《中国正史》以及《日本书纪》中都留下了关于6世纪新罗服饰的记录。

众所周知，法兴王在位7年(520)是颁布法令之年。法令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制定了百官的官服，其核心是根据官位的高低依次规定了紫，绯，青，黄色的服饰颜色。新罗本纪中将其表现为朱紫之秩，《三国史记》的编撰者金富轼认为包括唐宋在内的中国中原王朝的服饰是华服，因此认为法兴王时期的服饰是夷服，评价为“犹是夷俗”。

从服饰中值得关注的是颜色尊卑制度的实施对象是六部居民。在6世纪前期之前，新罗对地方居民的区别化非常严重，而王都的六部居民是引领新罗发展的主体，很多官员也都从中选拔，因此这项措施也在情理之中。所以以六部居民为对象，除了服饰颜色之外，还规定了笏等手持物，头冠的材质。

据6世纪初《梁书》中记载，新罗人称冠为遗子礼，称上衣为尉解，称裤子为

柯半，称鞋子为洗。《隋书》中记录新罗的服饰崇尚白色服饰，妇人们辫起头发扎在脑后，并装饰以各色绸缎和珠子。

另一方面，据《日本书纪》继体纪23年(529年)报道，大伽倻王为了改善与新罗的关系，迎娶了新罗公主。新罗送嫁公主时，派遣了100名随行人员，而大伽倻王允许他们穿着新罗衣冠。所谓“新罗衣冠”这一表达方式体现了新罗与大伽倻的衣冠在外型上存在些许差异。



图48 退化期新罗头冠(①尚州, ②枝洞2号墓, ③湫岩洞Ga-21号墓, ④下里)

在这一时期的文物中，部分资料体现出服饰的特点。首先是头冠。到了6世纪中期，金冠从庆州的古墓中销声匿迹。虽然有金铜冠或铜冠出土，但均来自地方的中小型墓葬中，形态或制作技巧也有所变化。即，台轮的宽度变得非常宽，分叉的段数和6世纪前期的金铜冠一样是4段，但形态向上下方向拉长。鹿角形立式已消失，立式装饰也增多至4个或5个。作为代表性例子，有安东枝洞2号墓金铜冠，东海湫岩洞Ga-21号墓铜冠，丹阳下里遗址铜冠(图48)。这些冠因其形态不统一，制作手法也粗糙，因此推测是各地区制作使用的。以有人骨出土的湫岩洞铜冠为例，可判断其为女性所有物，又是从小型墓中出土，因此可能是萨满等宗教职能者的所有物。

第二，进入6世纪后期后，几乎看不到垂饰附耳饰的出土了。曾经从积石木椁墓中频繁出土，堪称基本配置的金耳环也和其他金属装饰品一起无影无踪。只剩下皇龙寺遗址中出土的金铜制太环耳饰，庆州东川洞僧三村37号墓中出土的金铜制细环耳饰。皇龙寺遗址耳环制作于7世纪前期，是体现6世纪时盛行过的太环耳饰经过“简化，形式化”的过程延续至那时的重要史料。



图49 楼岩里型腰带配饰(左:尚州青里A-Na19号墓, 右:大邱達城综合体育公园地基1-B-165号石室墓)

第三,到了6世纪中期,开始流行被称为楼岩里型腰带配饰的新型腰带配饰。这些腰带配饰都是从较小规模的古墓中出土,由铰具,铗板,带端装饰具等简单的部件构成(图49)。但是,到了7世纪前期的某一时间点,又会出现新类型的腰带配饰。新型腰带配饰以从645年竣工的庆州皇龙寺木塔中芯础石底部出土的文物为典型,因此称其为皇龙寺型腰带配饰。即,在皇龙寺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既有楼岩里型腰带配饰,也有这种全新形态的。两者的形式变化不连贯,且性质不同。此类新型腰带配饰与中国隋朝或唐朝的有相通之处,因此可能是受其影响制作的。

### 唐朝衣冠制的引进和相关文物

7世纪前期是三国对立最为激烈的时期,而在这一情况下,新罗通过积极地与中国外交,在守护本国安危的同时,积极谋求统一之路。这一时期的服饰最引人瞩目的事件是真德女王3年(在位:647~654)时引进唐式衣冠制之事。

据《三国史记》中记载,真德女王2年(648)时金春秋入唐朝要求引进唐朝仪礼,唐太宗对此下诏书允许,并下赐服饰和冠带。史料记载3年(649)春正月,新罗首次穿戴中国衣冠,4年(650)夏4月则下诏书命真骨者持象牙笏。据《日本书纪》记载,白雉2年,即651年访问日本的新罗使臣就是身穿唐朝服饰,由此可旁证这一事实。到了文武王4年,即公元664年,不仅是官员们,连他们的夫人们也更换了服饰。

金春秋当时从唐朝收到的服饰和冠带的形态已经无从了解,但应该与从7世纪后期初建造的庆州隍城洞石室墓或7世纪末到8世纪初建造的龙江洞石室墓中出土的土俑所穿官服相似。作为官服配饰之一的冠带上,应该配有被称为“唐式腰带配饰”的腰带配件。这一时期的服饰真实体现在土俑身上。这种土俑最初开始用于墓葬,是与土偶不同的。这一时期的坟墓形式是石室墓,里面将死人生前的家人或管家,士兵,随从等做成小型泥偶一起墓葬。这一风俗是从隋唐传入的。在中古期,从隍城洞石室墓中出土了6件人物像。其中有3件文官像,1



图50 庆州隍城洞石室坟土俑

件武官像,2件女性像。男性头戴幞头,身上穿着裤子与外袍,这与唐朝服饰相符。整个鞋子被衣摆挡住看不见,但似乎是皮鞋。文官像和武官像的表现都较为简单,表面未着任何色彩。在出土人像中,形态完整的女性像(图50)右)一手持水瓶或酒瓶,面带微笑。这一女性土偶的服饰带有新罗的传统色彩,头发也是从后面捆束的。由此可以看出,该土偶制作于规定妇人们也穿着中国服饰的644年之前。但是,这一土俑是某官员妇人的可能性不大,可能是妓女出身或特殊身份的人物像。此外,男性像中有戴着形态特殊的帽子,眼窝深陷且高鼻梁的人像(图50)左)。这种帽子据推测应该是胡帽,人物可能也是胡人,但因为所穿衣袍的衣领与常见胡服不同,是圆领,而难以判定其为胡人。

## 农耕与生产

### 农耕

作为体现中古期新罗农耕的遗址案例，可以举庆州金丈里田地遗址。该遗址位于南北向横穿庆州盆地西侧的兄山江西岸，地形上位于山谷之间的谷底平原内。这是沟和垄并列的田垄形态农田，田垄的行进方向依据时代而有所不同。这可能是因为河道所致，也可能是为恢复农田的地力而有意所为。

从农田的沟与垄中出土的文物有6世纪的土器盖子和高杯杯身部，土器台脚，短颈壶口缘部片，把手，渔网锤，土工具等。在对土壤标本进行湿法分选的过程中，采集到了禾本科38件(米6件，大麦粒16件，小麦16件)，豆类15件(红豆12件，大豆1件，品种不详2件)，杂草种子27件等共计80件炭化植物标本。在金丈里耕作遗址中出土的炭化谷物，在6世纪以后新罗王京周围的实际耕作层也曾出土过，为了解当时农田耕种作物品种提供了最明确的证据。

这个耕作遗址并不是王京百姓在与新罗王京相邻的土壤条件优越的河床冲积土中临时开垦出来收获农作物的，而是从6世纪前开始为确保可耕地而开垦之后不断耕种的农田，体现了不同于王京地区粮食生产区的情形。此外，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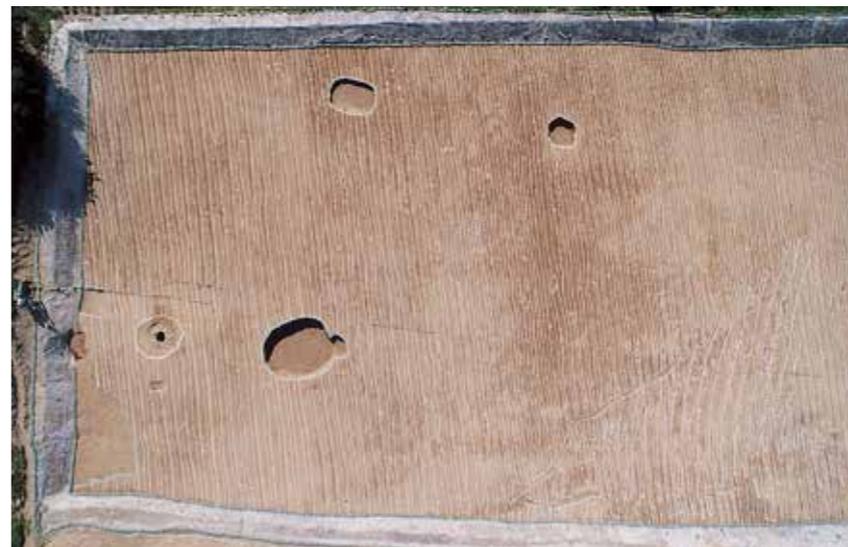


图51 庆州金丈里农田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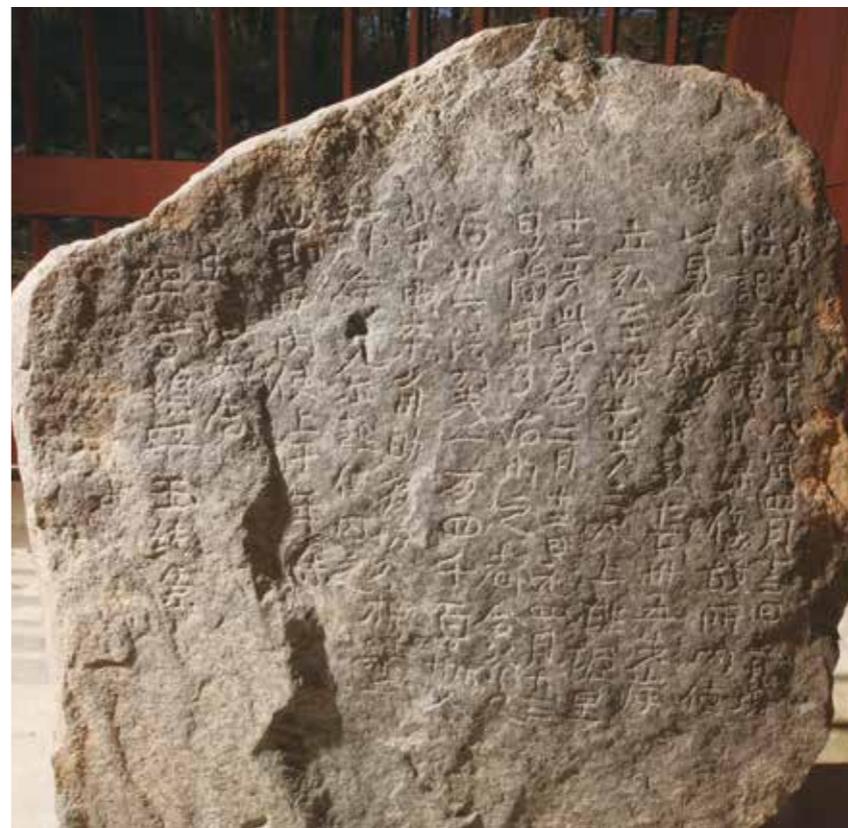


图52 永川菁堤碑(贞元铭)

为庆州首次确认与农耕相关的生产遗址，为迄今为止扑朔迷离的新罗社会的农耕技术，饮食文化，农业生产力的问题等新罗农业史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可靠的基础资料。

为实现稳定的农耕，需要扩充灌溉设施。中古期新罗举国建造了堤堰。这一工程让新罗摆脱了原本以天水畚为主的沟谷平原，将广阔的冲积平原开垦为耕地。据在菁堤周围发现的“菁堤碑”上的碑文记载，永川的菁堤始建于536年，以琴湖江冲积区为受惠范围。据同一碑上于8世纪末所刻铭文(贞元铭)记载，不仅在当时，在统一新罗时代也依然对该水库进行着管理，至今仍用于灌溉。戊戌坞作碑是记录在流经大邱新川冲积层的河流边设立灌溉用水塘的碑石，于578年建成。据该碑记载，设计技术人员名为“大工尺”，建造督工为僧侣。这一点和日本大阪的古蓄水池狭山池由僧侣担任技术督工非常相似。由此可见，自佛教得到正式流传以来，僧侣不仅担当着新意识形态扩散的媒介，也是非常重要的技工团队。另一方面，通过挖掘发现尚州恭俭池用敷叶工艺加强了软弱底土，建造护池堤，并利用木桶排水。通常认为恭俭池建于8世纪以后，但对从该遗址出土的木材进行年轮测定的结果却证明是7世纪后期，因此有了需要回溯至中古期后期的必要。对蔚山药泗洞堤防进行挖掘考证的结果，也证明是建于中古期后期。

## 生产设施

在分布于庆州外围的土器和瓦片工坊中，属于中古期的有蒜谷洞·勿川里遗址与花谷里遗址。但是，两个生产遗址的使用时间横跨麻立干时期和统一新罗时期，存在时间相当长，中古期只是它经历的一个时期而已，但土器和瓦片是如何生产，又是如何流入消费场所的尚不明确。

可以确定在中古期7世纪前期投入使用的瓦窑可认庆州花川里窑址。为例该遗址中出土了兼做瓦陶的9个窑炉和工坊遗构。窑炉呈半地下结构，窑炉地面的倾斜度在10度之内，烧成室内部无阶梯设施。规模为长426~570cm，宽



图53 庆州花川里遗址窑炉旧址

182~274cm左右。这里出土了单瓣莲花纹瓦当和超大型短板打捺的平面瓦。

除了制作耗材的铁匠铺之外，其他炼铁设施已经在麻立干时期脱离王京，迁移到了地方的铁矿附近。新罗中古期的炼铁遗址主要在洛东江下游发现。从密阳到梁山，洛东江畔的各个沟谷内到处是选矿遗址和炼铁遗址。梁山勿禁的选矿遗址据推测是挖好一个长长的水沟后，将采到的铁矿石放在流水里按矿石大小进行筛选的设施。对密阳沙村遗址的废弃熔渣进行分析后的结果表明，这里是熔炼铁矿石而提炼铁的炼铁设施。这两处遗址都是从麻立干末期开始投入使用，中古期正式运营的生产设施。这里之所以会成为炼铁的主要生产基地，是因为它从政治上早已被新罗收入囊中，可以利用丰富的原料及便捷的水路。

密阳的金谷遗址在已挖掘的新罗中古期炼铁遗址中规模最大。这里的炼铁炉达到86个，是能了解从炼铁到铁器生产整个工艺的遗址。炼铁炉包括精炼锻冶炉和熔炼炉以及焙烧设施，废弃物，黏土储存设施，炭窑，竖穴，作业车间等炼铁工坊的所有构成要素。在炉的周边同时出土了锻造剥片，铸模及各种



图54 密阳金谷遗址精炼锻冶炉

矿渣。废弃场中废弃有炼铁过程中发生的大量渣滓和炉壁残片, 鼓风管片, 矿渣。遗址的主要活跃年代为6世纪, 最久到7世纪初。

## 器具

麻立干期间在庆州市内平地 and 各个地方大肆修建的大型古墓, 到了6世纪中期后, 庆州地区的古墓迁移到了周边山区, 而地方则逐渐销声匿迹, 古墓的内部结构也变成清一色的横穴式石室墓。到了此时, 开始流行多人使用一个墓冢的“家族葬”, 这说明来世之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 古墓中随葬的文物种类和数量也骤减。

从这一时期的古墓中大量出土的土器有已变得非常矮的高杯和壶口呈L字形的角形附加口缘长颈壶。尤其是高杯, 前期盛行一时的高台脚高杯的变型形态虽依然存在, 但比重已有显著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盖子和碗合在一起后类似



图55 忠州楼岩里Ga-60号墓土器



图56 庆州芳内里石室墓出土的土器类

球形的盒(台附碗)。盒的盖子是里面有卡托的新形态。窄颈台附瓶的流行也是其一大特点,瓶身表面装饰有各种纹样。关于其纹样,最初一直采用竹刀上下分布三角纹和圆纹的图案,而到了6世纪末出现了用图章模具制作纹样后印至上面的方式。早期的台附瓶形态为瓶颈短,瓶身呈椭圆形鼓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成瓶颈长,瓶身扁平的形态。

进入中古期后,麻立干期间曾存在于中央和地方土器之间的样式差异迅速消失,土器形态变得均匀。不仅是器形,制作工艺似乎也进行过标准化,这可能是因为全国的专业工坊受到中央集权的控制,相互之间共享了技术信息。碗的形态变得矮小简洁。最早是用圆规和锥子刻画花纹,均匀规律地排列于表面,后来被用模具刻印的工艺所代替,更趋于标准化。简化的器形和标准化的制作工艺说明通过工艺的简化实现了批量生产。



图57 花川里窑址瓦当类



图58 皇龙寺遗址古式瓦片



图59 皇龙寺遗址百济系瓦当



图60 皇龙寺遗址莲花纹瓦当



图61 花谷里窑址瓦当类

自佛教开始正式流传后,由国家修建寺庙时被大量使用。早期的瓦当是花瓣锐利的莲花纹瓦当,最早用于王宫月城,后来皇龙寺也有所用。从其莲花纹给人的强势感觉来看,有人认为是受高句丽的影响,但从其生涩的工艺来看,可能是新罗创造的。从月城和皇龙寺中也出土了将花瓣末端稍稍翘起的写实莲花纹瓦当。据文献记载,中古期修建寺院时曾有百济的工匠群参与,因此可以说这种瓦当是受了百济的影响。反之,新罗独创的莲花纹瓦当则将莲花的柔和悄悄掩盖起来,在花瓣上加入了一条棱线。专家认为这种出现于6世纪后期的瓦当将强势与柔和完美结合起来,体现了新罗中古期的审美意识。

到了6世纪中期,曾作为身份象征的“冠”的形态或制作工艺发生了变化。冠轮[台轮]的宽度加宽,鹿角形立饰消失,立饰数字增至4个或5个。丹阳下里铜冠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金铜冠的特点,冠轮宽且用铜丝固定了4个立饰。该冠的树枝状立饰已退化,用凿子钻出圆孔进行了装饰。

在6世纪后期之后的遗址中,几乎没有再出土过垂饰附耳饰。积石木椁墓中



图62 皇龙寺遗址出土的太环耳饰



图63 尚州菁里A-ga-11号墓出土黄龙寺型腰带配饰(右:纹样細部)

曾作为最基本装饰品的金制耳饰销声匿迹，至今，只有皇龙寺遗址中出土的太环耳饰和庆州东川洞僧三村37号墓中出土的细环耳饰而已。

从皇龙寺遗址木塔遗址下端的压实层出土的耳饰是在建造木塔的过程中埋在下面的镇坛品。皇龙寺木塔始建于643年，于645年竣工，因此该文物一定是643年左右埋在这里的。该耳饰大概制造于7世纪，与麻立干时期耳饰相比，可知耳饰大为简化。

如此，认为在大约6世纪中期新罗古墓中出土的文物里黄金制品已渐渐不见，而腰带配饰也并非以往的三叶纹腰带配饰，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了铰具与带端装饰具的新型腰带配饰。在忠州楼岩里古墓群或尚州青里古墓群等与前期相比规模较小的坟墓中出土。后来在7世纪前期过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腰带配饰，以皇龙寺木塔址心础石底部的出土文物为代表。铰板上描绘了草花纹。金海礼安里49号墓或尚州青里A-Ga-9号墓以及10号石室，A-Na-2号石室，南原斗洛里3号墓等也有文物出土。这一类腰带配饰从铰具或铰板外型来看，可以从中



图64 皇龙寺型腰带配饰上的纹样



图65 铁铎(安东枝洞2号墓)

国隋朝或唐朝查找其流派，其特点为刻有人面，鸟，鬼怪面部等多种纹样。

从古墓中出土的铁器以刀子为主，偶有1~2件箭镞，农器具随葬，装饰武器或马具的随葬案例极其罕见。这可能是因为法令颁布导致规范，薄葬的葬礼风俗变化而衍生的现象。新罗自中古期之后，也做了大量的战争准备并作战。此过程中，在改良已有武器的同时，制造新的武器是显而易见的事。《三国史记》中记载了配备特殊武器的军队名称，有弩幢，云梯幢，冲幢，石投幢。此外，还记载了防御骑兵用的铁蒺藜。相信今后大力挖掘关防设施时会出现与此相关的各种文物。

在这一时期的铁器中，最醒目是铁铎。横口式或横穴式石室墓中偶有出土，主要是6世纪制作的。6世纪前期主要限制在洛东江以东地区，但进入6世纪中期后，像固城莲塘里或泗川月城里，陕川芋浦里一样范围扩大至洛东江以西地区伽倻故地。由于铁铎总是与锻冶工具同时出现，因此可以认为是与炼铁相关的工匠，但也能解释为萨满等宗教分子的巫具。退化型金铜冠或铜冠似乎是这类人的配饰。

## 透过出土文物看 对外交流

### 与中国北朝~唐朝的交流

公元553年新罗将汉江流域纳入版图，并由此首次开启了与中国直接交流的大门。《三国史记》中记载着大量中古时期与中国的各王朝正式往来的官方记录。新罗统一三国后，曾与唐朝暂时疏远，但很快又恢复了与唐朝的友好邦交，并成为引进新文物的窗口。同时，新罗还继续保持着与日本的跨海交流。新罗遗址随处都有从中国进口的成品文物出土，也发现了大量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新罗特色的例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如下。

第一组图片是从北朝-唐朝流入的成品，皇寺舍利供养品中包括北齐的常平五铢钱。同时，还有在7世纪初修建的庆州龙江洞古坟群6号石室坟内出土了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墓志石和围棋子，施釉陶器，带钩等(图67)。古坟的主人可能是生前游历过中国的新罗人，在中国长期居住过，或者根本就是来自中国的中国人。

此外，从月池的旧址中出土了唐朝的开元通宝(图66-②)，而从皇龙寺木塔址心础石底部出土的四神镜(图66-③)则充分体现了中国隋朝镜子的特点。



图66 展示着与中国交流的文物(①芬皇寺, ②月池, ③④皇龙寺遗址)



图67 庆州龙江洞古墓群石室坟出土的中国遗物(①墓志石, ②围棋子, ③施釉陶器, ④带钩)



图68 楼岩里型腰带配饰(①大邱舌化洞5号石室墓, ②庆州東川洞354号遗址1号石室墓)和皇龙寺型腰带配饰(③皇龙寺遗址, ④礼安里49号墓)

第二组是构成服饰的装饰品。到了6世纪中期出现新形态的腰带配饰, 即楼岩里型腰带配饰, 而到了7世纪初期则又出现了“皇龙寺型”腰带配饰(《图68-③~④》), 该腰带配饰的图谱很大可能与中国隋朝的腰带配饰有着一定的关联。

### 与日本的交流

蔚珍德川里古墓群I区域1地点24号石室墓中, 出土了一件日本产母子曲玉。从与楼岩里型腰带配饰的铰具一起出土来判断, 应该是6世纪后期的文物。据报告, 日本的冲绳岛祭祀遗址出土了新罗产金戒指, 在奈良县石神遗址出土品(图69-②)中有新罗土器。



图69 体现新罗与日本(倭国)交流的文物(①蔚珍德川里I区1地点24号石室墓, ②奈良县石神遗址, ③⑤正仓院, ④庆州月池)

另一方面, 从群马县金冠冢古墓中出土的一件金铜冠拥有很宽的台轮, 并附有5个“出”字形立式装饰, 是中间枝干较粗, 左右4根分叉突出的典型新罗样式。但虽然拥有新罗的原型, 可具体图案和制作工艺上存在差异, 可以推测该头冠是6世纪中期后日本受新罗头冠的影响制作的物品。

日本奈良县东大寺的正仓院原本是存放皇室宝物的仓库。保存在正仓院的重要新罗文物有“新罗琴”。该新罗琴装于木柜里, 而且还带有雁足, 这说明当时有大伽倻制造的伽倻琴和其他新罗固有的弦乐器。此外, 还有另一件新罗文物——墨。该墨呈狭长外形, 阳刻有象征着新罗杨家和武家出品高档墨的“新罗杨家上墨”和“新罗武家上墨”的汉字。该墨说明, 随着汉字文化在新罗和日本的大幅扩散, 墨的需求量也骤增。

同时, 正仓院保存着从月池出土的一件精致的金铜制剪子和外型与其酷似的金铜制剪子。虽然精致度上不如月池出土品, 但确属新罗制造。



## 第II篇

# 统一新罗

三国文化的融合与新罗文化的繁荣  
统一新罗时期



## 第一章

# 三国文化的融合与 新罗文化的繁荣

## 统一新罗时期

## 王京与地方城市

王陵

宗教与祭仪

佛教美术

儒学与文学

音乐

科学与技术

生活文化

农耕与生产

对外文物交流

新罗时期通常被分为几个阶段来解读,而7世纪中期加剧的三国之间的战争,被视为最重要的转折点。以这个时点为基准,新罗史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说明在新罗的发展历程中,统一战争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称统一之前的新罗为“三国时期的新罗”,“古新罗”,而随后的时期被称为“统一新罗”加以区分,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然,并不是说现在要刻意地用统一新罗这一国号来区别新罗。在此要阐明的是,“统一新罗”只是近代历史学成立后,为了重新审视新罗史的研究便利而才引用的术语。早在《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已经有过将统一时期作为起点,划分成两个时期来看待新罗史的倾向,因此这种划分方法也算是有着历史渊源的。

历史上,将统一新罗的开始时间认定为发动统一战争的第29代王武烈王即位的654年,而不是完成统一战争的文武王时期。新罗政治以武烈王在位前后为界,有着截然不同的倾向与变化,这也成为划分新罗不同阶段的重要依据。从文化角度来看,新罗很大程度上要以完成统一大业的676年来划分。随着战争结束,社会趋于稳定,在此基础上,三国文化开始趋于融合,促成了独一无二的统一新罗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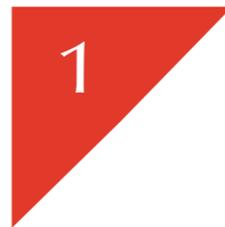
从政治,社会状况两个角度来看,统一新罗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一阶段从武烈王开始,到第36代的惠恭王(765-780),历时8个朝代,共127年;后一阶段则从第37代宣德王(780-785)到统一新罗末期,共经历20个朝代,历时155年。这沿袭了《三国史记》中划分为中期(中代),晚期(下代)的划分方法。

将中期,晚期的持续时间与国王在位时间相对比时,在存在着很大差距的中期,国王的平均在位时间为16年,相反,晚期的在位时间仅仅为7.2年,还不到中期的一半。这说明在晚期时,政治变乱频繁,社会经济动荡,极为不稳定。国王在位时间长并不等于国政稳定,但总体来看,大体上也基本如此。

可以说,统一新罗的前半期,为新罗的政治社会带来了可喜的发展。可以说统一为新罗带来的协同效应在这个时期获得了充分的体现。整体文化面貌也体现了这一点,所以通常认为中期是新罗千年历史的鼎盛期。相反,认为到了晚期,国内不仅动荡加剧,国力也开始衰败。这个问题在各种领域开始暴露出来。

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必然会带动生活文化的变化。新罗在统一三国之后，其领土和人口等外在规模至少增加了几倍。随着与当时先进的高句丽，百济文化的接纳与融合，给整个国家面貌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如此，新罗还接纳新的军事同盟国大唐的文物，并在此基础上沿着丝绸之路一直到中亚，阿拉伯，罗马帝国领域，积极接纳了这些国家的文物。这一时期的文化，无论是从质上还是量上，都带有了可喜的发展，已具备世界性，国际性色彩。为了上西天取经求法，慧超等众多新罗僧侣从水陆两个渠道前往佛教发源地——印度。新罗的国名能被传到遥远的印度，足以见得新罗人的对外交易，交流活动非常活跃。甚至有阿拉伯商人，粟特(Sogd)人来到新罗生活的记录。所谓罗马不是一日建成，9世纪张保皋能够以清海镇为据点建立海上交易帝国，与新罗时期以来的不断积累是不可分割的。

如此，统一时期的整个文化与生活水平有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发展，具备了成熟稳定的特点。文化享有人群的层次也获得了显著的提高。从各种文献记录，实物资料中，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 王京与地方城市

新罗时期城市形成时期，中央与地方各不相同。庆州作为中央，进入麻立干期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化。随着地方的人力，物力资源源源不断地集中到首都，城市化渐渐开始形成。据记载，慈悲王代469年确定了京都坊里名，并于487年修建官道，这些都体现了城市化变化。而正式开展规模性系统化街道区划等城市规划，则是在6世纪中期。相反，过了很久之后进入统一新罗时期，随着设置九州五小京，地方开始正式出现城市。毕竟九州五小京不是从一无所有建立起来的，所以在此之前，该地区的中心地带已经出现城市化倾向，只是现在很难寻找那些历史痕迹。因为九州的州治和五小京所在的各个地区，几乎同时推行了城市规划。

### 王京的都市规划及景观

随着庆州进入麻立干期，开始行使王京角色，盆地中心地带的人口也日趋密集。而宫阙所在的月城，成为了中心地。据文献记载，象征王都的这座宫城

位于斯卢国初期的中心地，即南山的西北山脚附近，被南川环抱，呈独特平面型半月状，其建筑工艺完全采用自然环保方式。有一种推测是，这座宫阙在建造最初，可能是考虑到了当时的君王以及统治阶级的坟墓选址——西北方墓地，所以才特意选择在这里建造当代君王的生活空间。城的规模，外围2,340m，东西长890m，南北宽260m，总面积193,845m<sup>2</sup>。除了这座月城，王都周边还建立了明活山城(土城)，南山土城，都堂山土城等，作为非常时期的藏身之地或防御敌人进攻之处。5世纪高句丽后期南下时，君王曾在明活山城住了10几年。

从上面俯瞰，月城形状如半月，新月，所以也叫半月城，新月城。瓦片内侧刻有“在城”铭文，证明了这里曾经是王宫。其间，多次挖掘和勘查城壁，东门址，外围地区，一般建筑地基，掘立柱地基，垓子及地基等，并开展了精密地标调查。另外，自从在月城内部实施地下物理探测(图1)以来，最近开始了内部挖掘工作，因此对于王宫内外面貌能有一个大致的具体推测。

据推测，月城修建于麻立干期开始时期，用石头和泥土铸造而成。建筑时



图1 月城航空图片及地下物理探测遗址布局图

修建了竖穴垓子，并沿着外围城修建了木栅栏等设施。5世纪后半期，竖穴垓子废弃，沿着从平面上看时似乎弯曲的西北城墙，修建了5个长方形平面莲花池状的石筑垓子。另一头，城西北角发现了5~7世纪的23栋掘立柱地基，证实了在很早的时候，宫城附近便出现了衙门或者类似军事设施等建筑体。随着时间的流逝，月城石筑垓子经过了两三次缩小和改建，一直保存到统一之后。

根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文武王19年(679)重新修缮宫阙，建造了东宫，并对宫阙内外的几扇门，第一次做了命名。王京各地出土了刻有“仪凤四年皆土”的铭文板瓦，可见当时王京大规模开展了改变王京面貌的工程。这个时期，月城石筑垓子位置的北侧修建了带有基石的建筑，与城壁方向并排。另外，瞻星台南侧，鸡林北边也修建了许多类似宗庙的建筑。因此可以推断，在当时王宫扩建面积浩大，从现在的月池(雁鸭池)到西边的建筑群乃至东边的东宫都包括在内。(图2)

月池东边以及东北相连处，发现了共26栋建筑体(图3)，其中位于月池东北角，呈南北走向排列整齐的3栋大型建筑物，被视为是东宫的中心部分。(图4)

新罗王京，大概就是沿着这种王宫变化轨迹发展壮大起来的。旧韩末《增补文献备考》中记录着庆州地区遗留着新罗时期的井田，从这一点可以推算出王京是按照一定的规划单位形成。实际的挖掘工作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都城内部按照东西走向，南北走向的道路进行划分。四方被道路所圈住的空间，相当于文献记录中的“坊”这一基本单位，但这些坊规模并不一致。比如皇龙寺遗址东边S1E1区域，以道路中心之间的距离为基准时，南北长为172.5m，东西宽为167.5m。而城东洞及西北洞一带，则是南北长150m，东西长120m左右。皇龙寺遗址由四个坊组成，占地范围东西，南北走向都大约为140m。

之所以有这种差异，是因为每个坊出现的时期不同，同时也因为都城的坊里规划并不是一次性同时完成，而是不同的地区按照不同阶段进行规划，最终导致了这种差异。经确认，大陵苑一带坊的中心轴方向，和北川以北，南川，狼山一带存在明显差异，也证实了上面的推论。前者的东西道路以及排水



图2 扩建后的王宫之最大推定范围



图3 庆州月池, 东宫址(图中间为挖掘区域)远景



图4 估计为东宫址建筑基础设施

路的角度, 朝着西北至东南方向明显倾斜。有种解释是, 这是因为庆州地形东高西低, 考虑到这一城市的规划特点, 才按照地形修建了自然排水沟。

都城坊里规划大概始于6世纪中期, 到了8世纪整体完成。首先在月城东北方向建造了皇龙寺, 并以该地段为起点, 正式开始进行直线型城市规划——坊制, 到了7世纪前半期, 逐渐扩大到九皇洞, 仁旺洞一带等周边地区。在7世纪后半期, 扩大到了皇龙寺北边, 西部洞一带; 到了8世纪, 则扩大到了城乾洞, 东川洞一带。文献记录上记载着智证王10年(509)设置东市, 并于孝昭王4年(695)开设了西市, 南市, 这些记载也暗示了都城坊里规划扩大的方向趋势。

根据考古发掘, 人工卫星图, 地图等资料来看, 新罗王京的坊的确是分布在盆地整个地带, 向北: 隍城洞至龙江洞一带的北川北岸; 西南: 鲍石亭附近; 东: 明活山附近; 东南: 四天王寺遗址至望德寺遗址附近。(图5)这与当时大唐, 日本的坊里制, 即如围棋盘严格限定的范围内对市区进行隔栅规划, 并由更高一级的规划单位包括若干个坊的坊里制有很大的区别。之所以呈现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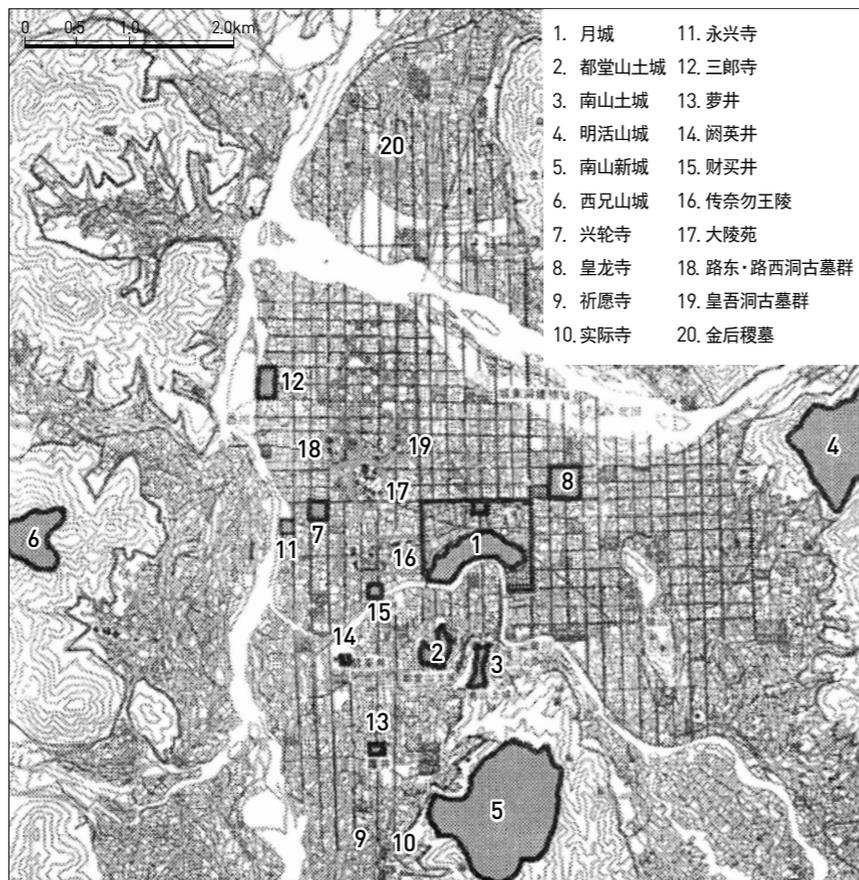


图5 新罗都城坊里规划

分布特征，是因为在进行城市规划时考虑到了王宫地形上位于盆地南边的这一地理原因，另外，也因为最初城市规划时并没有按照统一的计划全面展开规划项目，而是阶段性拓展而导致了这种布局的出现。

根据《三国史记》，《三国遗事》记载，王京空间范围分别留有南北3,075步，东西3,018步；1,360坊或360坊；35里或55里等记录。据说新罗鼎盛期，这里曾有178,936户。以目前考古发掘的范围为准，南北6km开外，东西5.5km范围内发现了道路遗址，可以推算出以现在的市区为中心的大致范围。

在距离月城往北600m的北川(阙川)南岸发现了城东洞殿廊址，它是文武王时期大规模整顿王京前后时期的遗址。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能够考证出其是文献记载中的北宫的痕迹，那么当时王京的范围，很有可能像日本或唐一

样，按照围棋盘形状来规划行政区。但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其北侧或月城南侧出现的坊，都必须看作是在那以后扩建形成的居住区。记事中记录着文武王21年间(681)，王本想重新建造京城(“王欲新京城”)，却听从义湘大师的意见放弃。也有人认为，这一记录表明王原打算按照计划大力实行坊里制，却最终放弃。最近在市区西边稍远的牟梁里发现了统一时期的坊里规划痕迹，可以视为是6部之一岑啄部人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文献记载中出现的“新罗鼎盛时期的1360坊”中应该也包括这部分。

这些坊和围绕四周用于区划土地的道路密不可分。其间，王京境内发现的许多遗址中，都能确认道路遗址。这些道路除了具备基本的通行功能之外，同时还是划分居住地的标准，即将城市空间按照一定的单位进行划分的标准。大致分为三类道路：宽幅15m以上的大型道路，宽幅10m左右的中型道路，宽幅5m左右的小型道路等。以黄龙寺遗址旁边的S1E1地区为例，坊南侧东西道路(图6)宽幅为15m左右，中央部分用粗大的石子铺设，两侧则用小石子和沙土修建。从路面上发现的界桩石位置可以看出，当时将道路内部划分为车道，人行道。道路两边用河床石修建了宽1.4~1.45m的排水沟。相反，北边的东西道路宽幅为5.5~7.5m，西边的南北道路以西侧的皇龙寺为界，宽幅为12m左右，东边的南北道路宽幅约5.5m。

这些道路修至溪水处，则有桥梁相互连接两边，在南川地带发现了桥梁遗址。这些大多失去了桥梁原有的面貌，只留下桥墩和其他配套的基础设施部分。8世纪文献纪事中出现的春阳桥(又名日精桥)(图7)，月精桥最为典型。这些桥位于大约在7世纪末扩建的王宫区域内，可能是贵族阶层的专用桥。桥墩基础呈平面船只模样，尽量不阻碍水流。

王京周围，从最初就建设了防御用，躲避用城。麻立干时期的这些山城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均为土城筑造，在庆州盆地周围，则只分布在东部，南部。进入中古期后，筑造了明活山城(石城)，西兄山城，南山新城，北兄山城，高墟城等。除了北兄山城，其他均为石筑城，修建于山地间，城廓规模庞大。富山城坐落于王京西侧较远的地点，在城中出土了陶器等物品，由此可见，富山城最晚也应该是建于中古期，并于文武王3年(663)进行了改建。富山城墙长7.5



图6 S1E1遗址南侧东西道路全景



图7 春阳桥桥墩基础部



图8 明活山城门址附近挖掘情形

km, 是大规模的山城建筑, 具有特殊的二重城结构。

明活山城原先只是土城, 到了551年改建成了石城。(《图8》)西兄山城是环绕西兄山(仙桃山)山腰的包山式石城, 据传, 它是真平王15年间(593)改建明活山城时一起改建的, 由此可见应该是建筑于更早年间。这说明, 在真平王之前开始, 西兄山城就和明活山城一样, 是为捍卫新罗都城东, 西方而构建的系统的城廓体系。南山山城位于南山北峰, 包谷式石城, 代替原有的南山土城而建。这是对于月城以及王京防御系统(《图9》)的加固设施。筑城时间在真平王13年(591), 南山新城碑(10件)上面的铭文记录, 也证实了这一点。

进入统一期之后, 又筑起了新垞里城, 关门城。之所以这期间新建的城廓只有两个, 是因为之前建造的北兄山城, 南山新城, 明活山城, 西兄山城等依然在充当着捍卫都城的作用。

新垞里城是单独修筑在关门城东边山顶的石城。有多处改建的痕迹, 说明后期持续被人们所使用。由于这里可以同时鸟瞰东海岸和蔚山湾, 占据着地理优势, 因此可以抵御日本势力从东海岸入侵, 从而保护京城, 起到军事基地的

作用。据估测，修建于7世纪后期，早于关门城，后来其功能延伸，于是筑造了关门城。新垈里城城墙上发现了10个铭文石(图10)，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筑造尺度(尺寸)以及分工，距离等信息。

关门城是圣德王21年(722)10月为抵御日本入侵而修建的。这座城连接着山与山，类似长城的形状，和其他山城外观上有很大区别。宪德王在位期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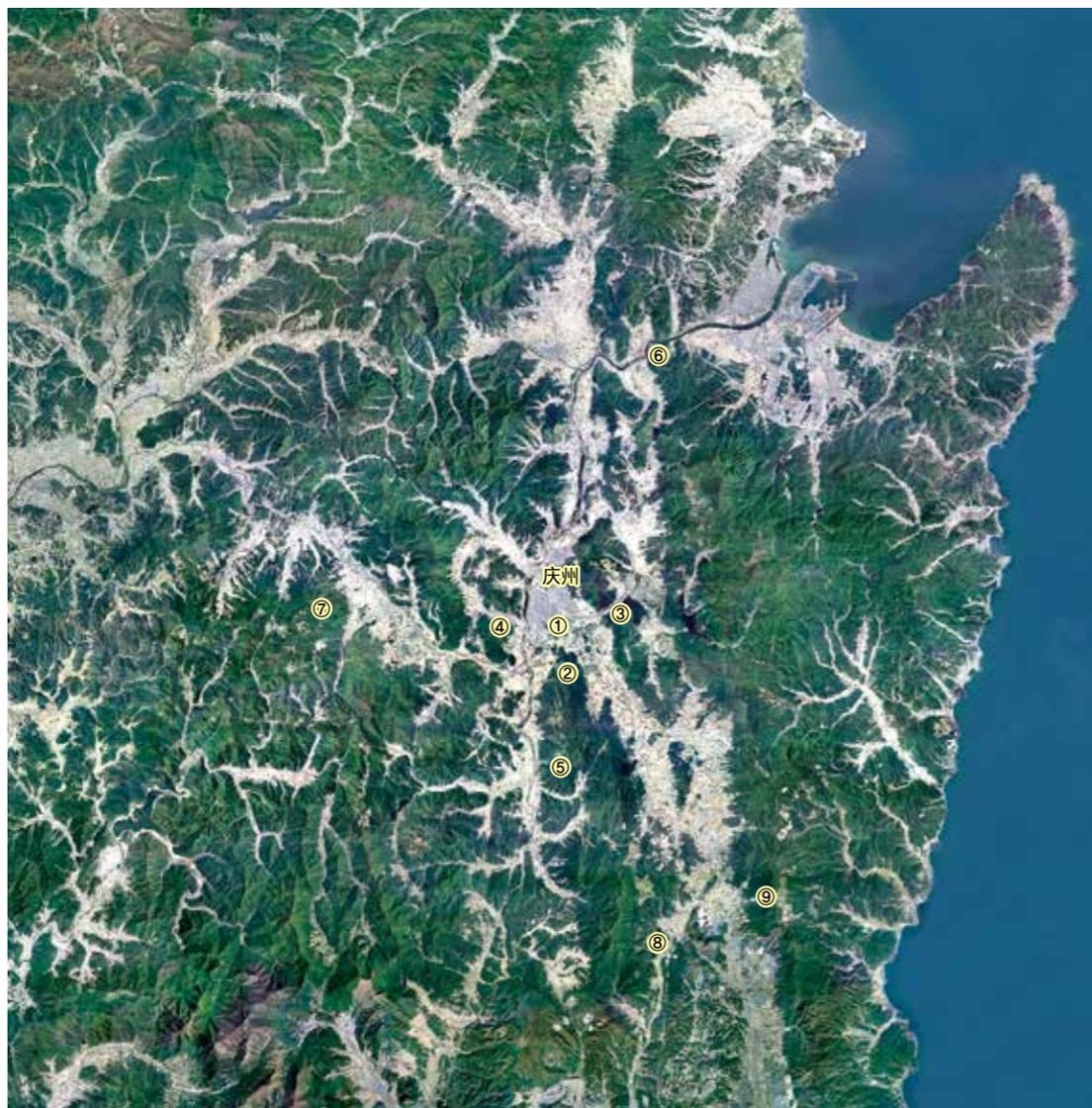


图9 王京防御系统(①月城, ②南山新城, ③明活山城, ④西兄山城, ⑤高墟城, ⑥北兄山城 ⑦富山城, ⑧关门城, ⑨新垈里城)

金宪昌起义时，该城曾起到了抵御叛军从东南角入侵新罗王京的作用。

王京作为人口密集城市，必然会有生产和供应生活用品的地区。从斯卢国时期就有人在周边山涧地区繁衍生息。后来这些地区归属于王畿。这些地区当中，靠近王京的地区出现了以手工业为专业的村庄——“成”。王京外围东北方向的川北面，西北边的金丈里，东南边的花谷里等地出土了“成”烧制陶器，瓦片的窑址，遗址(图11)。



图10 新垈里城铭文石拓本



图11 金丈里田地遗址



图12 庆州皇龙寺遗址全景

王京中除了宫阙，占据最重要位置的当然要数刹了。文献记载中出现的皇龙寺地基，芬皇寺地基得以全面挖掘，兴轮寺地基也勘查到了局部。皇龙寺(图12)东西，南北各围绕着280多米长的围墙。园内正面正中央处，矗立着一座著名的九层木塔，其后并排排列着三座金堂，证实了此为一塔三金堂式伽蓝配置。

在庆州平地，出土了与文献中记载的四节游宅，金入宅等属于豪宅苑池的苑池。龙江洞苑池和九黄洞苑池最为典型。龙江洞苑池位于王京都市规划范围外围的北川北边平地上，呈南北走向，只出土了苑池全长(估计为100m以上)



图13 庆州龙江洞苑池遗址

的一半左右。(图13)已确认的遗址有建物址，石筑列，具有护岸石筑的2座人工岛(人工岛包含在内的整个护岸石筑长为236m)，入水沟，落水槽，护岸内的造景石，桥墩设施，周围道路，河沟等。护岸石筑台选用加工好的割石，川石垒砌，采用曲线，直线相结合的方式，体现了自然美。建筑体和人工岛之间架设了木桥，供人们往来。这一点区别于雁鸭池。建于7世纪末，8世纪为核心年代。

九黄洞苑池遗址位于芬皇寺东侧的北川南岸。莲花池，引水渠，排水渠，“ㄷ”形渠，六角形建物地等各种遗址已被确认。(图14)时期大致分为1次莲花池，“ㄷ”形渠，1次筑台，六角形建物地等共存时期；2次莲花池，2次筑台，集水井，小型排水沟共存时期。1次筑台应该是在7世纪中期，2次筑台大概在8世纪中期。经确认，莲池南北长46.3m，护岸筑台长192m，相当于雁鸭池的约1/15。内部和龙江洞苑池一样，并排着两座人工岛。



图 14 庆州九黄洞苑池遗址

### 地方城市的结构

676年，唐朝军队撤离，新罗结束统一战争。随后将地方行政组织编为九州五小京。三国时期在相当于新罗伽倻的地方设置了沙伐州(尚州)，敌良州(良州)，菁州(康州);百济地区设置了熊川州(熊州)，完山州(全州)，武珍州(武州)等3个州;高句丽设置了汉山州(汉州)，牛首州(朔州)，河西州(溟州)等3个州，共9个州。另外在政治、文化中心区域设置了中原小京(中原京)，北原小京(北原京)，金官小京(金官京)，西原小京(西原京)，南原小京(南原京)等5小京(《图15》)，并且在州、京地区治所铸造了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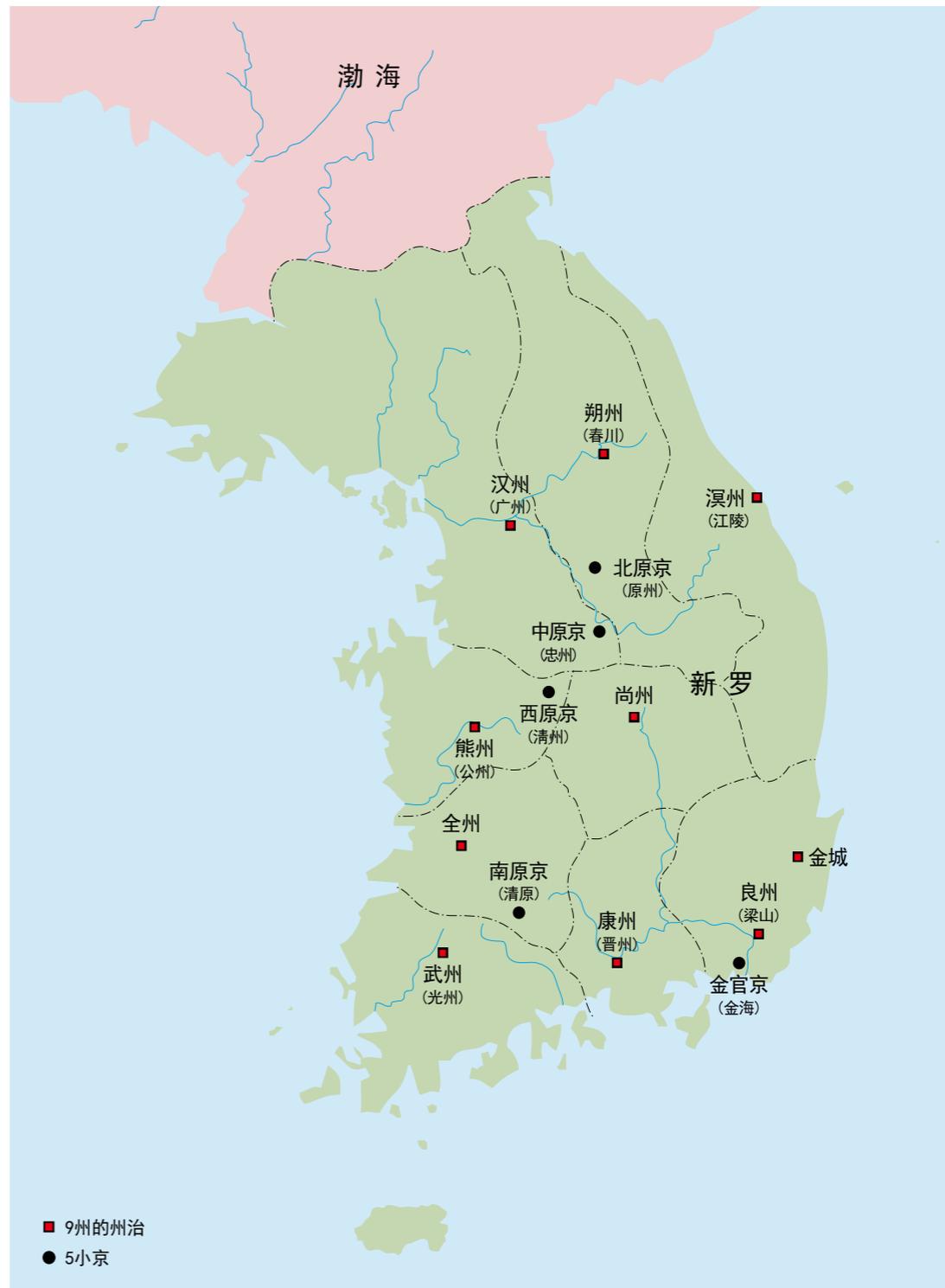


图 15 九州五小京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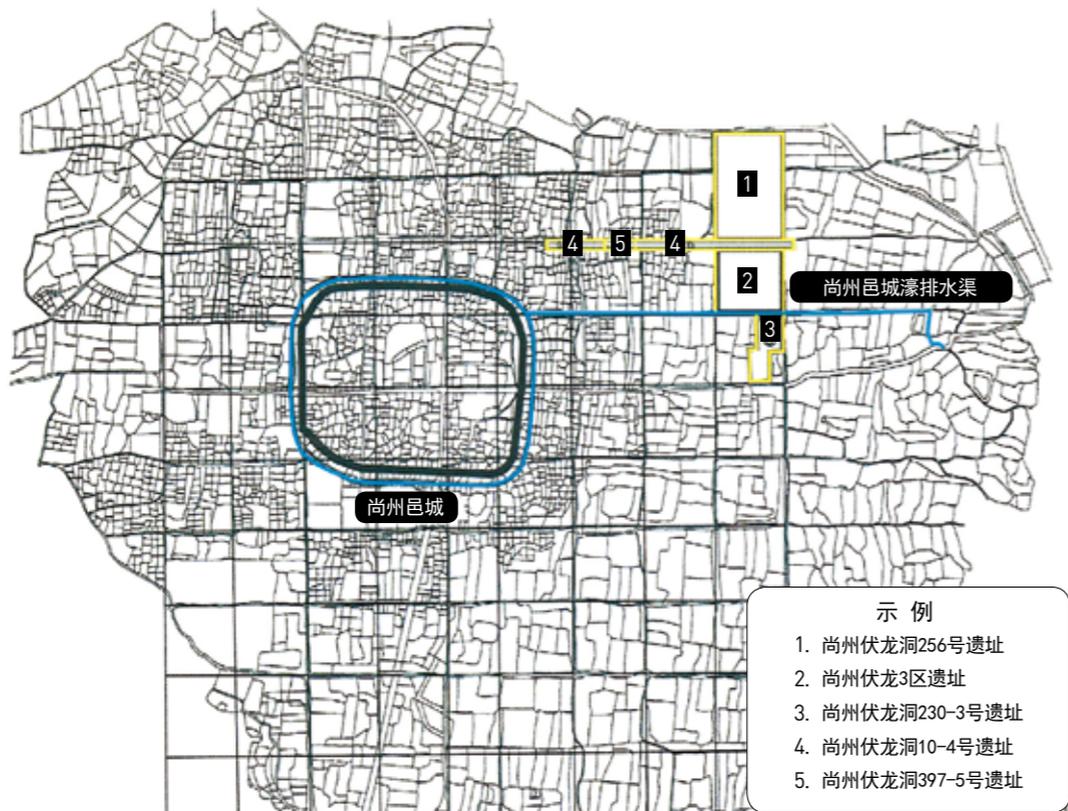


图16 沙伐州坊里规划复原图

新罗对地方据点也像王京一样进行城市规划，适用了坊里制。从人工卫星图片，航空拍摄等渠道可发现道路规划痕迹。另外从极少的文物挖掘勘查工作中，大致可以了解新罗时期有计划地进行城市规划的迹象。

据推测，沙伐州应该是在687年(神文王7)左右，在州治中施行了坊里制，位置相当于今日的尚州市中心地带。在这伏龙洞发掘了统一新罗时期的城市遗址。从发掘调查成就以及地籍图来看，沙伐州城市规划体系是将整体土地大体上划分成九等分之后，再对此细分为9等分小区域。此时，大区域单位为“里”，小区域单位为“坊”。南北宽幅约为1,440m，东西宽约为1,400m，再将这块土地按照9坊×9坊规划，最后整块土地按照9里81坊进行编制。(图16)

由于地形变化严重，我们以地貌发生变化之前的1913年地籍图为参考，研

究坊的规模和平面形状时，就会发现属于中央部1列的坊为东西约120m，南北约160m的纵长方形，东西向其他行列的坊，则是约160×160m的正方形。即，东西宽幅120m规模的单位区域置于中央位置，东西两侧分别设置着边长为160m的4个区域坊。由此可见，统一新罗时期尚州的中心部，其实际的空间结构应该是中心部按照坊里规划分布，与周边以及背后主城——资山山城相互交融在一起。

南原小京于神文王5年(685)设置，在神文王11年(691)修筑了南原城。其位置相当于今日的南原市区中心地带的乡校洞，东忠洞，道通洞，王亭洞，竹巷洞一带，这里道路和居住区域呈规划整齐的隔栅型土地规划模式，带有朝鲜时期南原邑城迹象。

规划范围为南北约1.12km，东西约1.36km。单位规划的一个边长，除了中央部1列，其他大致都是160m。即，属于中央部1列的坊，是约80m(东西)×约160m(南北)的纵长方形，其他坊则是约160×160m规模的正方形。在东忠洞龙城小学一带尚存坊里制痕迹，有一座建于神文王11年(691)的龙城馆址。坊里规划区域内，靠东的外围有一座据传建于宪康王元年(875)的禅院寺，西边外围处则有座高丽时期的万福寺。朝鲜时期以坊里规划线为中心，按照正方形建造了南原邑城。由此可见，自从南原小京实行坊里制之后，历经高丽时期，朝鲜时期，世代都是该地区的中心区。按照坊里规划以隔栅型修建的道路，在后人造邑城，修路时被广为使用。

2

# 王陵



图17 庆州塔洞木棺墓

斯卢国时期的庆州地区坟墓中，作为2世纪中后期之后的木椁墓，尚未发现规模庞大，附葬形式的王墓。1世纪后半期在庆州西部筑造的舍罗里130号木棺墓和市内的塔洞木棺墓(图17))，其规模和附葬文物可以说同一时期在岭南地区筑造的其他坟墓无可比拟，都是所属邑落的大人物的坟墓，但无法断定其是代表整个斯卢国的王墓。

进入麻立干时期之后，成为新罗首都的庆州领域统治阶级聚集到市里，作为自己的坟墓修筑了高大的古冢，即留下了今天的市内平地中心部的古墓群与金尺里的古墓群。其中，麻立干时期的王陵包含在市内中央古冢之中。西边金尺里群集的古冢群应该是6部中相对实力薄弱的岑喙部之墓，所以包括王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据说这

一时期的王麻立干由6部当中的有实力的部——喙部，沙喙部的部长来担任。

修建在市内中心部的坟墓，从群集面貌来看，当时有实力的部——喙部，沙喙部的坟墓，很有可能就是分布在大陵苑地区以及其北边路东洞，路西洞群集的坟墓(图19)。因此这些坟墓之中应该包括麻立干时期的王陵。

对于麻立干期王陵的重要条件，以当前的发掘成就还无法具体加以定论。其间曾出土过金制“山”字形立饰带冠的坟墓受到关注，有观点主张其中一部分坟墓被比较推定为麻立干时期的奈勿王，实圣王，讷祇王，慈悲王，炤智王，智证王的王陵。但显然，并非出土了金冠，就表示都是王陵。尚未发掘的大型坟墓当中，还有众多比曾经出土过金冠的坟墓规模要大许多的坟墓。正如(表1)所见，规模大于天马冢的古墓有9座。



图18 大陵苑，路西洞，路东洞金冠出土古墓(①皇南大家北墓，②天马冢，③金冠冢，④瑞凤冢，⑤金铃冢)

表 1 庆州市内大型古墓大小排序

古墓编号(名称)	直径(m)	古墓编号(名称)	直径(m)
125号(凤凰台)	82.3	119号(西墓)	53.7
98号(皇南大冢南墓)	76.0	119号(中墓)	48.9
98号(皇南大冢北墓)	76.0	119号(东墓)	42.3
130号(西凤凰台)	74.6	99号	51.2
90号(北墓)	56.5	105号	51.0
90号(南墓)	54.3	155号(天马冢)	49.6
106号(传味邹王陵)	56.1	129号(北墓 瑞凤冢)	46.1
134号(北墓)	54.1	97号(西墓)	45.5
134号(南墓)	44.0	97号(东墓)	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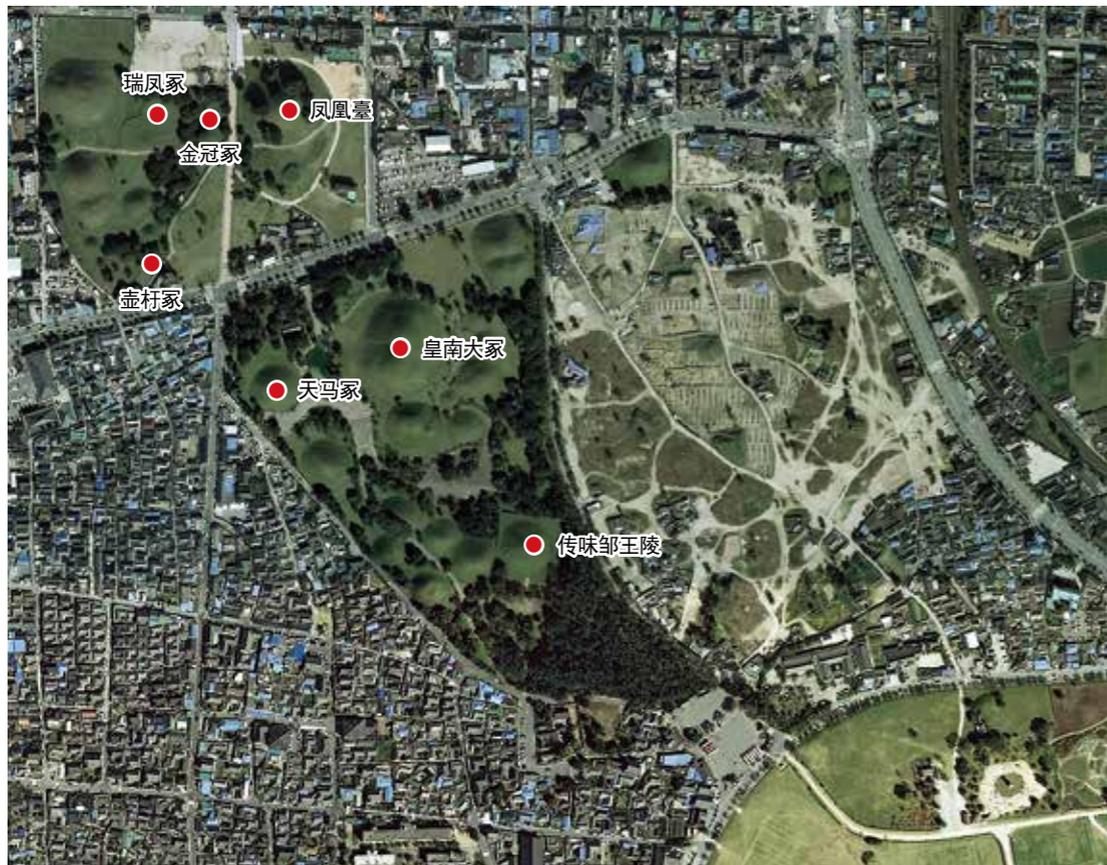


图 19 大陵苑一带以及路西洞, 路东洞古墓群分布图

把坟墓的大小作为是否为王陵的首要判断依据时, 已发掘的第98号坟中获得了可以看作是王陵的重要的判断依据。即大型双坟, 其中包含王陵的可能性很大。由此推论, 如果王陵不是双坟形式, 那么该妃陵就未必要规模很大。所以(表1)里的90号, 134号古墓是王陵的可能性非常大。此外, 最大的独立坟125号坟, 130号坟, 可以说是王陵。

除了坟墓的大小, 另一个王陵的判断依据就是那些坟墓必须是男性的坟墓。判断古墓主人公的性别时, 以佩戴的耳饰形状为重要的依据。细环耳饰为男性, 太环耳饰为女性。从这一点来看, 尽管金冠冢因为是日帝强占期所做的勘查调查, 其细节无法确定其准确性, 但据文字记录, 当时是佩戴太环耳饰, 而且坟墓规模不大, 因此难以看作是王陵。

截至现在发掘的案例来看, 无论是使用的仪礼用冠还是葬礼用冠, 从坟墓中能够发掘出金冠的, 有可能就是王陵。但, 98号(皇南大冢)双坟的南墓, 规模显然庞大, 而且其夫人的坟墓——北坟中出土了金冠, 从这一点来讲肯定是王陵无疑, 令人意外的是却并没有发现金冠。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关于这座南坟的主人, 认为他是奈勿王, 讷祗王的意见居多, 也有观点推定为实圣王。

从麻立干期坟墓分布来看, 王陵整体上与大小不一的其他坟墓一起筑造而成。因此可能和同属一个部的王族以及其他有地位的人共享同一个墓地空间。这也显示了麻立干时期的王并非至高无上, 他既是代表自己所属部的代表人物, 同时也是王。

到了中古期, 王已经超越了代表所属部的部长身份, 成为凌驾于6个部的人物, 称之为大王。并开始把王的葬地记录为永敬寺北边等, 将内容予以具体化。而且, 王与贵族的坟墓离开过去的庆州市区平地, 开始迁移至周围山地。作为这些古墓群的代表性例子, 就是中代第一王武烈王陵墓后面排成一列的古墓群(图20)。

位于武烈王陵最近的4号古坟, 其护石为基准的直径大约为62.9m, 而且坟墓的平面形状和麻立干时期的坟墓一样呈椭圆形, 而非像他后代的圆形横穴式石室坟。因此, 其内部结构很有可能是积石木椁墓。位于其上面的3号坟, 2号坟, 1号坟直径分别为50.3m, 46.2m, 46.0m。从规模和坟墓状况来



图20 西岳洞武烈王陵(下面树木围绕的坟墓)一带的陵墓

看,这些无疑是王陵级别的坟墓。据推测,4号坟应该是最早建造的法兴王陵,其余3起坟墓中,包括真兴王陵,真智王陵。

唯独真平王陵,真德女王之陵,其位置分别按照汉祗部,沙梁部所记载,因此估测,很有可能是二者陵墓位于平地。善德女王之陵位于四天王寺北侧的狼山南麓,属于独立古坟。

如此,到了中古期,由于王的地位已至高无上,因此王陵开始远离其他贵族坟墓,单独营造一个坟区,逐渐出现独立的趋势。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王权强化性质。

武烈王之陵的建造刚好是中代的始发原点。值得庆幸的是,陵碑螭首中刻有“太宗武烈大王之碑”内容,其主人与位置才能精确判断出来,实属罕见。这座陵碑雕刻技术精湛,备受瞩目,也预示着开始从唐引进陵碑文化,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案例(图21)。

被认定为中期,晚期的诸多王陵,大多分布在距离庆州中心地带较远的盆



图21 武烈王陵龟趺及螭首



图22 兴德王陵十二支像之马像

地周围。这些大多为18世纪前期庆州氏族所命名,因此其置信度有待商榷。曾经被推测为是闵哀王陵的王陵级坟墓,因在筑造该坟墓时在其后形成的山坡铲土面曾修筑过一座火葬墓,被证实元和10年(815)便使用了藏骨器,由此证实,不可能是于839年死亡的闵哀王之陵。目前能够确定的王陵,除了武烈王陵,还有根据陵碑证实的兴德王(826~836)陵以及根据崇福寺碑文推测的元圣王(785~798)之陵(挂陵)。

被认定为中期,晚期的王陵,陵墓周围设置了刻有十二支像浮雕的护石,并立有栏杆,陵墓前方则立着石人像,狮子像。(图23)这些陵是最具王陵规模的王陵。护石的源头要数武烈王陵,用块石修筑坛,并将墓碑石依靠而筑。随后发展成用琢石处理的长方形石块修筑,并用雕琢过的石头依靠而筑,以神文王陵(图24)为典型。后又发展成用板石来做护石,并在上面雕刻十二支。在雕刻十二支像之前,用板石做护石,在其周围单独设立十二支丸雕雕像,以圣德王(702~737)之陵为例。雕像应该是陵墓筑造后过了一段时间,到了景德王朝代时才建立的。

十二支像起源于中国。隋朝将表示12方位的牛(北),兔(东),马(南),鸡(西)等各种动物的面部结合人体烧制成小雕塑,放置于坟墓内作为陪葬。这种风



图23 元圣王陵前的石雕

俗延续到了唐朝。新罗借鉴这种方式，并进一步发展，将十二支像雕刻在了王陵护石上。另外，因出土彩陶俑而著名的龙江洞石室坟内发现了十二支青铜像，花谷里火葬墓则用扁平的土制十二支像围绕骨壶摆开。另外，藏骨器盖子上刻着十二支铭文(图25)，铁质秤锤上铸造成十二支纹样……各种器物上都印有十二支像，说明当时新罗社会已经盛行十二支信仰。

查看十二支像有身穿铠甲的，也有身穿普通便装的。在中国，十二支陶俑是埋在坟墓内的。新罗时期，则以坟外护石手持武器状设计。可见在十二支祈求时间永久的寓意上，增加了佛教神将像的守护功能寓意。王陵设立的狮子像等其他雕塑，也基本都包含着守护王陵的寓意。由此可见，王陵护石的十二支像，不仅是王陵雕塑的重要特征，还体现了新罗文化收容外来文化，作为己用的创新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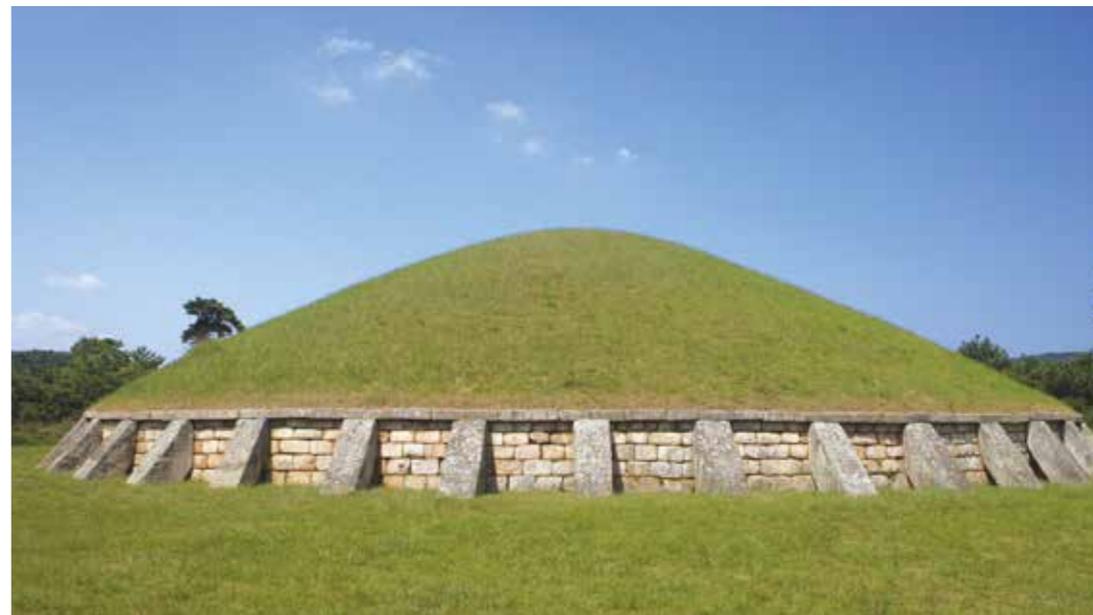


图24 神文王陵



图25 庆州出土的十二支铭骨壶

## 宗教与祭仪

新罗时期除了佛教，还有道教，儒教并存。儒教由于思想性过强，很难说成一种宗教信仰。而道教作为自成体系的具体宗教，对其功能却几乎无从知晓。所以本文主要围绕着普遍意义上的宗教——佛教，佛教引进之前早已在本土传承的土著宗教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家祭仪来展开。

### 土著宗教

任何社会，都有着对于自己以及围绕自己的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说明体系，即所谓的世界观或宗教系统。自古以来生活在韩半岛东南部的人们，自然也成了新罗国家的成员。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宗教系统。他们的宗教传统带动了初期新罗社会的形成以及发展，伴随着国家社会的发展与变革。随着佛教这种外来宗教逐渐被接纳为普遍宗教，本土土著宗教既与外来宗教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又在其传承角色上开始发生变化。

促成古代韩国土著宗教的历史文化背景，是萨满教传统。萨满教指以萨满

为中心的宗教文化现象。萨满在古代中国以“巫”来表示。萨满具体指通过脱魂，凭灵等意识转换，直接接触另一个世界，是人类试图解决人类问题而进行的一种宗教专家之形式。这种对于人类和世界的视角和说明中诞生的宗教文化，便是萨满教。

人们相信世界上存在萨满这种特殊的存在，通过灵魂出游和另一个世界通灵，从而解决人类世界的问题。因此他们在新罗以及整个古代韩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国家的初创期，掌握和运营权力的过程中，对于巫的神通广大的寄托和信任更受关注。有很多资料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将王号定为具有“巫”含义的“次次雄”的2代南海王，当初新罗初期的王均被视为是具有无所不能神力的拥有者，而且竭尽全力想把这种能力发挥到极致。

在阐述新罗人的土著宗教之前，必须先对世界存在以及结构的认识与说明进行理解。从檀君神话以及后来的满州，韩半岛古代神话中可以看出，包括新罗人在内的古代韩国人认为，这世界并不仅仅是人类的世界，而是动植物的自然世界，神的世界和谐共存的世界。所以他们具备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即人类的幸福必须通过与其他世界的交流，协调才能实现。这种世界观与萨满教世界观相通。

新罗人认为，天上世界属于神的世界；地下世界不仅天生富饶，是万物重生之根源，也是亡者的世界；二者形成垂直世界。而地面的另一边某个地方，又将存在某个水平世界。所以新罗人那时便已经具备了垂直世界，水平世界构成的空间性世界观。新罗人同时又具备了与月缺月圆相关的诸多象征及与之相关的时间观。

和过去的其他古代人一样，新罗人认为人类是由肉体 and 灵魂组成的，当肉体消失后，灵魂会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持续下去。同时认为，其中一个是具有肉体物理特性的肉体魂，一个是离开肉体走向另一个世界的自由魂。因此在对待亡者的方式上，也有着多种尝试。

新罗人认为诸神掌管着世界，尤其对于上天的观念和信仰更为突出。他们认为天神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君主作为地上世界的代表人物，试图从和天神的关联中寻找自己的权威。在这一时期，新罗人认为上天的权能，在地

面上通过人类,尤其是通过始祖神得以体现,因此对于天神,始祖神并没有明确的区分,表现出未分化的神观念。有关人格神性的观念,和亡者以及祖辈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新罗人对始祖神赋予了尤为重要的神圣性。他们认为生前担负重要社会角色的人,即便是在死后也会对现实世界发挥影响,起到守护神的作用。其中山神被认为是守护各个地区太平的存在,所以在新罗统治体制当中,甚至带有地区机构编制性质,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意义。对于社会生产和丰饶,新罗人统统将责任赋予在了诸神身上,而且从史前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有关女性丰饶度与水的生产性的观念,直接与女神,水神联系在了一起。

基于这种观念体系,新罗人举行了各种多样的宗教仪礼。新罗人的仪礼体系包括山岳祭祀,井主祭祀,水边祭祀,农耕仪礼,大海祭祀。比如井主祭祀,在新罗人看来井和王权相关,所以在井边举行登基仪式。水象征着生命,所以举行了水的净化仪式。为了祈求海上作业和与外国的海路交流,还举行了大海祭祀,来祭拜掌管捕鱼和航海的海神。

关于井边祭祀,庆州博物馆连接通路地带发现的一口井值得关注。这口井井深超过10m,在8.5m深处,出土了约小于10岁的人骨一具,另外还发现狗,猫,牛,野



图26 庆州博物馆连接通路地带的井

猪,鹿,獐,马等动物类骨骸;乌鸦,鸭子,野鸡等飞禽类,青花鱼,鲷鱼,黄姑鱼等鱼类骨骸;蛇骨骸以及吊桶,印花文土器,瓦片。尤其是刻有“南宫之印”的瓦,令人推测这附近地带应该为月城南宫,井边祭祀的主体也很有可能是与王权相关的人物。与各种动物的骨骸一同被发现的孩子的骨骸,属于单纯溺亡的可能性较小,很有可能是和动物,陶器一起,被当做祭祀品祭献的。(《图26》)

## 国家祭祀

众所周知,在人类初期社会,宗教信念和公共仪礼对共同体统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各个社会,尤其是古代国家在确立和强化其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对于以往进行的各种宗教礼仪以及支撑着它们的宗教观念,做了系统化的工作,或者将它们统一规划。古代中国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举措,将不同程度的宗教仪礼根据政治社会性重要程度,进行编制,确立了以大祀,中祀,小祀体系为中心的国家层面上的祀典。

新罗在落实中央集权制支配体制的过程中,也在国家祭祀的统一编制方面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到了智证王时期,则一次性整顿了祀典。到了中古期,政府面临新支配体制整顿问题,于是对支撑其后的礼祭也备加关注,因此又进行了一次国家祀典整改。随着新罗社会发生变化,到了中期末惠恭王时期,做了第三次祀典整改。具体以宗庙改编,晚期初时分设立善德女王社稷坛为例。

关于新罗国家祭祀整顿的具体情况,可以参照《三国史记·祭祀志》中概括性整理的文献,了解其概况。根据《祭祀志》,新罗将包括始祖在内的祭祖,农耕仪礼,山川祭祀,王京地区的祈福仪礼,民俗仪礼,统统从国家层面做了整改,直接由王室和中央政府掌管。这说明宗教仪礼以及作为其背景的宗教观念,对新罗人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国家始祖的祭祀,被看做是维护象征性国家以及现实中王室的存活的最为重要的国家祭祀。新罗支配势力根据出资情况,由代表不同政治观点的几个利益集团组成。为了体制的稳定,必须对始祖神给予特别的礼仪,从而确保始



图27 庆州萝井遗址发掘全景

祖神从国家层面使这些利益集团团结起来。

萝井是曾举行新罗始祖庙祭祀的地方。根据文献记录，萝井是新罗始祖朴赫居世诞生的地点。对萝井进行发掘勘察的结果发现，斯卢国时期~7世纪末，跨越3个时期设置的遗址有重叠的现象。其中建于6世纪后半期的第二次遗址，到了文武王时期筑造遗址时，则变为了第三次遗址即特殊的八角建筑物。这座八角建筑物，用打磨后的花岗岩做成了双重基座，外围绕有围墙，南侧出入口处设有回廊。因此，这很可能是当时国家的祭祀设施。

随着王室实力巩固，开始意识到祭祀王室直系血统的必要性，以便于团结王室势力，提高威望，表现出高于其他支配贵族的优越性。于是中古期之后，进行了多次对于王室直系血统的祭祀活动。统一之后接纳了唐的宗庙制



图28 瞻星台南侧皇南洞123-2号建筑物遗址航拍图

度，宗庙祭祀变得更为权威性，规模化。

新罗宗庙地点最为清晰的是，瞻星台南侧，鸡林北侧的皇南洞123-2号遗址地带。遗址中心年代估计为7世纪后期。该遗址靠近王京的中心——月城，积心部直径在1m左右，是大型宗庙。不同于常见的行政衙门建筑，其布局和础石排列状态都不同于以往。而且，位于以月城为中心的西北侧，而不是正北方，相当于在左侧位置。与北魏洛阳都城制，唐朝长安城的都城制做比较时，会发现和太庙(即宗庙)位于左侧这一点相同。

新罗是农耕国家。在新罗，农业收成好，是国家生存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新罗在土著(本地)农耕礼仪基础上，结合带有形式化，象征化精致美的中国式农耕仪礼，举行了各种农耕仪礼。另外，一边实行中央集权制统治体制，一边将王京等全国各地祭拜守护神的名山大川祭祀分为不同等级，编制为大祀，中祀，小祀。这表明新罗中央政府以祭祀作为媒介，对各地集团按照势力大小进行编制，实际上与郡县制一脉相通。

## 佛教

三国希望打造王权中心的强大国家。以王室为中心的人群对当时具备高度思想体系的佛教怀有浓厚的兴趣，并积极接纳和收容，以便作为国家发展的一个跳板。4世纪被三国接纳的佛教，事实上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后形成的中国佛教。三国佛教在高句丽，百济，新罗，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得以体现和接纳。高句丽和百济在4世纪后期，几乎同时接纳了南北朝的佛教。新罗要比这晚许多，直到528年(法兴王15)异次顿殉教后，在法兴王的主导下佛教才得以被公认。

### 前期之佛教

法兴王颁布律令，对地方制度，中央统治机构加以改编，加强集权力，并且接纳了普遍宗教——佛教，以配合自己的新治国理念。这一时期随着社会发生变化，确立了新的国家理念，佛教为王权的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优势，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整个文化现象也被广泛传入新罗，对创造新的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佛教深入人心，按照正法统一天下，实行仁政的转轮圣王被视为是理想的君主，而这种思想逐渐代替了过去那种祈求上天权威的圣王观念。因此王名，姓名也开始采用佛教式名字。法兴王，真兴王曾短暂出家，到了晚年时甚至正式出家。真兴王在领域巡狩时曾有僧侣陪同，并且举办过百高座讲会，八关会。到了真平王时期，佛教已成为新罗社会的核心思想。这个时期留学中国的僧人圆光积极展开传教活动，并且安舍等人被派往中国，开始正式接纳中国佛教。

圆光到南朝陈国，隋国留学归来，制定了宣传儒教道德的世俗五戒，为当时新罗社会渴望的伦理观提供了启发和提示。他曾以上首身份参加过在黄龙寺召开的百高座法会。百高座法会是当外敌入侵，遭遇火灾或洪水等国难当头时，邀请100人法师讲经般若波罗蜜，从而保佑国家，天下太平的一种仪式。从国王到地方平民百姓，为了让所有阶层的新罗人都能受到菩萨的保佑，圆光一生致力于传播佛教真髓。

善德女王时期，慈藏到大唐游学，为促进新罗和大唐的关系做出了贡献。回国时带来《大藏经》，为新罗佛教教学打下了基础。为了整肃纲纪，捍卫佛教界的纯洁，担任相应职责，制定僧侣管理方案，使其熟悉佛教戒律。慈藏还提出了新罗佛国土说，认为新罗是佛菩萨当前所在的地方。黄龙寺九层塔为强化王室权威，抵御外敌入侵而建，恰好体现了新罗佛国土说。

随着新罗王京出现寺庙，本国人出家也开始被允许。随着留学僧频繁来往中国，两国的直接交流趋于活跃，开始修建了大量寺庙，塔。按照佛国土观点，在“过去佛时代”的7处伽蓝址上修建寺院等，修建多处寺庙，以此来体现王京遍地都是佛国净土。七处伽蓝分别为：兴轮寺，县严寺，永兴寺，皇龙寺，芬皇寺，灵庙寺，四天王寺，均位于新罗王京中心地带。这些寺院都建立在曾经以巫教圣地闻名的地点，一直到新罗末期为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地点在都城规划和方位上，也属于重要地带。

### 中期佛教

进入中期，随着教学繁荣，对佛教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圆光，慈藏等人的摄论思想，普德等人的一乘思想，惠空等人的般若空观等各种教学趋于成熟，为宗教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思想上的追求，信仰与宗教实践运动都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新罗佛教思想的精华，可以从元晓大师身上寻找到。元晓思想最大特点是和净思想，意指化解佛教争论。元晓在《华岩经疏》中提出普遍性世界观，确立了明确的思想体系，创建了新罗佛教哲学。在教学研究中，元晓主张普度众生理念，并且以劳动阶层为对象，致力于大众教化活动，让众多普通民众皈依了佛教。

当时在东亚佛教界，旧唯识，新唯识之间的对立相当激烈。圆测提出了和净唯识思想，刚好协调了旧唯识，新唯识二者间的对立。他的唯识思想被道证，大贤所传承。随着憬兴等其他宗教倾向的唯识思想家大量出现，唯识思想成为了7世纪后期新罗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唯识思想系大体上分为信仰弥勒佛，阿弥陀佛的太贤系以及信仰弥勒佛，地藏菩萨的真表系。

义湘宣扬的是华严思想。华严综合了过去的各种思想,强调最高的圆满之教(圆教)。他主张“本来成佛(众生原本皆佛)”思想,认为众生通过中道求道,可在各自的位置上就地成佛。按照华严思想,用平等原则运营教团,为社会稳定打下了基础。弟子们也将师傅的讲学记录下来,编成讲义记,促成了学术论义的持续传承,为教学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十大弟子代表着华严教团,他们的后裔在全国各个主要地方建立了华严寺,浮石寺,海印寺等华严十刹。

密教为新罗佛教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中古期引进的最初的密教,以满足人们渴望免灾祈福的基本需求为主旨。因此密教通过治病发挥作用,此时应用的典籍为《药师经》。到了中期之后,此时中期的密教,在初期密教的基础上,渴望能系统地达到佛教的最终目的——成佛。新罗密教以圆光,安弘,密本等为元祖展开活动,随后分为护国密教系,除病密教系发展壮大。自圣德王开始,为了追福在塔内安置《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成为一种趋势。

到了7世纪前期,建造了许多石佛和寺庙。这也表明了有条件在寺院里修行的阶层日益增多。国家和王室,贵族们对寺庙的关心和经济援助,是寺院维持下去的重要基础。随着僧侣数量增多,大众教化现象加剧,国家对于佛教教团进行管制的必要性也日益突出。随之,僧侣出家有了一定的仪式,个人捐助资金建造寺院,供奉佛像,也有了相应的规定。

与此同时,也开始出现了掌管这些业务的机构——僧政机构。6世纪中期开始设立了国统,都维那,大书省等中央僧官制度。7世纪中期开始设置了州统,郡统等地方僧官职,并且开始出现掌管佛教界行政事务的实务官员。随着785年成立政官,并将实务官员补充列为僧侣,僧官职终于落实。国统是佛教教团的象征代表人物;都维那是负责为新罗社会传播先进文化的技术负责人;州统则每当地方举行佛事活动时,由其来临时负责和完成。成典负责成典寺院的日常维护,并负责管理田庄,奴婢。成典寺院除了对佛教界具有管制功能,它还充当着王室愿堂的服务功能。

佛教仪礼定期举行。具体分为每天举行的日常仪礼以及每年特定时期举行的年仪礼。每天的日常仪礼以一天六次的六时礼忏为典型,年间特定仪礼具体为讲经法会,燃灯会,八关会等。八关会最初带有抚慰战场阵亡者的性质,而

到了善德女王时期,则带有强烈的抵御外敌,祈福胜利凯旋的仪式性质。但是统一之后,最主要的特性变为了节日性质。燃灯会是为菩萨供奉灯的仪式。传统的宗教仪式和祭拜祖先的仪式,变为了佛教性质的仪式。

7世纪中期左右,百济,新罗建造了大量半跏思惟像,由此不难看出,在中期无论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信奉弥勒佛。这是佛教趋于大众化,被普通百姓接纳的结果。随着信仰趋于大众化,弥陀信仰和观音信仰也开始流行。弥陀信仰是指人们虔心诵读阿弥陀经,相信死后可以去极乐世界超度,是一种来世信仰。中期,由于僧侣们专心研究经书,大力宣传,阿弥陀信仰更加盛行,死后追善,今生来世等思想被广为传播。观音信仰更侧重于现实救济。希望国泰民安,自己的当前利益能得到观音菩萨的保护。另外还带有和弥陀净土来世相关的来世倾向,所以在当时是人们最为追捧的信仰之一。

#### 晚期佛教

进入9世纪,新罗社会中央贵族分裂开始加剧,其中地方势力反抗强烈,迎来新的变革。于是,一直以来成为新罗社会指导思想的华严宗,唯识宗佛教,被新出现的禅宗夺去其影响力。

相比其他教宗必须通过经书才能悟道,禅宗超越了依靠文字捷径走向究竟觉的方式,主张通过禅的具体实践和修行达到“悟”,是实践性质的佛教。这对现有教宗体制是一种否定,具有创新意义。这也顺应了新罗社会变化下佛教界根本改革的需求。

新罗在宪德王,兴德王时期,随着道义,洪陟等僧人从中国回归,南宗禅开始正式传播。禅宗为所有人提供了成佛的方法,削弱了王室佛教的权威。由于在王京未能得到接纳与回应,道义隐居至雪岳山。洪陟与此相反,得到了王室的支持,开创了实相山门。如此,传自中国的南宗禅,在新罗独立创办山门的,有九山禅门。九山禅门位于距离庆州不远处的边防地带,包括最初的禅宗山门——迦智山门(图29)以及实相山门,阁崛山门,桐里山门,圣住山门,狮子山门,曦阳山门,凤林山门,须弥山门等九个山门。这些山门对于新罗末期至高丽初期的佛教界给予了莫大的影响力。随着禅宗风靡,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变



图29 长兴宝林寺全景

化，禅僧们的茶文化给王室和“真骨”贵族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影响。

禅宗寺院以铁佛为主。由于缺乏制作佛像所需的铜，所以用相对容易弄到的铁作为原料。这些铁佛大多为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原本是华严主佛，此时由禅宗派来铸造，说明二者有着历史渊源。祖师诸弟子华丽地制作并建立了获国家认可的祖师之僧塔，塔碑，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祖师的哀悼之情，并彰显门宗派别的威望。

随着禅宗风靡，禅僧们宣传的风水地理学说也大为盛行。风水，是指洞察大地精气，解读它的性质，思索大地和人类如何才能维持良好的关系。禅僧们各个以自己占据的新山门为新罗第一圣地自居，并以此为中心，创办新的教团势力，并发展成教化中心地，从而起到地方文化中心地的作用。九山禅门的诸多寺庙山水和谐而成，具有风水地理上的特点。

到了晚期，禅宗盛行成为教宗教团的最大刺激。华严教团重新审视了新罗华严思想传统，祭拜祖师，针对教学中拘泥于无用的解释等问题，做了一番自我反省。同时试图通过祖师崇拜信仰，结社运动等方式，重新整顿信仰。另

外，晚期的僧政主要以政官为中心展开日常业务。政法典僧侣是在国王身边负责处理佛教界事务的僧官，确定与寺庙相关的土地问题，并负责国家，王室举办的佛事活动。中央僧官由国统，都维那娘，大都维那，大书省，少年书省组成。地方僧官具体由州统9人，郡统18人组成。

### 新罗佛教的对外交流

由于求法僧的积极活动，新罗以及东亚佛教得以繁荣昌盛。以佛教发祥地印度为首的西域以及中国，是当时僧侣们求法取经的主要目的地。新罗求法僧从7世纪上半期开始，在天竺(即印度)多个圣地巡礼，甚至在那烂陀大学(Nalanda University)留学。唐代高僧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收录了阿离耶跋摩，慧业，玄太，玄恪，慧轮等新罗7位求法僧的传记。慧超高僧研究了密教经典，并且确立了从金刚智到不空传承下来的密教传统。他游历印度整个地区和中亚各个地区，结合自己所闻所见撰写了3卷《往五天竺国传》。

新罗求法僧远赴印度，希望能在印度找到中国未引进的梵本，佛典，或就算中国已经有引进版本，因注释存在各种问题，因此望能得到印度原版书；另外，求法僧还希望能亲自参拜佛教圣地。新罗前往天竺的求法僧，基本上都未能回国。而前往中国求法的新罗僧人，大部分都回了国。其中也有选择不回国的，而在中国度过余生的僧侣。这些僧人在中国大多从事经书翻译，教义解释等，为中国的佛教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中国求法而归的僧侣，在新罗大受欢迎，有的甚至获得了王公贵族和百姓的款待与敬重。

求法僧为新罗佛教发展做出了贡献。新罗佛教在传入初期，咒术的成分比较多，后来随着佛教思想逐渐被接纳为普遍信仰和普及，需要对佛教思想做一番更为系统的理解。出于这种需求，佛教王室出台政策，将求法僧派往中国，使其学习先进的佛教思想。这些求法僧在回国时，带来了经书，佛像，佛舍利等，为新罗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新罗和唐，日本，主要是通过经书来交流了佛教思想。佛经交流频繁活跃，促进了各国佛教的发展，并使其带有国际性特征。求法僧带来的中国先进佛教思想，成为新罗佛教教派的基础。

新罗僧侣的著作也被介绍到大唐。《十门和诤论》，《起信论疏》，《华严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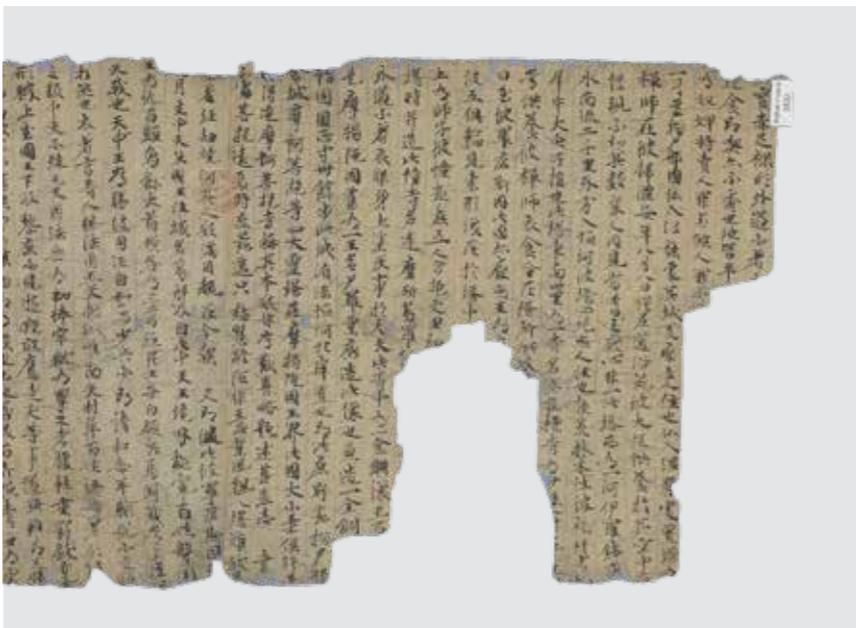


图30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前部, 法国 巴黎国立博物馆

疏》等元晓大师的大量著作在大唐广为流传。新罗僧侣走遍了大唐全域, 宣传禅道, 巡礼圣地。这些僧侣慕名而去的中国佛教圣地有: 文殊菩萨常驻过的五台山, 天台宗总寺国清寺, 供奉慧能大师舍利塔的漕溪山, 寺院众多的终南山以及长安一带的广阔地域。新罗求法僧对东亚佛教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传教活动也影响了日本佛教, 为真言宗, 天台宗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以佛教作为媒介, 新罗和当时与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对立关系的高句丽, 百济, 也促成了活跃的文化交流。元晓, 义湘从高句丽普德那里学到了涅槃学。黄龙寺九层塔建造时, 百济工匠阿非知曾前往协助工程。新罗朝廷在与唐, 日本进行外交来往时, 也涉及到了佛教元素, 赠送佛像作为礼物, 或使臣来访后去寺院朝圣。8世纪新罗佛教对日本佛教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人员方面的交流, 主要是相当多的日本僧侣前来新罗留学。新罗僧侣前往日本, 则大多是为了传法。新罗学僧的各种著作被传到日本流通, 为日本古代佛教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4

## 佛教美术

众所周知, 统一新罗期的美术, 大部分是佛教美术。虽然还有绘画, 书法等作品, 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什么留存下来。因此, 重点围绕佛教美术展开叙述。佛教美术存留于寺庙中, 已知在统一期新罗拥有约160个寺院。目前在庆州已经证实的寺院仅有30多个, 剩余的文物数量也相当有限。但通过这些有限的资料, 我们依然可以轻易地看出新罗期的美术。

统一期的新罗佛教美术, 根据教学佛教, 禅宗这一佛教两大流派, 大致可分为两个领域。庆州南山的佛教美术, 佛国寺, 石窟庵不仅佛教美术物品数量多, 在统一期新罗美术中占据的地位也举足轻重, 因此另作单独阐述。另外, 东宫, 月池这些王室遗址中出土过佛教美术品, 但除了这些特殊情况, 大多佛教美术品均是供奉在寺院的各种佛像, 佛塔, 舍利器以及梵钟, 金鼓等佛教法具, 石灯等。

## 教学佛教的发展与佛教美术的开化

### 王京

新罗寺院最初主要建立在王京地带，后来逐渐扩散到地方。王京分布着黄龙寺，四天王寺，奉德寺等成典寺院和芬皇寺，望德寺，皇福寺，三郎寺，佛国寺，甘山寺等众多寺院。正如《三国遗事》中记载，一派“寺寺星张，塔塔雁行”的壮观景象。随着佛教信仰扩散，贵族建立愿刹，愿塔盛行，地方区域也开始大规模创建寺院。

新罗统一后最先创建了四天王寺。义湘法师从大唐回国后，向文武王(661~681)汇报了大唐的侵略消息。于是作为防备，在679年建立了四天王寺。据说曾经深入龙宫习得秘法的明朗，提出了创建四天王寺的建议。四天王寺不仅是护国寺院，还是设有寺院管理机构——成典的高格寺院。

四天王寺是新罗最早修建双塔的寺院，至于因为什么原因，改变了过去单塔的风格，开始建成双塔，这就不得而知了。关于这一点，有观点认为这是三国统一时期新罗特有的一次尝试。但同时期的中国，日本早已有了双塔建造的先例，所以也不适合看作是统一期新罗特有的现象。四天王寺双塔的正四边形塔座各个方位分别设有台阶。由此判断，双塔主体是可能通往塔内部的木塔结构。

统一期新罗将“四天王”视为是抵御大唐侵略的挡箭牌。尽管中古期已经建立了规模巨大的护国寺刹——黄龙寺，但从此以后，“四天王”将以新的护国使者身份亮相。且并没有在现有的黄龙寺，金光寺开设道场，而是特意以“四天王寺”来命名。这说明在当时四天王受到了极大的重视。3年后建立的护国寺刹感恩寺东，西双塔的舍利器中，也有四天王像。感恩寺是神文王为了纪念欲成为龙守护国家的父亲文武王而建的寺刹。如此，统一初期和护国相关的寺院，被赋予了四天王的名号，或为佛像赋予了特别的寓意。

根据护国寺刹四天王寺遗址的挖掘结果，并没有如期发现四天王像。那些曾经以为是装饰木塔塔座的四天王像的佛像，后来被证实为神将像。这些神将像身披铠甲，佩戴武器，一副将帅的模样，搭坐在生灵座上面。这些都是利用模塑制作而成。虽然仅剩残碎的断片，但细节造型卓越，工艺完美，被视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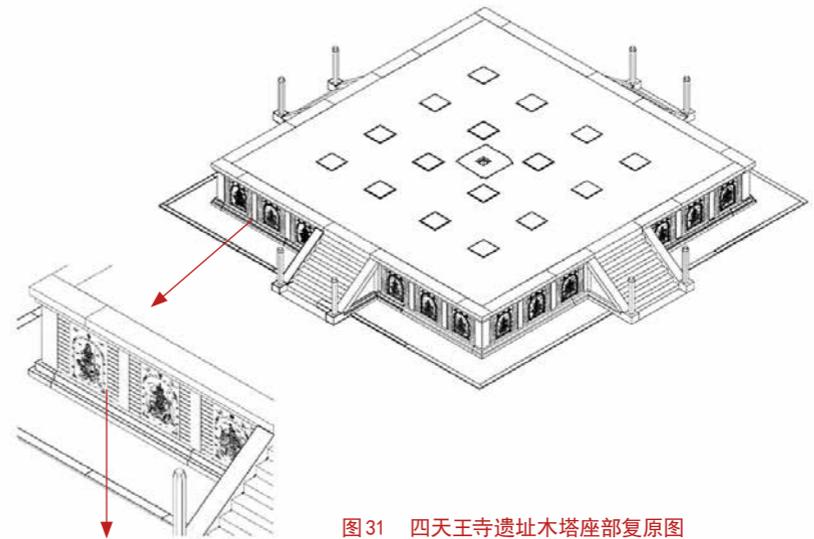


图31 四天王寺遗址木塔座部复原图



图32 四天王寺遗址木塔座部神将像

是和石窟庵佛像雕塑齐名的统一新罗佛教雕塑代表作之一，备受关注。尤其是它很有可能与《三国遗事》中的雕塑家良志有关，所以是研究韩国古代佛教雕塑史的重要资料。

682年神文王(681~692)为了悼念父亲文武王，在感恩寺东，西边各修建了三层石塔。这座塔有2个塔座(基壇)，上面是3层塔身，是规模，样式相同的双塔。不同于四天王寺的双塔木塔，感恩寺双塔是石头搭建的石塔，是现存石塔

中最早建造的石塔。这座石塔壮观，雄伟，将三国统一之后的新罗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东，西两个塔中发现的舍利器，彰显了新罗工艺技术的精湛和实力，是这一时期工艺技术的经典之作。舍利容器外盒就是四天王像。

四天王像单独制作后附着在了舍利器上。这是最早的四天王像实物。四天王像的主要功能在于守护供奉在里面的舍利子。鉴于感恩寺是护国寺刹，所联。北方多闻天手捧宝塔站立，具备了四天王像的图像。只是全身铠甲武装，手捧宝塔等各种武器，却并没有头戴头盔。尽管是仅20cm左右的小型四天王像，但无论是面部表情，还是铠甲的细节部分，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不愧是新罗四天王像的代表作。以也和护国有着关

东宫和月池，即雁鸭池发掘中出土了10个金铜板佛。其中金铜三尊板佛2个，菩萨板佛8个。尽管这座金铜板佛没有铭文，但从月池形成时间以及周围塔。不同于四天王寺的双塔木塔，感恩寺双塔是石头搭建的石塔，是现存石塔



图33 庆州感恩寺东，西三层石塔

中最早建造的石塔。这座石塔壮观，雄伟，将三国统一之后的新罗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东，西两个塔中发现的舍利器，彰显了新罗工艺技术的精湛和实力，是这一时期工艺技术的经典之作。舍利容器外盒就是四天王像。

四天王像单独制作后附着在了舍利器上。这是最早的四天王像实物。四天王像的主要功能在于守护供奉在里面的舍利子。鉴于感恩寺是护国寺刹，所以也和护国有着关联。北方多闻天手捧宝塔站立，具备了四天王像的图像。只是全身铠甲武装，手捧宝塔等各种武器，却并没有头戴头盔。尽管是仅20cm左右的小型四天王像，但无论是面部表情，还是铠甲的细节部分，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不愧是新罗四天王像的代表作。

月池，即雁鸭池发掘中出土了10个金铜板佛。其中金铜三尊板佛2个，菩萨板佛8个。尽管这座金铜板佛没有铭文，但从月池形成时间以及周围建筑竣工年代为680年，还有在建筑旧址出土了刻有调露2年(680)铭文的砖块等因素来看，应该是制造于相同时期。金铜三尊板佛是统一期之前从未尝试过的全新形式与风格。坐在中间的佛像，双肩披着通肩式袈裟，结成转法轮印。两旁的菩萨像则以腰身扭曲的三曲姿势，较为特别。这种强调肢体表现的金铜板佛突然出现，表明此时已受到从中国新引进的模本的影响。



图34 感恩寺遗址东，西塔舍利器



图35 月池出土的金铜板佛



图36 青铜砖佛模子

这座金铜板佛曾供奉在东宫里面的内佛殿内。光背边缘有穿孔。类似日本玉虫厨子之类的厨子或法隆寺献纳宝物第198号，这些孔的功能应该是附着于小型木质佛龕等物品上用于礼拜。九黄洞苑池出土的金铜佛菩萨坐像和它是同样的外形。此外，华严寺西五层石塔的青铜砖佛模子的手势也与此相同，但这种例子非常少见。看来，这板佛的形式或佛像手的模样在后来并没有流行起来。

曾经供奉在皇福寺三层石塔舍利容器内的纯金佛立像，是根据中国流传过来的全新模型制作的新作品。曾供奉这座佛立像的舍利盒盖子内侧，刻有长达350字的铭文。据铭文所示，孝昭王1年(692)神文王妃和其子孝昭王为了给先王神文王祈福，建造了石塔。之后的706年，圣德王为祭奠神文王，神文王妃，孝昭王，在石塔内安放了菩萨舍利，纯金弥陀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简称《无垢净经》)等，祈求王室的繁荣和太平盛世。其中的纯金佛立像，身着通肩式袈裟，“U”字形衣服褶皱从前胸如流水般飘逸垂落至膝盖下方，左手放置前胸握着袈裟一角。新罗佛立像当中，类似印度佛像一样一手拿起袈裟一角的一幕非常少见。

我们来关注一下铭文中的《无垢净经》。因为这是704年中国弥陀山，法藏翻译的经书。翻译仅2年就被传到了新罗王室。由此可见在当时新的雕塑样式是如何迅速地被接纳和应用的。黄皇福寺纯金佛立像曾经是新罗王室的愿



图37 皇福寺遗址三层石塔金制佛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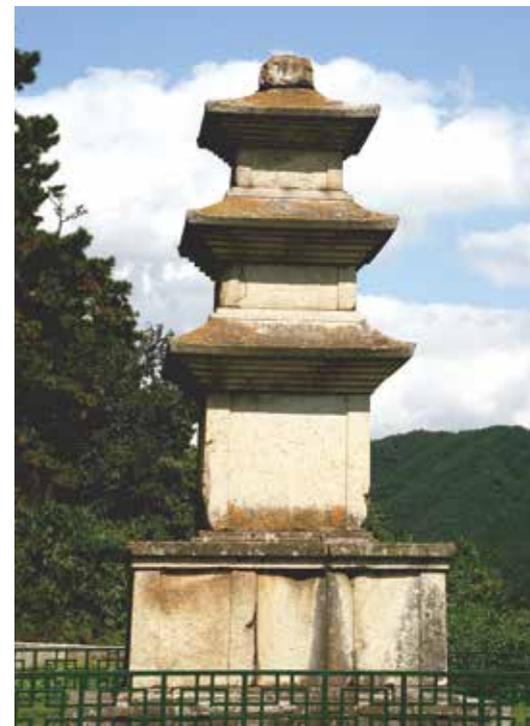


图38 庆州皇福寺遗址三层石塔

佛，是舍利庄严内放入佛像的首例。当时新罗和唐频繁交流，积极引进新的佛教文化。皇福址寺纯金佛立像对于研究新罗雕塑的特点有着很大的研究价值。

圣德王18年(719)，重阿湊金志诚为了为父母祈福，祈求国王和王族的安宁，在庆州市外东邑挂陵里创建了甘山寺。他分别为母亲制作了弥勒菩萨像，为父亲造了阿弥陀佛像。佛光背面的造像记上清晰地记录了制作时期和制作人，是韩国佛教雕塑史上的重要作品。

其中阿弥陀佛像以独特的服饰褶皱而出名。保存在庆州博物馆的砂岩佛立像，也几乎具备了同样的特征。两个佛像作品的相同点在于宽阔厚实的肩膀，发达的胸部，短腰，敦厚的大腿，身躯壮健。衣裳紧贴在身躯上，突出了身体的质感。更特别的是袈裟的褶皱。袈裟呈“U”字形。从胸部垂落到腹部附近，在双腿处呈“Y”字形分开自然垂落。这种服饰褶皱统称为优填王式。以这两座佛像为起点，数不胜数的统一新罗金铜佛立像制作成与此相同的形式。



图 39 甘山寺阿弥陀如来立像



图 40 甘山寺弥勒菩萨立像



图 41 掘佛寺遗址四面佛像



图 42 远愿寺遗址西三层石塔

弥勒菩萨像有几点有趣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弥勒菩萨像，尽管半跏思惟姿势已非常普遍，但却做成了立像形式。虽是弥勒菩萨像，但却具备了同一时期观世音菩萨图像的特点，即宝冠化佛。

庆州掘佛寺遗址的四面佛像在巨大的岩石四面都刻上了各种佛像，菩萨像。东侧刻着药师佛，西侧为阿弥陀佛，南北侧分别刻着看似释迦牟尼佛，弥勒佛的佛像。北面看似像弥勒佛的佛像旁边，线刻着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不仅采用了环雕，浮雕，线刻等各种雕刻技法，其佛像也分为坐像，立像等各种姿态。



图43 獐项里西五层石塔



图44 獐项里石造佛立像

柔和富有生动感的雕刻技艺,充分展示了统一新罗前期佛教雕刻的特点。

庆州远愿寺遗址的双塔,由于其塔身和塔座上雕刻着四天王像,十二支神像而别具一格。上层塔座上刻着十二支神像,兽面人身,身穿一般服饰。1层塔身上是身披铠甲手拿武器的四天王像,使人想到《三国遗事》上对于远愿寺的文字描述:“护国寺刹,抵御外寇入侵王京。”

与远愿寺遗址同一时期值得关注的塔还有獐项里西五层石塔。该寺遗址位于吐含山东南角,西塔保存得完好。5层塔身比例协调,1层塔身上刻着金刚力士像,栩栩如生。佛像用吐含山石材制作而成,现已被破坏。一部分被修复后,立在国立庆州博物馆院内。

7世纪后半期~8世纪初,不仅是韩国,东方三国的钟文化早已形成各自的特点,稳定并发展起来。统一新罗时期制作的钟,已经被确认的有9个。国内现存



图45 上院寺铜钟



图46 圣德大王神钟

的5个钟,其中2个遭到破坏,而其余4个在日本。其中的上院寺钟(725年),是当前韩国现存的最古老的钟。从它的完成度可推测,在此之前,韩国梵钟已正式扎根此地。

在完成上院寺钟后的40年之后,完成了圣德大王神钟(771年)。神钟高达3.75m,是名副其实的纪念碑性质的作品。这座钟是景德王时为了纪念圣德王的功德,祈愿中期王室和国家的繁荣而建,于惠恭王7年(771)完成。根据铭文,“凡是深奥的真理,还将包括可见形象之外的存在。即便是看到,也不会悟得;即便是真理的声音在天地间震动,也不会领悟到回音的根源。正如菩萨会根据时间和人,用恰当的比喻告知真理一样,挂以神钟,使人听到真理的圆音。”这座钟无论是在大小,外形,还是纹样,音质等方面,均代表了新罗时代的最高水平。



图47 柏栗寺金铜药师佛立

统一期新罗有三座金铜佛：栢栗寺金铜药师佛立像，佛国寺毗卢遮那佛像，阿弥陀佛像。关于佛国寺两座金铜佛，将在后面做重点介绍，所以在此仅介绍栢栗寺金铜药师佛立像。这座佛像高1.77m。528年，异次顿为弘扬佛教而殉教。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原位于栢栗寺的这座佛像转移到了国立庆州博物馆公开展示。协调的身体比例，流畅的衣裳，充分展现了卓越的雕塑技巧，是韩国雕刻史，服饰史上的重要资料。



图48 大方广佛华严经写经变相图

遗憾的是新罗时期创作的绘画仅剩一幅，即创作于754~755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写经》变相图。根据其制作年限，这本写经应该是庆州黄皇龙寺僧侣缘起法师发愿制成。也有观点认为，黄皇龙寺缘起法师和华严寺创建人缘起法师为同一人，但没有具体依据可查。这本写经是根据实叉难陀(652~710)所翻译的《新译华严经》80卷中的1~10卷，43卷~50卷抄写本，变相图正是贴在该写经前面的。紫色楮皮纸上用金泥，银泥，墨水创作绘画。画分别画于前后封面上，如今被分成两块。前面画着神将像，后面是坐在狮子座上的毗卢遮那佛像，上首菩萨等。用写实手法表现了佛，菩萨丰满，儒雅的身躯，并充分描述了菩萨的理想世界，是新罗的代表作。

这幅变相图是新罗绘画仅剩的一件文物。但从晚期~新罗末期的文字记录中可以了解到，这期间制作了各种佛画。当时的佛画形式，相比帧画这种挂图形式，描绘在殿阁内部和墙体的壁画更为流行。佛画的题材以11面观音，千手观音等观音菩萨图和弥勒菩萨，弥勒佛画等居多。这与当时观音信仰，弥勒信仰在统一新罗佛教信仰中占据优势的趋势相吻合。

#### 地方

统一期新罗各地中，岭南地区的遗址，文物尤其多，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宝库。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北部地区在统一之后，依然有很多保持中古期美术风格的作品。奉化北枝里磨崖佛，荣州可兴里磨崖佛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奉化北枝里寺遗址的磨崖佛——凿开天然岩壁后，在里面刻上了形象鲜明的佛像。双手和头部硕大，整体圆润。这与南山拜洞，长仓谷出土的中古期佛像有着相同的特点。这尊佛像的制作时期估测为7世纪后期。荣州可兴里西川江边岩石上雕刻的磨崖三尊佛与此外形相同。

位于庆北军威八公山峭壁的军威三尊石佛也同样带有过渡期的特征。本尊佛具有中古期佛像特点，左右菩萨立像则是新流行的三曲姿势。左右菩萨像外形相似，宝冠上分别刻着化佛和净瓶，表示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

金泉葛项寺的东，西三层石塔，石佛坐像同样备受关注。据东塔塔座的铭文所示，公元758年(景德王17)言寂法师三兄妹建了东塔。由此可准确追溯其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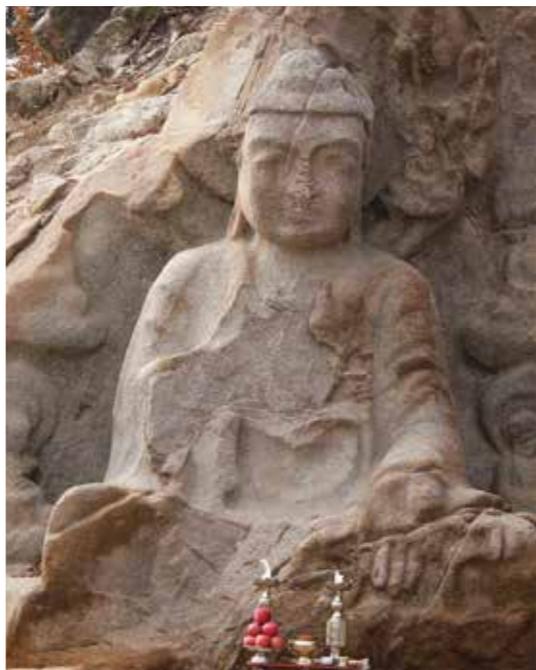


图49 奉化北枝里磨崖佛



图50 军威三尊石佛



图51 金泉葛项寺东三层石塔



图52 葛项寺石佛坐像

造年代。言寂法师三兄妹是后来的第38代王元圣王金敬信的姨妈和舅舅。由所刻文字来看，应该是晚于30年的元圣王期间所建。这尊佛像脸庞圆润，面露微笑，是座雅致的石佛坐像。据估测应该是建造于758年，和塔同一时间建成。

山清石南岩寺遗址石造毗卢遮那佛像是韩国最古老的毗卢遮那佛像。这些如今已迁到山清内院寺。据说在这座佛像的台座中央孔内发现了舍利壶。根据上面的“永泰二年丙午”铭文，可断定这座佛像制于766年(惠恭王2)，认为是现存最为古老的毗卢遮那佛像。山清断俗寺，因率居曾创作维摩居士像而闻名。率居是新罗最著名的画家，于8世纪中期景德王(742~765)年间活跃创作。据说率居所画的黄龙寺老松图非常逼真，常常引来群鸟停歇，却撞到墙上纷纷掉落。据说率居千里迢迢赶到断俗寺从事绘画创作。遗憾的是仅有文字记录，具体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

统一新罗时期庆尚南道昌宁地区修建了许多重要的寺刹。这里有述亭里东三层石塔，西三层石塔。东三层石塔矫健，不失稳重，递减率卓越，将工艺发



图53 山清石南岩寺石造毗卢遮那佛



图54 永泰二年铭舍利壶



图55 昌宁述亭里东三层石塔



图56 昌宁仁阳寺造成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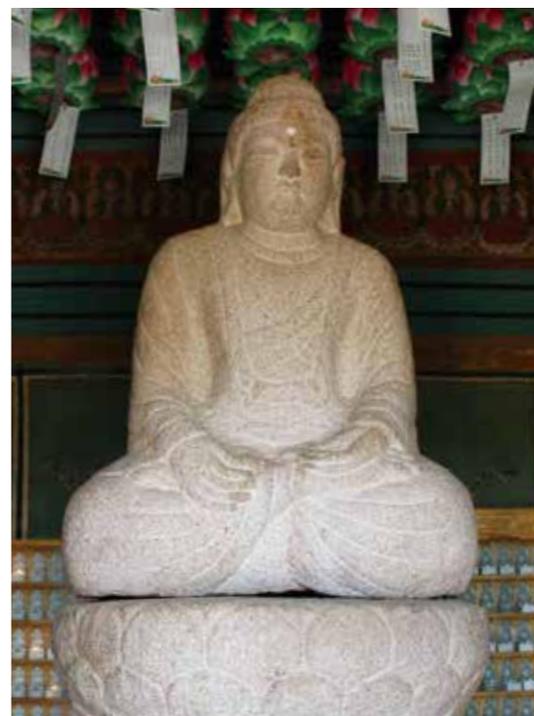


图57 昌宁观龙寺药师殿石佛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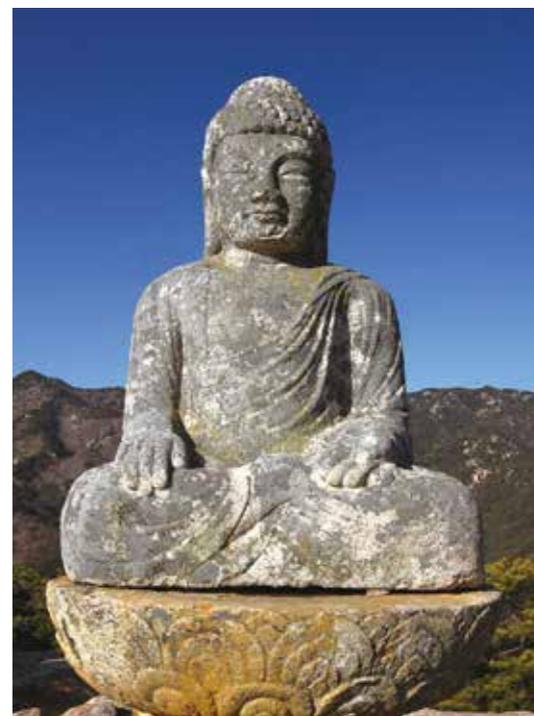


图58 昌宁龙船台石佛坐像

挥到极致，是新罗除了王京以外，难得一见的佳作。建于810年的昌宁仁阳寺造成碑前面是僧像，侧面和后面刻有铭文，设计特别。关于僧像的由来并不多，更突出了其特别之处。铭文中记录了从771年惠恭王建造仁阳寺钟的事件至宪德王2年(810)碑石建立为止，长达40年间发生的事件。

昌宁观龙寺药师殿石佛坐像位于寺院内，龙船台石佛坐像位于西侧约500米距离的山顶。近期在不同的底座都发现了铭文。据铭文所示，前者为惠恭王8年(772)的弥勒像，后者建造于圣德王21年(722)~圣德王30年(730)之间。关于佛像和台座是否为一套，铭文是否为后人追刻，有着不同意见。另外，在昌宁末屹里寺遗址出土了竖型长条铁釜，里面装有柄香炉，风铎，锁头，门环装饰等大量金属工艺品。埋在土里的时间应该是高丽时期之后，但出土的文物以新罗同一时期使用过的工艺品为主。



图 59 昌宁末屹里寺遗址柄香炉



图 60 大邱八公山石造如來坐像

进入9世纪，出现了许多无法考证其制作时期的文物。庆尚南道咸安郡防御山峭壁上线刻着三尊佛立像，这座药师三尊像刻着801年(哀庄王2)的铭文。本尊手捧药碗，很显然是药师如来像。左右菩萨则是辅佐他的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同为9世纪佛像的有八公山石造如来坐像。头顶硕大石头的样子颇像戴着斗笠，因此也叫冠岩菩萨。佛像背后屏风一样围绕的岩石，起到了佛光的作用。丰润而威严的表情，模式化的衣裳褶皱，平面式身躯……这些建于九世纪的佛像带有区别于8世纪佛像的明显变化。

有趣的现象是，统一时期新罗修建了很多砖塔。尤其大多分布在安东地区。漆谷松林寺5层砖塔建于统一初期，到了高丽时期重修。基底为花岗岩，塔身则是砖头堆砌而成。1959年对砖塔进行分解维修时，在2层塔身发现了龟状石函，里面放有舍利庄严具。殿阁型舍利器，玻璃瓶，玻璃杯最为特别。玻璃杯的形状和出土于麻立干期古坟的西域系玻璃器皿相似。安东地区最具代表的砖塔是造塔里五层砖塔，法兴寺遗址七层砖塔。

大邱桐华寺毗卢庵有9世纪3层石塔，舍利壶，毗卢遮那佛坐像等重要作品。石塔建于863年景文王3年。大约建于同一时期的石造毗卢遮那佛坐像，呈智拳印手势，光背饰有化佛，台座中台刻着7只狮子像，极具特点。

这一时期的佛教工艺品，除了末屹里寺遗址，军威麟角寺出土的所有文物，还包括梵钟，幢竿龙头等各种物品。疑为麟角寺僧塔的遗址中发现了柄香炉，香盒，净瓶，圆筒形二重盒，金鼓，盘子，小迦陵频伽像等金属制品和中国越州窑青瓷等各种文物。有不少来自于大唐的物品。



图 61 漆谷松林寺舍利器



图 62 安东造塔里五层石塔



图 63 大邱桐华寺毗卢遮那佛坐像



图 64 军威麟角寺僧塔遗址出土文物

晋州莲池寺梵钟刻有制于833年(兴德王8)的铭文, 16世纪末丁酉再乱时被倭寇夺走, 现收藏在日本福井县敦贺市常宫神社。这是位于日本的50多个韩国梵钟当中, 唯一一个被列为日本国宝(第78号)的文物。钟鼓用青铜制成, 用于寺院敲钟报时或召集大众, 是简单的工具。根据刻在钟鼓腰身处的“咸通六岁乙酉”铭文, 可见制于865年(景文王5)。钟鼓呈同心圆纹路, 造型古朴。出土于荣州丰基的幢竿龙头, 目的在于将幡挂在幢竿顶端。龙的造型栩栩如生, 犹如立刻腾飞升天。嘴里放有辘轳, 彰显了新罗时期的工艺美和精湛的技术。

京畿道首尔钟路区庄义寺遗址, 安养中初寺遗址的幢竿支柱比较有名。庄义寺遗址幢竿支柱没有特别的装饰, 风格朴素。它的意义在于, 它是首尔唯一的现存幢竿支柱。中初寺遗址幢竿支柱是唯一一个根据铭文来了解寺院名称与制作时期的幢竿支柱。除了外侧上方宽敞, 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上下有着孔, 凹槽, 便于固定幢竿。据铭文所示, 兴德王1年(826, 实历二年岁次丙午)8月28日开工, 于第二年(丁未年)2月30日竣工。

江原道主要的佛像有建于865年(景文王5)时期的到彼岸寺铁造毗卢遮那佛坐像。这个佛像的特点在于连底座在内, 整个佛像用铁制成, 更重要的是背后刻有铭文。按照铭文所示, 这座佛像由1500多名地方民众信徒组织建造, 充



图 65 晋州莲池寺梵钟



图 66 “咸通六岁乙酉”钟鼓



图 67 荣州丰基幢竿龙头



图 68 安养中初寺遗址幢竿支柱



图 69 铁堀到彼岸寺铁造毗卢遮那佛像



图 70 燕岐癸酉铭全氏阿弥陀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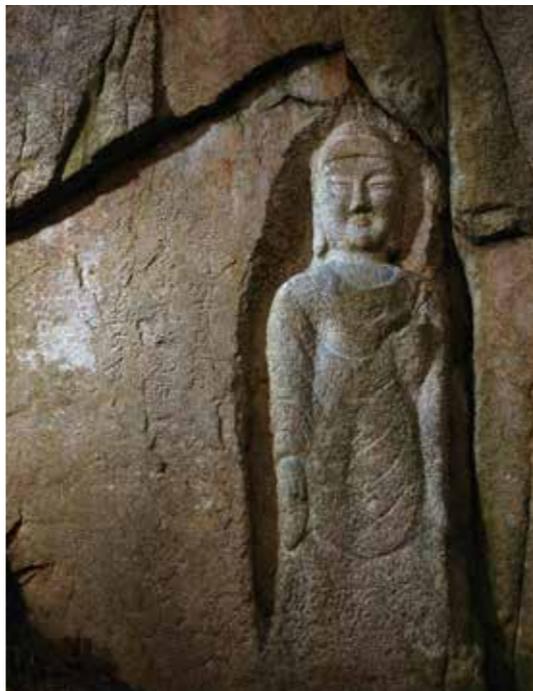


图 71 洪城龙凤寺磨崖佛立像



图 72 求礼华严寺四狮子石塔



图 73 报恩法住寺双狮子石灯

分体现了当时佛教界的变化趋势。三和寺铁造卢舍那佛坐像根据背后发现的铭文，得以证实是建于统一新罗后期的卢舍那佛佛像。铭文是反刻的，很特别。而且使用了吏读(历史上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方法之一)，按照朝鲜语语序将汉字进行排列叙述，为各个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湖南，湖西地区，有着大量丰富的文物，如佛碑像，佛像，僧塔，石塔，石灯，幢竿支柱，舍利庄严具，铜钟，铁幢竿，铁镬，木雕佛龛等。在忠南燕岐集中发现了建于680年前后的佛碑像，备受关注。碑石状石头上刻着佛像，碑文，因此叫佛碑像。燕岐地区共出土了7件。碑石上刻着“阿弥陀”的大名，这个铭文说明在当时燕岐地区中朝交流相对频繁，新信仰，新图像已流传到此，也反映了曾经的百济人被编入新罗后的心愿。忠清南道洪城龙凤寺佛像旁有一座磨崖佛立像，上面刻有制于799年(昭圣王1)的铭文。岩石上刻出神龛形状，里面在雕以佛像。左手举起，右手放下贴附前胸，手势特别。这种朴素的造型，出现于地方刚开始流行建造佛像的初期阶段。

全罗南道求礼郡华严寺四狮子石塔是湖南地带石塔的经典之作。华严寺觉皇殿的后山坡上有个孝台。石塔上方底座上有四个狮子托着3层塔身，中央站立着一位大师，手捧供品，造型独特。下面的塔座上刻着12个飞天像，1层塔



图74 潭阳开仙寺石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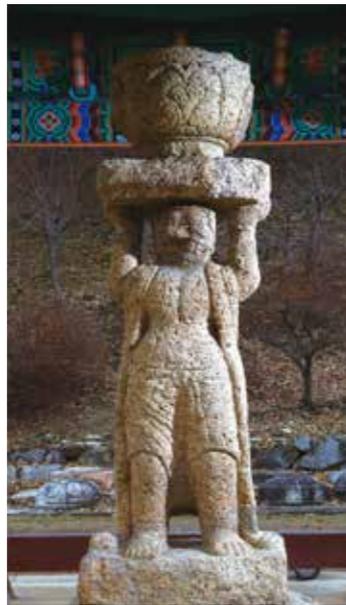


图75 报恩法住寺石造喜见菩萨立像



图76 益山弥勒寺止金铜香炉



图77 清州云泉洞梵钟



图78 公州甲寺铁幢竿

身靠门扇处，刻着金刚力士像，四天王像，菩萨像。觉皇殿前面相对而立的石灯，双狮托举状，高6.4m，是韩国最大的石灯。

湖西，湖南地带，还有很多石灯。例如：光阳中兴山城双狮子石灯，潭阳开仙寺石灯，扶余无量寺石灯，报恩法住寺双狮子石灯。法住寺双狮子石灯是两个狮子面对面而立，前脚和嘴部顶着火舍（香炉）。飞逸的鬃毛，紧绷的腿部肌肉，演绎得栩栩如生，艺术性极强。开仙寺石灯的火舍石上刻有868年（景文王8），891年（真圣女王5）铭文，实属罕见。

该地区特别的文物有法住寺石造喜见菩萨立像。喜见菩萨是《法华经》中提及过的谙熟苦行修炼的菩萨。双手扶着头顶硕大的香炉站立，造型罕见。石造喜见菩萨立像和同寺院的双狮子石灯被视为是出自同一雕塑家之手。

金属工艺品有益山弥勒寺遗址金铜兽脚香炉，清州云泉洞梵钟。香炉呈半圆形。高耸的盖子，扁平的水盆状炉体，有四个脚。具有特点的怪兽型香炉脚，是单独制作后用钉子固定成一体。大唐庆山寺遗址出土过与此类似的香炉，因此有可能是从大唐传来的引进品，也有可能是新罗根据大唐香炉制作而成。云泉洞梵钟最上面有着韩国钟典型的龙钮，音筒。下面是刻有天人像的莲廓带，裙带飘逸，演奏琵琶，竹笛的飞天像。

具代表性的幢竿支柱有公州甲寺铁幢竿，石支柱，大通寺遗址班竹洞及弥勒寺的幢竿支柱。现在的甲寺铁幢竿为24个铁桶连接状，据说最初时是28个，到了高宗30年（1893）因遭雷击缺了4个。铁幢竿，石支柱保留的几乎完整，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 佛教美术博物馆,庆州南山

庆州南山，佛国寺，石窟庵是代表庆州的佛教遗址。南山每个山谷间都建有寺院，遍布佛像，佛塔。以两个山峰为中心，形成了30多个溪谷，山脊，大体上分为东南山，西南山。东南山坡度倾斜大，西南山则山势缓慢，且蜿蜒绵长，大部分佛教遗址都聚集在这里。庆州南山佛教遗址始于7世纪前后，到



图79 庆州南山

了9~10世纪,沿着山脊,山谷地形遍布各地。目前确认的佛教遗址有140多个,分布着100多个佛教雕塑,数十座佛塔。2000年庆州南山被列为世界遗产“庆州历史遗址地区”之一,正是因为这里保留着新罗千年的历史气息,是珍贵的历史宝库。

#### 东南山的佛教遗址

东南山代表作品是以华丽雕刻技术闻名的塔谷磨崖四面佛。在高约9m的巨石四面,雕刻了共20多起佛教尊像。岩石的不同面,和谐地雕刻着佛像,菩萨像,天人像,供养像,9层木塔,7层木塔,母狮像,雄狮像等各种佛教尊像。经修复的三层石塔的岩石西侧和平地上,残留着木结构建筑物痕迹,可见当时这里应该是座寺院。

东南山弥勒沟有一座高2.44m的佛坐像。据传这座佛像为菩提寺石佛坐像。寺院的名称出现在《三国史记》,《东京杂记》中,至于是否为现今的菩提寺却无法确定。这座佛像不仅完整地保存着佛身,光背,台座,面部也完好无损。手势为右手低垂至膝盖下方的降魔触地印。光背饰以华丽的花纹,火焰



图80 塔谷磨崖四面佛



图81 弥勒谷佛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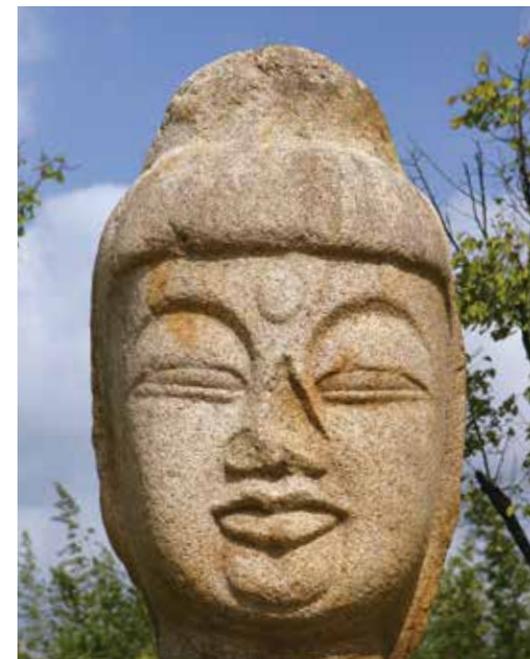


图82 铁瓦谷大佛头



图83 七佛庵四面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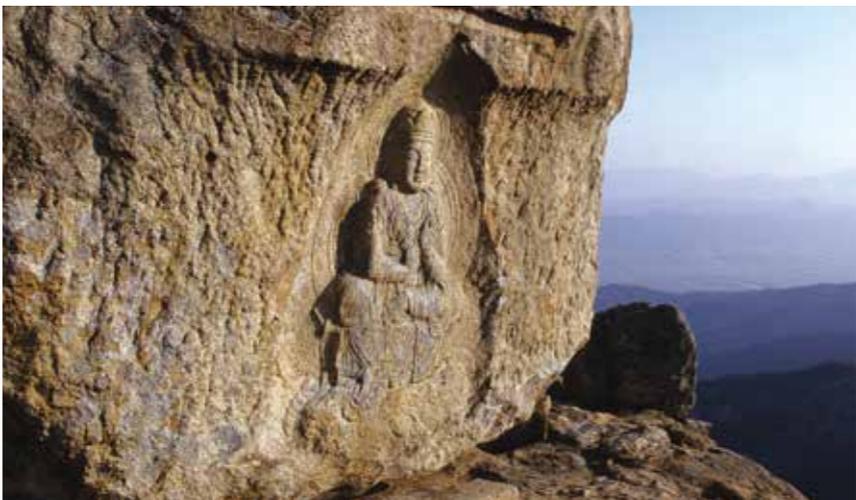


图84 神仙庵磨崖菩萨像

纹，化佛状。背面是浅浅的浮雕，雕刻着手捧药罐的药师佛坐像。作品形象状态良好，脸部，台座等都充分体现了雕塑家的精湛手艺。

1959年SARAH台风时在南山铁瓦谷入口发现的佛头高达150cm以上，头型巨大。头部没有雕刻头发，头为素发，肉髻高宽。长眼眉，厚嘴唇，嘴唇下面一道半圆形深刻纹很是特别。但耳朵部位表现得并不明显，所以也被认为是未完

成的作品。

烽火谷七佛庵四面佛不仅是东南山的代表性作品，还是整个东南山的代表作。中央本尊高达2.66m，在朝向东边的巨大岩石岩壁上刻上了摩崖三尊像，并在前面一根巨大石柱的西面上，分别刻上了一个佛像。磨崖三尊佛本尊像坐在莲花台座上。左右协侍菩萨像面向本尊而立。本尊佛像手势为新罗统一期大为流行的降魔触地印。这座四面佛是新罗石塔四方佛样式的雏形，对新罗佛教雕刻史意义重大。

七佛庵再往上走，则是神仙庵摩崖菩萨像。东南朝向的岩石上有着浅浅雕刻的神龛，里面是高浮雕菩萨像。这座菩萨像设计成“游戏坐”姿态，菩萨搭坐在云朵上面的台座上，左脚放得随意而自然。在山顶的岩石上，可以将庆州尽收眼底。山顶岩壁上刻着驾云而坐的菩萨坐像，犹如菩萨下凡人间，给人一种神秘感。

#### 西南山的佛教遗址

西南山保留下来的佛教雕塑和塔明显要多于东南山。南山西山脚的寺遗址，立有昌林寺三层石塔。这座石塔内部发现了陀罗尼经写经文以及写有“无垢净塔”的铜板塔志。这说明了这座塔曾用名为无垢净塔，而且也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流行的无垢净塔形成以及信仰情况。创建期为文圣王17年(855)。塔志字体根据王羲之字体雕刻而成。

润乙谷“ㄣ”字形天然岩壁上刻着3个佛像。朝南的“一”字形岩壁上雕刻着两个佛像。朝西的“1”字形岩壁上刻着一个佛像。中央佛像左肩附近刻有“太和乙卯九年”铭文，建造年代估计为835年。但三座塔在雕刻技法上各有不同，因此无法判定是否确为



图85 庆州昌林寺遗址三层石塔



图86 昌林寺三层石塔无垢净塔愿记

同期建造。

三陵谷沿着山谷地势修建着许多佛像。沿着山谷上行，有一座已丢失佛头的佛坐像，这座雕像的特点在于左肩和胸下方有一个精致的飘带结。再往上走，是一座犹如一幅画的三陵谷线刻三尊佛立像。宽广的天然岩壁上，以线刻方式雕刻着6个佛像和菩萨像。向左边望去，是佛立像和供养菩萨像；右侧则是佛坐像，协侍菩萨立像。在新罗，8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线刻磨崖佛。最具代表的是三陵谷线刻六尊佛以及庆南咸安防御山磨崖佛(801)。

三陵谷石佛坐像最大的特点是肩膀，前胸，下半身挺拔矫健。台座由上台，中台，下台组成的三段八角莲花台座。中台石每个面都雕刻着床足纹络。药师佛坐像同样位于三陵谷顶附近，后迁移到国立中央博物馆。佛像具备着佛身，光背，台座等部位基本上整体完好，毫无损坏。药师佛坐像将手放在腹前手掌朝上捧着宝珠，八角台座中台石的香炉，供养天人像雕塑与众不同，是南山的代表作。



图87 润乙谷磨崖佛像



图88 三陵谷佛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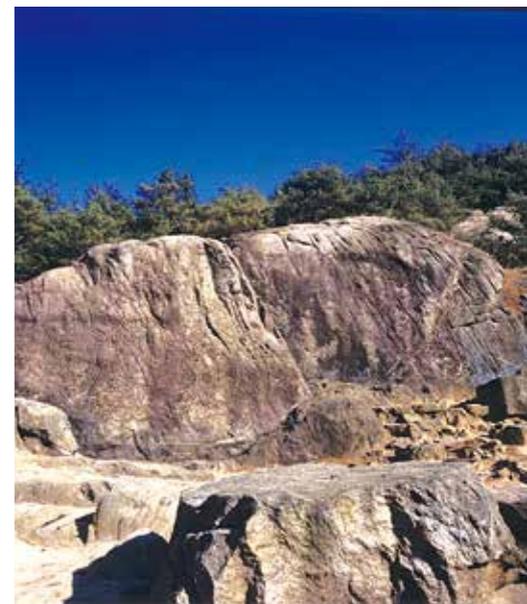


图89 线刻三六尊佛像



图90 三陵谷石佛坐像



图91 三陵谷药师佛坐像

三陵谷山顶上禅庵有个巨大的岩石，岩壁上刻着摩崖佛坐像。佛像脸部用高浮雕方式雕刻，身躯用线刻方式雕刻。这些特点常见于统一新罗后期的大型摩崖佛像。与此类似的大型佛像，是高达8m多的药水谷摩崖大佛。它是庆州南山最大的佛像，遗憾的是头部已丢失。

三陵谷和茸长谷都是代表西南山的山谷。这里有茸长谷石造如来坐像，摩崖如来坐像。因台座是圆盘状特殊造型而闻名。虽然佛头不见，但是左肩上留有袈裟打结的痕迹，比较有特点。这座石造佛坐像北侧的岩壁上，朝南方向刻着一座摩崖佛坐像。

列岩谷佛坐像的佛头原已丢失，仅剩身躯，令人庆幸的是2005年发现了佛



图92 三陵谷摩崖佛坐像



图93 药水谷摩崖大佛



图94 茸长谷石造如来坐像



图95 列岩谷石佛坐像

头，因此2007年经过修复重现原貌。佛像身躯矫健，光背和台座雕刻精致。据估测，这个台座应该是三段八角莲花台座。留有仰莲的上台石，覆莲的下台石，八角中台石原本丢失，到了近期才重新修复。

位于列岩谷石佛坐像30m距离的摩崖佛立像拥有4等身身材比例。头部，上半身为高浮雕工艺，下半身为低浮雕工艺。脚下是浅雕5朵花瓣的仰莲台座。是什么原因导致坍塌无从知晓，但耳目口鼻丝毫没有受损，因此被称为“5cm的奇迹”。

庆州南山岩壁上雕刻的大小崖佛以及用巨大的石材雕琢而成的石塔，石佛像，都充分地体现了新罗繁盛的佛教文化。新罗当时四月初八等节日时也像现在这样以寺院燃灯方式过节，那么从庆州城看到的整个南山，应该是一片华丽的佛国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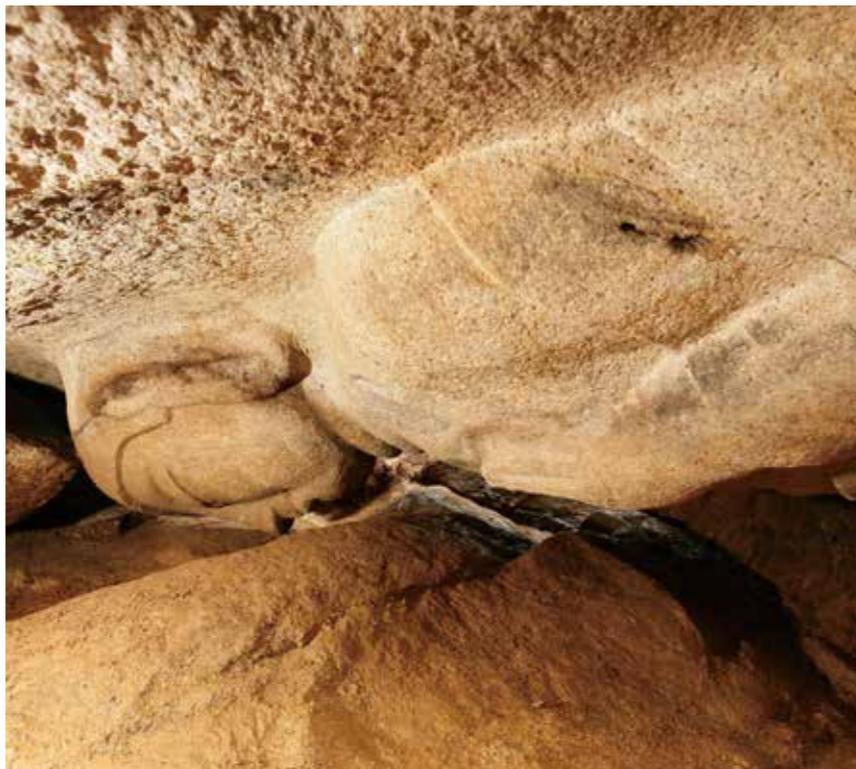


图96 列岩谷摩崖佛立像

## 佛国寺与石窟庵世界

佛国寺由景德王10年(751)宰相金大城所建。《三国遗事》孝善章节中详细介绍了佛国寺，石窟庵的创建情况。据记载，金大城为了缅怀另一个世界的父母，创建了佛国寺；为了父母转世，创建了石佛寺(今石窟庵)，并请神琳大师，表训大师在此居住。该记录表明，佛国寺，石窟庵最重要的创建动机是“孝善”，即对父母的孝和对菩萨的善。

### 佛国寺

佛国寺结构大体上分为石墙上面的菩萨世界以及下面的人间世界。连接这两个世界的，便是青云桥，白云桥，莲花桥，七宝桥。从正面看时，这些桥呈阶梯状。侧面看则是犹如攀登菩萨世界的通天梯。青云桥，白云桥通往紫霞门。



图97 佛国寺莲花桥, 七宝桥



图98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莲花桥，七宝桥则与通往极乐殿的安养门相连。

走进菩萨世界，又可以分成3个领域。紫霞门以内的大雄殿领域象征着释迦牟尼佛教化的娑婆世界。安养门以内的极乐殿领域则象征着阿弥陀佛所在的极乐世界。后面的毗卢殿区域则象征着毗卢遮那佛所在的莲华藏世界。佛国寺是不是从创建初期就划分为这三个领域，对此不是很确切。但是从流传下来的金铜毗卢遮那佛像，金铜阿弥陀佛像来看，莲华藏世界和极乐世界是从最初开始就已经有了各自独立的空间功能。

现在的大雄殿领域有个双塔，分别为释迦塔，多宝塔。其中西侧的释迦塔在1966年对建筑进行拆解，修缮工作时，从2层塔身舍利孔发现了舍利器等各种文物。舍利孔中央放着金铜制舍利外盒，里面叠放着银制盒和碗。银制碗内放着装有舍利子的绿色玻璃瓶。周围是金铜制成的舍利盒以及《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等文物。舍利外盒塔座底部有墨书纸片，多达110张。借助现代保存处理结果，证实了这些分别为《宝篋印陀罗尼经》残片，《佛国寺无垢净光塔重修记》(1024年)，《佛国寺西石塔重修形止记》(1038年)等4件古文集。

通过这部文书，可以了解到释迦塔在高丽时期因庆州地区发生的地震，先后于显宗15年(1024)，正宗4年(1038)经历了两次拆解，修缮工程;还可以了解到释迦塔，多宝塔的曾用名称应为佛国寺西石塔，无垢净光塔。出土文物中最



图99 佛国寺释迦塔



图100 佛国寺多宝塔



图101 佛国寺三层石塔舍利庄严具

受世人瞩目的是《无垢净经》，它是世界现存木版印刷本中最出色的一部。统一新罗时期曾流行一种信仰，人们相信把这本经书放到塔里念咒语时，即便是“罪恶累累将打入地狱之人，也会得到赎罪和长寿，即便死了也能在极乐世界得到重生，享福，最终成佛”。

佛国寺西石塔(即释迦塔)将感恩寺遗址，高仙寺遗址三层石塔样式改变成了结构简洁，规模合理，比例和谐的建筑风格，为今后的石塔发展提供了方向，是8世纪杰出作品。现在的相轮部是模仿第37号宝物实相寺三层石塔修复

而成的。和这座三层石塔并排而立的无垢净光塔(即多宝塔),也是代表韩国历史的新罗石塔。凭借精湛的治石工艺,自由垒砌石材,造型精致而完美。1925年日本人在全拆,维护石塔的过程中,将放置在塔座上面的4个石狮中的3个遗失掉,至今下落不明。

壬辰倭乱时期,佛国寺是当时义兵们的据点。1593年遭遇严重火灾。随着战争结束,1612年进行大规模恢复。当时佛国寺除了莲花桥,七宝桥,青云桥,白云桥,双塔,佛像等极少数的文物,其他全部流失。当时从火灾中幸存下来的具有纪念碑性质的金铜佛像,一个是毗卢殿的毗卢遮那佛坐像,另一个是极乐殿的阿弥陀佛坐像。是列为新罗3大金铜佛之列的经典之作。金铜毗卢遮那佛像象征着真理,以写实手法展现了面部威严中透着慈悲,衣服褶皱自然垂落等细节。手势为左手握着右手食指边缘。这与常见的毗卢遮那佛手势刚好相反。金铜阿弥陀佛像和毗卢遮那佛像犹如一对双胞胎,极为相似。金铜阿弥陀佛像高为1.66m。面部圆润,慈祥,面朝正方。半圆形眉毛,鼻梁高挺。整个造型干练,富有写实特色,是统一期新罗佛像的代表作。



图102 佛国寺金铜毗卢遮那佛坐像



图103 佛国寺金铜阿弥陀佛坐像

## 石窟庵

根据《三国遗事》记载,石窟庵也叫石佛寺。刚开始这座寺院独立于佛国寺单独而建,如今已所属于佛国寺。石窟庵雕塑位于吐含山东侧山腰的海拔565m处。它是统一期新罗雕塑的代表作,也是韩国最优秀的佛教作品,可以说是世界级宝物。这件雕像作品设计独特,手艺精湛,精致而富有美感,完美体现了佛教思想和神观。它不仅是新罗美术的代表之作,也是代表韩国古代文化和韩国美术史的象征。

建造于8世纪中~后期的石窟庵,无论是其缜密的结构还是达38个的雕塑数量,都是前所未有创新。韩半岛花岗岩石质过于坚硬,几乎无法演绎出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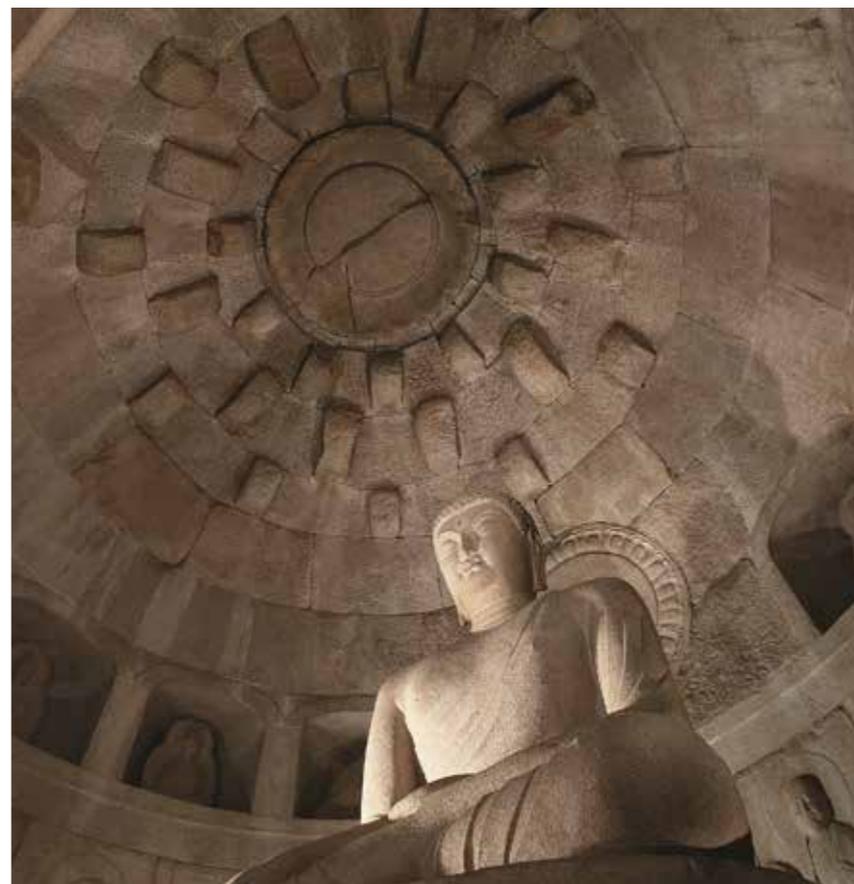


图104 庆州石窟庵本尊佛与穹顶顶棚近景



图105 石窟庵八部众—左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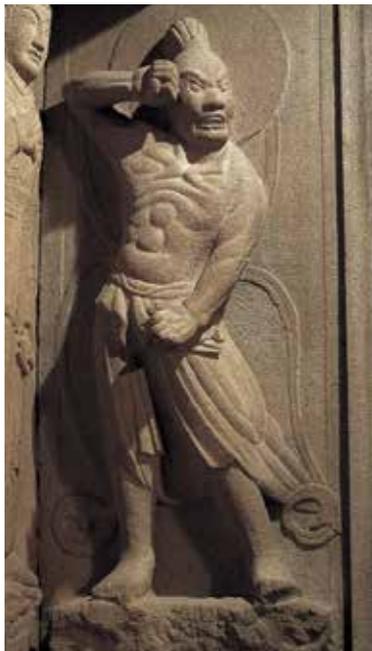


图106 金刚力士



图107 四天王像—北, 东



图108 梵天



图109 帝释天

度, 中国石窟的庄严性。应该是某个曾经领略过印度, 中国石窟寺院的人提出了“重现石窟”的建议。于是, 新罗人选择了比挖掘石窟难上难的人工石窟方式。这项工程从751年开始, 工期超过20年, 足以说明工程的艰难。其特别之处不仅仅在于它是人工石窟, 圆形平面上是半球形(dome)型天棚, 这种结构在东亚非常罕见。主室中央放着本尊像, 人们围着本尊像前行和礼拜。为了确保足够的礼拜空间, 主室设计成了圆形。

这种独创性并非仅仅体现在结构方面。石窟庵内部分别按照佛, 菩萨, 佛弟子, 神众等身份等级摆放着40多个尊像。石窟庵雕塑在造型风格上很像中国盛唐时期佛教雕塑的风格, 但其工艺更加缜密, 系统, 细致, 这要比中国当时的工艺出色和卓越。

砖室左右墙壁上作为装饰的8个浮雕, 佛教称为八部众, 上面刻着天, 龙, 夜叉, 阿修罗, 乾闥婆, 迦楼罗, 紧那罗, 摩呼罗迦立像。佛教神观中, 他们是地位低的神, 主要功能是守护佛法。他们在石塔上主要被刻在塔座部位。石窟庵上



图 110 十人僧人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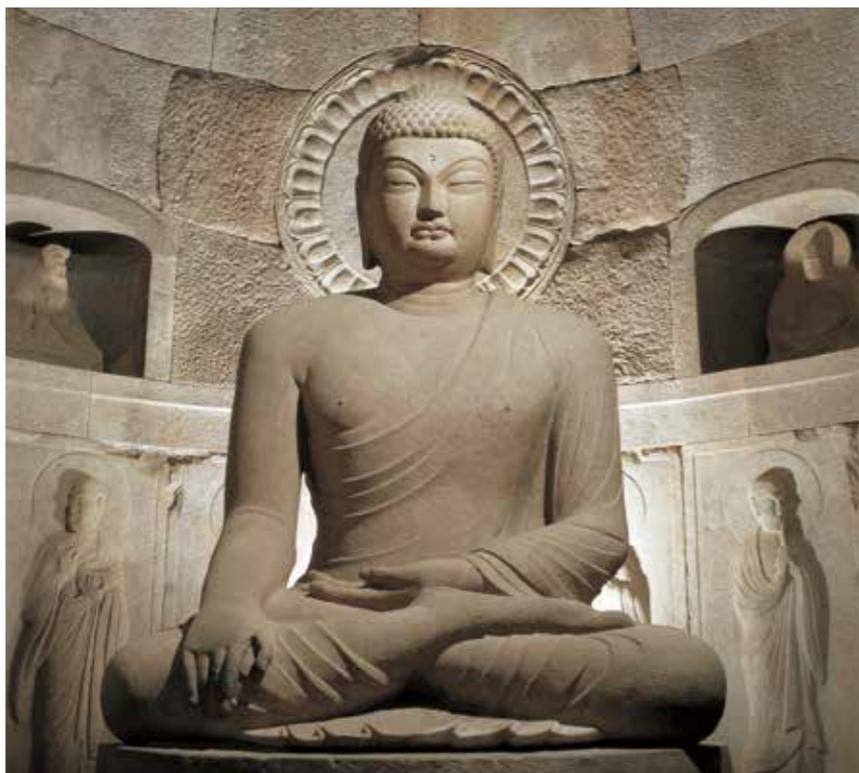


图 111 本尊佛



图 112 十一面观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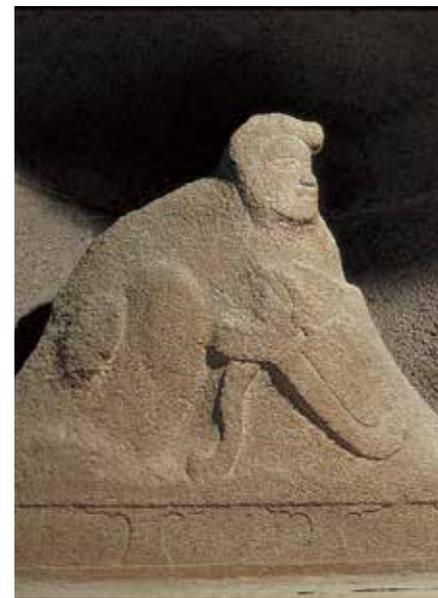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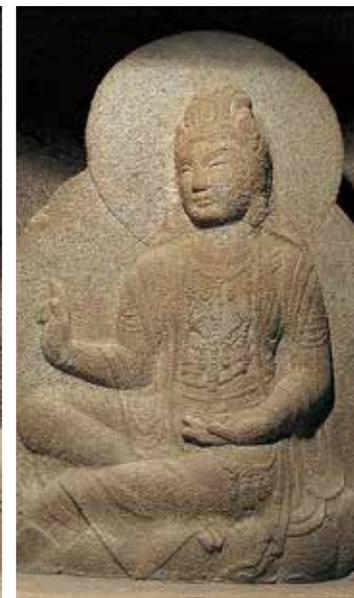


图 113 维摩居士·文殊菩萨



也是按照等级被刻在最外围，起到保护礼拜空间的作用。

砖室通往圆形空间的通道入口两边，是金刚力士立像。金刚力士是从犍陀罗由来的佛陀守护者。本应是手持金刚杵，后传入中国后，其形象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头戴高帽，甚至手里并没有金刚杵。石窟庵金刚力士是一对组合，一个是张嘴的阿形，一个是闭嘴的吽形。人体姿态简洁干练，表情丰富，富有活力。

砖室和圆形主室之间的通道两边墙壁上，分别刻着2个四天王像。根据佛教世界观，四天王是守卫须弥山山腰的天神，其形象源于印度，经过中亚，中国，变成了身披铠甲的武将形象。其中北方多闻天手捧宝塔，其余都手拿着刀剑。

圆形主室入口左右两边分别是梵天，帝释天。梵天是天神，生活在欲界之上的色界天国。左手捧着净瓶，寓意清苦修行。帝释天天神位于欲界下面排行第二的天国，须弥山山顶天宫。左手拿着寓意霹雳闪电的金刚杵。梵天，帝释天旁边分别站着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文殊，普贤在大乘佛教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分别象征着智慧，实践。分别拿着经书，圆盖。至于哪个菩萨是文殊菩萨，哪个是普贤菩萨，众说纷纭。站在莲花上，朝着本尊像略为转身，身上的衣裳自然垂落，体现出一种美感。

梵天，帝释天内侧左右分别刻着各5名(共10人)僧人立像。其中多数为异国特色的面孔，身着印度服饰，手捧类似于带手柄的香炉和钵盂的容器。根据这个作品中有10个人物，被认为是表现了释迦牟尼10大弟子。但也有观点认为，这个类似于中国龙门石窟的祖先像排列方式。

石窟庵本尊像位于圆形主室中央靠后位置。佛像所坐的台座高达160cm，上面的佛坐像则高达340cm，全高达5m。统一新罗时期流行的仰莲座，覆莲座，由八角杆石连接到台座上。佛像盘腿坐在台座上，右手触地，触地印姿态。造型精致，比例完美，很难想象花岗岩竟然也能达到这种技术高度。不同于普通佛像，头光并没有附着在头部，而是附着在了后墙体上。关于这座佛像的尊名，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释迦牟尼佛，有的认为阿弥陀佛，也有人认为是毗卢遮那佛。笔者认为这部作品的高明之处在于超越了“先入为主”式的方法，避免了先给作品定义后再去引导人们去辨别的传统方式，而是超越了这种定义框架，将无尽的世界和具体的存在实体，用视觉方式展现了出来，其实是一个象征。将身体的细节部位雕琢得淋漓尽致，又恰到好处。将想象世界的佛陀雕刻得缜密，精致。

本尊像后身圆形主室最里面是十一面观音菩萨像。石窟庵十一面观音负责体察众生生活万象，根据具体情形施以救济，是佛陀的化身。圆形主室周围的墙壁上设置了10个神龛，里面分别放入了坐像。但实际上有两个是空着的。以头光为中心，左右神龛上分别是维摩居士和文殊菩萨相视而立。其余的空间则雕刻着观音菩萨，金刚手菩萨，地藏菩萨等。

石窟庵的中央本尊佛和周围眷属融为一体，透着无以言表的庄严和肃穆。使人忘却一切烦恼，获得宗教震撼力量。因此，石窟庵可以说是东亚最杰出的作品。

### 禅宗的扩散与佛教美术的变化

到了新罗末期，中央真骨贵族之间的王位争夺战越演越烈。此时六头品身份开始成为新的知识分子力量，地方的富豪也逐渐形成独立势力。佛教也开



图114 清道云门寺西石塔



图115 河东双谿寺真鉴禅师塔碑

始反省过去的“凡是以《华严经》为中心，以理论为中心的佛教传授方式”。禅宗成为新的佛教实践派，形成一种新流行。禅宗相比教学佛教，具有个人性，民众性，进步性质。它的重点不在于文字或者经书，而是通过参禅，领悟人心内在的初衷。禅宗和地方富豪联手，得到了他们的经济支援，所以寺院大多建立在离王京遥远的地方。

禅宗注重师徒关系，所以在当时徒弟建造僧塔，塔碑来纪念师傅非常流行。相比礼佛，禅宗更注重参禅，对于佛像的建造不是很重视。但因为教理相通，建造了华严毗卢遮那佛像。现存的毗卢遮那佛像，仅剩宝林寺一尊了。

岭南代表性禅宗寺刹包括：清道云门寺，河东双谿寺，闻庆凤岩寺，昌原凤林寺。这里建有塔，僧塔，碑等。大部分保存完好，对于研究塔以及金石文，提供了重要资料。云门寺大雄宝殿前面的东，西双塔是云门寺代表文物。塔座为



图 116 闻庆凤岩寺智证大师塔碑



图 117 昌原凤林寺真镜大师塔碑



图 118 襄阳陈田寺遗址道义禅师塔



图 119 原州兴法寺遗址廉巨和尚塔

上下两段，塔身3层。上层塔座刻有鲜明的八部人像，但其中一部分是日帝强占期补充的。屋盖石底面的5段底座，呈平整的直线效果，给人以简练的感觉。这个作品和庆州昌林寺遗址三层石塔一样，在统一新罗三层石塔原有的典型技巧上，增加了浮雕像元素。



图 120 襄阳弘觉禅师塔碑



图 121 襄阳禅林院址破钟

庆尚南道河东郡花开面双谿寺立着真鉴禅师慧昭(774~850)之碑。真鉴禅师远赴大唐游学回国后，深受当时君王的敬重。他引进和普及了佛教音乐梵呗。真鉴禅师入寂后，宪康王为寺院赐名“双谿”，并令崔致远撰写碑文。这是崔致远“四山碑铭”之一。

闻庆凤岩寺是曦阳山门的中心寺刹，由智证大师道宪(824~882)更名。智证大师道宪僧塔正是当时普遍流行的八角圆堂形。前面并列着塔碑，介绍了他的一生业绩。他的塔碑撰写于真圣女王7年(893)左右，建于景哀王元年(924)。这座塔碑和真鉴禅师碑，因崔志远的撰写而闻名。

昌原凤林寺是凤林山门的中心寺刹，由真镜大师审希(855~923)开创。如今他的僧塔，塔碑都转移到了国立中央博物馆。碑石建于景明王8年(924)，由大王亲自撰写碑文。僧塔为典型的八角圆堂形，应该是和碑石建于同一时期。

京畿，江原地区的禅宗寺刹中，留下令人瞩目的美术佳作的寺刹分别是原州兴法寺，襄阳陈田寺和禅林院，江陵崛山寺，骊州高达寺。隐居在襄阳陈田寺的道义国师，是第一个将禅宗传到新罗晚期的僧侣。784年(善德王5)在大唐传承禅宗，821年回国。由于当时整个社会只重视教宗，所以他的禅宗观念未被采纳，不得不开王京，到襄阳陈田寺隐居，40年来潜心修行后入寂。他给廉

巨和尚(?~844)传授法道, 陈田寺有关于俩人的僧塔。道义禅师的僧塔为平面四角形石塔塔座上放置的八角形小塔身。它是韩国石造僧塔的起源, 创建时间约为9世纪后期。这座僧塔体现了新罗僧塔趋于八角堂形的过渡期特点。

第一个八角堂形僧塔是据传位于兴法寺的廉巨和尚塔。廉巨和尚居住在雪岳山亿圣寺——禅林院, 为普及禅而努力, 844年入寂。随着在僧塔内发现廉巨和尚的金铜塔志, 其创建年份也变得有据可证。僧塔平面为八角形。塔座按照下台石, 中台石, 上台石依次叠合。下台石雕饰着狮子, 中台石雕饰着香



图 122 江陵掘山寺幢竿支柱



图 123 南原实相寺东, 西石塔



图 124 南原百丈庵三层石塔

炉, 花纹, 上台石用莲花叶纹做了雕饰。塔身上刻着四天王像和纹。屋檐下方刻着椽子, 屋顶则留出瓦垄, 使其具备了瓦片屋顶的样子。在此基础上, 有些僧塔稍微做了改变。比如高达寺遗址僧塔(今元宗大师慧真塔), 禅林院址僧塔, 江陵掘山寺遗址僧塔等。

位于江原道襄阳郡的禅林院址留有弘觉禅师僧塔, 弘觉禅师塔碑, 三层石塔, 石灯等文物。886年(定康王1)建造了禅林院弘觉禅师(814~880)塔碑。碑身已碎裂, 仅剩碎石片瓦。

禅林院钟曾转移到附近的五台山月精寺保管。韩国战争时寺院发生火灾, 钟也遭到破损。钟体两侧以吏读记载着“804年由忠清北道沃川的地方富豪出资, 邀请庆州灵妙寺僧侣前来指导制作”的



图 125 实相寺铁佛坐像



图 126 南原实相寺证觉大师塔



图 127 保宁圣住寺遗址郎慧和尚塔碑



图 128 长兴宝林寺双塔

内容, 是珍贵的历史资料。这座钟相比8世纪统一新罗梵钟明显小了很多。这也是区别于过去的这一时期新的变化。

江陵掘山寺作为闍崛山门的核心寺院, 847年(文圣王9)由梵日创建。掘山寺有梵日国师(泛日国师?~889)僧塔。还有韩国最古老, 最大的幢竿支柱。该幢竿支柱两根长5.4m的的柱子相距1m距离而立。未经雕琢的巨大天然石, 展现了雄壮的雕塑美。

湖南, 湖西的禅宗寺刹包括实相寺, 圣住寺, 月光寺, 泰安寺, 宝林寺, 双峰寺。新罗末期湖西, 湖南地带出现了不少禅宗山门, 其中最先开创的是以南原实相寺为中心的实相山门, 由证觉大师创办。

实相寺除了东, 西三层石塔, 还有百丈庵三层石塔, 铁佛等重要文物。石塔实际为今日普光殿前东西两侧的双塔。石塔和石灯是实相寺的重要文物。这座塔完好的保留了相轮部, 有宝贵的研究价值。百丈庵三层石塔由单层塔座, 三层塔身, 相轮部组成, 这一点和其他石塔相似。相比低浅的单层基坛, 1层塔身高出许多, 而且2层, 3层的宽度和高度, 并没有因为层数递增而减少, 结构比



图 129 宝林寺铁造毗卢遮那佛像

较特别。塔身上除了雕刻菩萨，神将，天人像，还雕刻了栏杆。就连屋盖石下面都刻上了莲花，三尊像。

今天的实相寺药师殿有一座高约270cm的铁佛坐像，是分割铸造法做成的大型佛像。它是统一新罗后期地方所属的禅宗寺院大规模创建铁质佛像的个例，充分体现了9世纪佛像风格。

证觉大师洪陟是禅宗第一山门——实相山派创建人。证觉大师的僧塔建于9世纪中期，是典型的八角圆堂形。塔碑的主体部分已丢失，仅剩龟趺和螭首。螭首前方中央刻着碑铭“凝蓼塔碑”。

保宁圣住寺遗址立有朗慧和尚无染的塔碑和另四座塔。碑文上记录了身为真骨贵族的朗慧和尚一家到了父亲一辈时降为6头品。这对于研究骨品将提供重要资料。据推测，此碑文由崔志远撰写，他的堂兄弟崔仁浣提笔。而真正立碑应该是在这之后。

迦智山门长兴宝林寺立有双塔，智拳印姿态的铁造毗卢遮那佛像，石灯。双塔均为2段塔座，3层塔身结合式，带有新罗石塔的典型特点。相轮部保存完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在塔内发现了塔志。根据北塔志记载，该塔建成时期为景文王10年(870)5月。据说是景文王为祈福先王宪安王的来生而建。9世纪时在王室带领下盛行创建愿堂，愿刹，这座塔应该也是其中一例。大寂光殿铁佛坐像为毗卢遮那佛，右手握着左手食指状。据左臂后侧的铭文所示，该佛像在新罗宪安王2年(858)由武州，长沙(今光州，长兴)的副官金遂宗发愿和建造。

迦智山门创建人普照禅师体澄从唐回国之后，在宪安王3年(859)按照王的要求，成为宝林寺住持。入寂时享年77岁。王赐予他“普照禅师”谥号，并赐予“彰圣”塔名。碑石建于884年(宪康王10)，舍利塔是当时流行的典型的八角圆堂形样式。

和顺双峰寺的澈鉴禅师道允(?~868)赴唐游学回国后，在和顺建造双峰寺后在此生活，入寂时享年71岁。澈鉴禅师的僧塔是新罗晚期最完整的僧塔。此塔呈典型的八角圆堂形，创建期应该是禅师入寂的868年(景文王8)左右。塔碑没有碑身，仅剩龟趺和螭首，定础石前方中央刻有“双峰山故澈鉴禅师碑铭”的碑文。



图130 长兴宝林寺普照禅师僧塔，塔碑(右)



图131 和顺双峰寺澈鉴禅师僧塔，塔碑(右)

## 儒学与文学

### 儒学

儒学以“仁”为最高品德，并追求“仁”的实践。儒学思想在韩国前近代时期发挥着长期主导思想的作用。因此，可认说了解儒学是正确理解当时社会的最为核心的部分之一。

儒学源于中国春秋时代，那么经过发展和成熟的儒学通过什么渠道，又是在何时传播到这里，并被接纳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没有具体的历史记载。有人认为儒学应该是随着汉字一起传进来的，时间大概是古朝鲜或三国时期。但这种说法也只是猜测，并没有具体的依据。即便是儒学带有强烈的政治社会性质，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倘若不是儒学本身成熟到足以让社会接纳它，那么也不可能被主体受众群所接纳。因此应该是到了三国时期多少具备了古代国家的资格时，接纳儒学的时机才算是成熟了。

新罗在三国当中，各个方面都落后许多。有观点认为，接纳儒学的政治社会条件是从4世纪后半期开始成熟的，只是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直到6世纪，才有了关于儒学正式被接纳的具体依据。新罗历史上，关于儒学正式

被接纳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确切的时间应该就是这个时候。

6世纪时刚摆脱了具有强烈共同体性质的部体制秩序，开始迈进中央集权性质的贵族国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接纳儒学的条件已趋于成熟。儒学被认可和接纳后，逐渐扩散，并深入人心。刚开始人们对于儒学的理解水平极其肤浅和片面。当对于儒学的内在需求越来越强烈时，人们的理解也迅速提高，更为丰富。法兴王7年(520)颁布律令，15年(528)佛教得到公认，这些都是儒学能得以发展的重要契机。

律令看似目的在于实现佛家思想，但其实是为了实现儒学的“仁”而颁布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帝王滥用权力，防止贵族官僚肆意掠夺平民百姓。当时以国王为利益顶点，正在形成中央集权制国家。从这点来看，法兴王首次颁布成文法律令，必然带有政治意识和目的。524年制成的“蔚珍凤坪碑”的核心内容与《奴人法》律令相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末尾有一句借用《论语》的“获罪于天”，刚好说明了这一点。

佛教被公认，更为具体地说明了儒学被认可的事实。想要解读晦涩难懂的佛经，必须先理解汉文。学习汉文，必然会理解汉文里内涵的儒学思想。所以说，新罗儒学具备了能够在佛教边缘发展的条件。535年制成的《蔚州川前里书石》乙卯铭也证实了这一点。上面有安及僧侣带领沙弥僧和居智伐村众士访问现场的记录。众士即安及的门徒，是对于师从安及学习文字与学问的学生的统称。这表明僧侣主导着当时的新思想——儒学。

真兴王编写的新罗第一本史书《国史》中，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当时在辅佐年幼的真兴王打理政务的异斯夫建议之下，新罗编撰了《国史》。而实际推进这件事的是异斯夫推荐的居柒夫。居柒夫幼年时期曾有过出家的经历，所以完全具备着编撰史书的能力。居柒夫为了编撰史书，召集了天下众多的文人才子，这时曾经的僧侣经历给他的这个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编撰《国史》是为了通过记录君臣的善恶，告诉后代褒与贬。这里蕴含着极为强烈的儒学意识，能够承担这项工作的文人已有一定人数，大多是僧侣的学生。随后为了迎合时代的要求，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对花郎徒实行了系统化教育，其中把僧侣安排到教师队伍当中。

在佛教被公认之后，儒学在其庇护下快速扩大和发展。真兴王29年(568)编写的“黄草岭碑”和“磨云岭碑”证实了这一点。两座碑的建成时间虽有2个月时差，但其内容却完全相同。真兴王在巡防地方时，率领着众多臣僚和2名僧人。这些僧人被放到最前面加以叙述，值得特别关注。碑文前半部内容大多是摘自《书经》的内容，标榜着王道政治理想。根据儒教经书内容，在真兴王身边辅佐其王道政治的，正是僧侣。在当时，佛教和儒学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共存关系。

随着佛教的发展，儒学也逐渐走向发展成熟。和转轮圣王意识，释迦族信仰一样，佛教作为主导思想的比重日益加大时，儒学占据的作用也自然随其变大。官僚组织的整顿，必然和儒学有着直接关联。一些贵族官僚在取名时喜欢用和儒学相关的名字，表明了这一点。比如真平王时期历任兵部令的金后稷，是典型的儒学式名字。人如其名，金后稷对于真平王的失误，常常是借着《书经》的典故直言不讳。直到临死前，他也是一直劝导着真平王知错改错。这表明儒学已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成就三国统一伟业的金春秋与金庾信，都是带有儒学意义的名字。他们追崇儒学，刚好也说明了儒学逐渐变为大气候的趋势。

强首的例子很好地反映了这种事实和历史氛围。强首是任那加罗(即大伽倻)出身，其祖先因为向新罗投降，直接被徙民到中原地区。强首长大开始读书时，父亲问他佛教和儒学二者间选择哪条路？他选择的是现实实用的儒学，而不是研究俗世之外世界的佛教。到了7世纪上半期，儒教已经发展到能够和佛教平起平坐的地位。

高僧圆光的经历也说明了这一点。圆光在出家之前，已经对道学，儒学有着深入的了解。589年，25岁的圆光到南朝陈国留学，出家。圆光是先学习儒学思想后，才最终成为僧侣的。这也表明从小他就有了接触儒学思想的机会。600年其归国时，深受真平王的欢迎和款待。在他回国后有两个分别叫贵山和箒项的青年向他求教能受用一辈子的金言。于是圆光提出世俗五戒，这里蕴含着儒学的意识，也包括佛教“杀生有择”的信条，但主要强调的还是以忠孝，信义为主的儒教品德。世俗五戒，不仅是少数几个人处事做人的原则，也成为整个新

罗人遵守的品德规范。在当时，随着社会的分化，时代要求底层民众要普遍具备忠孝，义节，而儒学的思想体系刚好符合这种需求。6~7世纪，社会秩序逐渐从底层整个开始改变，急切需要一种思想引导，而儒学刚好蕴含这种思想，因此其发展迅速。

612年的《壬申誓记石》中写道，两个年轻人自发熟读《诗经》，《书经》，《礼记》，《春秋》等书，这表明在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广泛阅读儒教经书。儒学思想已普遍发展，为社会规范提供了一种思想理念。这时国家设置“礼部”来掌管国家仪礼，教育，也说明了这一点。

儒学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固守现有传统思想的势力发生矛盾。647年的毗昙之乱，其实是固守佛教为中心的支配体制的势力与主张儒学的势力之间的政治对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最终儒学派胜利，决定了新罗未来的发展方向。主导这项事务的金春秋认为，想要开辟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才。于是开始重视国学传播与稳定，以代替现有的人才培养机构——花郎道组织。此时，主导思想不再是佛教，而是儒学。所以儒学实践者，成为了新时期的官僚成员。

## 文学

现在的韩语具体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已无法考证。但是在文字正式出现之前，已经有了口头形式的故事文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口碑文学逐渐消失。一些流传下来的故事，经过相当漫长的历史之后才得以以文字形式记载和保存。新罗文学也是这样流传到后世的。这个时期的文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历史上第一个定型诗——乡歌文学，后人接纳和成型的说话文学以及汉文学。

### 最初的定型诗——乡歌文学

乡歌指创作于公元6世纪~10世纪的新罗，高丽初期的诗歌作品。新罗3代琉璃王(公元1世纪)曾创作兜率歌，如今歌词已不详。这首歌被记录为“宫中乐

的开始”。由此可见，乡歌文学始于这个时期，到了统一新罗7~8世纪时，达到鼎盛期。所以韩国是世界文学史中10世纪前用自己国家的语言记录文学作品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乡歌文学是韩国诗歌文学史上第一个定型诗。分为长型10句体(10行)和8句体(8行)以及短型4句体(4行)。收录于《三国遗事》的这些作品，均有着口头故事由来，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叙事文学价值。

乡歌借用汉字的音，训来记录成乡札文字，但由于它忠实地记录了韩语的发音，所以是韩国的诗，韩国的歌。只是由于对古语了解得不多，所以解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用文字来记录朝鲜语的最早的标记方式是15世纪的“训民正音”。学者们在研究乡歌时，会努力把它复原成15世纪中世国语，因为这个文字和乡歌在时间上最为接近。

新罗时期，魏弘，大矩和尚编撰了乡歌集《三代目》，却并没能保存到今天。

《三国遗事》上收录的新罗乡歌仅为14首。《均如传》中收录了高丽初期均如大师为传播佛教而创作的11首《普贤十愿歌》。

乡歌作品按照主题可分为：1)王宫乡歌；2)祈愿人生；3)人生无常；4)路上行；5)徐罗伐情歌。流传至今的乡歌作品，按照创作时间，朝代，作者(估测)可整理成下表。乡歌文学的创作者可以是君王，老人，妇幼等所有新罗人。学者们对于具体作者意见不一，无法具体确定。值得注意的是，乡歌作品的名称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很少，大多为学者后来为其命名而得。

表2 三国遗事所载乡歌

乡歌名称	世纪	王	作者(不确切)和性质
薯童谣	6世纪	真平王(600年)	薯童, 百济武王, 传承歌谣
彗星歌	6世纪	真平王(600年)	融天师
风谣	7世纪	善德女王(632-646)	良志, 传承歌谣, 劳动谣
愿往生歌	7世纪	文武王(661-680)	广德或广德之妻, 传承歌谣
竹旨郎歌(慕竹旨郎歌)	7世纪	孝昭王(692-701)	得乌
献花歌	8世纪	圣德王(702-736)	姓名不详的老者
怨歌(737)	8世纪	孝成王(737-741)	信忠

乡歌名称	世纪	王	作者(不确切)和性质
兜率歌(760)	8世纪	景德王(742-765)	月明师
祭亡妹歌	8世纪	景德王(742-765)	月明师
安民歌(765)	8世纪	景德王(742-765)	忠谈师
赞耆婆郎歌	8世纪	景德王(742-765)	忠谈师
千手大悲歌 (祷千手大悲歌)	8世纪	景德王(742-765)	儿童(5岁)或希明夫人, 传承歌谣
遇贼歌	8世纪	景德王(742-765)	永才
处容歌(879)	9世纪	宪康王(875-886)	处容
普贤十愿歌	10世纪	新罗神德王6年- 高丽光宗24(917-973)	均如大师

下面以“处容歌”为例，介绍其背景和内容。

新罗第49代宪康王某天到东海边游玩，在海边休息时，突然东海龙王使坏，天上云雾密布，一片黑暗，无法辨认方向。于是王按照日官的建议，同意给龙王建一所寺庙，天这才放晴。随后东海龙王带领七子载歌载舞歌颂大王。离开时留下一子，使其辅佐国王料理国事。那个孩子便是处容。王把处容安置在王京生活，赐予官职，并使其与貌美女子成婚。

一日徐罗伐夜深月明，处容玩到深夜才回家，却见妻子与陌生人同床。处容见后并没有立刻争论，而是走出门外边唱边舞，“东京明期月良，夜入伊游行如可，入良沙寝矣见昆，脚鸟伊四是良罹，二胯隐吾下於叱古，二胯隐谁支下焉古，本矣吾下是如马於隐，夺叱良乙何如属理古”，将对方逐出，这首乡歌被视为是巫歌的一种。《处容歌》不应该只是直观地理解成淫秽歌。在这里，疫神与妻同床意味着妻子患病，处容见状唱歌击退疫神。所以这首歌应该理解成为治病而创作的念咒性质的巫歌。即便这首歌不被看作是巫歌，总之在末尾最后一句中可看出，处容已达到超脱的境界。

据说从此以后，疫神看到处容就惊慌而逃。他也被视为是驱逐疫神的守护神一般的象征。这种8句体乡歌，被称为处容歌。驱逐疫神而跳的舞蹈被称为处容舞。处容歌，处容舞一直流传到高丽，朝鲜时期，当时所用过的面具，绘画

资料也流传至今。处容这个名字寓意龙王之子留在陆地，即龙处于人间。原本是“处龙”，后“龙”字换成“容”字，为的是更符合人的名字。

### 说话文学

新罗“说话文学”可以说是千年新罗漫长梦的旅程。历史不能直说的那些真实面貌，借助说话文学这种隐喻方式流传于世间。所以说说话文学比历史更真实。这一时期的故事已经超越了历史沉浮中的胜败，包含着对人生的思索。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这些古老的故事，是历史的内在一面。历史承载的是人生的量，而说话文学解读的是人的内心本质。故事除了描绘当前世界，还描绘了彼岸世界。收录在《三国遗事》里的说话文学作品中最具新罗特色的那些作品，与下列四个因素有密切关系。

首先，新罗曾出过三位女王。这在同时期的百济，高句丽以及后时期的各个王朝都没有出现过。由于这种政治上的独特性，新罗出现了许多与此相关的说话作品。其次，新罗崇尚豆豆里鬼怪。豆豆里是炼铁的冶铁神。新罗初期斯卢国的几个王，即居西干朴赫居世，尼师今昔脱解，金氏王始祖金阏智，他们都是引领铁器文化的英雄人物。第三，新罗在接纳其他文化圈的宗教时，总会和传统信仰发生种种矛盾和冲突，却又总能接纳和包容，使之成为自己的文化内容之一。故事中体现了佛教与传统信仰碰撞，产住矛盾，逐渐安定的过程。第四，新罗尊重基层百姓的社会力量和地位。《三国遗事》中介绍到的《志鬼爱上女王》和《真圣女大王居随知》，描绘了底层百姓活的尊严而又有骨气的面貌。

新罗说话故事《善德女王知几三事》根据三件预知事件而写，表现了女王作为领导者和普通人所具有的神奇能力。

第一个故事：无香牡丹花。唐太宗送来了画有红，紫，白三色牡丹的一幅画和三升花种。善德女王根据画上的花，预感到牡丹花将无香。第二年开放的牡丹果然没有花香。善德女王根据牡丹画没有蝴蝶，预知了这花将没有香气。由此看穿了唐太宗暗讽自己孤身一人的阴暗心理。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窥见唐太宗与新罗女王这两个统治者之间暗流的紧张和矛盾。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通过预知，成功歼灭了偷偷入侵的敌军。故事讲述的

是，寒冷冬季灵庙寺玉门池却是蛙声一片。有人向国王报告这一异常现象，国王派精兵前往女根谷歼灭外敌。士兵来到西郊，果然发现有个女根谷，并且有500多人的百济士兵埋伏于此。于是他们先发制人将敌人歼灭。牡丹花的故事展现了善德女王的审美预知能力；女根谷的故事则讲述了女王面临危机时表现出的卓越的洞察力和实践能力。同时也可看出善德女王不仅谙熟传统信仰，还十分了解阴阳五行，并且驾驭得游刃有余。黄色青蛙象征士兵，玉门象征女性，表示“阴”，“白色”则表示“西”边。所以立刻明白了是百济士兵埋伏在西边。

第三个故事讲述的是女王预知到了自己离世的时间。女王预言了自己的死期之后，吩咐将自己安葬在切利天。大臣不解，问切利天在哪里？女王答曰：狼山南边。后来女王果然在自己预言的那一天死去。大臣们按照遗嘱将其安葬在狼山南侧。10年之后，文武王在其坟墓下方建了四天王寺。佛经上写到四天王



图132 庆州女根谷

上方为忉利天。人们这才恍然醒悟并感慨女王的预言再一次应验(图2)。说明女王对佛经也有很深的造诣。可见,善德女王作为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女王,对各种宗教思想表现得豁达包容,研究深透。

《三国遗事》,宋《宋高僧传》中记载着关于义湘大师和浮石寺的故事。义湘赴唐游学时在一户人家住宿,善妙娘子正是那家人的女儿。善妙娘子对义湘十分爱慕,对他表达了自己的爱意。但义湘对此毫不动心,一心只想修道。当善妙娘子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变义湘的决心时,毅然出家入佛。用遥望换来一丝



图133 庆州四天王寺遗址和善德女王陵

安慰。当义湘不辞而别时,善妙伤心欲绝,化身成龙保护义湘伴其归途。

无法成就的爱让她痛不欲生,而她将这种悲伤化为了动力,成为佛门弟子。她化作一条龙一路上保护着义湘,一起回到了新罗。回国后义湘主张创建浮石寺,却遭到本地传统信仰势力的抵抗,显得很无奈。据《宋高僧传》中记载,当时信仰新罗本土宗教的500多个异教徒强烈提出反对意见。善妙娘子又化身成晃动的石头,即浮石,滚落到那些异教徒山上,将他们击退。最终寺院修成,便取名为“浮石寺”。

### 汉文学

卫满朝鲜晚期,一些来自北方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流亡者聚集到岭南辰韩地带,开始传播汉字。到了汉四郡时期,这种现象更显加剧。真兴王时期占领汉江流域后,新罗与中国开始了独立的交流。这时,新罗的汉文才追上高句丽与百济,达到了与之相等的竞争实力。6世纪以前的新罗文字资料中,符合汉文语法的文字几乎没有出现过。6世纪初期~中期创建的金石文资料中,韩文地名,人名,官职名称等均用音叉标记后按序排开。统一前,主要是僧侣文人充当着主要角色。他们侧重于撰写和国王出行,呈文,以王室为中心的历史以及与中国的外交文件等现实政治中不可缺少的实用类汉文,因此对于文学意义上的诗歌,几乎是很少关注的。

新罗在统一前后引进儒教时,把它作为与佛教相区别的新的指导理念来接纳和深入加固。与此同时,接纳了当时最先进的大唐《九经》体系,进而从根本上提高了对儒学的理解层次和深度。另外,将《文选》定为国学的正式课本,学习和普及《文馆词林》,最终达到了符合统一国家规模和格调的高水准的文学写作。

统一之后,文章的撰写不再拘泥于僧侣阶层。陆续出现了许多文人写士,有的是曾经到大唐国子监留过学的文人;有的是在新罗国学苦读《五经》,《九经》儒家经书的文人;还有一部分则是学习《文选》,《文馆词林》等诗文选集的文学家。他们代替了僧侣阶层,成为撰写外交文件等国家公文的主力人群。为撰写外交文件做出赫赫功劳的强首,身为宿卫学生七次赴唐的金仁问,解读《九经》



图134 庆州甘山寺阿弥陀如来造像记

重阿浪金志诚为了缅怀已故的父母，建造了甘山寺，并为其母亲制作弥勒像(719)，为父亲制作阿弥陀像(720)，在光背记录了造像记。佛身文字由奈麻聪撰写，学界认为，他就是当时最著名的学者，文学家薛聪。两个作品大体上分为3段：关于“至道”本质的序论前提，主创者金志诚的一生，具体发愿对象及内容等。文中内容不仅涉及了佛教知识，还涉及到老庄和儒学内容。文中还自如地运用到了“至道：至高无上的道”，“三身：法身，应身，化身”，“真宗：真理教导”，“荣班：高官贵职”等抽象概念。前后2句各为一组，推敲提炼，体现了至高的文章美。

圣德大王神钟又叫奉德寺钟或“妈妈钟”。它是为纪念圣德大王的功德，祈愿王室和国家繁荣而建造的。由圣德大王之子景德王(742~764)策划，惠恭王7年(771)完成。《圣德大王神钟铭》刻在钟的外面，序文约630字，铭文200字，共830字。序文从头到尾以4字或6字句为主，确保前后语句相扣，是典型的

教育后生并撰写《讽王书》(又名《花王戒》)的薛聪，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人物。任职新罗国学少卿的金△△建造了《文武王陵碑》(681)翰林郎金弼奥建造了《圣德大王神钟铭》(771)。尤其，《甘山寺弥勒菩萨造像记》，《甘山寺阿弥陀如来造像记》(〈图134〉)，《圣德大王神钟铭》(〈图135〉)等均是代表当时散文最高水平的杰作。

重阿浪金志诚为了



图135 圣德大王神钟铭文和飞天像图

四六骈俪文。铭文为4言50句形式，中间运用了换韵法。全文没有生硬，晦涩的词汇。一些经典名句中常见的词汇，也被驾取得自然贴切，古词涉及的题材也广，比喻运用得如鱼得水。此文无疑是当时最优秀的佳作。

统一新罗时期的汉诗，以僧侣们的揭颂和部分抒情诗为主。学者，官僚或多或少参与到其中。僧侣的诗作中，慧超，义湘等主要作家大多在国外创作诗歌作品，所以还是有着根本的局限性。

到了新罗晚期，大量宾贡及第者回国，他们精通唐文学，并且创作实力高超。由于他们的积极创作活动，近体诗成为文坛主流，并且改变了现有文风。其中崔志远的文章，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文体的多样性，句子的格式和表达水平上，都达到了当时最高的创作境界。新罗末期积累的这些创作经验和实力作品，被完整地传承到了下一代王朝——高丽时代，为振兴高丽早期门阀贵族的文学，奠定了基础。

## 6

## 音乐

古代重视礼乐，音乐在生活中占据的比重要比现在重要得多。新罗社会是由王，贵族，僧侣，平民等组成的阶层社会。各个阶层的音乐和舞蹈，既有共性，又有差别。平民的歌，舞，必然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而王和贵族，则享受着和自己的高雅文化相符合的音乐和舞蹈。

## 平民的音乐

平民的音乐与他们从事的劳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农耕或捕鱼，有的可以独立完成，有的则必须借助大家的力量。尤其是后者，集体劳动力需要同时协作，所以“劳动谣”显得必不可少。4~5世纪新罗人在修筑庞大坟墓时，搬运泥土的过程中吆喝“劳动谣”的可能性非常大。7~10世纪新罗人在修筑石塔时，搬运沉重的石材的过程中，肯定也是伴随着嘹亮的口号，唱着劳动谣。

据《三国遗事》中记载，善德女王(632~647)时期雕塑家良志大师在建造灵庙寺丈六像时，城里的男女搬运黏土的过程中曾唱过“风谣”。这是劳动谣的一

个典型例子。当时的旋律尽管没能流传下来，但是从词调“来如来如来如，来如哀反多罗，哀反多矣徒良，功德修叱如良来如”来看，其旋律和节奏应该是与民谣类似，简洁而又通俗。

另外，出于一些特别的原因，人们把不方便直接诉说的故事，编成小孩子吟唱的歌谣即“童谣”传播四方，其典型代表就是“薯童谣”。百济武王幼年时期是靠挖薯维持生计的薯童。据说他听闻新罗真平王(579~632)的三女是貌美的女子之后，便来到金城，让孩子们传唱童谣，这就是著名的“薯童谣”。歌词为：“善化公主主隐，他密只嫁良置古，薯童房乙，夜矣卯乙抱遣去如。”

虽然歌词内容简单，但核心内容却很明确。即：善花公主和薯童偷偷幽会。因为这个童谣，善花公主竟然真的和薯童喜结良缘。关于这首“薯童谣”的作家等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5~7世纪的新罗社会的确传唱过这首薯童谣。

## 僧侣的音乐活动与佛教音乐

5世纪佛教传到新罗，到了6世纪初被正式公认。佛教的传来对整个新罗社会的面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音乐领域也不例外。这时，僧侣们起了主要作用。

景文王时期，4名花郎在游览江原道通川地方时创作了三首歌词，以寄托辅佐国王治理国家的抱负。随后他们将歌词送往大炬和尚那里，以便给歌词谱曲。大炬和尚为他们的歌词谱了曲，分别为：玄琴抱曲，大道曲，问群曲。

玄琴抱曲，意为怀抱玄琴，即玄鹤琴。估测应该是和玄鹤琴有关的乐曲。大道曲，顾名思义，表示和“大道”有关。新罗时期的各种祭祀中有“四大道祭”，由此看来，有可能是用于祭祀的音乐。问群曲内容不详。这三首歌的旋律，歌词都没能流传下来，但是据说景文王听过三首曲子后非常满意，由此可见大炬和尚的谱曲实力精湛，能够深得王室认可。这份记录表明，9世纪的新罗社会中，在音乐领域才能出众的是寺院的僧侣。

## 王与贵族的音乐生活

到了新罗晚期，9世纪宪德王，宪康王在和大臣酒宴时，曾亲自演奏过琴。弦乐器是乐器中最难演奏的乐器。新罗王能够亲自演奏弦乐，这与高丽，朝鲜时期的王有着很大的区别。此时的弦乐器是过去的“go”。“go”是对于玄鹤琴，伽倻琴等弦乐器的统称。“go”在汉字中，解释为“琴”。新罗王演奏的乐器，可能是6世纪从伽倻传入新罗的伽倻琴，也有可能是9世纪初从新罗传入日本正仓院并流传至今的“新罗琴”。

该鼓可以从5世纪新罗土偶12件中发现的乐器中找到。鸡林路30号墓中出土的土偶装饰长颈壶(图136)中刻有新罗土偶人物演奏go(琴)的样子(图137)，乐器放在演奏者的膝盖上，乐器中央正对着胸前。乐器呈倾斜状搭放在膝盖上。这件土偶证明，在伽倻琴传入新罗之前，新罗已经有自己的go(琴)。也就是说，当时新罗在已经有自己的弦乐器的前提下，伽倻琴被传入和接纳。三国统一后，高句丽的玄鹤琴也传入新罗。

新罗大王们在和大臣共设酒宴时，等到兴致来了，就会亲自抚琴演奏或者观看专业乐师们的演奏。689年神文王出行新村时，设宴并下令演奏音乐，表演舞蹈。这时演奏的曲目共有7首。曲名为下辛热舞，思内舞等，最后一个字均为“舞”，所以被认为应该都是舞曲。各个曲目的演奏成员，除了音乐导演，歌，舞，乐的成员少则3人，多则6人。这个数字在现在看来，应该是一个小规模乐团。之所以规模这样小，也有可能是因为演奏地点并不是宫城所在的徐罗伐，而是新村。

807年(哀庄王8)2月，哀庄王在月城崇礼殿坐观音乐演奏，在演奏思内琴之后，演奏了碓琴舞。这时演奏思内琴的成员，是新村时的两倍左右。王室为大臣设的宴席主要以月城崇礼殿和临海殿为主，所以没有单独的表演地点。朝鲜时期的宫廷音乐也是如此。

这里提到的碓琴舞，据传是5世纪慈悲麻立干代最著名的音乐家，新罗音乐家代表人——百结的碓乐流传下来的。据说百结家境贫寒，衣衫褴褛，在当时被人们称为“百结先生”。所以百结并非其真名。据说百结的妻子因为年底没有



图136 庆州鸡林路30号墓出土的土偶装饰长颈壶



图137 土偶装饰长颈壶之琴

粮食发愁，百结用弦乐“鼓(琴)”演奏出稻米声效安慰妻子。后以“碓乐”的名称而流传后世。

## 新罗音乐册子《乐本》

《乐本》是金大问撰写的关于音乐的著作。704年(圣德王3)时期，金大问曾历任汉山州都督职务。除了《乐本》，他还编写了《花郎世纪》等其他著作。当时新罗人接纳唐文化，并且对《礼记》有所了解。《礼记》的《乐记》中有关于“乐”的定义以及音的特性的内容。由此推测，《乐本》顾名思义是记录了“乐”的根本，讲述了从“乐”的定义到声音的种类，特性以及新罗乐器种类，由来，各种乐器的乐调，乐曲数量等内容。

乐调，意为乐曲的音乐结构。新罗人在演奏不同乐器时，其乐调也各不相同。据《三国史记》上关于乐调的记录，伽倻琴，玄鹤琴·乡琵琶，三竹的乐调各不相同。尤以弦乐器更为突出。由于管乐器制作过程中管的音程是固定的，所以乐调也是统一的。但弦乐每次使用时，都可以调节音调。在演奏弦乐器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应的琴弦相对容易些，因此也就注定了每个乐器的乐调不同。当然，现在这种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了。因为这样无法合奏。新罗时期的弦乐器乐调各不相同，原因在于可能当时与合奏相比，人们更喜好独奏所致。

## 新罗乐器

新罗乐器可从考古学资料，文献记录中了解它的种类。考古学资料分为文物形式的“文物乐器”和刻在文物上的图像形式的“图像乐器”。文献记录的弦乐器有三弦，即玄鹤琴，伽倻琴，乡琵琶。实物乐器“新罗琴”以及存放新罗琴的盒子“新罗琴柜”，均被保管在日本正仓院。图像上的乐器有箜篌。

玄鹤琴，伽倻琴在现代依然是韩国弦乐器的代表。玄鹤琴源于高句丽，统



图138 正仓院新罗琴

一后传入新罗。新罗将玄鹤琴和万波息笛一起保管在月城天尊库，列为国宝级乐器。景德王(742~765)时，玉宝高在庆州南山金鳌山琴松亭演奏玄鹤琴，后来智异山云上院苦练50年，创作了30首新曲，是新罗著名的玄鹤琴家。

伽倻琴是于勒及其弟子李文投降新罗时传入新罗的。原本，大伽倻嘉悉王命令乐师于勒参考中国乐器制作了12弦乐器。但没有发现和出土过这方面的文物，所以当时的制作形状就无从了解了。

“新罗琴”实物保存在日本正仓院北库。(《图138》)这件“新罗go”，长158.0cm，宽30.0cm，和现在的伽倻琴，玄鹤琴大小相似。

琵琶和现在的吉他类似，都是抱在怀里演奏的弦乐器。在新罗时期，琵琶有很多的样式和种类。感恩寺舍利器上雕饰的琵琶(《图139-①》)，乐器顶部装饰成鸟头状。上院寺钟的外廓上雕刻的琵琶(《图139-②》)，带有4弦夹钳，且指板直。而凤岩寺智证大师浮屠(《图139-③》)，尚州石刻天人像琵琶(《图139-④》)的弦夹钳部分呈“ㄣ”型。演奏者在演奏琵琶时，用手指拨弹，或用勺状拨片演奏。

琵琶是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乐器。新罗琵琶早在4~5世纪的新罗土偶出现过(《图139-⑤》)，和中国琵琶有所区别。早先的琵琶是2弦的简单乐器。统一后受到高句丽，百济琵琶的影响，后变为4弦。这时出现了直指板，弯指板等各种琵琶。

箜篌外形和西方竖琴类似。725年上院寺梵钟中带着箜篌纹样。(《图140》)箜篌也被认为是起源于西域。该乐器的奏乐像也出现在石塔，浮屠上。统一初期新罗曾出现过箜篌，一直到高丽初期。这种弦乐在后期逐渐消失。

三竹是新罗管乐器的代表。根据大小，分为大琴，中琴，小琴。这些都一



图 139 各种遗物中被表现出来的琵琶(①感恩寺西塔舍利器中的琵琶, ②上院寺钟外廓的琵琶, ③新罗土偶琵琶  
④尚州石刻天人像的琵琶, ⑤凤岩寺智证大师浮屠琵琶)

直流传到今天。除了三竹, 考古学资料上出现的乐器, 还有笙, 箫, 纵笛, 短箫类, 螺鉢, 埙。

笙在现代被称为笙簧。若干个管插入音筒, 再连接一个长管作为吹具而进行演奏的管乐器。上院寺梵钟的中期, 晚期出现了笙的图案(图141), 瓦片的滴水凹瓦, 凸瓦上也有笙的图案。这种乐器经过高丽, 朝鲜时期, 一直流传到现在, 是现存并还在使用中的管乐器。

纵笛是竖着吹奏的管乐器。文献上关于这个乐器, 仅有“新罗乐器, ‘笳’”的注释。5世纪新罗土偶, 7~8世纪滴水凹瓦等考古学资料上出现的纵笛类乐



图 140 上院寺铜钟的笙篪



图 141 上院寺铜钟的笙



图 142 庆州月城垓子出土的唐三彩埙



图 143 闻庆凤岩寺智证大师浮屠的笛

器中, 有的“笛子”管细短, 有的则属于“短箫类”, 略粗长。凤岩寺智证大师浮屠(图143)上也出现了笛子的图案。

埙和西洋乐器陶笛类似, 是一种管乐器。泥土烧制成圆球状吹具, 吹入气流便可发出声响。上面的几个孔用于发出不同音色。庆州月城垓子出土了直径



图144 闻庆凤岩寺智证大师浮屠的拍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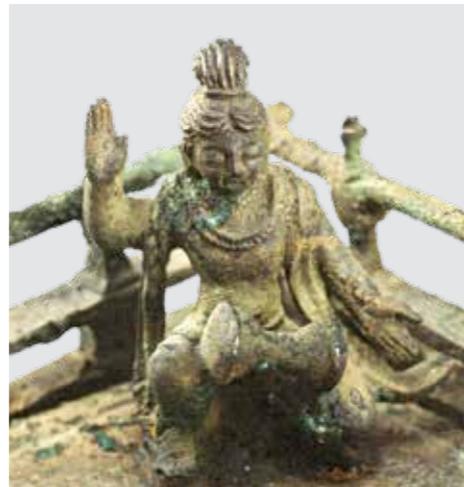


图145 庆州感恩寺西塔舍利器上的腰鼓

约3.7cm的唐三彩埙(图142), 形状像猴面。这说明新罗时期已经引进和使用了大唐乐器。

《三国史记》上记载的打击乐器只有拍板和大鼓。而事实上, 除了现存的梵钟, 金鼓等实物型乐器, 在昌宁火旺山城出土了一件8世纪的鼓。另外在京畿道二圣山城也出土了一件8世纪的腰鼓。其他图像中出现的乐器有钹或铙钹。

拍板在现在称为“拍”。“拍”是一种打击乐器, 宗庙祭礼仪仪式上演奏管弦乐合奏时, 开始时“啪!”拍击一次, 结束时“啪啪啪!”敲击三次。拍打奏乐像中, 凤岩寺智证大师浮屠的雕刻作品(图144)最具写实风格。

通常鼓是用兽皮覆盖在鼓框架上制作而成, 由于它不像梵钟, 金鼓那样具有金属特性, 所以几乎没有保存下来。根据用途与规模, 鼓可以分类成多种, 目前考古遗址出土的只有腰鼓和小鼓。大鼓, 即大型鼓。根据《三国史记》记载, “太宗武烈王2年(655)月城内建造鼓楼”。说明当时已存在大鼓, 但新罗时期的大鼓并没有流传下来。

腰鼓, 即系在腰上打击的鼓。682年庆州感恩寺西塔舍利器(图145)等文物中发现了腰鼓的图像。京畿道河南省二圣山城出土过一件腰鼓, 边角略有残缺。(图146)木材边长43.0cm, 直径17.0cm, 和现在的长鼓外形相似, 但是大小不一样。



图146 河南二圣山城出土的腰鼓



图147 昌宁火旺山城莲池出土的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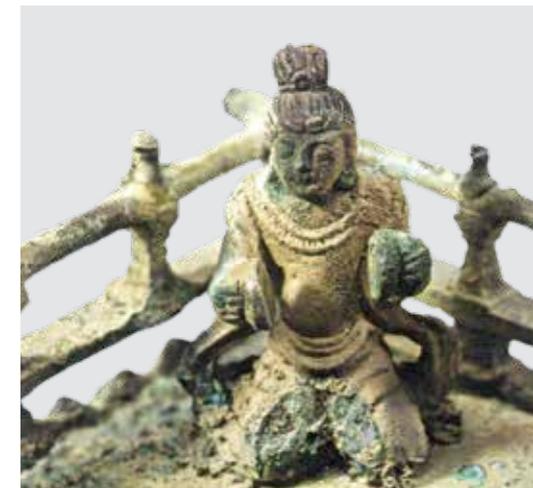


图148 庆州感恩寺遗址舍利器的钹

小鼓以昌宁火旺山城莲池出土的榆树制成的鼓(图147)为例, 高达51.2cm。前后附着用于系绑的环。

名为钹或铙钹的这种乐器, 形状类似西方的钹, 是一种打击乐器。最先发现于感恩寺西塔的舍利器(图148)中。统一新罗时期的钹, 流传得只有图像乐器形式。高丽时期的钹则大小不一, 样式多样。现在这种乐器用于大吹打演奏, 寺院里则用于钹舞道具。

## 科学与技术

### 天文与历法

提起新罗的天文学, 有两点令人惊叹不已。一是伫立在新罗王宫月城西北侧空地上的瞻星台, 另一个是《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收录的30条日食记录。

#### 天文

瞻星台, 顾名思义就是观测星象的高台, 很早就被认为是天文观测设施。另一方面, 位于顶部的井字形方框和越往下越宽, 划出圆形的上方下圆状的曲线造型之美(上直径2.85m, 下直径4.93m, 高9.10m)充分体现了新罗人对上天的敬仰, 其造型也备受瞩目。

佛土信仰强烈的新罗人用模砖石砌成31层, 加上天与地为33层之数, 因此也可以解释为描写佛教须弥山切利天的祭祀用象征物。从远处看, “井”字形井口仿佛一棵直达上天的生命之树, 也是新罗人将那里视为世界之中心的敬天信仰的产物。

虽然可以如上所述赋予多种解释, 但因为瞻星台的名字, 因此天文台说

最能站住脚。面对非常狭窄的“井”字形的上部, 至今仍有猜测是摆放天文仪器, 用于天文观测。但无论是《三国史记》或《三国遗事》或金石文中, 都未发现新罗人使用瞻星台的天文观测记录或相关天文文物。因此, 最近比起专业的天文观测台说, 认为是仪典用象征物的说法更占上风。此外, 关于瞻星台的建造年代, 《三国遗事》中记载为善德女王(632-647)时期所建, 后来有633年说(《世宗实录地理志》)和647年说(《增补文献备考》), 但这只是到了高丽末年和朝鲜王朝后, 随着对天文观测台的认识扩张, 推测为善德女王的即位年和末年为建造年代而已。

关于日食记录, 在《三国史记》中收录的67条日食记事中, 发生在新罗年间, 包括统一新罗时期在内共计30条。在这30条中, 共计19条(63%)集中在新罗建国4年(赫居世王4年, BC54)4月1日~第十二代王沾解王10年(256)10月1日之间的早期新罗时期, 即斯卢国时期。其中, 1, 2代王在位的70年间共计发生所有日食次数的30%(9条)。此后, 一直到统一期第38代王元圣王3年(787)8月1日



图149 庆州瞻星台远景

再次出现日食记录，足足有530年没留下任何记录。统一新罗时期记载的11条日食事件都是统一三国的一百年后，社会因战争而动荡不安的155年期间发生的记录。

如上所述，鉴于新罗建国初期的1、2代王统治的70年里，记录了全部日食事件的30%；新罗早期的310年间记录了全部日食事件的63%；之后建造瞻星台，引进唐朝的天文历法，促进天文学发展的中古期及中代之间的530年间(257-787)全无日食记录等情况，因此很难完全相信《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的早期日食记录。因为新罗初期中国正值后汉前后，因此相当大的可能是借用了中国《汉书》，《后汉书》，《魏书》，《晋书》等中记录的对日食的记录。

重要的是三国的日食到底是如何被观测，记录，流传并收录进《三国史记》的历法学上的问题。与此相关的经常犯的的错误之一便是相信日食观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观测是查看实际存在的现象，相对容易，反之预测是精密科学，是需要建立在观测历法学高度发展上的截然不同的范畴。此外，为了记录观测日食的日期，需要完善与日历相关的历法制度和体系。星座观测也一样，观测某个星座并不困难，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观测内容记录下来并传承给后代。为此，必须奠定一定的天文图体系。

## 历法

怎样才能了解天文学核心主题之—日历制度和历法问题呢？因为新罗专业的历法学并不发达，因此我们需要用更寻常的时间学观点探索真相。

为确认系统化的历法确实存在或已被应用，对作为太阴太阳历的代表性指标的闰月进行核查，发现到了三国统一之后的神文王9年(689)首次出现闰月的记录。其背景是15年前文武王14年(674)正月从唐朝回来的大喇嘛德福学得历术的记录。这里的历术具体指的是唐朝初期颁布的《麟德历》。正是因为这《麟德历》，新罗才能在神文王时期使用闰月。此外，在闰月首次出现3年后的孝昭王元年(692)8月，高僧道证从唐朝回来后进献了天文图，可知天文与历法制度是从此开始步入正轨。

但此时依然没有专管天文历法制度的机构。到了8世纪初的圣德王17年

(718)才设立了专管天文历法的机构——漏刻典，但其建制为天文博士1人，漏刻博士6人，由此可见与其说是观测与历法的天文学，更多是将重点放在了日常的时间学方面。

且不论文献记录，透过该时代的金石文资料进行分析的结果来看，记录有闰月的干支历日金石文只有9世纪中期第46代文圣王建造的《昌林寺无垢净塔志》。该碑石使用的历法为宣明历，是能证明新罗下代使用宣明历的有力证据。这一点与《三国史记》中记载的圣德王年间设立漏刻典后闰月记录增多的现象相吻合。

如上所述，新罗并未创造自己的历法，而是到了统一新罗的文武王时期才接受了唐朝的《麟德历》，到了圣德王时期设立了漏刻典，任命漏刻博士和天文博士掌管天文历法制度，新罗下代则引进了唐末的《宣明历》。

为了解统一新罗以前使用历法的时间，我们需要大范围去了解新罗的历日制度和时间学问题。对此，纵观新罗的国家祭祀始祖庙及神宫祭祀的时间，发现主要是在新王即位的翌年2月进行祭祀。2月进行纪元礼的频率远远高于正月。可以设想，对新罗人来说作为岁首(年初)的纪元是不是从2月开始的呢？

其次，查找《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并非年月记录，而是包括年月日三要素的史料记载，发现除了日食和天变记录以外，从建国开始一直到法兴王(514-540)的将近600年时间里，只有2条记录。而这2条记录的也是沾解王与智证王薨毙。除此之外，真兴王33年(572)10月20日在外寺开设八关宴会的记录实际上是第一个含年月日的记录。随之，《三国史记》早期记录中只有日食和天变记录才精确记录至初一干支日，只能解释为《三国史记》编纂者参考了中国的相关记录。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合理解释。

金石文中年月日的记录比《三国史记》还早，有浦项冷水里碑(503)中记载的“癸未年(智证王4, 503年)9月25日”和蔚珍凤坪里碑(524)中记载的“甲辰年(法兴王11, 524)正月十五日”，这表示到了6世纪的智证王和法兴王及真兴王时代，用干支年和月日标注日期的方式已经被普遍采用。

在新罗金石文的历日资料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是真兴王的《黄草岭巡守碑》和《摩云岭巡守碑》的历日。对此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有可能使用了真兴王年

间缔结册封与进贡官方外交关系的北齐的《天保历》。虽然不能排除使用了南朝陈国使用的梁朝《大明历》的可能性，但《摩云岭巡守碑》的历日与北周历明显不同，但与北齐的《天保历》一致则是事实。这说明在已知的文武王时期的《麟德历》之前，有更早的历法存在。

作为真兴王巡守碑之后的干支历日史料首先可以举《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记载的真德女王5年(651, 唐高宗永徽2年)正月初一在朝元殿举行的贺正礼。这是对“正月朔日”的第一次记录。其次，有关于文武王时期和神文王时期及孝昭王时期的记录。另一方面，金石文中庆州《皇福寺石塔金铜舍利函记》上记录了：“中宗神龙2年丙午年(706, 圣德王5)5月30日(怀孕)……”的干支历日记录。这里的历日中5月为大月，与当时使用的《麟德历》一致。

反之，在京畿道安城出土的《永泰2年铭腊石舍利具》中“太宗永泰2年(766, 惠恭王2)丙午年3月30日(乙酉)”的历日中三月依然是大月，与当时使用的《五纪历》(763~783)一致。永泰2年铭金石文表示8世纪中后期新罗使用了《五纪历》。

另外，《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记载了哀莊王2年(801, 唐德宗贞元17)下5月壬戌朔应有日食而不食的记录。此时正值唐朝《正元历》(784~806)的使用时期。历日与这《正元历》一致。这一记录可以说是新罗独立预测日食的重要证据，但当时新罗是照搬中国历书使用。那么，也可以解释为历书中就有关于日食的预报，因此以此为依据等待日食，但事实上却并未发生。

相反，山清《断俗寺神行禅师碑》(813)的历日资料与唐朝《观象历》(807~821)一致，而年干支，月干支，日干支俱全，由此可以充分体现新罗使用了《观象历》。此外，安养《中初寺幢竿石柱记》(827)的历日资料与当时现行的唐末的《宣明历》(822~892, 71年间)一致。

最后，《圣住寺郎慧和尚塔碑》(890)等崔致远编纂的多个碑文中可以看到使用印度历之梵历方式的痕迹。与此同时，查看元晓和憬兴及胜壮的《金光明经》注疏书逸文资料，可以发现早在7~8世纪开始，由黑月和白月组成的梵历的历日法可能已经用于佛教的在日和择日。

## 度量衡

度量衡是长度(尺度)，体积(量)，重量(衡)或对其进行测量称重的器具的统称。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度量衡的整顿与统一都是纳税，商品流通，土木建筑等所需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 长度(尺度)

韩国的度量衡制度引进的是中国的制度，中国早在汉代便已对度量衡进行了系统化的整理。据《汉书·律历志》记载，以12律中基本音黄钟管的长度为基准，对度量衡的单位进行了系统化整理。用黑黍将黄钟管均分为90份，1份为1分，10分为1寸，10寸为1尺，10尺为1丈，10丈为1引。分，寸，尺，丈，引等5个基本单位统称为五度，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十进制计算。

新罗照搬中国的度量衡制度，以尺和寸为主广泛使用了这些单位。丈就像丈六像的示例(1丈6尺)一样，用于衡量钟，悬崖，石塔，佛像等的高度或积雪，土地等的深度。但使用引和分的记录几乎为空白。

步通常用于显示城，堤坝的长度，城市或村子的规模或周长，建筑物的规模，布的长度等。新罗最初以6尺为1步，在唐朝于624年调整1步为5尺后，依然沿用旧的1步6尺。此外，虽然使用频率并不高，但寻也作为长度单位出现。寻的原意指的是将双手左右打开时双手两端之间的距离，后来用作衡量长度的单位。1寻大概相当于8尺，寻用于衡量丝绸的长度和堤坝的长度。

另一方面，衡量麻布或丝绸长度的单位有端，匹，疋。匹和疋等虽然是代表布帛一定面积量的单位，但后来用作了长度单位。中国从汉代开始已统一匹和疋为40尺。新罗同样不分匹与疋，均视为同样的长度单位，而其一半长度的段也用作衡量绫，绢的单位。此外，还有代表2尺或1尺5寸长度的肘；作为周长单位，相当于8寸左右长度的围；代表军队一日行军距离的30里的舍等长度单位出现。

虽然新罗最初使用什么尺度并不明确，但鉴于后来引进了中国汉代整理的尺度制度，也许是引进了汉尺使用。而能证明这一点的具体文物是在京畿道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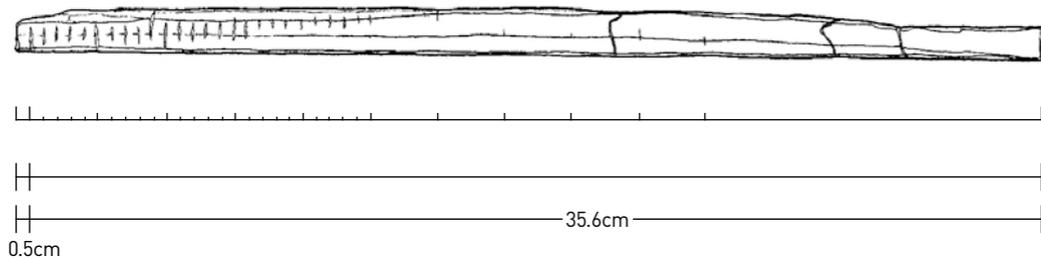


图150 河南二圣山城C区出土的35.6cm尺度

南二圣山城C区出土的尺(图150)。

这把尺的全长为36.1cm,但第一个刻度距离末端有0.5cm的余白,因此实际长度是35.6cm。这个35.6cm又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分为5个节,每个节再以5个刻度细分。第二个部分只以5个节分割,第三部分则没有节或刻度等特殊标记。这把尺的一个刻度为0.47cm,一节为2.37cm,到分成10节的第二部分总长23.7cm。该尺是6世纪中期二圣山城中使用的尺,由此可以推测到三国时代新罗使用的是23.7cm长度的汉尺。

三国时代的新罗似乎同时使用了这种汉尺与高句丽尺。高句丽尺是高句丽独有的尺度,是长度为29.7cm的唐大尺的1.2倍,全长35.6cm,而这个长度与上述二圣山城出土的尺的全长一致。高句丽尺可能是按照汉尺的1.5倍长度全新打造的尺度。新罗引进了这种高句丽尺,用于城市规划或量田等。新罗王都自6世纪后呈阶段性扩张,对王都的坊里区划(行政区划)及规模,道路宽度等意见各不相同。但是,按照1坊规模视为东西约162m(高句丽尺450尺),南北约144m(高句丽尺400尺)的说法来看,新罗王都的规划按高句丽尺计算时是一个整数,因此当时的新罗使用高句丽尺的可能性非常大。

可以说三国时代新罗最初引进汉尺并使用,后来引进高句丽尺用于城市规划,量田等。在引进高句丽尺之后,汉尺仍用于测量身体等。到了7世纪,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似乎是引进了唐朝的唐大尺。唐朝于高祖武德8年(624)将全长为24.7cm的南朝尺规定为唐小尺,将其1.2倍长度的29.7cm的尺度规定为唐大尺,新罗引进的正是这种唐大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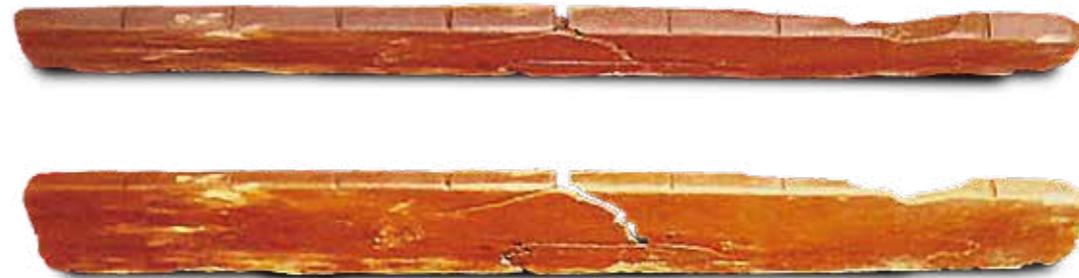


图151 河南二圣山城C区蓄水池出土的尺(29.8cm)侧面(上),正面(下)

证明新罗使用与唐大尺同一长度尺的有力证据依然是从河南二圣山城出土的29.8cm的尺。这是从二圣山城C区蓄水池的第4文化层出土的尺,是只刻有寸单位刻度的29.8cm长度的尺。这把尺的年代可以推算到7世纪后期,就在它的出土层下面出土了前面所述的高句丽尺。

新罗引进唐大尺的时机大约是在文武王5年(665)。据史料记载,以往绢布10寻为1匹,在这一年更改为长7步,宽2尺为一匹。1寻为8尺,10寻=80尺;1步为6尺,7步=42尺。这种布帛尺的变化与新尺度制的应用衔接在一起,由此可以猜测这一时期引进了唐朝的尺度。

新罗引进唐大尺后,唐大尺作为营造尺一直广泛应用至新罗末期。这可从722年(圣德王21)为阻止日本侵略而建造的新垆里城上铭刻的墙间距离和895年(真圣王9)建造的海印寺吉祥塔高度和与此相关的《海印寺庙吉祥塔记》中推测出来。

如此,新罗自7世纪以后将汉尺继续用于测量身体等,7世纪中期引进的29.4~29.8cm左右的唐大尺作为营造尺使用。但三国时代曾用于城市规划或量田的高句丽尺在7世纪以后是否被继续使用,则无法断言。高丽前期的标准尺长约31~31.5cm,鉴于高丽前期和新罗时期1结的面积与计算方式相同,新罗的量田尺与其说是高句丽尺,更多可能是唐大尺。因此,目前来看7世纪中以后新罗用作营造尺和量田尺的是唐大尺长度的尺度。

### 体积(量)

据《汉书·律历志》记载，度量衡中体积的基本单位是龠，合，升，斗，斛。这些单位之间的关系为2龠为1合，10合=1升，10升=1斗，10斗=1斛，以10进法规定。汉代以后，龠已几乎不用，不知从何时起在合下面有了相当于1/10合的勺。此外，石原本作为重量单位指120斤，后来代替斛成为体积单位。宋朝时规定10斗=1石，5斗=1斛后才分开了石与斛。

新罗使用的体积单位史料上有记录的有合，升，刀，斗，斛，石，硕，苫等。合是有据可查的最小体积单位，但根据其他佐证猜测，合下面应该还有更小的单位勺。升指的是“双手可握的体积”，但《正仓院佐波理加盘附属新罗文书》中将“升”写作了“刀”。在接受中国量制之前，新罗自己使用升，斗等，在接受合，升，斗，石等中国单位名称后，依然使用这些自主单位术语。

比斗更大的体积单位有石，斛，硕，苫等。其中最常用的是石。755年(景德王14)赐给孝子向德租300斛，宣德王赏赐孝子圣觉时“依据向德古事”赐租300石，可见斛与石是相同的体积单位。硕与石无论是发音(译者注:韩文发音相同)还是指代体积，都完全一致。

苫原来的发音为“点”，原意是“蒲团”，即用稻草编织的坐垫。在新罗则用作计量谷物的单位“苫”，此时的发音为“Shan”。一苫为两草袋子，一草袋子为五斗，因此一苫为10斗，即一石。因此，9世纪末使用的苫是与石，斛，硕一样的体积单位。除此单位苫，金石文和古文中与苫同义的石，斛，硕中，只使用了石。由此来看，新罗官方使用的体积单位应该是石。

明确指出在新罗一石为几斗的记录见于《佐波理加盘新罗文书》。该书著于8世纪左右，里面记录了向官员支付月例的记录。

但新罗最初引进量制并制度化时，尺度制度一样照搬了中国的制度。随之，新罗的一石刚开始应与汉代一样，1石=10斗的可能性很大。

新罗的1石=10斗制度在8世纪之前的某个时期变成了1石=20斗。量制从1石的容量变成双倍容量发生在7世纪的可能性非常大。在这一时期，百济，高句丽灭亡后新罗的领土迅猛增加，生产力也随之提升，因此受唐尺引进及唐朝量制的影响，1石的容量趋于大型化。

之后，到了9世纪末，新罗的1石变成了15斗。896年(真圣王10)崔致远所著《崇福寺碑》中记载：“用于付账的稻谷共计两千苫(酬稻谷合二千苫)”，而据高丽后期的文人崔灌(1287~1340)注解可知，苫与石是一样的体积单位，即15斗。如此，从1石=20斗变成1石=15斗，是因为在新罗下代，1升的容量从过去的约200毫升增加至350毫升，随之将1石也从原来的20斗下调到了15斗。

中国汉代时1升的容量约为200毫升，而8世纪初新罗的1升也一样是大约200毫升。但到了新罗下代，1升的容量增加到了约350毫升。这是从庆州雁鸭池出土的2件土器的容量和土器上铭刻的“四斗五刀”和“十石入瓮”铭文中比较



图152 庆州月池(雁鸭池)出土的铭为“十石入瓮”的土器

推算出来的结果。对刻有4斗5升(升)即45升的土器容积进行计算,计算至口缘部末端的容积大约为16 $l$ =16,000毫升,根据这一点计算时,1升约为355毫升。因为是计算至口缘部末端的,因此实际1升的容量应该比355毫升略小一些。此外,刻有10石的土器容积为520.8 $l$ =520,800毫升,因此按1石=15斗计算时1斗为3,472毫升,1升为347.2毫升。因此,1升的容积在347毫升~355毫升之间,大致可以定义在350毫升左右。

### 重量[衡]

中国汉代的重量单位为铢,两,斤,钧,石等5个单位。铢是100粒黍米的重量,1两为24铢,1斤为16两,1钧为30斤,1石为4钧。其中,石逐渐被用作体积单位。唐朝早期铸造的钱币开元通宝的重量为2铢4累,10个钱币为1两,之后在这两个单位下面设立1两=10钱的钱单位,又在其下面按十进制的规律规范了“两-钱-分-厘”。即,10分=1钱,10厘=1分。

新罗主要使用的重量单位为斤,两,分等。斤用于表示(黄)铜的重量,两分别用于表示金,银的重量,而相当于1/100之一两的分则用于表示金,铁,水银等的重量。和中国一样,斤和两同样也是新罗普遍使用的重量单位。

从铭文或秤砣等的重量来看,中国汉代时1斤的重量约为248g。重量与尺度或体积一样,越往后权重越大,到了魏晋南北朝时1斤的重量已达到500g左右。隋唐时期,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剧,1斤超过了600g。

能明确说明新罗时期1斤重量的秤砣等文物已无从查找,只能是大概猜测。据说,771年(惠恭王7)时完成的圣德大王神钟使用了12万斤铜。1997年对神钟称重的结果为约18,900kg。而在此重量基础上计算得出1斤的重量约为157.5g。该重量与汉代的1斤相比也太少。12万斤的记录并不是实际铸造的圣德大王神钟的重量,而是铸造神钟时使用的所有铜的总重量,而在神钟的铸造过程中必然消耗了一部分铜。因此,鉴于汉代1斤的重量,8世纪新罗的1斤重量应该是约为200g。

## 新罗的医药

医药是“医”与“药”的结合,“医”指的是治疗疾病的行为或技术及施展这些行为的人,“药”指的是治疗疾病所用的物品。现在的医药是医术与药物的统称。

### 至中古期的医药

新罗早期的医药是通过传统的咒术和民间土配方等传承并使用的。接受最高医疗服务的皇亲贵族患病后也会优先接受巫医治疗。古代的巫医在念咒的同时,还会辅用简单的药物。檀君神话中出现的艾蒿和大蒜就可能是巫医使用的药物之一。该药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民间土配方结合在一起,成为新罗药理学的基础。在568年建成的《摩云岭碑》中出现的药师表明掌管药材管理和本草学配方的医疗官吏至少在真兴王时代就已经存在。

但是,巫医的作用随着佛教的传入而逐渐被削弱。这在讷祇王(或味邹王)时期王女治病的传说中露出端倪,据说因巫医治疗公主无效,后来借阿道(或墨胡子),即佛教法力的力量获得痊愈。

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僧侣逐渐在医药领域担任主角,寺庙之间展开了谁家僧医医术更高明的竞争。野史中记载善德女王患病后,按照惯例由兴轮寺的僧侣前来医治,结果后来居上的密教僧医密本法师的疗效更好,这一传说也体现了代替巫医为上层人物治疗疾病的僧侣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但巫医在民间的权威与作用仍然没有变化。巫覡世代相传,为平民医疗发挥了核心作用。而最重要的是,可以被称为“医生”的专家数量的绝对短缺。

### 新罗产处方

作为新罗原创的处方,有威灵仙方和新罗法师方上残留的处方。这些处方体现三国统一后正式受到唐医药的影响之前,新罗医学原创的固有状态。

唐朝贞元(785~805)年间,周君巢所著《威灵仙传》中讲述了用当时新罗的游方僧人告知的威灵仙草治愈重疾的故事。但这位僧人只知这一药草的新罗名字,即乡名。这也说明,他对唐朝医学并不甚了解。鉴于此,威灵仙在8世纪

通过新罗游学僧人被唐朝医学界获悉，却也是来自新罗固有的传统处方。

984年日本的丹波康赖编撰的《医心方》中收录了从《新罗法师方》中选取的4个处方。《新罗法师方》的编撰年代可推测为景德王(742~764)左右的8世纪中期。其中记载了腹内出现病态肿块的病症，即积聚的治疗处方。虽然是8世纪以后编撰的处方集，但其中必然收录了新罗传统的古方集。

如上所述，现存新罗传统配方都与中国医学分属不同体系。尤其是在威灵仙的故事中药物名称与用法跟中国截然不同，因此当时必然存在原创烙印很深的新罗医药体系。

### 新罗统一战争时期医药与统一后的医疗面面观

7世纪中期新罗主导的统一战争席卷了高句丽，百济，新罗及唐朝乃至当时从属于高丽军队的靺鞨(女真)军和从属于唐军的突厥(现在的土耳其)军，回纥(维吾尔)军以及前来支援百济的日本。来自东亚各国的军队在集结于朝鲜半岛上长期作战的过程中，提供了交流各种风土病的契机。与此同时，新罗在为消灭白济与高句丽而与唐军执行联合作战的过程中，向随军的唐朝军医们了解了中国医学的方方面面。

军事医学的一个缩影可以从662年金庾信向包围平壤城的唐军苏定方转达的医药品中看出端倪来。他除了粮草等之外，还补给了头发30两，牛黄19两。另外，文武王12年8月新罗向唐朝上呈“表文”的同时一起进献的除了银和铜之外，还有针，牛黄，金等。其中，头发，牛黄及针，金应该是作为药用。金庾信军冒着严寒向苏定方艰难送达头发，可以反推以头发入药治疗的食物中毒，皮肤病，性病，冬季冻伤等各种疾病在7世纪中期的唐朝军队内常常发生与蔓延。

用于镇痛解热的新罗牛黄因其质量上乘，统一后成为对唐的主要贸易商品。磁石被用于止血。669年(文武王9)4月，新罗曾应唐朝要求进献过两箱磁石。这一事件应该是唐朝在罗唐联合作战时期亲身体会过新罗产磁石具备的优良药效后，在与吐番作战当时特别向新罗索要的。磁石是治疗受铁器所伤而内脏流出体外或出血严重的外伤以及由此而引发高烧等症状时所用的药物。从现在的医学知识来看，这一处方可能很难让人理解，但在当时都是为了在恶

劣条件下治疗军队内发生的疾病而开发出来的。

统一之后，新罗参照唐朝的医疾令，于692年设立了教育机构“医学”，整顿了各种医疗行政。当时国家对医疗的主要关注内容首先是以国王为首的贵族们的健康。国王与贵族优先接受了各种医疗服务。其次，军队或劳役等大型群体生活者们的健康，为他们派遣了官方医生。这也是因为他们是易爆发传染病的群体，意在防患于未然。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变化。

到了新罗中代，设立了掌管医学教育的医博士和针博士以及主管国王及其他贵族们健康问题的官医等各种职务的医疗官吏。他们也是掌管并领导国家医疗行政的阶层。医疗官吏仅限从在国家成立的医学教育机构接受规定课程，并通过特定考试的人中间选拔。但是，医术卓越者通过特别聘用的形式编入官方医疗体系中。翻看新罗医学传授的课本内容，与“针”直接相关的医术所占比例在一半以上，由此可见医学教育非常重视针灸。

各种资料证明，“医学”教育出来的官方医生在医学传授的知识基础上，以唐朝医学为依据进行治疗。此类医疗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可以从822年(宪德王14)王弟忠恭患病时派遣去治疗的医生处方中看到。当时的太医给出了龙齿汤的药方，而利用这龙齿汤治病的方法在大部分唐朝医书中均有记载，由此可见当时在唐朝实施的疗法在新罗也同样在使用。

统一新罗时期官医处方医药的另一情况可以从处方笺木简中发现端倪。月城垓子出土的木简共计20余件，主要年代集中在6~7世纪，167号木简上记载了药材名。该处方值得关注的是主要用于增强性功能的药材毒性很强，而且用量也非常大。这是制造丸药的配方，而不是汤剂处方，很有可能是新罗药典中御医为提高国王的性功能而制造的药丸。

在雁鸭池出土的木简年代主要集中在8世纪，其中198号木简4面均密密麻麻记载了药材名。这块木简的性质应该是学习医术时摘录相关处方的学习用木简或药师接到医生大处方并按处方抓药制药时用的木简。该木简的处方与唐朝《外台秘要》的处方相似。该木简中记载的药材剂量也非常大，由此推测是大量制作药丸的处方笺。

宪德王时期的忠恭服用的龙齿汤是以被称为龙齿的哺乳动物牙齿化石为

主药引的。这也是体现新罗药材进口活跃的一个事件。被中国和日本文献记载在案的新罗产药材除了威灵仙之外，还有人参，牛黄等多种。尤其在对日贸易中，药材是一个重要品项。752年(景德王11年)派往日本的使团还身负参加东大寺元尊毗卢遮那佛开眼会的任务，使团人数多达700余人。他们与日本贵族签订的采买文书《买新罗物解》上记载有具体的交易品项。该文书涉及药材有麝香，人参，大黄，牛黄，甘草等。其中，麝香和甘草等是从西域或中国进口的药材。由此可见新罗起到了药材贸易中转国的作用。

另一方面，756年6月21日日本圣武天皇49日祭时，王妃将已故天皇生前爱用的物品及皇室物品献给了东大寺。其中，对捐献药品的记录以“种种药帐”的形式得以保留。帐目里共记录了60种韩药，其中麝香等16种是从新罗进口的药品。尤其紫雪或金石陵是添加黄金2两或100两的调配药物。由此可见，新罗从唐朝进口药品后添加本国丰富的黄金制作成高档成品药，再高价出口到日本。

新罗统一时期造就的医学成果延续到了高丽。就像新罗薛聪的后人薛景成家族成为高丽时代的代表医学世家一样，出身新罗的医生在高丽社会中奠定了韩国中世纪医药的基础。如上所述，始于统一新罗时期的中世纪医疗的特点是截至19世纪西方文物传入之前，在韩国中世纪社会作为基本结构一直运行。

## 物品制造技术

用于物品制造的技术有金属着色技术，镀金技术，琉璃工艺和珠宝加工技术，螺钿和蓝胎或干漆技术，织造和染色技术，皮革加工技术等。大部分是由新罗人开发和发展起来的。

### 金的提炼与加工技术

提起新罗，首先会想起“黄金王国”，而新罗古墓中也大量出土了各种金制品。为了从矿石中提取出黄金原料，需要经历多道工序。而最终获得的天然金



图153 庆州普门洞合葬墓出土的太环耳饰



图154 庆州普门洞合葬墓出土的太环耳饰细节图

粉中,通常除了作为主成份的金子之外,还会残留有未完全分离出来的杂质。因此,需要再次对其进行精炼。精炼技术主要有两种:一是将金粉与铅一起加热,加工成金(Au)-铅(Pb)熔融合金后,再次以骨灰进行分离,从而获取纯金的灰吹法;二是将低纯度的金粉与水银混合后,加热将水银蒸发掉的混汞法。很有可能,新罗人应该掌握了其中一种或两种方法,并熟练使用。

获得纯金后,大部分会加工成金板或金线状态作基本材料,对其进行剪,弯曲,穿孔,粘贴等工艺。而比这些技术更高级的制造技术是黏贴非常细小金粒的所谓镂金技术(图154)。近年来从自然科学角度对镂金技术进行调查,分析的结果来看,当时大致上采用了焊接或熔接等两种方法。焊接采用金焊或金汞齐法,熔接采用了将作为基板的金板与金粒或细金线两端适当加热到熔点以下后,按压粘贴的方法。用于焊接的材料中,金蜡应该为降低熔接温度而添加了2~5%的银(Ag),2%的铜,将熔点降低至100°C~50°C左右。但新罗工匠在上述方法中具体采用哪种方法则目前尚不明确。

#### 铁的锻造及铸造技术

新罗时代的炼铁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庆州隍城洞遗址中,发现了公元前1世纪的锻造用工坊遗址和20余座可兼顾铸造与锻造的3世纪的多用途窑炉。这里可以说是新罗时代从事铁器制造的综合小区。此外,古墓正式随葬了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用作锄头的铸造铁斧。如上所述,从很早开始积累炼铁技术的新罗,到了统一新罗时代的下代,用铸造技术铸造了大型佛像。下代具有创造性的工匠借鉴全盛期的中代先人铸造庞大的圣德大王神钟的成功经验,成功铸造了当代最大的大型铁佛。即,统一新罗末期(858年)铸造的宝林寺毗卢遮那佛坐像。

该佛像高达273.5cm,其铸造技术为:(1)先设置木心。(2)在上面用黏土塑造和铁佛一模一样的模型(图155)。(3)在该塑形模具表面粘贴韩纸或薄薄一层滑石粉形成隔离层,以便外面的框架顺利分离。之后,抹上可抗高温的模板用泥土,在上面覆盖掺合沙子的黏土团后,再用混合稻草或糠的黏土团覆盖其上,形成外面的模具。模具完成后,将该模具分割成几个小块(图156)。(4)



图155 安装木心和制作塑形像



图156 制作模板外框



图157 削去塑形像制作内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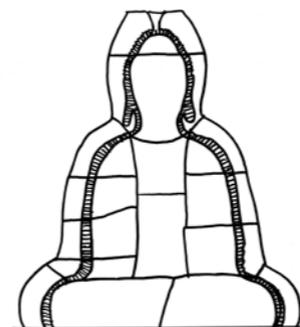


图158 完成模板的组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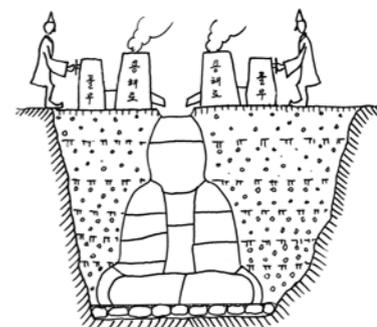


图159 铸造作业

将塑形模具的表面削去一定厚度。此时削去的深度即为铁佛的厚度,大致上为5cm左右(图157)。(5)在内框外侧组装外框模具部分。此时,在两个框架之间插入金属制托架或大型铁钉,维持一定的框间距离。模板周围将留出注入熔水的注入口,根据铸造物的大小设一个或多个(图158)。(6)进行铸造作业并拆除模板后,完善铸造缺陷,打磨粗糙的表面(图159)。组装好单独铸造的螺发,佛手后,采用整体粘贴金箔的方法完成镀金。

#### 釉漆技术

漆用于涂在各种基材表面,实现光泽或色彩装饰,以防止腐朽或生锈。新罗时代的涂料大部分都是天然提取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釉漆,适当添加了山茶油和蜡,松脂等树液,颜料等。

韩国的釉漆技术以先史时代开始传承下来的土著技术为基础，三韩时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了三国时期，出现与前一时期截然不同的更加发达的漆器法。即，精炼出并开始使用生漆，现在木心上粘贴织物后刷漆，或在漆料中添加各种添加物用作底漆。涂刷在上面的上漆也采用多重方法调制和喷涂。如上所述，漆器制作技术呈飞跃性发展，并站稳了脚跟，生产量也骤增，随之朝廷设立了名为漆典的衙门，对漆技术实施了综合而系统化的管理并标准化。

到了统一新罗时期后，生产的漆器有用竹子切细后的竹篾编织成形后上漆的捲胎和在竹子基板上上漆的蓝胎漆器等轻盈而结实的漆器。漆器法也实现了标准化，在木心上包裹织物心之后涂刷2次底漆，再用精制的釉漆刷几次透明漆或朱漆。底漆是在生漆中加入土粉和骨粉调配而成。骨粉是在高度的还原火焰中将牛骨烘烤成粉，为漆膜赋弹性，起到提升漆器耐久性的功能。雁鸣池出土的花形漆器正是用这一工艺制造的代表性案例(图160)及(图161)。

在这一时期最早出现的漆器制作工艺中，其中一项是在金属工艺品上面涂刷釉漆的平脱工艺。这种工艺以铜镜为例，是首先在进行装饰的背面添加各种金银制的装饰后，在剩下的空白空间填充釉漆的工艺。由此更添金属工艺品的奢华之气，起到使材质显得冰冷的金属变得温暖的惊人效果。另一方面，在庆州皇南洞的统一新罗时代遗址中发现装有“黄漆”的土器容器。黄漆是从不同于漆树的黄漆木中采集树液精炼而成，刷漆后呈金黄色，因此用作高档涂料。该文物的出土说明了将黄漆作为新型天然涂料的工匠正是新罗人。黄漆一直存在至朝鲜时代，之后失传。



图160 雁鸣池出土的木制银平脱花形漆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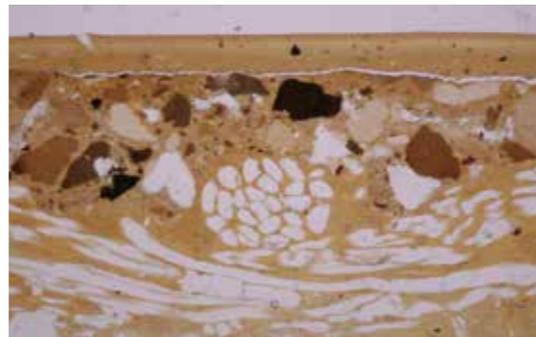


图161 釉漆层的显微镜照片(×100)

## 造纸与染色技术

据测，纸张传入韩国始于三国时代初期，但最早生产的是什么样的纸，后来如何发展，则仍存在诸多疑问。在现存的纸类文化遗产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应属统一新罗时代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和新罗白纸墨书大方广佛华严经。

《陀罗尼经》(图162)写在宽度为6.7cm，全长约6.2m的长卷轴上，是拼接12张长度约54cm的楮皮纸而成。关于楮皮纸的制作方法，首先是将优质楮树的韧皮精心加工成纤维后，放入水里充分搅拌后用竹帘捞出。之后，用黄蘗等染色后，将纸再次放到砧石上用槌棒敲打，通过捣砧作业打造轻薄有韧性的纸张。将这样完成的纸张放在木板上印刷佛经。《陀罗尼经》所用的纸本身的纸质已无比优秀，通过捣砧技术敲打更是提高了纸张的密度，虽然比未经捣砧的纸张轻薄，但韧性却强了2倍。此外，用黄蘗染色提高了防虫效果，使其可以在1300年来于释迦塔的舍利孔内保存至今，也因此成为现存的最高印刷本。

《华严经》是直接用毛笔书写的书写本，是新罗历史最为悠久的写经。这部经书用30张长度为14m，宽度为29.2cm的白纸拼接成长卷形式。纸张薄于一般的楮皮纸(厚度约0.04mm)，但通过捣砧技术使韧性和弹性提升了三、四倍。尤其通过经典结尾的跋文中透露出了当时的造纸技术和写经的制作过程(图163)。即，在作为纸浆原料的楮树根上喷洒香水培育，而且写经文的笔师或制作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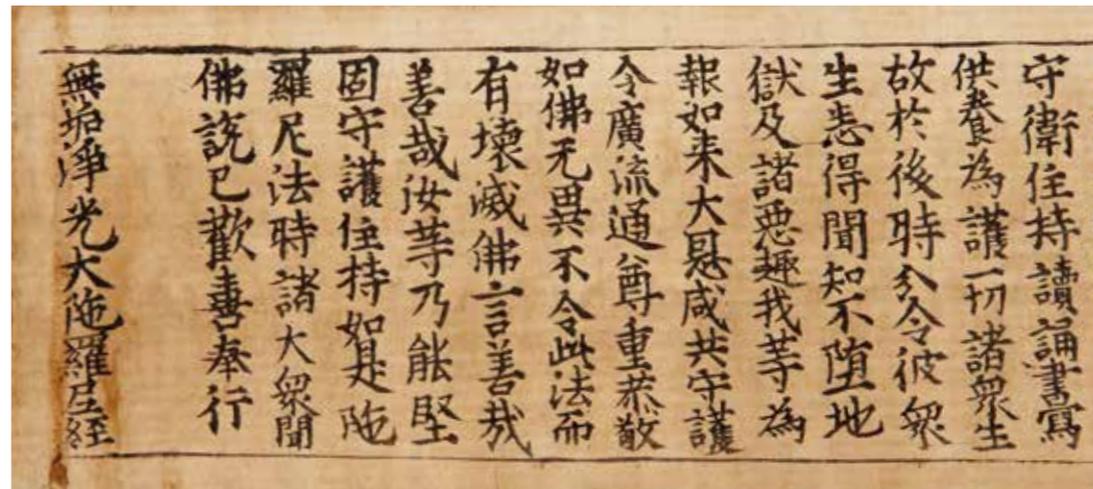


图162 《陀罗尼经》(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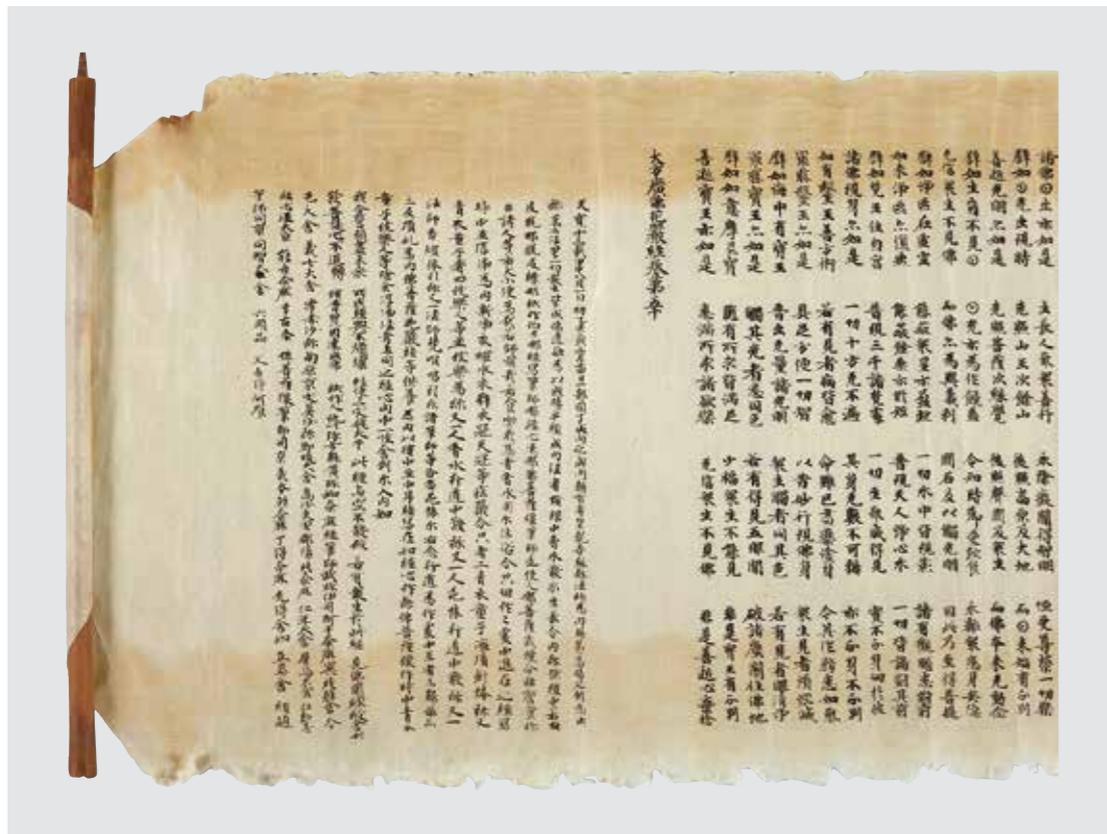


图 163 《华严经》轴与跋文



图 164 《华严经》封皮(部分)

心的工匠，画师等相关工匠们都接受了菩萨戒。这些人在吃喝拉撒睡之后，均用香水沐浴后才能继续作业，对佛事极为虔诚。此外，收集最高端的材料后，再从中筛选出优质品制作成纸张，采用捣砧这一纸质提升技术，最终制造出了最高水平的韩纸。

另外，封皮的紫色，即绛红色无论东西古今都是皇帝的颜色，也是色中之色，象征着神秘与高贵(图164)。封皮的紫色是如何染成的至今尚不明确，但流传下来的传统染紫法有几种。首先是将紫草的根晾晒后磨成粉，放入热水中作为媒染剂添加灰分进行染色的方法。想要获得深色，需要反复进行几十次。还有一种办法是将苏木用铁粉媒染剂着色，也能获得和《华严经》封面相似的颜色。

但为纸张染色并非易事。将纸浸泡在水中会导致楮木纤维之

间的氢化结构遭到破坏，无法维持纸张的形态。染色也不是重复一两次就能染出深色。总之，染出紫色是难上加难。

新罗的纸都是楮皮纸，与中国主要生产的麻纸从质上不同。新罗的楮皮纸是敲打出来的雪白而光滑的纸，因此被称为飞白纸，也曾出口唐朝和日本。如此，当时新罗的造纸术为世界的最高水平。

### 新罗的木版印刷术

新罗的木版印刷开始是为了将其作品作为供奉物放入佛塔中，但随即为教育基本资料的生产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之后到了高丽时期，通过木版印刷业印刷出了纪念碑式的巨作《大藏经》，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作为木版印刷术发展前提条件的纸和墨，从实物和记载来看已经在6~7世纪被广泛使用。从庆州月城孩子发现的应属于7世纪中后期，长度为19.0cm的4面木筒中，以吏读形式记录了为书写经书而购进12斤纸的过程，成为当时使用纸的间接证据。

得到核实的具有代表性的新罗时代纸张文物有《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白纸墨书大方广佛华严经》，白纸墨书陀罗尼(华严寺石塔)，《陀罗尼经》(罗原里石塔)等。这些文物共同的特点是造纸的原料是楮木，均采用了捣砧技术。并非为宗教目的使用的纸有：日本正仓院收藏的《新罗村落文书》，该文书中记录了人口数，性别，耕地面积，种植植物等的的数据增减。

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的墨是印刷的必需品，将熏黑，阿胶，香料搅拌在一起固化而成。新罗的实物墨有目前收藏于日本正仓院的长约26cm的“新罗杨家上墨”，“新罗武家上墨”，日本京都东大寺收藏的“新罗柳家上墨”及释迦塔中发现的大小为5.4×4.1cm的统一新罗时期的墨(以上参考图165)。

从木版印刷术的萌芽和发展过程来看，最初印刷从将刻印在印章等小面积上的信息直接拓印到纸上开始，慢慢发展为在更大的面积上记录更多信息的方式。将大面积的印刷板由上自下压在纸上拓印的方式因无法均匀施



三国时代毛笔

新罗杨家上墨

新罗武家上墨

释迦塔出土墨

图 165 新罗文具

力, 后来便出现了将印刷板翻过来涂上墨汁后, 将纸放在印刷板上揉搓的方式, 即木版印刷术。作为中间的发展过程, 出现了将刻有佛像或塔像的印章反复印在纸上的方式, 其代表性范例便是华严寺西五层出土的白纸墨书《陀罗尼经》(图166)。

这是《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手写版, 将塔的形状刻在木板上反复印在上面。正如《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记载, 没有真的建造77座或99座木塔供奉, 而是做为替代, 将同等数的塔印在了上面。

该塔印以5层为单位印了22行, 一个塔印的高度为5.3cm, 塔座部宽度为2cm, 呈底座与相轮部齐备的3层塔形状, 每一层的玉盖石左右还刻有风景。

代表新罗木版印刷术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1966年为维修佛国寺的释迦塔而拆建时, 在第二层塔身中封印的金铜舍利外函中被发现的。此外, 舍利孔金铜舍利函底座地面发现了《宝匣印陀罗尼经》和3件石塔重修文书(图167)。这些文书都与佛塔的建设有关, 包括1024年(显宗15)重修佛塔的记录和1038年(正宗4)重新书写的记录。其具体内容包括建设无垢净光塔的历程和取出舍利并重新安葬的事件; 准备过程及布施和支出的内容; 地震受灾后1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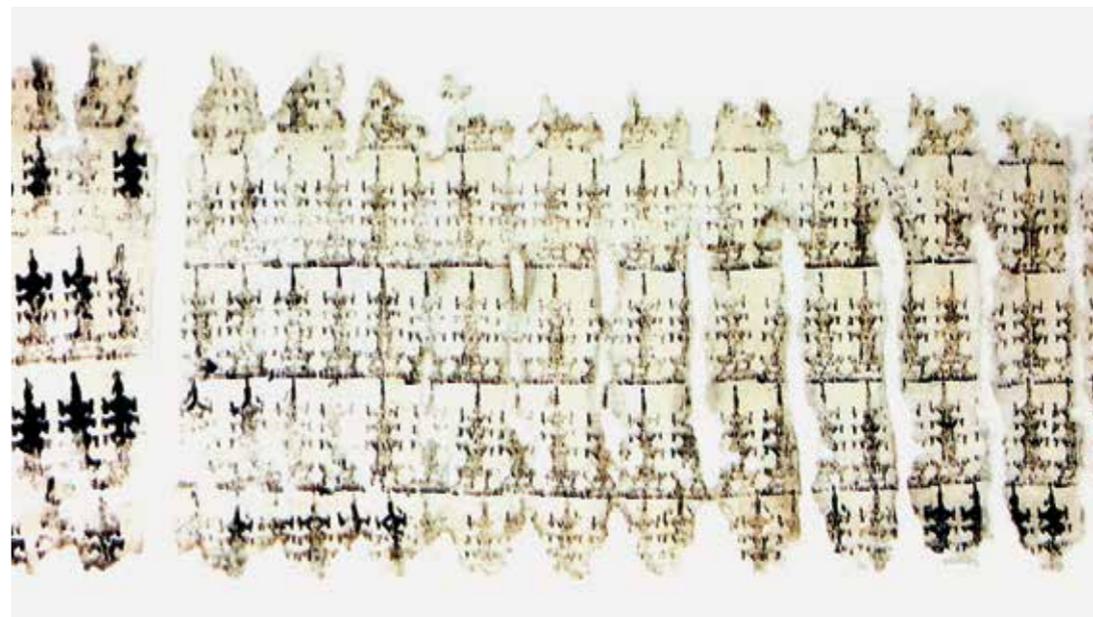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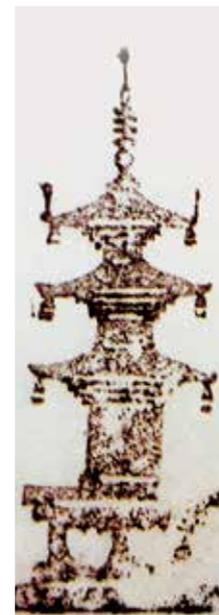


图 166 发现于华严寺西五层石塔的白纸墨书陀罗尼经的拓印本拓印本(下)和塔印放大(上)

年重修的过程; 布施者名单等。对这些文件的解读结果成为现存世界最至于这座无垢净光塔, 即多宝塔的重修文件为何保留在释迦塔中, 推测是1038年重修1036年因地震而毁坏的双塔时, 将1024年的无垢净光塔的重修记录一同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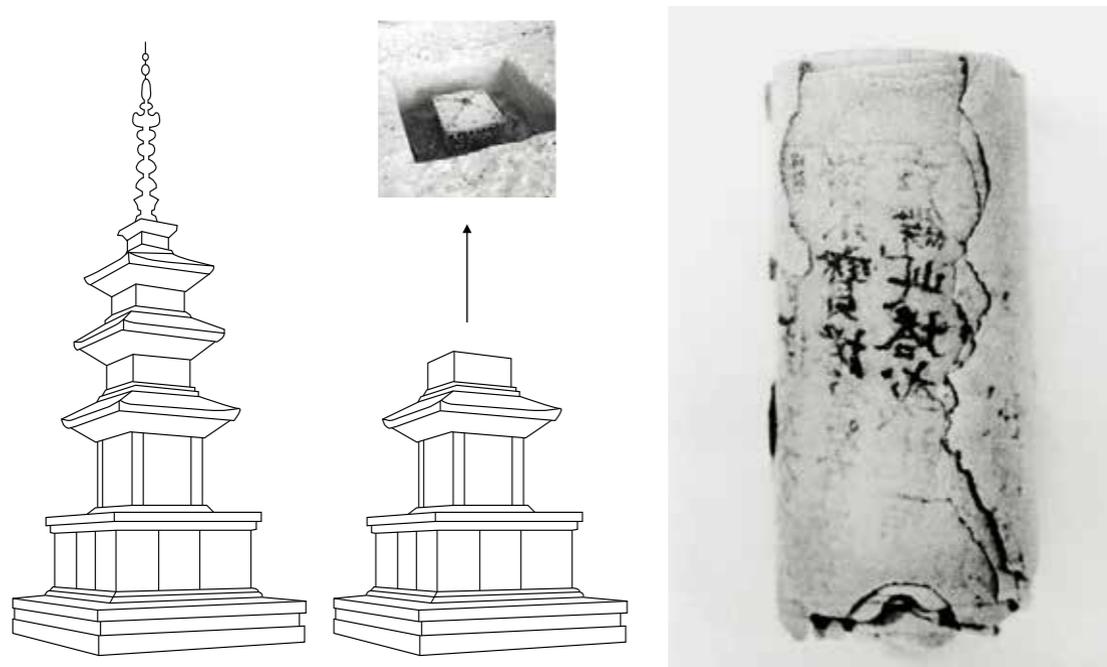


图167 释迦塔第二层塔身部内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被发现的位置(左)及出土状态(右)

入了释迦塔中。另一方面，重修记录中记载了其重建始于742年(景德王即位元年)，于惠恭王时竣工。因此，木板印刷本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也是742年收纳于多宝塔中，重修时转移至释迦塔的。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是木版印刷到楮木纸上的卷轴装书籍。大小为宽度6.5~6.7cm，每张长度为52.9~55.7cm(第12张为44.0cm)的12张纸拼接而成。总长度为641.9cm，卷在直径为0.29cm细木轴上，轴的两端漆成了红色。印刷面的版式为上下留白5.3~5.5cm，用楷书体每行写了6~9个字，全部有681行。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纸张颜色呈茶色。这并不是原本白色的纸经过时间流逝后变黄，而应该用黄蘗将纸染色后经过长时间后出现的颜色。用黄蘗染色的纸可利用黄蘗所含的生物碱杀虫，并散发出香味，可延长纸张的寿命，而且还能防止墨水晕染。

纸张的密度比普通楮皮纸的密度高2倍以上，这说明经过了造纸时是将纸放在砧石上用木棒捶打平整的捣砧工艺。此外，从纸张的光泽上看经过了研

磨过程，最终结论是这并非生纸，而是熟纸。这种黄蘗染色和捣砧工艺体现了造纸的最高水平，新罗也因此拥有了用上墨的木板印刷时可防止墨水晕染，将纸放在上面拓印时也不会有损伤的均匀的印刷技术。

本文的书写字体从笔法层面上看，结构未定型，章法不均衡。上述笔法与6世纪初及末期的《蔚珍凤坪里新罗碑》(524)和《南山新城碑》(591)等表现出来的新罗的传统书法资料类似。尤其笔法的样式与建于706年的庆州皇福寺塔的舍利函铭文相似。这也是猜测发行时期的依据之一。

推测《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发行时期的方法有：通过物理标准分析纸，形态等的办法，此外还有依据文中所写文字或内容进行分析的方法。从印刷的文字来看，出现了中国唐代武则天时期690年~704年新创造的字，即武周制字中的“证”，“地”，“授”，“初”等4个字出现了10处。随之，可以推测该经典是704年以后发行的。该经典被发现后，立即成为中日韩三国学术界研究木版印刷术起源的重点关注对象。在《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被发现之前，被公认为历史最悠久的木版印刷本是770年左右发行的日本的《百万塔陀罗尼经》。这是各自刻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的根本，自心印，相轮，六道等4种陀罗尼后，用拓印方式印刷后放置的。

中国的部分学者根据《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原文中出现的武周制字，主张这部经书是在唐朝刻版，由新罗的僧侣或留学生回国时带回新罗，并在兴建佛国寺时供奉给释迦塔的。但通过对印刷本纸张的分析揭示了采用的是新罗传统的纸张材料及加工工艺，字体与皇福寺塔金铜舍利函的字体属于同一系统。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结合了新罗产材料和新罗人的字体，刻版技术，于742年以前发行的木版印刷物，是现存印刷品中最早的木版印刷物。





图169 庆州将军路1号墓铜制腰带配饰(金钉)

及各种不同材质。

在职的真骨戴在头上的幞头不受材料限制，但外套，半臂，裤子则不得使用当时作为最高级材料的罽绣锦罗。半臂指的是穿在内衣上的半袖马褂型服饰。罽绣锦罗是新罗衣料中最珍贵的织物，“罽”可能是用羊毛织造或添加纺纱线制造的Raxa系统的毛织品。“金”是用各种颜色的真丝线织造的最精致，最奢华的丝绸，“罗”是添加花纹的轻薄优质的丝绸。

和幞头一起构成官服主要配饰有腰带和真皮木靴。在职的真骨不可以作为装饰品，在腰带上粘贴刻有纹样的白玉，也禁止穿着用紫色皮革做成的木靴。收紧木靴脚踝部的带子不得使用带有隐约纹样的白玉，袜子除了有纹样的丝绸之外可随意使用其他材质，没有靴筒的鞋履可以随意使用皮，真丝，麻。从整体上，麻布的升限制到了单位宽度的支数。在职真骨中男性的支数为26支，可以推测这已经是用非常细的线致密织造的高档麻布。

真骨女性虽然有些元素与真骨在职男性通用，但内衣，围脖，梳子，发簪，冠属于女性服饰元素。梳子中禁止使用瑟瑟钿和玳瑁，前者大概是指将现在的塔什干地方产翡翠装饰成贝壳状的，后者是热袋海龟的壳儿。“冠”应该是指头上的盖头。如上所述，不仅规定了真骨，还详细规定了6头品，5头品，4头品乃至平人的男女服饰，由此对服饰材质分析如下：

首先是幞头。真骨可以随意使用任意材料，但6头品可以使用總

罗，總，绢，布；5头品可以使用罗，總，绢布；4头品可以使用纱，總，绢，布；平人可以使用绢，布。“總罗”指的是极其轻薄的有纹绸缎，“總”指的是平纹高级绸缎，“绢”指的是非常轻薄但较稀松的绸缎，“布”指的是非绸缎的普通麻布。

第二，腰带的装饰品。除真骨之外，作为装饰品，6头品可以使用乌犀，鎡，铁，铜；5头品可以使用铁；4头品可以使用铁，铜。“乌犀”指的是黑犀牛角，属于舶来品。鎡指的是铜与铅的合金黄铜。这两种材料均比铁或铜更高档一些。

第三，木靴。6头品以下不得穿着将黑色驯鹿皮染成紫色，绣有水波纹的特定皮靴。这可能是因为新罗官员争相效仿而导致的。在职真骨只要不是紫色，是可以穿着黑色驯鹿皮鞋绣有水波纹的鞋子。木靴的装饰带也有严格的规定。6头品可以使用乌犀，鎡，铁，铜；5头品可以使用鎡，铁，铜；4头品和平人分别可以使用铁和铜。

## 饮食文化

### 谷物

青铜器时代后期随着田耕的开始，正式步入了农耕社会。而到了斯卢国建国的原三国时代，主要耕种小米，黍，禾等杂谷。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气候变冷，导致稻谷整体减产所致。但据《后汉书》记载，辰韩自古以来土质肥沃，五谷长势良好。今天的五谷指的是大米，大麦，大豆，小米，黍，但《三国志》中关于弁韩朝的记录中记载着“因土地肥沃而适合耕种五谷和水稻”，即五谷和水稻是分门别类的，可见三国时代的五谷并不包括水稻。中国晋汉代时也将除水稻之外的小米，黍米，大豆，大麦，山药称之为五谷，其中小米和黍米的种植规模最大。

除了小米和黍米之外，主要作物还有大豆和大麦。据《三国志·东夷传》等记载，大麦在播种后要祭天，以求风调雨顺，可见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农作物。与其他作物相比，大麦的耕种期短，抗旱能力强，最迟也可在6月收获，因

此和大豆一起成为了田耕的主要作物。大豆无需高超的耕作技术，能轻松地简单地耕种，在凶年也能安全耕作，因此成为古代社会的主食。大豆和大麦这两种作物是受到国家关注的重要谷物。

作为说明这一时期谷物的遗址，有釜山机张佳洞的4~5世纪聚居遗址。对在该遗址中采集的土壤进行分析的结果，除了稻子之外，还发现了小麦，黍米，红豆等谷物以及桃子，香瓜，葫芦等和核桃，栗子，野草莓等。

稻子开始全面发展的时期是4~6世纪。进入4世纪初之后，铁器制作技术迅猛发展，农器具生产骤增。种植稻子所需的水利灌溉设施的建造和维修记录出现在4世纪以后的记录中，因为水稻与其他作物不同，需要有稳定的水供应。事实上，关于蓄水池的建造记录可以从法兴王23年(536)编写的永川菁堤的碑文中找到。菁堤的建造共投入劳工七千人，分为280个地区，每个地区25人。

6世纪之后，关于种稻子的相关记录增多，这说明大米已经取代新罗中古期之前的主要谷物即小米，大麦，大豆等杂粮，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三国遗事》中记载了发生在7世纪的一个故事，说真定法师前往太白山投奔义湘时，他的母亲把家里的米袋子掏空凑出7斗米，用它为即将远行的儿子做了一顿饭。由此可见，最晚在统一新罗以后，普通百姓也可以吃到一些大米。但一般百姓像今天这样将大米作为主食的习惯是到了朝鲜时期后才逐步形成的。

### 餐桌上的菜肴

新罗时代的餐桌必然是由饭和菜构成，是否也像今天一样喝汤和吃炖锅呢？崔致远的《桂苑笔耕》中提到“只吃白饭，难以体会搭配汤的美味”。在这里，崔致远提出“和羹”的说法，用此比喻了可以执掌天下的宰相。但因为该文是他旅居大唐时所作，因此单凭此文很难判断当时的新罗是否有汤。但“匙”这一餐具应该与汤关联起来。

匙是构成现代韩国饮食文化的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以匙为主餐具的国家不仅在东方，在全世界也只有韩国。该匙即用于吃饭，但更多是用于汤汤水水。

因此，匙的存在说明汤和炖锅等汤类食物是重要的菜谱。匙最初始于韩国青铜器时代，是用骨头加工而成。因为当时以混合了谷物和蔬菜等的粥类食物为主，因此很早就开始使用匙。韩国的大部分菜肴都是多汤热的热食，因此很难直接用手抓，光凭筷子也很难顺利进食。就像咸安城山山城中出土的木匙一样，三国时代的匙在餐桌分为主食和辅食之后，应该是用作喝汤的工具。

除了汤之外，餐桌上还有哪些菜肴，可以从《三国遗事》中一段记载中窥探，据说，文武王的弟弟车德公为了给从武珍州来到王都的安吉接风，特意举行“具饌至五十味”的盛宴。关于“五十味”，有菜肴达到50种的说法和用五张桌子(俎)摆上5味的不同说法。无论是哪一种，都可以由此窥探到7世纪中期居住在新罗王都的贵族们奢华的饮食文化。

肉类则通过狩猎或畜牧来供应。可以通过狩猎获得的动物有野猪，麋，鹿，兔子，野鸡，野鸭等。尤其朝鲜半岛自先史时代以来，从众多遗址中都出土了野猪和麋，鹿的骨头。《三国史记·金后稷列传》中记录了真平王放出鹰或猎犬来捕猎野猪，兔子等的事情。野生鸟类中，最受欢迎的是野鸡。据记载，武烈王即位之后每天要消耗酒6斗，大米6斗，公野鸡10只。从这些记录中不仅可以看到统治阶层饮食文化的奢华，还可以了解到对普通百姓来说野鸡也是比重非常大的肉禽之一。事实上，在建于5~6世纪的庆山林堂古墓中随葬的瓮中曾出土过大量的野鸡骸骨。韩国俗语中有一句是“以野鸡代鸡”，指的是没有最合适的时候就用最相似的代替，可见自古以来野鸡便与人们的生



图170 月池出土的青铜匙

活紧密相连。

畜牧实现了肉类的稳定供应。饲养的家畜有牛，猪，鸡，狗，古墓中出土的狗与马的骨头也证明了这一点。据《日本书记》中记载，此外饲养的其他家畜有鹅，黑山羊和山羊。《新唐书·新罗》篇记载了宰相之家多牛，马，猪。

与匙的使用一起构成韩国饮食文化特点的另一元素正是丰富的蔬菜食谱。尤其是作为春季野菜代表的山野菜是韩国特有的菜肴，保留了最晚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传统，在全球几乎也是独一份。这种情况符合了韩国山地和丘陵多的特点。蔬菜类有与生菜，蘑菇有关的记录。据《三国史记》记载，圣德王3年(704)公州进献了金芝，尚州进献了瑞芝。

据《三国史记》记载，神文王时在迎娶金歆运之女为王妃时，聘礼中就包括发酵食品及加工食品，备受关注。其中有大米，酒，油，酱油，蜂蜜，大酱，肉脯，米露135车和稻子(租)150车，吃食占据聘礼的相当大一部分。《隋书》中记载，新罗的婚礼受贫富差距影响，食物和酒的差距非常大。这些记录中出现的酱，豉，脯，醢是发酵食品及加工食品。8世纪左右日本的文献记载中出现，用大豆发酵的食品中有用黄豆和谷物酿造的酱，发酵大豆豆瓣的豆豉。前者是与今天的大酱，后者是与现在的清麴酱相似的发酵食品。醢也是一种发酵食品，应该与现在的海鲜酱或米露相似。肉脯是晒干肉类的加工食品。

体现饮食文化其中一面的是考古挖掘的祭祀食品的残迹。在庆州国立博物馆8~9世纪统一新罗时代的古井中，发现了人骨和大量的动物骸骨。动物除了猫，狗，牛，马，野猪，兔子，老鼠，鹿，麻雀，鸭子，野鸡等禽畜之外，还有青蛙，蛇以及鲫鱼，鲤鱼等淡水鱼类的残迹。此外，还有鲨鱼，鳕鱼，鲑鱼，鲈鱼，鲑鱼，大头鱼，黄姑鱼，青花鱼，鳕鱼，比目鱼，河豚等海鱼的残迹。这些都是在新罗领域内生长的，作为献给神的祭品出现在这里。与此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桃核。此外，4~6世纪的新罗古墓中除了鸡，野鸡等肉类骸骨外，还有海螺，白蛤，河蚬，蛤仔，鲍鱼等贝类和鲨鱼，河豚等各种鱼骨以及桃子，香瓜，栗子等果实类各种食物装在土器中一起随葬。

祭祀及各种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食物还有酒。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记载，琉璃王时用纺织决胜负，输的一方请吃酒和美食。唐朝诗人有歌颂新罗酒

的记录，可见新罗的酒在当时已经名扬中国。与酒有着相同地位的是糕点。今天的祭祀供桌上也必须摆上糕点，尤其是用大米做成的糕点更是祭祀食物中的重中之重。据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8月15日新罗人在唐朝的法华院中准备面片汤和糕点庆贺8月15中秋节。

特殊吃食可以举茶为例。茶虽然也是日常饮品，但更是祭祀用或供奉用品。

《三国史记》中记载兴德王3年(828)时出使唐朝的大廉带回了茶树籽，王命他种在智异山上。茶早在善德女王时已经存在，但到了这个时候才达到鼎盛时期。茶的普及与佛教密切相关。茶叶的效用在从中国是从后汉末期开始被人所知，并在东晋时期与佛教一起广泛流传。

此外，作为吃食可以举水果(五果)为例。新罗时代将桃，李子，杏，栗子，大枣等五种水果统称为五果。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桃子和李子从很早便开始作为果树种植。此外，《三国遗事》中还收录了关于桃树及栗树的故事。与此同时，中国将新罗的松子称之为“海松子”，并给予高度评价，经常作为进贡品。日本正仓院的文书中也有购买新罗产松子的记录。

新罗时代有应该作为药用的饮料，即人参茶。据《三国史记》记载，圣德王22年(723)向唐朝派遣使臣时进献了果下马1匹，牛黄与人参，海豹皮，金银等。此外，738年(孝成王3)时新罗王向唐朝使臣刑璫赏赐黄金30两和布50匹，人参100斤。734年向唐朝出口人参200斤以上，崔致远在唐朝任官时也单独向自己的上级赠送过人参。由此可见，统一新罗以后人参成为对唐贸易中的主要商品。这种人参比起生吃，更多应该是熬煮后入药或泡茶饮用。

在身份等级森严的新罗，饮食文化并非人人平等。王族，贵族层的食谱由米饭和汤，米露或海鲜酱，肉类和鱼类等的烧烤，肉脯及酒等构成，这些食物必然是由侍女用几张桌子端出来的。与之相比，百姓以用大酱或盐腌的小菜或蔬菜为主，鱼类和肉类只是少量食用。据《双溪寺真鉴禅师塔碑》记载，统一新罗时期的人物真鉴禅师家里无一斗多余的粮食，无一尺田地，但对父母极尽孝道，靠贩卖鱼鲜为父母做小豆饭。而他自己则是橡子和大豆糊糊搭配两三道小菜吃，即使贵人来访也没有加菜。该文反映了僧侣的特殊地位和修道者的缩影，但也能从中窥探到普通百姓们简朴的饮食。

## 居住文化

目前尚无阐述从建国之初到亡国为止新罗人居住生活的记录，而可以从侧面体现的考古学资料的调查水平和内容根据时代又有所不同。

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韩条》记载，“建造草屋土室作为居处，其形态如冢，门开在上方。全家共同生活在室内，没有大人孩子和男女之分”，而弁辰条中记载“造房子时将木材横向筑起，形似监牢”。这些记录中关于房屋整体结构及各部分的详细结构，我们可以参考继承了这一时代住宅结构大部分精髓的麻立干时期的住宅形土器(家形注子)的结构并进行理解。

若将上述记录中的冢简单解释为墓冢，那么住宅就是挖地而建的结构，即窝棚，并可以认为这种竖穴住宅大致上便是3世纪中期时住宅的基本结构。然而冢指的是高的坟墓，因此如果说草屋指的是茅草结成的屋顶，那么地面



图171 麻立干时期的家形土器

上土屋的外型在中国人看来可能像高顶墓冢，因而有此一说。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住宅是浅挖地基，或直接建造在地面上的地面式结构。此外，将“门开在上方”的表述是指竖穴住宅的出入口，但鉴于住宅结构为地面式，因此应该按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即，利用梯子进出开在一侧墙面上方的出入口的结构。这种基本结构大体上延续至麻立干时期，住宅形土器的存在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截至目前，从岭南地区的古墓遗址中实际出土或认为是从这里出土的“家”形土器(图171)表现出来的住宅，其各部位结构几乎相同。屋顶都是茅草屋顶，内部由墙体部分一层和屋顶正下方一层(阁楼)等2层构成，一侧墙壁上挂着梯子等。土器的这些表现写实度极高，真实反应了实际内部结构，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前一时期的住宅遗址挖掘结果来还原住宅结构(以下参考图172)。

住宅的结构是草屋。其内部由连接出入口的2层阁楼和支撑屋顶的承重墙(耐力壁)环抱起来的封闭的下层房间构成。因此，文献记录中的“土室”应该是指无出入门，只是用承重墙围起来的生活空间情形。当然，这里的承重墙并不



图172 住宅结构和各部位名称

是纯粹的黏土构成的,而是有以墙柱为承重中心的墙体架构,其中一部分可能会呈框架结构,因此应该是横向堆建起木材的表现。

墙体是先将主柱和壁柱密集竖立形成架构后,用混有紫芒等草本类的黏土填充内部的结构,起到直接撑起屋顶的承重墙作用。这一承重墙是为了让地面化的房屋结构实现不亚于窝棚的热效应而设计出来的。室内是没有分壁的单间结构。沿着灶台和一侧墙体而建的单排火炕是从早期铁器时代便已出现的炊事及取暖设施(图173),是房屋的核心元素。火炕末端是排烟所需的烟囱。

屋顶的一侧是圆锥形的四坡顶或隅进阁屋顶,另一侧是“人”字形屋顶向墙体前方稍微突出的结构。这应该是先史时代的四坡顶窝棚的低矮出入口结构进一步发展的形态。承重墙也是青铜器时代的窝棚中出现的壁柱发展的结果。“人”字形屋顶一侧设有的出入设施,可以利用梯子爬上去,通过出入门进出(图174)。

与这种独特的双层结构及与出入门直接产生关联的家具材料有伸向室内的系梁和高耸的梁上小柱。系梁由室内的四根柱子支撑起来,它既是支撑屋顶的辅材,也是阁楼的外榀框架。奇特的是,高的梁上小柱是在确保阁楼空间的同时,也确保了阁楼前地面上出入门到室内的进出空间的建筑元素。这种阁楼应该是每家每户的作坊,也是放置家具及个别家庭储存粮食的场所。

如此,执意要将住宅建成双重结构,并在阁楼开放出入门的原因可能是为了躲避危险动物对人以及日常生活的危害,而公元元年前后向冲积平原迁移时恰逢相对的高海面期,因此这种住宅结构也可能是为了应对上升的河水水平面。但这种住宅结构,尤其是阁楼上的出入门普及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导致了在机张佳洞村落遗址中,出入口开在了灶台另一侧地面上的现象。

麻立干时期新罗人的村落生活可在佳洞村落遗址中窥见端倪。村落位于群山环绕的盆地之中,可以从周边的山上获得栗木,榆木等丰富的木材,流经村前的河流,周边的农田里农耕活跃。不仅如此,顺着村里这条流入东海的河流,可以轻松与周边地区进行贸易与交流。

该遗址整体上明确划分了聚集平面抹角方形宅基地的地面式住宅区和聚集了瓜棚式高床仓库的地点。此外,还发现了生产土器用的窑炉遗址和井眼等。



图173 釜山机张佳洞居住遗址的地基



图174 还原模型



图175 瓦房形藏骨器外盒

住宅在某一时期大概达到了30~40幢左右。仓库是村里人储存收获的谷物或各种物品用的公共设施。其数量繁多说明该村落在当时的新罗地方中可能起到了类似一个据点的作用,在这些仓库中存放了贡品等。

新罗的瓦房大概是进入中古期后登场的。这些瓦房在一定期间内可能仅限于寺庙或宫殿等。不过据《三国遗事》记载,9世纪末的宪康王时都城没有一个茅草屋,住宅的屋檐和外墙都彼此相连。这一记录表明,进入统一新罗时期后,王都的普通住宅中也不乏砖瓦屋顶的房子。

统一新罗时期王都的居住情形可以通过《三国史记·杂志·屋舍条》中的兴德王禁令分析一二。如果说当时因毫无章法，规矩全无而颁布的措施是禁令的话，那么这个禁止内容本身就可以视作9世纪初之前的实际情形。禁令中详细规定了真骨，6头品，5头品等各种身份下应避讳的住宅各部位的详细内容。另外，各身份之间的禁止内容是在对最高身份之真骨的禁止内容基础上往下逐层增加的。因此，对真骨的禁止内容加上其下身份阶层的禁止内容，就可以窥探到当时贵族阶层“住”文化的方方面面。

真骨的房子(室)的长度和宽度不能超过24尺(约7.2米);不得使用瓦当,不得使用重檐;可以设置井字天棚,重椽,棋牙,兽头,但不得雕刻悬鱼;可以用白蜡和铜装饰,但禁止用金,银,流石,五彩装饰。可以使用中间台阶和双重台阶,但不得铺设阶石;不得使用三重台阶;墙不得用房梁和大梁;不得涂抹石灰。帘子(簾)边角框架可以使用绢和绳,但不得使用锦,罽绣,野草罗;屏风禁止使用刺绣;被褥可以使用绸缎辅料和紫檀,沉香,淮阳木装饰,但不能用玳瑁,沉香装饰。房屋的门可以使用双重门和四方门。

在此,对于“室”,如果按规定看作一间房间则太大,但看作一栋建筑物又太小。因此,也有一种说法是从正面看是三间房,每一间的宽度为7尺左右的房屋。重椽指的是木造建筑中架设房顶时设双重房梁;棋牙应该是指原始状态的棋包。兽头指的是屋檐上的兽头状装饰瓦。悬鱼指的是屋顶的搏风板在大梁上相遇的合阁阁顶部分垂落的鱼形装饰铁,应该是吊在八作屋顶之上的。白蜡是铅和锡的合金,五彩指的是五种颜色的丹青。常用的木材似乎是榆木。

如上所述,可以通过文献资料详细分析统一新罗时期瓦房的详情,但很难想象整体形态。幸好发现了用黏土将藏骨器外盒烤成瓦房形的文物(〈图175〉),成为了想象统一时期贵族家住宅的很好的参考资料。据此,可以联想到八作房顶的瓦房。

通过考古挖掘呈现统一新罗时期的居住文化详情的资料并不多,但从皇龙寺遗址东区一带(新罗王都S1E1地区遗址)(〈图176〉),可以窥探到利用贯穿东西与南北的街道进行一定划分的王都一个坊内家户的构成情况。一个坊的规模以道路中心间距为准,南北为172.5m,东西为167.5m。在内部空间建造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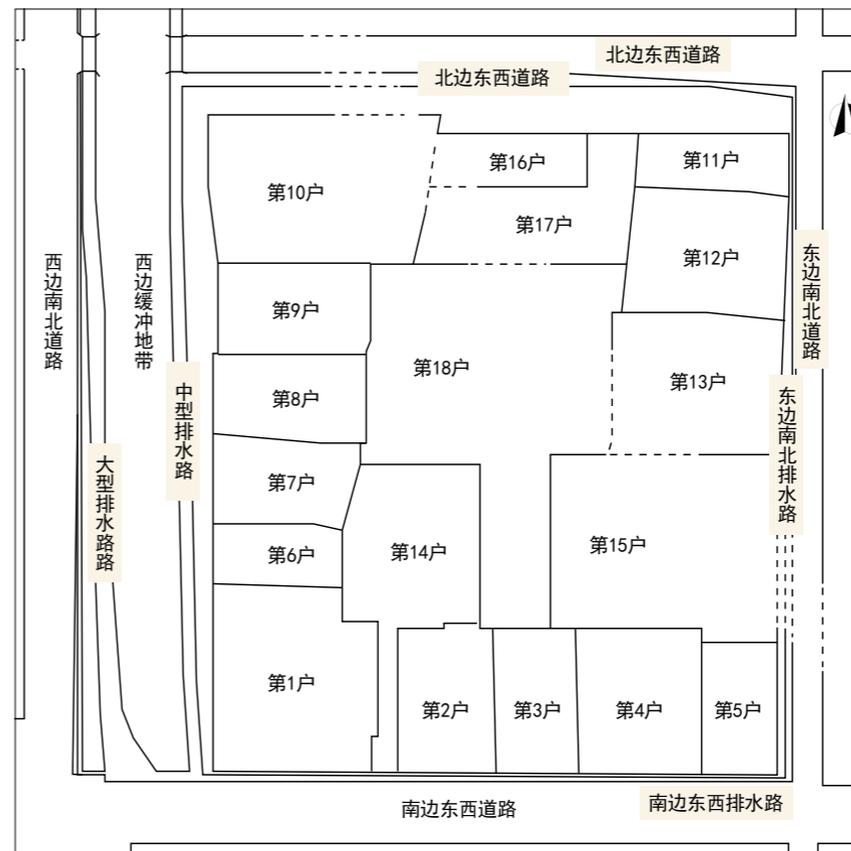


图176 新罗王都S1E1遗址遗构分布图

墙,里面通常分为拥有5~8期左右的建筑物和井水等的18户住家。在这18户住家中,围墙和建筑物保留相对完整地分布在南侧和西侧。关于住户的规模,除了位于南侧和西侧角落里的住户之外,位于南侧的住户住宅地基大致为南北30m左右,东西20m左右,呈南北长轴的平面长方形;位于西侧的住宅则是东西约30m,南北为20m左右的東西长轴的平面长方形。

其中,以第二户(〈图177〉,〈图178〉)为例,平面结构上南北比东西更长,面积为704m<sup>2</sup>。住宅应该均为瓦房,从建筑物的分布上看,在对应南侧围墙正中央门的北侧围墙正中央有着规模最大的朝南的第五建筑物。此外,剩余的7幢建筑物中东侧和西侧的围墙附近各有3幢朝东或朝西的住宅,只有第一建筑物才靠近第五建筑物的南侧。位于住户北侧的第五建筑物面积为37.45m<sup>2</sup>,是其他



图 177 S1E1遗址第二户挖掘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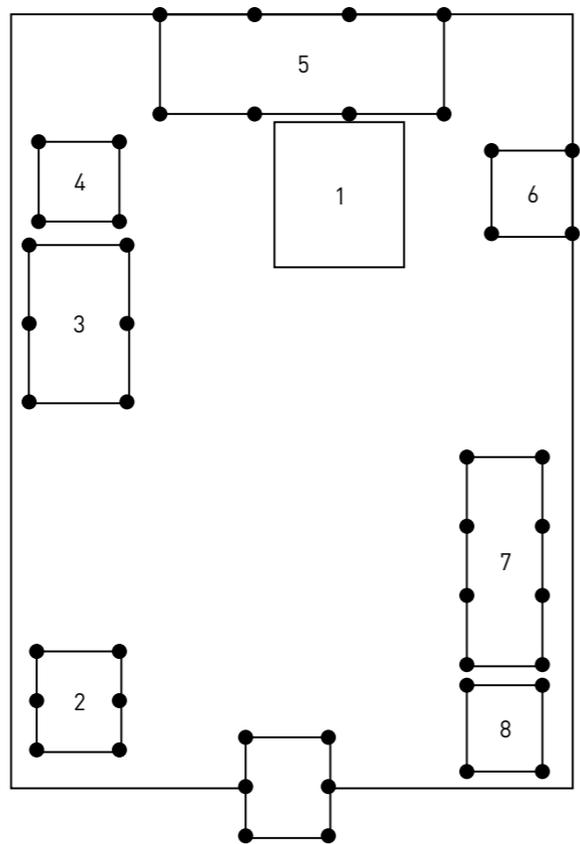


图 178 S1E1遗址第二户建筑物分布

建筑物的2倍~4倍以上，从规模和位置来看是第二户的中心建筑物。在第七建筑物中出土了可储藏谷物的大壶碎片，由此推测可能是仓库所在地。因为当时的王都并不具备中央集中式上水管理体系，因此作为居住生活根本的饮用水通过每家配备的井水解决。此外，也有一家拥有多个井眼的情况，其中一部分井眼应该是该家庭的仪典用井。

地方城市的居住文化可以通过在沙伐州部分区域的尚州伏龙洞遗址的考古挖掘中发现的积心建筑物和一般住宅地，井水等来了解。积心建筑物的中心方向大部分是东西轴的正南方向或南北轴的正东方向，与坊里规划线一致。每个积心通常直径1m，深度30cm，建筑物的长轴长度在10m以上，估计是大型建筑物所在地，分为正面3间的(图179)和1间，2间的。正面1间，2间的建筑物



图 179 尚州伏龙洞256号遗址积心建筑物



图 180 尚州伏龙洞230-3号遗址一般住宅地



图181 尚州伏龙洞256号遗址井水

考虑其宽敞的纵贯距离,互相对称的建筑物分布结构等,应该是为使几个建筑物形成一个单位空间而设置的特殊的公共建筑用地。反之,正面为3间的建筑用地分散在公共设施所在空间的左,右两侧,互相呈直角或平行密集分布,形成一个单位空间,从分布上呈“匚”形住宅分布形态。这种建筑用地配备有储藏室等,应该是普通居住建筑物的痕迹。

一般住宅地的浅挖竖穴平面形态为方形或长方形或椭圆形等固定形状,内部配备有灶台,单排火炕等炊事及取暖设施(图180)。灶台分为用黏土和石头,瓦片等制作的安置锅的部分和其边框设施。基本上与麻立干时期的设施相同,但火炕用保暖性更好的石头建造,这一点可以说是一种进步。

井眼全部为石造,地面部分已被破坏殆尽,如今只能看到地下部分。石造的平面形态大部分是圆形和方形。剖面形态大部分为筒形和上宽下窄形。井底大部分是修整沙砾层后,用加工好的木材架设井字形最下端设施,井壁为实现整体性的稳定和均衡,采用了下端大于上端的石材(图181)。

## 农耕

统一新罗时期是传统农耕的成熟阶段。新罗从6世纪左右开始建造蓄水池和扩大耕地,同时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包括犁在内的铁制农具。这种现象在统一之后进一步强化。三国时代铁制农具主要是古墓中出土的比例较高,但其量显著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从生活遗址中出土的量大幅增加。在这一时期仍然出土铁制农具的遗址大部分是与王室或国家相关的场所。这一时期的农具体现出来的重大特点有带犁镜犁头的广泛普及,铸造锄头的大型化,有茎式锄头的登场。

已出土的铁制农具包括犁和犁镜,U形铁镰,双刃犁铲,耙子,铲子,锄头,镰刀等,而新变化的核心是带有犁镜的犁上。带有犁刃的犁在三国时代的遗址中也有出土,但带有将犁好的土拢向一个方向的犁镜(鏊)的犁是从这一时期才开始出现的。犁的犁镜可以将土翻过来,实现深度犁地。因此,可以提升土壤的肥沃度,也由此实现了田里的续耕和地里的轮作。这一时期的犁可以说是继承了从首尔九宜洞遗址中出土的传统高句丽式三角犁,整体形态非常相似。



图182 龙仁彦南里遗址出土的犁

通过这些农具，虽然当时的田耕已较之过去发展许多，但因各种自然灾害而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尤其如文献资料中记载的一样，统一时期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在播种的3~5月份，危害极其严重。新罗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水利设施的增建和维修。早在中古期以来，便已开始着手新水利设施的建造和管理，调节河流或溪谷的水流，陆续开拓更多耕地，8~9世纪末堤防的增减和维修活动进入了活跃期。建于中古期的永川菁堤也是8世纪末重新修筑的，这一事实通过永川菁堤碑贞元铭记录了下来。另外，在菁堤碑的贞元铭中记录了798年（贞元14）出现了相当于水桶的“上排掘里”这一设施名称，据分析应该是从蓄水池向农耕地排水的过程中所需的设施。

统一新罗时期国家作为赋税征收的农作物，以粟，米，大豆为主。发给官吏的俸禄是大米，国库开仓济民时的粮食是粟。虽然在发展水田农业，但仍然以旱田农业为主，因此大米较为紧缺，所以普通平民以粟或大豆等为主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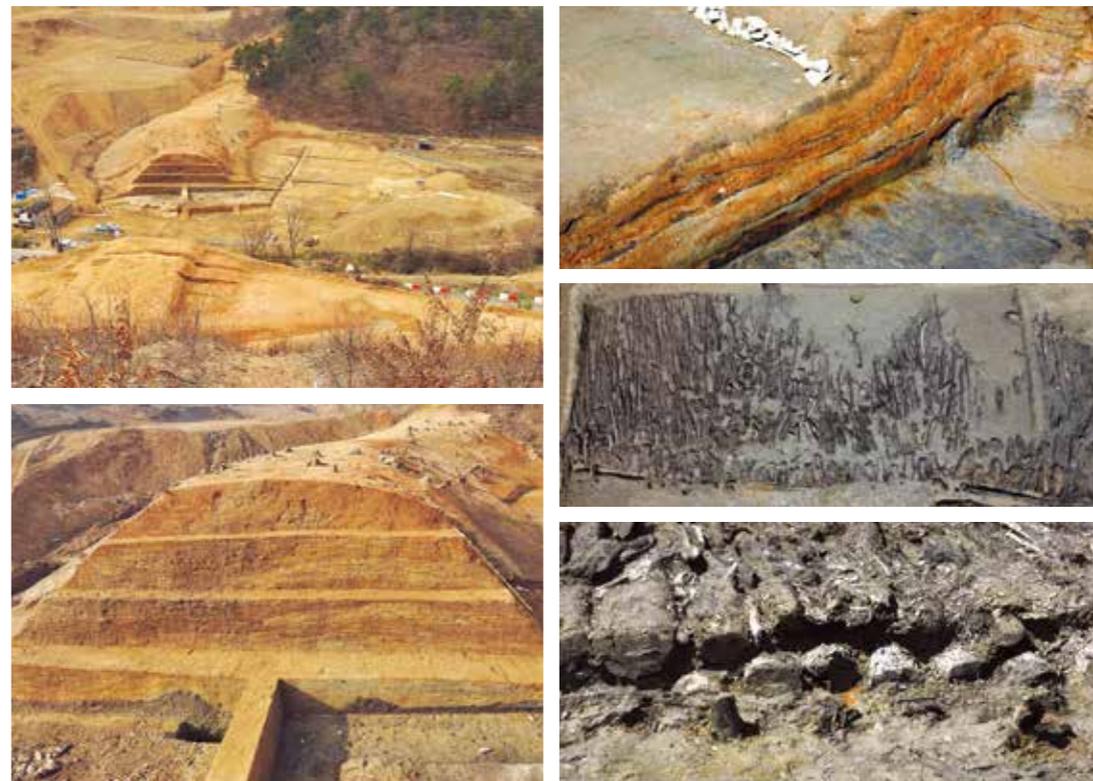


图183 水利设施遗址发掘现场(左:蔚山药司里堤堰, 右:尚州恭俭池)

### 物品生产遗址

从三国时代到统一新罗时期的土器生产工艺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窑炉的结构向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向发生了改变。从统一新罗时期土器窑炉的烧成部地面发现的有段式结构就是其中一个改变的元素。从庆州勿川里，金泉大圣里，龙仁冬柏地区等的遗址中发现的这种段应该是用于维持窑炉地面的水平，稳定放置器物。与此同时，5世纪以后出现的火口之积石火口从结构上解决了每次进行烧成作业时都要封闭和拆除黏土造火口，从而损坏窑炉本身的缺陷。这种窑炉结构的变化和各种烧成用窑炉道具的改进与土器生产的多样化紧密相关。庆州荪谷洞遗址中发现了各种陶枕，即土器托架，可见当时已经在生产精炼的高品质土器。

新罗从大约6世纪开始用瓦。但三国统一之后正式用于官府建筑和金入宅等，需求的扩大刺激了瓦片的生产。统一新罗时期瓦窑遗址以庆州地区的下邱里，金丈里，荪谷洞，望星里等遗址为首，还有保宁川防，益山弥勒寺遗址，青阳本义里，尚州青里，安东亭下洞，蔚山曲里等散落全国各地的遗址。大部分半地下式窑炉在结构上并未出现与提升生产效率有关的某种变化或特征。这应该与在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其需求群从根本上受到限制有关。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现的如庆州花谷里遗址一样，可以在一个窑炉中同时生产瓦陶的兼业窑也是特点之一。8世纪以后的大型遗址庆州金丈里遗址在窑炉内部同时发现瓦片和土器，弥勒寺遗址也在窑炉内外同时发现了统一新罗时期的各种土器片和瓦片。

统一新罗时期生产王京所需的生活物品，其中生产宫廷和官府及平民所需土器和瓦片等的村落都围绕庆州市中心坐落于城区外围。从那里发现了麻立干时期以来短期或持续生产土器的生产遗址。即，例如相当于庆州市东北侧外郊的川北面荪谷里和勿川里等地方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之外，世代生产王都居民所需的物品。西南侧的望星里等地也一样。如上所述，生产和消费体系的完善为庆州成为王都奠定了物质基础。

统一新罗的金属器生产遗址有：东川洞遗址，皇南洞376号遗址。东川洞遗址位于北川的北侧，出土了道路，大型建筑遗址和青铜工坊遗址。在用石列分



图184 庆州花谷里土器生产遗构和出土文物



图185 庆州花谷里出土的纹样砖



图186 东川洞遗址出土的模具

图187 皇南洞376号遗址出土的木筒

隔开的三间建筑物中，工坊遗址是位于中间的2间。位于内部，直径为3m的长方形窑炉中出土了大量的赤褐色铸模，由此判断此为铸模制作用窑址。在这里发现了4个青铜熔解炉和1个提炼炉。从其周边发现的琉璃铸模说明可能也同时生产着琉璃。

皇南洞376号遗址中出土了竖穴遗构，水井，积心建筑遗址，木柱列和木册，集石遗构等。该遗址有可能是由统一新罗的官府管理的仓库的附属设施或储存祭祀用献祭品设施的附属遗构。从该遗址中出土的木简中出现了意指仓库的“椽”，很有可能指的是管理工坊的衙门储藏物品所用的仓库。对生产设施中出土的琉璃碎片和琉璃熔炉分析的结果证明是铅玻璃。同时出土的石秤砣似乎是用于称重仓库中谷物重量的。

## 物品

统一新罗时期的土器文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从7世纪末~8世纪末，印花纹大肆盛行。印花纹在前一时期已经出现过，但那时候只是简单将一种图案印在特定部位上。而到了这一时期，整个碗面都会密密麻麻填满图案，极尽奢华。大致上，是在一个长条模板上印多个图案后一次性刻印的。因此，8世纪可以称为印花纹土器的鼎盛时期。

在土器种类中各种高杯类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盒和台附瓶。盒变成口缘向外开放的形态。这一时期随着火葬文化的发展，用印花纹奢华装饰的骨瓮需求量骤增。代表性遗址为676年竣工的月池。这里作为新罗的宫苑遗址，出土了大量上流贵族使用过的土器。

其次是9世纪初~统一新罗末期的土器文化。这一时期，印花纹装饰急剧减少，无纹是其特点。印花纹仍保留在褶皱纹瓶等部分土器上，但前一时期大肆流行的各种印花纹几乎销声匿迹。相反，褶皱纹瓶和扁瓶等各种瓶类开始流行，瓶颈上印有水波纹的大型瓮也出现在各个遗址中。小型褶皱纹瓶在表面装饰横向带线，或印上密密麻麻的虚线，实线以表现褶皱纹。四面扁平的扁瓶



图 188 庆州月池出土印花纹土器

在装车时可以摆放得更紧凑些，比普通瓮型的空间利用率更佳。

这一时期的土器以月池和皇龙寺遗址，弥勒寺遗址为首，在保安真竹里，始兴芳山洞，灵岩鸣林里等地的土器窑址中也有大量出土。此外，统一新罗末期后三国的争权夺势和社会紊乱使各地大兴土木兴建城池，因此在这些地方也出土了大量土器。将岛清海镇遗址就是其中的代表。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从中国进口的越州窑系青瓷碗在月池等多个生活遗址中出土。新罗早在7世纪便已开始生产涂有绿釉的土器，并拥有高温烧成土器的技术。加之9世纪中期接触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因此统一新罗末期已经具备了生产瓷器的条件。随之，大部分人都认同瓷器生产是从高丽时代才开始的说法，但统一新罗末期也存在生产的可能性。



图 189 庆州出土的凸瓦(月池等)



图 190 月池出土宝相华纹砖(调露2年铭)



图 191 调露二年铭文石砖详情

新罗的瓦以三国统一前后为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史无前例开始制作滴水凹瓦。与此同时，凸瓦开始融入中瓣形莲花纹，莲叶之间出现子叶，周缘部用珍珠纹装饰。这种形状比起单瓣形莲花纹凸瓦，变得奢华许多。此外，瓦当还出现了双鸟纹，麒麟纹，狮子纹，迦陵频伽纹等各种特殊图样，并流行宝相华纹，藤蔓纹，葡萄纹等各种纹样。但9世纪以后，瓦当纹样中出现了很多细长花瓣的菊花形，这一时期曾经华丽的纹样开始变得简单，也失去了往日的耀眼。

普通凸瓦在流入初期和土器制作方法一样，推测为是黏土带编制的，但后来用圆柱形模具制作。此外，统一之前以无段式凸瓦居多，统一之后流行的是有段式。凹瓦大致上先用类似长竹片的板子编制成瓦桶生产瓦片，后来发展为利用圆筒框架制作瓦片的方式。砧板从短板变成了长板。短板长度不足10cm，需要至少捶打3次以上才能完成。反之，中板的长度为12~17cm，需要捶打两次，长板则能一次性完成。大致上是同一时期后从短板变成了长板。这种变化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为了提高作业效率性所需。

石砖与现在的地砖一样铺在地面或装饰墙面。既有无任何纹样的石砖，也有在上面和侧面装饰华丽花纹或绿釉的。绿釉砖在皇龙寺遗址，四天王寺遗址，感恩寺遗址，兴轮寺遗址等地出土，应该是铺在佛堂内部或建筑物周边进行装饰的。石砖的纹路非常细腻和精致。最具代表性的是从月池出土的宝相华纹石砖。上面正中央是八瓣宝相华纹，四个角落是单瓣的花瓣，尤其在侧面分布了两头对视的鹿，空白的地方填满了手艺精湛的唐草纹。另一个侧面则刻有“调露二年汉只伐部君若小舍三月三日作康”的内容，调露二年即680年，是能从中了解月池周边建筑物的施工时间，6部分摊供应建材的情况，当时的官职等的重要资料。

此外，还有镂空纹石砖，龙纹石砖，狩猎纹石砖，表现佛与塔的石砖等，均在侧面描绘了纹样。侧面有纹样的石砖不是铺在地面上的，而是用于塔身或建筑物的壁面。用于装饰塔身的代表性文物有四天王寺遗址中出土的绿釉塑造像。日本侵略时期在铁路施工过程中发现并修缮了一部分，收藏于国立中央博物馆中。一直以来其被认为是四天王像石砖，但从2006年开始对四天王寺遗址



图192 月池出土嚼子



图193 昌宁火旺山城出土壶蹬

重新开展考古挖掘后，金砖的全貌终于浮出水面。该砖石装饰的是四天王寺东西塔底座外围，三个为一组，以塔身一面的台阶为中心分布了各2组，即6个。三个纹样均为全副武装的武将镇压恶鬼的形态，从表情到服装均细腻入微，但每个像中人物的视线与形态，恶鬼的形态都有所不同。该作品体现了统一新罗佛教雕刻的卓越水平，有一种说法是，这个作品是出自于当时的良志僧人。

统一后遗址中出土武器的情况显著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农具。农具和其他文物一样，在古墓中出土的案例几乎没有。例如龙仁彦南里遗址，在竖穴内发现了犁，犁镜，铁锅，锁头，嚼子等多重铁器，可以推测此处可能是铁匠铺或铁器存放的地方。此外，在庆州东川洞770号水井中出土了犁和鏝斗等铁器。

马具中，嚼子和蹬子的特点非常明显。嚼子主要是镮轡，与衔的侧面相交后多加一个圆环的双重外环是其特点。镜板呈“S”型，不仅有铁制的，还有金铜制和青铜制的。引手分为两个体系，即三国时代开始出现的双股工艺和从唐代的镮轡中发现的圆环工艺等2个体系。统一新罗时期镮轡的代表性案例有前庆州塔里，昌宁火旺山城，光阳马老山城，扶余扶苏山城，益山弥勒寺，龙仁彦南里出土品。

蹬子主要是包裹前脚的壶蹬。三国时期的壶蹬基本上都是先用木头制作出基本形态后，只将主要部分用铁板加强，而统一时期的铁制壶蹬则是整体用铁打造成的。统一新罗时期的铁制壶蹬为了更轻松地连接马鞍与蹬子或改变皮革穿过的孔的方向，或将脚踏部分向壶口外面更突出扩展，进行了功能方面的改进。庆州天官寺遗址，庆山林堂低湿地I区，昌宁火旺山城，光阳马老山城，益山弥勒寺，前黄海道平山出土品等。

## 对外 文物交流

### 贸易港

统一新罗的外交非常多元化，并伴随着活跃的对外贸易和交流。其结果，庆州王都传入各种文化和物品，令新罗文化具有国际性。据兴德王禁令条记载，在奢侈风俗的背景中发生着活跃的对外交流。虽然从考古学上并未发现外国人对新罗的见闻记或史书记载，但还是能看到冰山一角。在曾经作为王都的庆州以及地方的大型寺庙及行政中心均曾出土过从大唐进口的瓷器等物品，并发现了商人出入贸易港中的一部分。

将岛清海镇遗址是9世纪被张保皋设为东亚国际贸易中心，曾经十分繁盛的地方。很早便到中国任武官职的张保皋于828年返回新罗。他向兴德王谏言通过打击海盗和进行国际贸易来打破新罗朝廷的财政困难问题，兴德王任命他为清海镇大使，并拨给他一万军士驻军清海(莞岛)。清海镇位于连接西海和南海沿岸的海路上。那片海域恰好是从很早以前便开始连通东北亚三国的线路，尤其是日本对唐贸易船只的必经之地。

截止到目前，已经发现了清海镇大本营所在的将岛和象晃山下面的法华寺

遗址。将岛是距离壮佐里村180m前方的小岛。这里是以张保皋为核心的清海镇势力驻扎的大本营。遗址有海盗沙滩上的防御用木栅栏，且至今残留有内城和外城等城池的部分痕迹。木栅栏是为守护将岛南侧和西北侧海岸线而立起的木桩，在距离海岸线10m左右的海水里，1000余根原木隔着40~80cm左右距离伫立在那里。

出土文物有一面偏瓶，四面偏瓶，小型褶皱纹瓶，中国越州窑青瓷片以及滴水凹瓦和凸瓦，土器等。这些文物在益山的弥勒寺遗址和保宁真竹里土器窑址，庆州月池，郁陵岛天府洞古墓群等地也曾出土，与统一新罗下代的典型



图194 莞岛清海镇遗址考古情形



图195 清海镇遗址出土文物

文物形状相同。在土坑中也曾出土疑似祭祀用品的铁板和铁锅，青铜瓶等。青铜秤砣和箭簇，刀剑，铁制腰带，马具等表明清海镇不仅起到了贸易中心的作用，同时也是行政及军事据点。

另一方面，蔚山伴鸥洞遗址疑似新罗朝廷直接经营的外港相关设施。在考古挖掘区域内，除了统一新罗时期的木栅栏和水井之外，还发现了三国时代的建筑遗址和高丽时代以后的遗构。被发现的双排木栅栏全长约250m，木栅栏的排间距为4m左右。此外，第一区发现了3个岗楼，第四区发现了1个岗楼。岗楼所用的柱子是直径为45~70cm左右的原木，至今残留的原木柱的长度为130cm左右。建造岗楼时，挖1m深的主穴后插入木柱，主穴地面并不做特殊的设施处理。木栅栏与土城或石城相比，通常具有临时性的特性。但在伴鸥洞遗址发现的木栅栏



图196 蔚山伴鸥洞遗址木栅栏

无论是从结构的坚固度，还是围绕丘陵分布的状态来看，都是长期使用的。从残存状态上看，像将岛清海镇の木柱列一样，也许是防御及监控设施。

### 从遗址中出土的外来文物

在这一时期的几处遗址中，出土了一些反映统一新罗对外关系的文物。但当时文化交流的方向是从大唐到新罗，再从新罗到日本，因此文物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脉络。即，在新罗出土的主要是唐朝的文物，而新罗的文物通常是从日本出土或收藏于日本。

三国统一之后新罗的印花纹土器在日本列岛也频繁出土。从大体上可以归属于7世纪末~8世纪的史料主要在福冈县太宰府，鸿胪馆，福冈城址等日本政权的政府机构遗址中出土。几内也主要在与宫殿或官衙等有关的遗构中出土了同属这一时期的新罗土器。在奈良县明日香村石神遗址中，曾出土过长颈壶碎片。8世纪以后从城池遗址出土的案例有平城京出土品。大阪市四天王寺食堂遗址

出土的印花纹长颈壶是寺庙出土文物的典型。在类似大阪府大井遗址或奈良县明日香村西橘遗址的生产遗址中出土的印花纹土器是证明当时的官营工坊中可能有新罗人工作的史料。但到了8世纪后期之后,比起前一时期从都城,官衙,寺院出土的数量有所减少。这应该与日本与新罗外交关系的紧张有关。

676年,新罗在伎伐浦战争中打败唐军,在对唐作战中获得胜利。之后,两国之间的邦交断了大概35年。率先寻求和解的是唐朝。唐高宗向新罗遣使册封神文王为新罗王,命其世袭文武王的官爵。另一方面,新罗到了神文王时期后,迫切需要安抚因常年征战而涣散的民心,复苏已经荒废的国内百业。因此,新罗也希望修复与唐朝的关系。但两国的邦交并不是马上就水到渠成稳定下来的。到了后来即位的孝昭王时期,两国关系才有所改善。到了圣德王时在国内局势稳定的大前提下,与唐朝的关系终于走向稳定。圣德王在位36年间,向唐朝派遣使者46次,积极推动了对唐外交。惠恭王以后,新罗的政治,社会开始出现不安迹象,但两国依然维持着友好关系,并推动着人才,物资的交流。

在这样的外交关系背景下,唐朝的新型制度和物品相继传入新罗。但新罗并没有照单全收唐朝文化,而是根据本国实情进行了改变。在曾经作为新罗王都的庆州街市遗址中,出土过从唐朝进口的成品,并发现了大量以此为模型发展成新罗样式的物品。

数量最多的是瓷器。不仅在月池,王都遗址,皇龙寺遗址,天官寺遗址等王都各地大量出土,在扶余扶苏山城,益山弥勒寺遗址,光阳马老山城,将岛清海镇遗址等地方的寺庙和行政中心遗址中也曾出土。中国瓷器通常用作高档生活用品,有时也作为葬骨器使用。从庆州拜里出土的葬骨器是越州窑出品的两耳附壶与碗结合的形态,朝阳洞出土的葬骨器是唐三彩三足壶与新罗铜制碟盖相结合的案例。

金属器有铜镜和佛教工艺品。统一新罗遗址中出土镜子的案例并不多。从庆州川北面东山里出土的1件海兽葡萄纹镜和2件瑞花双鸟纹镜值得关注。这2件铜镜或是从唐朝进口,或仿造唐朝镜子而造。海兽葡萄纹镜是唐朝最具代表性的镜子样式,统一新罗遗址中曾经在庆州芬皇寺建筑旧址,王都遗址,光阳马老山城等地出土过。尤其是马老山城的出土品为方形,并伴随着中国越州



图197 庆州出土的中国青瓷与唐三彩(①拜里, ②锡杖洞, ③朝阳洞, ④萝井遗址, ⑤九黄洞王京遗址)



图 198 军威麟角寺僧塔遗址出土的工艺品(柄香炉, 香盒, 净瓶)

窑和邢州窑瓷器。瑞花双鸟纹镜的图谱可以从唐朝的镜子中找到,但也有可能在新罗制作而成,是高丽时代非常流行的镜子形态。

统一新罗的金属工艺文化之精髓是以舍利庄严具为首的佛教工艺品和月池中大量出土的王室生活用品。部分佛教工艺品也有可能是从唐朝进口的舶来品。昌宁末屹里退藏遗址的柄香炉,军威麟角寺僧塔遗址全部文物中的柄香炉,净瓶,香盒等铜制品是其代表性例子。末屹里柄香炉虽是最常见的形式,但炉身内部可以拆卸的内炉结构却非常奇特。麟角寺出土品与中国神会禅师庙塔(756)中发现的贡品非常相似,可能是与伴随的日晕底碗青瓷一起进口的成品。



图 199 体现与西域交流的文物(①九政洞方形墓, ②国立庆州博物馆孔雀纹样石详图, ③漆谷松林寺, ④月池)

除了这些唐朝物品之外,还有一些体现与西域交流的文物。其中,可以证明成品进口的有用作漆谷松林寺前塔舍利庄严具的琉璃碗和月池出土的琉璃杯等。此外,还有一些西域人形象的各种石造雕像和各种纹样元素。挂陵和兴德王陵的文人和武人像雕塑,九政洞方形墓角落柱子上雕刻的人物像等展现了外国人的风貌。这些也被解读为外国人曾出仕新罗朝廷,但认为是融入唐朝及中国各朝代的西域人雕塑形象传入新罗的说法显然更具说服力。纹样中除了宝相华纹之外,还有如庆州博物馆中收藏的石材雕刻所示的立于树下左右对称的孔雀纹等。这纹样与其说是与西域直接交流的产物,更大的可能性是以中国为媒介传入的。

**执笔班子** 李熙濬 庆北大学  
**(执笔部分)** 引言  
第1篇第1章,第3章第1·2·4·6节第2  
篇第1章第1~3节·5~8节

**李汉祥** 大田大学  
第1篇第2章,第3章第5节  
第2篇第1章第9·10节

**林玲爱** 庆州大学  
第1篇第3章第3节  
第2篇第1章第4节

**翻译** PanTransnet

**审校** 孟维 庆北大学



**编著者** 《新罗千年的历史与文化》编纂委员会

**发行人** 庆尚北道知事  
36759 庆尚北道安山市丰川面道厅大路455  
T. 054-880-3176 F. 054-880-4229

**发行处** 庆尚北道文化财研究院  
38874 庆尚北道永川市琴湖邑元堤2街38  
T. 070-7113-9011 F. 054-336-8323

**设计** 任昭罗, 金多英

**图片** 吴世允

**制作** 设计工房  
04554 首尔特别市中区忠武路13 ELORU Metro City 616号  
T. 02-2285-4132 F. 02-2266-9821  
<http://www.designgb.co.kr>

**印刷** (株)Taeung C&P

**印刷日期** 2016. 12. 1.

**发行日期** 2016. 12. 30.

**ISBN** 978-89-6176-247-2 98910  
978-89-6176-245-8 98910(SET)

本书的著作权归庆尚北道所有。  
未经庆尚北道许可, 不得进行转载, 复制或变相使用。  
copyright@2016 by Gyeongsangbuk-do